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衣俊卿
主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波兰] 亚当·沙夫 著 ● 衣俊卿等 译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ISBN 978-7-81129-870-3



9 787811 298703 >

定价：69.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
主编

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波兰] 亚当·沙夫 著 ● 衣俊卿等 译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 (波) 沙夫著 ; 衣俊卿等译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2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870 - 3

I. ①作… II. ①沙… ②衣…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异化理论 - 研究 IV. ①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1079 号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Pergamon Press, Oxford, 1980
Copyright© Adam Schaff

This book's right of translation abou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deputized by China Written Works Copyright Society.

Telephone: 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翻译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

电话: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ZUOWEI SHEHUI XIANXIANG DE YIHUA

[波兰] 亚当·沙夫 著

衣俊卿等 译

责任编辑 林召霞 张 慧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56 千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70 - 3

定 价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作为主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自知,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书不能抱过高的学术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地、系统地“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基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写一个较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某些参考。

一、丛书的由来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也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那时的我虽对南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碍,无法深入探讨。之后,适逢有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为了却自己的这桩心愿创造了条件。1984年至1986年间,在导师穆尼什奇(Zdravko Munišić)教授的指导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派代表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了他们热情而真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维亚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回国后,我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活》一书。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①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虽然除了本人

^① 如衣俊卿:《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衣俊卿:《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台湾)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衣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关于科西克、赫勒、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列论文。

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代表人物,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①,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只涉及几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把关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并没有把他们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同时,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位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略,也是不利的。应当说,过去30年,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 例如,沙夫:《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以及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等关于科西克、赫勒等人的研究文章。

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衡量,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这一基本格局而言,由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70、80年代之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了一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队,以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填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空白。2010—2015年,“译丛”预计出版40种,“理论研究”

丛书预计出版 20 种,整个翻译和研究工程将历时多年。

以下,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历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以便丛书读者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本划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的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显得更为复杂,范围更为广泛。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或理论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并陆续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但是,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

近年来,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调其特定的内涵和规定性。我认为,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来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具体说来,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 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 1923—2010)、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ć,

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 1923—2008)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 1931—2010)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Agnes Heller, 1929—)、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马尔库什(György Markus, 1934—)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斯维塔克(Ivan Svitak, 1925—1994)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除了上述十几位理论家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外,还有许多理论家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 Korać, 1914—1991)、日沃基奇(Miladin Životić, 1930—1997)、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ć, 1930—)、达迪奇(Ljubomir Tadić, 1925—2013)、波什尼雅克(Branko Bošnjak, 1923—1996)、苏佩克(Rudi Supek, 1913—1993)、格尔里奇(Danko Grlić, 1923—1984)、苏特里奇(Vanja Sutlić, 1925—1989)、达米尼扬诺维奇(Milan Damnjanović, 1924—1994)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女社会学家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1936—)、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1922—1999)、吉什(Janos Kis, 1943—)、塞勒尼(Ivan Szelenyi, 1938—)、康拉德(Ceorg Konrad, 1933—)、作家哈尔兹提(Miklos Harszti, 1945—)等,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霍韦茨(Milan Machovec, 1925—2003)等。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也考虑到目前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的限度,我们一般没有把他们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共

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支持者。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普遍经历了“斯大林化”进程,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以及工人自治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因为,1948年至1968年的20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理论传统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通常我们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

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1953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一样,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活动进一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定向,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杂志(PRAXIS, 1964—1974)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Korčulavska ljetnja Škola, 1963—1973)。10年间他们举办了10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

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2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1981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果。^①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沿革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时间点,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

^① 例如, Agnes Heller, *Lukács Revalu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3; Ferenc Feher, Agnes Heller and György Markus,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J. Gruml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son eds.,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Essays for György Marku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等。

期,第二个阶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时期。具体情况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或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布达佩斯学派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密切关注人类的普遍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赫勒的《日常生活》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他们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大体说来,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热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①、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夫作为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

^① 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等。

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献,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片面地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在这里,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以把握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我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①,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②。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II,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参见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I、II、III),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1988、1992年版。

^②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20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阈中，围绕着人类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①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

^①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x.

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①。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

^①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stička revolucija—Očemu je riječ? Kulturni radnik*, No. 1, 1987, p. 19.

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①,在我看来,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

^① 参见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4页。

才能达到。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等方面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类型。相比之下,20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具备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它们甚至构不成一种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评价的视角把握它的学术影响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作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文献分析,而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其理论已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他们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实践派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1965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德拉·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在内的共35篇论文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10篇——包括波兰的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普鲁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①1970年,弗洛姆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序,他指出,沙夫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个体主义、生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术界正确

^①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①。1974年,弗洛姆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他特别肯定和赞扬了马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弗洛姆强调,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而且已经成为由南斯拉夫不同大学的教授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和一生的工作。”^②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编撰论文集等方式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谢尔1978年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这是精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达迪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鲁波维奇等10名实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③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波塔默

① Adam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1970, p. ix.

② Mihailo Marković, *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 vi.

③ Gerson S. Sher, ed., *Marxist Humanism and Praxi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8.

1988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一书,其中收录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科拉科夫斯基等5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①此外,一些专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续出版。^②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③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④其中,赫勒尤其活跃,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于1981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1995年在不莱梅获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2006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Sonning Prize)。

应当说,过去30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① Tom Bottomore, ed.,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Oxford UK, New York USA: Basil Blackwell, 1988.

② 例如, John Burnheim,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nes Heller*,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 V., 1994; John Grumley, *Agnes Heller: A Moralism in the Vortex of History*,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等等。

③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④ 其中,沙夫于2006年去世,坎格尔加于2008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于2009年去世,马尔科维奇和斯托扬诺维奇于2010年去世。

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①,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②,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③,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④,等等。这些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已经真正进入到20世纪(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应当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

^①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9页。

^②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52页,即“人名索引”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尔库斯”(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译作“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③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0~95页,这里马尔库什同样被译作“马尔库斯”。

^④ 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一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必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坚持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争得理论和学术上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形成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还需要我们自觉地、勇敢地、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锋。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和错误，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但是，同其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的经历，因此，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

理论资源、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或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全面准确地了解的原则，即是说，通过这两套丛书，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具体说来，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多，著述十分丰富，“译丛”不可能全部翻译，只能集中于上述所划定的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在这里，要确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不被遗漏，不仅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如果不直接同这样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二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即是说，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比较中，加以理解、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因此，我们将在每一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入理论分析视野，而在“理论研究”中，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态度，才能使我们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和轻松，反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开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虽然包括一些有经验的翻译人才，但主要是依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轻的队伍，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一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硬仗，我感到一种悲壮和痛苦。我深知，随着这两套丛书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的不会是掌声，可能是批评和质疑，因为，无论是“译丛”还是“理论研究”丛书，错误和局限都在所难免。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定位于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束）——我始终相信，一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肯定会有更多更具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好在我一直坚信，哲学总在路上，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冲动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们不仅要挑战智慧的极限，而且要有执著的、痛苦的生命意识，要有对生命的挚爱和勇于奉献的热忱。因此，既然选择了理论，选择了精神，无论是万水千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跋涉……

>>> 中译者序言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系统阐发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现和深入阐发,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演进和发展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众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和理论资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人道主义立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对当代世界的全方位的理论批判、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都离不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人道主义批判精神。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中,沙夫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中的年长者,他的研究涉猎许多问题,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构成他的理论关注的核心。在20世纪60年代代表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正式兴起或问世的一批代表性著作中,沙夫的《人的哲学》(1961)一书是最早发表的一部,在这部著作中,他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发。1965年沙夫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一书时,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弗洛姆还为该书写了序言。沙夫一生关注人的问题,特别对异化问题,以及异化在当代世界的表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沙夫于20世纪60年代初所呼唤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要确立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阐发人的问题对于社会历史理解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这种对“人的哲学”的呼唤和对异化问题的高度关注,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回到马克思”和“复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

沙夫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①一书中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做了系统的阐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些涉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著作,例如,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0)、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1963)、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1965)等,相比之下,无论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基本内涵的系统阐述,还是对异化理论当代价值的深刻揭示,沙夫的《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都占据独特的地位。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一经正式发表,马上就推动卢卡奇于1923年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马尔库塞于1932年发表了专门阐述马克思这一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的专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应当说,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密不可分。同样,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中东欧的翻译出版,对这一地区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兴起起到重要的理论武装和思想助推的作用,几乎所有后来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家都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尤为突出。他们在苏南冲突之后大规模开展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急需一种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范式。因此,当1953年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

^① 沙夫的《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1977年以德文版发表(*Entfremdung als soziales Phänomen*, Wien: Europaverlag, 1977),1980年出版英文版(*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此后被翻译成波兰文、日文等多语种出版。

内的塞尔维亚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出版后,立即在哲学界出现了对异化理论阐释的热潮。1953年初,苏佩克就发表了《异化理论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意义》一文。他首先分析了人的社会异化的各种形式:对商品、货币和自然力的崇拜,对个人、国家、国家领导和官僚制的崇拜,等等。他认为,这些以及其他异化形式都是人的劳动异化和人的意识异化的表现,而人的劳动和意识的异化则根植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以及由于分工而造成的后果,例如私有制、专业化、城乡对立、阶级分化等等。在此基础上,苏佩克强调指出,不能期望随着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确立,随着阶级关系的消亡,所有异化形式均会立即消除。相反,“使人的意识和存在人道化,即扬弃异化的过程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和长期的过程”^①。同年底,日沃基奇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文章。他认为,在劳动分工基础上产生的私有制是人的异化的基本形式,其他异化形式均由此产生。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人的劳动异化、人的需要的异化、自由的异化和人的意识的异化等异化形式。他相信,“在共产主义,人的异化,社会存在与意识异化的一切形式都将消失,将被扬弃”。在这里,日沃基奇同对马克思异化理论持否定态度的苏联哲学家相反,他强调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充分肯定异化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的唯心主义劳动概念已经达到了伟大科学发现的一些基本内容,这些发现最后在《资本论》中得以表述”^②。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越来越多的实践派哲学家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多视角展开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入研究,一方面为自己所主张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实践哲学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关于当代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

① Rudi Supek, “Značaj teorije otudjenja za socijalistički humanizam”, *Pregled*, Sarajevo, 1953, No. 1, p. 55.

② Miladin Životić, “Marksova teorija otudjenja”, *Filozofski pregled*, Beograd, 1953, No. 2, p. 39.

全方位批判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在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探讨中,实践派哲学家最为重视的是马克思关于自我异化的揭示。他们认为,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但是,异化形式的数目并不是研究异化理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在这里也可以列举三种、五种或更多的异化形式,而不必只限于四种。要真正把握异化理论的精髓,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列举尽可能多的异化形式,而在于揭示异化在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异化这一实质。彼得洛维奇断言:“自我异化意味着人从自身异化,人从自己的本质异化,而这一本质既不能理解为他的(一般的、过去的或将来的)现实性的一部分,也不能理解为某种独立的超时空的理念,而是人之历史地给定的属人的可能性。”^①既然异化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异化,那么显然“应当在人自身揭示异化的根源”,即是说,应当在人的活动结构中,在人的本质中,而不是在人之外揭示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和基础。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人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不断通过自己的活动重新生产出自身和自己的世界,这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但是这一活动本身就包含着否定的可能性。人在扬弃自然性和给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否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人不断为自己制造和提出新问题,带来新的异化形式,而又努力去解决和克服这一切,努力超越现存。因而,弗兰尼茨基断言:“异化是必然的现象,甚至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的存在结构。”^②由此可见,在实践派看来,异化理论的重要意义绝非囿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定非人道现象的批判,而是对人的存在结构与人的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揭示。换言之,异化是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最为普遍的现象,它涵盖了个体活动和社会运行所有层面上的人类困境。同样,异化既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

^① Gajo Petrović, “Marksova teorija alienacija”, *Filosofia*, Beograd, 1959, No. 3-4, pp. 37-38.

^② Predrag Vranicki, “Marginalije ux problem humanizma”, in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 Zagreb: Naprijed, 1963, p. 295.

题,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实践派哲学家从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更加普遍的异化问题出发,充分肯定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日沃基奇断言,“当代世界的基本的人道主义问题都包含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中”^①,因此,“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异化理论”^②。

沙夫同实践派哲学家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高度重视马克思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当代价值。他还特别通过马克思异化理论被发现后所经历的复杂命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离不开对异化理论的阐发。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的导论中,沙夫特别详细解释为什么要专门写一本关于异化的专著。他发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异化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十分流行,很多学科领域都在讨论异化问题,甚至出现了专门探讨异化问题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但是,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异化热”形成强烈反差,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则受到冷落,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异化理论获得很高的声誉,50年代末和60年代异化理论在南斯拉夫和波兰也具有很大反响,可是以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则对异化理论持拒斥的态度,他们往往把关于异化理论的阐发作为修正主义观点来看待。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那些重视异化理论的人即便不是要完全推翻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歪曲马克思主义。沙夫指出,异化理论因为对当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具有特别的解释力而引起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广泛重视,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但没有抓住这一重要契机来进一步彰显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反而对异化理论持一种警惕的和拒斥的态度,这

^① Miladin Životić, “Humanistička problematika u marksizmu i savremenoj zapadnoevropskoj filozofiji”, in *Marks i Savremenost I*, Beograd, 1963, p. 158.

^② Miladin Životić, diskusija, in *Marks i Savremenost II*, Beograd, 1964. p. 152.

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令人遗憾的事情。沙夫特别借用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L. 费斯廷格 (Leon Festinger) 的认知失调理论 (cognitive dissonance) 和 M. 洛奇赤 (Milton Rokeach) 的封闭性心理理论 (closed mind) 来剖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异化理论的这种封闭的和僵化的心理机制和思维方式。

沙夫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中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的分析,论证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全部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沙夫按照思想回溯的方式,重点分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三个阶段:《资本论》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沙夫认为,在这三个阶段中,关于《资本论》时期的分析最为关键,因为反对异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断言,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时期,异化理论彻底地从马克思的文章中消失了。例如,阿尔都塞就强调异化理论的人道主义立场是非科学的,因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沙夫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正如一些学者,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厄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等人所发现的那样,在《资本论》中存在很多关于异化的论述和思想。不仅如此,沙夫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必须充分估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①的重要地位,因为它是《资本论》的第一稿。而正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直接使用了青年时期所表述的异化概念。“正如在其青年时期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所发现的一样:人的劳动产品转变为一种与他自身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以异化理论作为他经济学思想基础的例子比比皆是。”^②沙夫通过对马克思关于

^①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新翻译版本中被译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31卷,人民出版社1995、1998年版)。鉴于沙夫这部著作的写作年代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以在本书的翻译中我们沿用了此前国际和国内理论界比较通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译名。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41.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分析等问题的分析,具体展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由此,沙夫断言,异化理论存在于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之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详尽地论述了异化问题,同时也使其在马克思《资本论》体系中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应用明朗化。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经常使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概念和语言,因此也就驳斥了存在两个马克思的论调。与此相反,异化理论在这部成熟马克思的著作中的活力与其早期著作相比并未减弱,《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清楚地表明异化理论渗透在《资本论》的整个知识结构当中。^①

在沙夫看来,从《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思想时期,也就是他的晚年成熟时期向前回溯,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他承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以及《共产党宣言》时期,马克思的确曾经表述过对“异化”概念的讽刺性评价,这些论述成为阿尔都塞等人断言1845年前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出现“意识形态断裂”,并由此否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重要根据。但是,在沙夫看来,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批判异化理论本身,而是针对当时一些哲学家和理论家对异化等思想的抽象使用的一种拒斥。在引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异化”概念的否定性论述后,沙夫指出,“这两个段落的确都是讽刺性的,但它们所针对的并非异化理论本身,而是那些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与之辩论的作者们对于异化理论某种可悲的应用。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嘲弄的是那些来自于他之前伙伴中的抽象的哲学家的话,他们企图用关于‘人类本质异化’的哲学废话代替对货币关系的分析,那么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拒斥异化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将‘异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41.

化’置于引号当中,并且还讽刺性地加上了他使用这个词是为了让哲学家们能够理解的注解,这只能说明有特殊倾向的哲学家们对异化理论进行了抽象的应用(这是为什么在他提到扬弃这种异化时强调‘实际’这个词的原因),而不能说明马克思拒斥了异化理论”^①。

通过关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的命运的分析,沙夫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的当代价值,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沙夫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的导论中说明自己写作此书的意图时曾经非常精练地概括了他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性的认识:

我的意图很清楚:我首要的是为马克思主义者写这部书,正是要在他们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我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我想说明,就异化理论而言,这里所涉及的利益攸关的是马克思的真正的思想,而不是他尚不成熟的思想。第二,我想说明,我们所讨论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的革命活动的支柱之一。^②

沙夫指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其他关于社会现象的伟大解释一样,具有对人类现实问题的独特的解释力和批判力,从实践活动的角度看,其中包含着两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可能性:一方面,异化理论可以对社会各种有害的现象做出病理诊断;另一方面,异化理论有助于我们找出克服这些现象的合适的治疗方法。而且,异化理论的这种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适用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也适用于对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困境的分析,因此,有必要系统地、全面地阐述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刻理论内涵,并结合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类的危机和困境,深刻揭示和阐发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46.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8.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

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沙夫高度重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的基本理论分析,但是,他认为,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关于异化和自我异化的论述还不够,还应当结合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等著作中的有关思想,揭示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conceptual apparatus),即通过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几个基本范畴及其相互联系来建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整体思想。沙夫对于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的基本含义做了这样的说明:“当论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时,我所指的是它的概念网格(conceptual network),它不考虑这一理论所经历的变化,而是作为始终如一的特征被从异化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推断出来。因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依照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历史变化而进行的概念分析的差异与特质,而是是什么使这些概念联结为一个整体,促进马克思思想在这一领域的持续发展。”^①

沙夫认为,构成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的核心范畴包括三组:一是异化和自我异化(alienation and self-alienation);二是异化和物化(reification);三是异化和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沙夫指出,对这三方面的概念逐个分析,并且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的精准把握,而且将为我们对当代异化问题的进一步反思提供基础。

第一,异化和自我异化。沙夫仔细解析了马克思所使用的一系列相关范畴,如 Entfremdung(异化)、Entäusserung(外在化、异化)、Veräusserung(外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对象化)等,在此基础上,沙夫断言,贯穿于马克思全部思想发展继承中的异化理论的核心范畴是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55.

异化和自我异化。具体说来,沙夫认为:

马克思在从早期到晚期的所有著作中区分了两个概念——“异化”和“自我异化”。它们是两种彼此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名称。异化指的是人与其生产活动的产物(在这个词的广义上,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智力的产物,以及社会制度等等)的关系。自我异化指的是人对他人、社会及他自身的态度。^①

沙夫把异化现象理解为特殊的社会关系,用以揭示人在异化条件下的存在状态。在他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和自我异化所呈现出的两种社会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或者是同一种社会关系的两个层面。具体说来,“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区别在于究竟是人还是他的产品与他自身相异化。我们谈及异化时,是说人的产品在与其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中使它们自身异化(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个问题),谈及自我异化时,是说人在与社会、他人或自身之间的关系中使他自身异化”^②。从这种区分,可以看出,沙夫在论及异化时,更多地描述人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摆脱他的控制,并且反过来控制他的外在力量而存在,这里更多地强调异化现象的客观状态,而他论述自我异化时,则是强调人作为一个主体,不仅失去了控制自己的产品的能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主动同他的产品、他人和社会关系的疏离,因此,这里更多地揭示出异化现象的主观状态或者主体存在状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当沙夫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中开始具体分析当代人类社会的异化问题时,他使用了“客体的异化”(objective alienation)和“主体的异化”(subjective alienation),这刚好与这里的异化和自我异化相对应。

沙夫在阐述异化和自我异化作为对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的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p. 56-57.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57.

否定现象时,分析了异化的消极后果,他特别揭示了异化现象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沙夫把异化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状态描绘为社会发展的“自发性”。他指出,“如果异化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人类的活动结果在既定社会机制下被人以盲目的方式发挥其作用,转变成阻碍人类计划目的实现进而支配着人的自律的力量,那么我们实际上说的就是社会发展的自发性。‘自发的’在这里等同于‘人的盲目’,因此它有时‘与人的计划对立’甚至‘与人及其有意识的活动相异化’。人类活动的异化产物表现得像某种要素——火、水等等——当其摆脱人的掌控并摧毁他的财产甚至生命时就像一支入侵一个国家的部队”^①。因而,无论从个体生存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扬弃异化都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异化和物化。沙夫十分重视马克思的物化概念和物化批判,他认为在马克思所使用的异化、对象化、物化、拜物教等概念体系中,物化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根本上讲,物化与异化是同样的现象,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然而,当使用物化这一范畴时,就更加突出了马克思思想的经济学内涵,这使得异化理论的关注点从关于一般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的描述,转向关于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人的异化状态的批判。

沙夫是从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入手来探讨物化问题的,他指出,“马克思认为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是在任何社会结构中都会出现的现象;否则人们将不能生存和生产。正如人类思想的外化对于它成为社会、人际间的现实来说是必然的,对象化作为人类活动的实现同样也是必然的”^②。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不难看出,在对象化之中,就包含着某种可以称为物化的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60.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75.

现象,也就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以具有自然物体形态和典型特征的物告终”^①。然而,沙夫强调指出,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不是这种对象化意义上的人的劳动凝结于劳动产品之中,因为这种对象化实际上是确证了,而不是否定了人的劳动和人的主体活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沙夫认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意义上的物化是指人的关系屈从于或者变成一种物的关系,一种商品关系。他指出,

在商品经济体系中,包括人及其能力和天赋等等在内的一切都成为一种商品,这里有一种将一切都视为商品,即可供买卖的物的趋势;而且因为物就是商品,所以这里还有一种赋予一切以物的本质、物化的趋势。在被理解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及人类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的人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在此意义上产生并模糊了社会进程的本质。对马克思来说,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了异化,即客体的异化而不是主体的异化,正是这种异化产生了私有制,尽管异化、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随之而来。物化在马克思看来是诞生于异化的结果。^②

基于这种分析,沙夫认为,物化概念的提出就在于它揭示了对象化的扭曲形式,揭示了异化状态中人的关系变成非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分析商品生产条件下日益普遍的异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沙夫认为,我们必须清楚地指出,对于物化在马克思异化理论中重要地位的揭示,应当归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沙夫指出,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才得以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75.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p. 75-76.

1939—1941 年期间才出版,卢卡奇以自己独具的思想敏锐性和理论创造力从《资本论》的研读中,概括出马克思的物化思想,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 10 年前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为主题表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历史功绩在于向世界译解和引介了马克思思想体系被忽视的理论方面”^①。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商品形式越来越普遍,物化也就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普遍性特征,这正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自觉地描述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影响了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影响了海德格尔等存在哲学的思想家。

第三,异化与商品拜物教。沙夫指出,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中,商品拜物教与物化是密不可分的概念。“一旦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貌似他们产品之间的关系出现,那么商品就成为崇拜物、上帝般的偶像以及人类力量和特征显而易见的化身。因此,‘商品拜物教’是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他们产品之间关系这一事实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名称。”^②

沙夫指出,马克思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它涵盖了人对于各种独立于自己的活动和控制的物态的和符号性的东西的崇拜,例如,与商品拜物教密切相关的货币拜物教,以及与商品拜物教情况相似的典型的语言符号崇拜,等等。沙夫认为,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要理解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的本质关联,从而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异化现象。他指出,

“拜物教”范畴和“物化”范畴有机地彼此相连;它们实际上是对同一种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为表现的社会关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76.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80.

系的不同表述。拜物教理论表明,当价值关系对外表现为商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商品交换价值以其劳动为基础的这些商品的制造者之间的关系时,商品就会呈现出偶像的特征。物化理论则表示人之间的关系对外表现为物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物化的”。两种理论谈及的是同一件事,差别在于拜物教理论研究的是这一关系中假设其为一种与人类特性相异化,并成为一种偶像类型的以商品为表现形式的物的方面;物化理论接近同一关系中被赋予物的特性、成为物化的人的关系方面。^①

通过上述三对范畴的解析,沙夫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深入挖掘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理论,而且还通过对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为我们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彰显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沙夫在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做了分析之后,接着就从客体的异化和主体的异化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异化问题的批判。

三、当代社会的客体异化和主体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看,不属于那种关于人的存在的纯粹学理反思的理论,而是一种致力于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的批判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致力于从异化理论的视角批判各种具体的异化现象和物化现象。同样,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现在国际学术界持续引发的理论热情也不是出自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纯粹理论逻辑,而是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因此,沙夫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阐发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当代价值。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p. 80-81.

在阐发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时,沙夫就一直是结合着当代人类历史实践来解读马克思的异化批判思想的。例如,他在分析异化现象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自发状态和盲目状态时,就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例子,从很多方面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实践结果背离了实践目的的异化现象。沙夫认为,我们经常置身于这样的社会进程,在其中,个体或者整个社会都力求实现某一个目标,但是他们行为的结果并不与其目标相符,甚至是大相径庭。“人生产对象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但这些对象却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发挥着商品的职能。当生产过剩的危机随之而来,它们不但无法触及消费者并满足其需求,而且还像泛滥的自然力量那样通过失业、饥荒等手段摧毁了人。人类发展科学以掌握关于世界的知识进而强化对于世界的掌控;但诸如原子能这样的知识也能扮演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量的角色。这些例证也许还要增加,包括导致宗教法庭的意识形态,通过其官僚主义机器消灭人的国家,引发人口爆炸、污染环境、耗尽自然资源进而威胁人类生存的科学。我们在以上全部事例中所面对的是社会发展的自发过程及在客体关系意义上的异化。”^①在该书中,沙夫除了对上述各种具体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以外,还集中大量篇幅从客体的和主体的两个方面来透视当代人类社会的异化状态。

关于客体的异化,沙夫没有聚焦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工人生产的具体劳动产品的异化,而是在社会运行层面上揭示当代人类社会的普遍异化。沙夫认为,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人的一切产物都具有异化的倾向,异化和物化越来越呈现出普遍化的特征。但是,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异化构成了客体异化现象的主要内涵,这就是:经济的异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异化、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沙夫关于这些异化现象的分析十分清晰,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及一下他的主要理论要点。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61.

第一,经济的异化。从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中的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已经不难看出,经济的异化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沙夫指出,“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现的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在商品交换中变得不依赖于他们的生产者的意志和目的,这是客体异化的一个经典例证。这是那些伴随着战争,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迫使人们以最敏锐和最痛苦的方式意识到,他们的劳动产品不仅会变得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图,而且甚至还会威胁到他们的健康和生存的社会现象之一”^①。在沙夫看来,经济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之所以占据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异化影响人的最基本的生存,另一方面,经济的异化构成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异化的基础。对此,沙夫做了深入的分析:

经济的异化这种异化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着一种独特的作用并不奇怪。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的人的社会,即人不再受自发的社会发展的反复无常所支配,而是以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方式决定这一发展,那么经济的异化就必须首先被克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目的正在于此。然而,抵制经济异化的斗争还必须建立在另一个前提之上;依据马克思的观点,重要的是在经济异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其他形式的异化。这就是马克思从宗教和意识形态开始,继而将其注意力转向政治的异化,最后以作为基础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foundations)的经济的异化结束的原因。^②

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异化。政治异化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99.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99.

人类历史演进和人类社会结构的形成时就已经表达了政治异化的思想。一方面,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①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这些从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构对人的背离和统治。他们断言,无论在生产力的意义上,还是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受分工的制约,“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②。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这种政治异化现象并没有消除,反而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普遍化和更加严重,这显然与现代性背景下社会政治结构的理性化和不断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沙夫在分析当代社会的客体异化时,对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异化高度关注,他在这里重点分析了国家和官僚制的问题。

沙夫首先分析了国家作为一种异化结构的问题。他指出,“当代社会,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就是国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家是异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③。关于这一点,沙夫认为,应当没有任何疑义,国家从诞生起就是作为一种异化的统治机构而存在,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高度重视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命运问题,并提出了国家消亡的思想。对此,沙夫做了理论概括:“国家是社会通过暴力而产生的一种异化机构,它源自社会的内在矛盾,但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起源于社会分化成阶级及其斗争,国家总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通过暴力获取被压迫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顺从。但是,当社会的阶级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③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106.

化消失了,在那时,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的结果,阶级自身消失了,那么国家也将必然消亡。”^①沙夫认为,问题不在于对国家的异化本质的认识和对国家在未来走向消亡的必要性的认识,而在于,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无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及其机构非但没有逐步走向消亡,反而呈现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以生产者的自治为核心的民主和自我管理都还是一种理论构想。因此,现代社会的政治异化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趋势。

现代社会政治结构异化的加深,不仅体现在国家的进一步强化,而且还突出体现在与现代国家运行理性化密切相关的官僚制(即科层制, bureaucracy)的发达和盛行。官僚制是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的表征,是社会管理机制理性化的突出体现。韦伯曾专门分析了官僚制的构成,包括专门化的职员培训、档案管理、科层化的责任体系等。应当说,官僚制的形成,其最初的宗旨无疑是为了提高社会管理和运行的效率,但是,官僚制的不断膨胀又会导致例行公事、抑制创新等负面效应,特别是会形成一种凌驾于个体和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因此,沙夫和很多理论家都明确剖析了官僚制的异化本质。他指出,

官僚制变成了并且必然要变成一种异化的力量,不仅独立自主于它的创造者,而且甚至违背和疏离于他们的兴趣,当论及我们对作为“官员的统治”和作为“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官员整体”的“官僚制”的理解时,我们补充两个上述所引用的词典的作者所忽略的更深层的特点。它们是:第一,这种“官员整体”从民众中的分离;第二,官员的具体的等级组织建立在其自身的法律和规范的基础之上。^②

第三,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106.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113.

态》中就从分工的角度谈到了精神生产的独立化和意识形态异化的思想。他们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①。进入20世纪后,人类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进入了空前的发达时代,这种状况在极大地推动现代人类的精神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同时,也使人类常常失去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批判成为20世纪众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共同关注的主题。

沙夫在这里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他列举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反复批判的宗教,把它作为意识形态产物异化的典型例子。同时,他还指出,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形式十分多样,从一般的理论体系,到语言、科学、艺术等,都可能成为异化的现象。沙夫对意识形态异化的内涵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加以揭示:一是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二是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对人的操控。沙夫指出,“意识形态可以在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意义上被视为一种异化的产物。这是马克思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但是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成的产物被接受时,认识到它的异化同样也是可能的。意识形态可能会与它的创造者所给予它的内容不相容”^②。

通过对经济的异化、政治的异化和意识形态的异化的批判,沙夫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客体的异化现象,进而,他又转入了对普遍的客体异化背景下的主体的异化,即自我异化的分析。从异化的内涵上看,沙夫所批判的客体异化和主体异化在很多方面是相互交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p. 135-136.

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沙夫在剖析客体的异化时,着眼点放在人的活动的产物的自律和外化,而在分析主体的异化时,则把着眼点集中于主体的精神状态和存在状态。正因为如此,沙夫在“主体的异化”这一章中首先用了不少篇幅来介绍当代社会心理学关于“失范”(anomie)现象的理论,如埃米尔·涂尔干(Emil Durkheim)、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等人的理论观点,其重点是探讨失范和自我异化之间的本质关联。沙夫认为,失范这个术语对于我们的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是必要的,因为第一,它在这个学科文献中被广泛使用;第二,在一种恰当的“客观”解释中,它为异化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不同的角度。当然,沙夫认为,失范与异化是有区别的,但是,失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自我异化的理解。“我们拒绝将失范和异化等同起来,我们把“失范”理解为这样一种社会情形,在其中,由于社会体系的无秩序,社会所接受(从内化的意义上讲)的价值行为体系的崩溃,导致社会成员被剥夺了选择社会行为标准的结果。失范强调了社会成员自我异化,也解释了自我异化的根源。在分析异化的具体表现时,特别是人对社会及其机构的异化,或者某个生命(所谓存在的空虚)无意义的感觉,等等,对于失范的类别有所丰富,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更多情况。”^①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沙夫剖析主体异化的侧重点。在这里,沙夫主要是从两个大的层面来揭示现代主体的异化:一是个体与社会、社会机构及他人关系方面的异化;一是个体与他的“自我”、他的生命和他自己的活动关系方面的异化。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非常简要地提及一下沙夫这两方面的观点。

关于个体与社会、社会机构及他人关系方面的异化,沙夫重点谈到了政治异化、文化异化等。这里的重点不是谈论政治、文化等同人的疏离和对人的操控,而是强调人在这些活动和机构中的主动的、自我的异化。例如,在谈及主体异化意义上的政治异化时,沙夫重点讨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157.

论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政治态度,个体从“政治是肮脏的游戏”这一信念出发,逃避政治活动和社会参与。沙夫强调,“当我们说‘政治异化’我们想说的是人们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表现形式——机构的运行,意识形态的发展,等等——相异化。因此,我们认为的是关乎其政治问题的感情、态度(对行动的准备)以及个体的行为被异化了”^①。而谈到文化异化时,沙夫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文化结构和价值规范的拒绝和触犯,因此,他也把酗酒、吸毒和各种犯罪纳入到主体的异化中加以思考。这里所强调的都是主体的态度上和行为方式上的异化。沙夫指出,

从一个特殊的观点来看,政治异化是指个人与社会相异化;他拒绝行为规范中的某些价值观隐喻,那些有关机构和社会政治行为的规范的行为规范。这可能假定反对现有体制和政治价值观的革命斗争中“逃避”冷漠的形式或反叛的形式,目的是为了进行激进的社会转型。但除了这一点,个人仍处于社会,处理一些例外情况,他仍可以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但个人的异化可以进一步发展,超过界限,拒绝**整个**现有的规范价值体系,即用默顿的话来说,拒绝社会现有的整个文化结构。^②

而关于个体与他的“自我”、他的生命和他自己的活动关系方面的异化,首先,沙夫讨论了个体对于自己的“自我”的异化。这意味着个体把自己当作相异的东西,当作存在于自我之外的无法鉴别的个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已经深入到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之中。在沙夫的分析中,这种同“自我”的异化包括很多情形,例如,其中包括现代人的心理疾患,“失去自我认同感出现在特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172.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178.

定的心理疾病中,当一个人没有失去自我意识,但是经受神经分裂症病痛的折磨,使他不能清楚认定自己的‘自我’”。也包括正常人的心理状态,“当对比个人所具有的模式时,也就是与他想要成为什么,他想要在表面上看起来像什么进行对比时,我们能感受到‘自我’的异化。他在现实中是什么,令他不满意,相反,产生强烈的自我批评”^①。此外,其中还包括人在市场条件下自我认同感的消失,“当个体把自己投身市场关系中,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自己的特定特质,能力和行为是异化的,是商品/物品”^②。其次,沙夫讨论了个体同自己的生命的异化,他用“生存空虚”这一典型的存在哲学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自我异化的状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能体验自己与自己的生命相异化的这种状态吗?沙夫认为,“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地破译这一问题,但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因为在这群异化的人中,不仅能找到存在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他们直接表达与生命有关的异化,也能找到那些表达感到生活空虚和存在无意义的人,为了逃避这种生活,他们酗酒、吸毒、滥交、流氓甚至犯罪,等等”^③。最后,沙夫还谈到了个体同自己的活动相异化的情形,这里的论述非常接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异化状态下人对构成自己本质的劳动的逃避现象,因而,这也是深层意义上的劳动的异化。沙夫指出,

当人的活动成为商品,受市场规则支配的时候。此时即使是创造性活动也失去了自然而然的特征,不再满足人的创造性需求,受市场经济支配,成了一些异化的东西,一些压迫人的东西,不仅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和志向,与之相反,这使他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p. 184-185.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185.

③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195.

感到人生的缺憾及各种形式的挫败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创造他希望创造的东西,而是创造买者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不仅是创造的产品,就连创造本身也成为商品。^①

沙夫对各种客体异化和主体异化现象做了十分细致的分析,通过上述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社会条件下异化现象的普遍化和异化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正是沙夫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复强调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的原因所在。而且,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不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现象呈现普遍化的态势,而且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着严重的异化问题,这就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价值。

四、社会主义与异化问题

应当说,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异化理论所展开的针锋相对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同异化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一般说来,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即便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也是把这一理论的效用限定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上,他们否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异化现象。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基本上都承认现存社会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和普遍的异化问题。应当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刻和全面的:一方面,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的强化、官僚制问题、民主制度的薄弱、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本身都是政治异化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重要性还包含另一层重要的思想,即揭示社会主义扬弃异化的使命,换言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异化问题上的根本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02.

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异化是共生的关系,因而它不具备扬弃异化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则是通过真正的民主建设,扬弃各种异化和物化现象,实现个体自由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弗兰尼茨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做过专门的深入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Marksizam i socijalizam*)和1985年发表的《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Somoupravljanje kao permanentna revolucija*)两部代表作中都坚持认为,现存社会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而且他明确指出,异化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他断言:“对于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如果不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都不可能有任何丰富的成果。”^①弗兰尼茨基从人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这一基本理解出发,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给定的,人在超越现存,获得新的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可能走向异化,成为从其本质异化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如前所述,弗兰尼茨基断言,异化是必然的现象,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的存在结构。在他看来,“只要人自己的活动成果作为某种外在的东西(政治领域、宗教领域、市场、金钱等等)而存在,作为统治他的力量而与他敌对,那么就存在着异化现象”^②。他不仅认为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异化,而且断言异化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已不再有异化问题的命题相反,我们最坚定地认为,异化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③

对于这一常常引起人们的惊异、不理解和质疑的命题,弗兰尼茨基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异化社会,但不能由此断言,异化是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这是因为,正是依靠这种无所不在的异化结构和异化意识,资本主义社

① *Marks i Savremenost I*, Beograd, 1963, pp. 167-168.

②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 2, 1964, p. 228.

③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 2, 1964, p. 232.

会才会存在下去。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不曾也不会把人从各种异化形式中的解放当作自己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它不会消灭统治人的独立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而只会使之更加坚固。其次,异化并没有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而自行消亡,“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并不代表已经发现那个把一切邪恶变成善良,解决人的一切问题的魔杖”^①。弗兰尼茨基认为,由于历史的继承性,社会主义不得不接受许多代表着人的异化的社会关系。例如,国家、阶级、政党、官僚制等等的存在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异化不可避免。同时,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货币关系以及各种拜物教的存在,必然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中心主义、货币拜物教、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两重化、道德蜕变等异化形式很难杜绝。再次,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均存在着异化,但是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一个异化社会而存在;而社会主义原则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允许它作为一个异化社会而存在。因此,社会主义只有将扬弃异化当成首要任务,将扬弃异化贯穿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切方面,才能展示社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弗兰尼茨基得出了基本的结论:“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作为异化的社会才能存在。异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克服和扬弃异化才能存在与发展。”^②

与弗兰尼茨基一样,沙夫认为现存社会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异化问题。他不仅在《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中就已经涉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而且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沙夫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各种形式的异化这一事实同异化在人类生存中的地位和扬弃异化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关于扬弃异化的可能性问题,沙夫没有

^①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 2, 1964, p. 233.

^②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obleml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 2, 1964, p. 239.

简单地给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而是做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

如果根据定义来假设,异化与人类的状况是不可分的,那么考虑扬弃异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正如讨论使人长生不老一样没有意义。然而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特定的和历史的暂时条件下的产物,它不是永恒的,不是与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相联系的。认为异化与人的状况无法分开的人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异化等同于自我异化。他们没有看到人的产物异化的客观关系是有着明显的历史性,所以把主体异化(自我异化)问题神秘化了,相对于客体异化而言,主体异化具有派生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个合理的解释。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①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沙夫是从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扬弃异化的可能性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既坚持异化的超历史性,又主张异化具有历史性。准确说来,这一理解与沙夫关于异化和自我异化、客体的异化和主体的异化的区分的理解密切相关。一方面,具体的异化现象,即客体的异化是历史性的现象,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消除的;另一方面,异化本身是无法彻底根除的,这是因为,它是人的对象活动的一种特定形式,而对象化是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所以只要对象化活动存在,就存在产生某种异化的可能性,人不可能达到完善完美。这样一来,就从原则上承认了社会主义(以及任何社会形态)中存在异化的可能性,以及扬弃各种具体异化形式的可能性。进而,考虑到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国家、商品、分工、脑体差别、民族问题等等,异化的存在就不只是原则上的可能性,而是社会历史现实。沙夫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

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异化。首先,国家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异化形式。如前所述,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p. 222-223.

只要国家作为强制机关而存在,其本质上就具有异化的性质,这对于每一种国家都是适用的,包括无产阶级专政。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执政党的主观努力,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不仅没有逐步削弱,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走向了强化。“重要的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即国家、常备军、强制性机构等等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开始消亡,相反的是,它们却走向强化(特别是那些强制性机构);它们的扩张已给社会主义社会投下了阴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国家通过发展自己的‘自律’,已经成为经典国家的范例。”^①其次,在现代社会中,政党是同国家共生或共存的。沙夫认为,二者有些差别,这就在于,国家“永远是异化的产物”,而政党“可能成为异化的产物”。资产阶级政党无疑是异化的产物。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能幸免。沙夫认为,当无产阶级由夺取政权的党变为执政党时,就已经提供了党走向异化的可能性。沙夫比较了艰苦的战争年代的政党和执政时期的政党之间可能发生的变化,阐述了政党走向异化的可能性。“当在一种情况下这个党的成员是由那些职业的革命家组成的,他们靠着党的微薄薪水忍饥挨饿,同时要冒着牺牲自由,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投入到造福群众的崇高革命事业中去;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党的成员是由那些职业的权贵组成的,他们享受着物质和社会地位上的特权,掌控着常常是不受控制的、几乎绝对的权力,我们所说的还是同一个新型政党吗?对处于后一种情况中的党员来说,唯一的危险就是冒犯他们的上级。”^②再次,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严重的官僚制问题,而党和国家的官僚制度的强化,正是政治异化深化的根本标志。“官僚体制及其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相对于在其他的体制下,要更加危险。正如历史上所出现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人方只有一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32.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41.

个,它同时也是唯一的政治权威,并且拥有着实际上无法被社会控制的行政权力。”^①

第二,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异化,沙夫认为,虽然一般说来,自然有其客观性,但它同时也表现为人的产物,因为人实际上参与现存自然的创造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自然也会异化,例如,由于人口爆炸而引起的生态平衡问题,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枯竭的问题,自然环境的污染现象,等等。因此,沙夫认为,“重要的是,人类不能不考虑任何后果地控制着自然界,这么做势必会受到惩罚,被这样‘利用’的自然界将会成为一种反对性的力量,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也就是人类的自然环境,可能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②。

第三,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和他的社会所形成的个性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异化。沙夫指出,“正如人可能同社会机构或他人的关系异化,他同样也可能同他形成的被社会认可的性格发生异化关系。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尤其普遍。我们有个‘社会主义新人’的模式或理想。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存在着人的性格特征同这个模式矛盾、冲突的现象,如犯罪、盗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等。‘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实际上就要扬弃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性格异化的表现,也就是,采取社会手段,斩断异化之根,形成新的性格。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因为在异化—扬弃异化的理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扬弃异化,因此,全部的理论,包括描述性部分,也都应服从于此”^③。

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之后,沙夫于1981年发表了《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在这里,沙夫以社会主义异化论为依据,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44.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54.

^③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59.

具体揭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状况、可能的命运及其出路。沙夫认为,目前共产主义运动处在十分关键的历史时刻,处在十分复杂的历史境地,处在转机与危机并存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变化;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处于危机之中,这至少将妨碍它在这一总的发展趋势中发挥其积极作用。具体说来,沙夫认为,以微电子学、微生物学、核能等为主要内涵的新的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导致资本主义形态,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消失。这样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机遇,带来了新的和真正的革命形势,使人类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建立一个经济结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上层建筑是民主的,其本质是人道的社会。在沙夫看来,共产主义本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运动,但它目前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沙夫把这一危机称为“革命的异化”或“和平的反革命”,即革命的进程根本偏离了革命的初始目标。在沙夫看来,凡是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可能发生客观异化,革命也是如此,这就给现存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沙夫对于这一危险高度警觉,深入思考,他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对革命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其基本思想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的“代跋语”中已经加以阐述。沙夫强调:

人的所有产品都容易走向客体的异化: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国家和政党等政治机构,或者类似革命的人的活动的产物。人们可以发动革命(经济和政治结构转型意义上的革命)以便实现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但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革命可能会以并非所期待的,甚至是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摆脱了它的发动者的控制。于是,人们会说这是对革命的背叛,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客观地说),是革命的蜕变,

甚至是变质,但是,最准确地说,人们可以谈论革命的异化。^①

综上所述,沙夫得出结论:任何社会形态,包括共产主义在内,都不能免于异化的危险;这就决定了人类扬弃异化的斗争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核心正是要扬弃人的存在的片面性,使人类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沙夫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中,不仅深刻地、全方位地剖析现存社会,包括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异化现象,而且反复强调扬弃异化,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例如,沙夫在阐述现代国家和官僚制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异化现象时,反复强调建立生产者自治制度,即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成为一个自治的社会,并且这将最终导致国家的消亡。这样的‘自治的’社会,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需要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人们去实现它,这些人应当是能够独立思考的、勇敢的(在公民的意义上)、在智力上全面发展的、与社会一体的人(反对各种形式的自我异化)。”^②而作为自治社会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新人,即扬弃了异化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个体,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沙夫指出:

广义的“社会主义”一词不仅表示基础(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也表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等)。然而,由革命引发的基础中的变革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上层建筑中的相应的变革。上层建筑的变革是一个必须自觉地加以引导的革命过程。社会主义的新人,作为革命的最重要的产品,必须加以塑造。“社会主义的人”同时成为革命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基础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其未来发展的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82.

^②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90.

不可或缺的要素,舍此则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发展——即共产主义——的成功是不可能的。^①

综上所述,沙夫的《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的确是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部力作。尽管沙夫的理论论述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他对当代社会的异化现象的分析中,也有不严谨的地方,把某些似乎不应当算作异化的现象也都纳入异化范畴中加以分析。此外,沙夫在关于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问题的严重性的判断等方面的理论观点上,也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必须承认,这部著作无论在理论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理论的当代价值的阐发方面,都属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理论著作。尤其是这部著作充分地展示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无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还是深化社会主义的改革,都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本书的第一章由宋铁毅翻译;第二章由刘海静翻译;第三章由杜文丽翻译,温权对本章的部分内容做了修改;第四章由胡蕊翻译;导论和跋语由衣俊卿翻译。此外,衣俊卿还对全部译稿做了审阅和统校。由于沙夫的这部著作所涉猎的理论文献和现实问题比较多,内容丰富且复杂,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肯定存在理解不准确的地方和翻译错误,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衣俊卿

2014年10月8日

^①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89.

目 录

| | |
|--------------------------|-------|
|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 |
|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 衣俊卿 1 |
| 中译者序言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系统阐发 | 1 |
| 导论 | 1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异化理论 | 27 |
| 第二章 客体的异化 | 115 |
| 第三章 主体的异化(自我异化) | 163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与异化 | 242 |
| 代跋语 论革命的异化 | 299 |
| 参考文献 | 322 |
| 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 354 |

导 论

1

怎么又是一本关于异化的著作？这是为谁写的著作？为什么要写这部著作？我可以想象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愤怒的情绪提出这些问题。一听到“异化”这个词，他就会对修正主义或者反共产主义观点有所警觉。这本书起初不是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理解和评价异化理论的意义和重要性，促使我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那些对异化理论感兴趣的人，特别是那些本应对异化理论感兴趣并给予合理评价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本书特别把目标指向那些政治活动家；指向那些自觉地把他们的行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并且公开地宣称这一点的政治家。换言之，这部著作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主要目标则是政治的。

过去二三十年，异化现象已经变得很“流行”。在我熟悉的各种语言中，很多书刊都在讨论这一主题。异化在国际学术会议，特别是那些专门的社会学会议的日程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多伦多社会学国际大会(the Congress in Toronto)十分突出：它设立了探讨异化问题的国际组织。

对异化问题的兴趣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法国存在主义者而开始的,现在已经涵盖所有的社会科学,而不只是哲学。然而,如果说异化变得流行了,并不意味着这一流行本身就是充足的解释。为什么会出
2 现异化的流行?这是因为,那些从事各种类型的社会研究的人发现,这一理论有助于描述和解释他们所面临的现象;使他们能够概括这些现象,并且总结出它们的规律。换言之,理论的效用使得异化理论变得流行。后面我将阐释异化理论的效用都包括哪些内容,并且由此说明它为什么变得流行。

当我们谈论异化变得“流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中并非如此。的确,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异化理论获得很高的声誉,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异化理论在南斯拉夫和波兰也具有很大反响。但是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则明显是防御性的。在这里写作关于异化理论的著述更多地是为了抨击“修正主义者”,为了强调异化概念本身的危险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甚至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也发生了变化(我将在第一章结尾处回到这一问题)。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依旧很难说异化理论变得流行。相反,令人惊讶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理论的热情(他们承认异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起源)和那些自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即便不是彻底的反对,也是对这一问题的冷漠态度之间的显著差别。这是一种很反常的情形。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重新发现马克思,赞扬他,并声称受到马克思著作的鼓舞。人们本应当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或许是值得骄傲和高兴的事情,应当能够利用这种知识证券交易的国际增长的优势。但是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采取防御性的态度,忽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明显的事实,仿佛在说“即使送礼的希腊人也是可怕的”(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远比异化在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著述中新培养起来的兴趣更令人感

兴趣,也更难以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认为,对异化理论的这一兴趣的意图即便不是要完全推翻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歪曲马克思主义。

古人认为,惊奇(thaumadzein)是哲学思想的来源。或许是这样的。但是,并非所有的惊奇都是如此,有时它不过是无知或者学术上天真质朴(naïveté)的表达。例如,尽管无论是异化(Entfremdung)还是外在化(Etäußerung)都没有出现在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哲学词典,如艾斯勒词典(Eisler Dictionary)中,但是异化理论在当今获得了引起轰动的大成功(succès fou),就是令人惊奇的。^①然而,艾斯勒词典中没有收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如“基础”和“上层建筑”;能够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研究这些范畴是没有依据的吗?几乎所有更老的哲学词典都没有收录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异化”概念,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格洛克纳(Glockner)著名的《黑格尔辞典》(Hegellexicon)也没有收录“异化”和“外在化”。^②任何一个读过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读过他的《精神现象学》的人都丝毫不能否认异化概念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格洛克纳忽略了异化范畴并不会导致异化在黑格尔哲学中消失;我们所能得出的全部结论只能是,格洛克纳没有能够领会异化的重要意义。我们在这里值得停顿下来询问一下,为什么像格洛克纳、艾斯勒、拉蓝德(Lalande)以及其他一些如此著名的学者没有能够理解某些对于当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十分明显地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无论对于异化理论,还是它之前的其他理论,关于这种情形的解释都是十分简单的:随着这一理论在思想上所反映的那些现象在客观现实中的增长,作为其功能,这些理论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强。因此,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回到已经被长久地遗忘

3

① 关于这种令人惊奇的人物,我们可以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者 T. I. 奥伊泽尔曼(T. I. Oizerman)作为例子,参见 T. I. Oizerman, *Chelovek i ego otchuzdenie*, in *Chelovek i epokha*, Moscow, 1964.

② *Filosofskaya Entsiklopediia*, Vol. IV, Moscow, 1964.

的,甚至被隆重地埋葬的理论和概念的情形并不少见。这些理论和概念依据新的科学数据而呈现出新的重要价值和辉煌。其中一个例证就是辩证法精神总是回归自身,但是总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自身,关于这一现象,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L. 克里维茨基(Ludwig Krzywicki)于 19 世纪之交在自己的《思想的漫游》(*The Wandering of Ideas*)中做了非常出色的阐述。异化理论关注的事实是,在给定的条件下,人的产品摆脱了人的控制,并且反对和对抗它们的创造者的意志。当世界以如此多的方式逃逸了人性的控制,并且像一个弗兰肯斯坦怪物(Frankenstein monster)^①那样威胁人的存在时,异化概念成为反映社会活动的特别行之有效的工具,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吗?人类发现自己处于歌德笔下的魔法师的学徒(sorcerer's apprentice)的位置上,对于一种能够引领人们去发现那种被长久遗忘的,拥有控制人类自己产品的力量的魔咒的理论,自然会展示出更大的兴趣。

因此,没有什么可值得惊奇的。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学说;为什么对于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理论,一种能够提高马克思主义感召力的理论,并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头脑和心灵中的胜利也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公开追求的,他们要反对呢?这个问题是我们直接面对科学认知的心理学问题,几乎处于心理病理学的边缘上。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问题上,而在这里,为了回答“这本书主要是为谁而作”的问题,我必须列举一些对异化理论持防御的,甚至否定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

4 我特意从不同的国家选择一些事例,以便说明两点。首先,要把那一类自认为是“正统的”,而在我看来是根本错误的思想展示出来,

^① 弗兰肯斯坦怪物(Frankenstein monster),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雪莱于 1818 年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物(怪物)。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热衷于用科技手段造人,后来制造出一个怪物。由于得不到人类的理解,无法融入人类社会,这个怪物盗用了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的名字,不断作恶,最终与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同归于尽。——译者注

并加以解释。其次,要破除那种认为这个问题只是苏联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神话。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苏联关于异化问题的确有很多平庸之作,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出版了很多优秀著作,其中A.奥古尔佐夫(A. Ogurtsov)为《哲学百科全书》第四卷所写的一篇关于异化问题的非常漂亮的论文,就像珍珠一样闪亮。这一作者甚至走得更远,断言异化的终极形式表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例如,在《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因此,异化理论并不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思想,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这是出现在由F. V. 康斯坦丁诺夫(F. V. Konstantinov)主编的官方《哲学百科全书》之中的。[其编委会包括了米丁(Mitin)、约夫丘克(Yovchuk)、莫姆江(Momdzhan)、费多谢耶夫(Fedoseiev)等声名狼藉的修正主义的敌人。]“时代在变,我们应当与时俱进。”(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ntur in illis.)因而,我们不要过于简单化,问题将更为深刻复杂。

另一方面,让我们列举一个年轻有为的作者J. N. 达维多夫(J. N. Davidov)的一本小册子,他完全可以为我前面描述的那种立场提供一个经典的例子。^①他经常使用引号来提醒读者,“异化”是一个准问题(quasi-problem)。当然,这里出现了那个声名狼藉的人本学论据: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从人的本性的概念先验地推论出异化的范畴。达维多夫提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提出了客体的异化(objective alienation)的概念(即并非人的异化,而是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他并且暗示,马克思在这里对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持的立场进行了自我批判。我们先不讨论青年马克思观点的历史的不准确和错误的解释,值得关注的是,达维多夫把异化问题完全归结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仿佛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尽管他在一些场合也引证了这本书的观点。这样

^① J. N. Davidov, *Freiheit und Entfremdung*, Berlin, 1964.

的做法即便不是否定,至少也是贬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

通常人们认为,异化理论同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人道主义一样,被“伦理社会主义”所倡导,用以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概念。而M. 布尔(Manfred Buhr)在一篇论文中则走得太远了。^① 需要强调的是,作者来自西欧国家而不是来自苏联,我引用一下其论文开头的几句话。

- 5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敌对分子,断然求教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使用的异化概念,其目的在于修正基本的革命学说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取消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理论……因此,令人吃惊的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异化说教——虽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研究异化问题或者异化理论。”^②

虽然最后几个词鼓舞人心,但是,像我这样愿意讨论异化问题的鲁莽之人还是会意识到威胁他们的危险。

让我们再向西行——看一下法国的情形。这回我们不谈论L.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阿尔都塞当然是坚决反对异化概念的: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而异化是人本主义的思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的意识形态。眼下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一观点。我要探寻异化理论,即这一在阿尔都塞看来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和反科学的胡说八道的理论所包含的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意蕴。非常令人惊讶的是,R. 加罗蒂(Roger Garaudy)的想法不同。他甚至比布尔走得更远,他对异化毫不留情,认为这个概念在政治上是可疑的,

^① Manfred Buhr, Emtfremdung—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Marx kritik.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966, No. 7.

^② Manfred Buhr, Emtfremdung—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Marx kritik.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966, No. 7, p. 806.

在理论上是多余的(公正地说,他的这一观点比布尔还要早七年)。

“修正主义者思索异化理论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十分警醒地对待这一概念(正确!——沙夫),为了避免被误用,马克思在1844年之后就放弃了这一概念(并非如此——沙夫):马克思只是在分析劳动力的商品形式的拜物教,以及分析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发展和转变中的作用时,才保留了异化概念的严格的科学内涵。”^①

“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我们发现了另外的形式和术语(更加深刻的和恰当的术语)……在历史上以异化概念所表达的内涵现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范畴加以发展了。”^②

非常令人奇怪的是,“正统的”异化恐惧症不仅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而且有时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这一点必然使“正统派”非常惊讶,他们确信自己的敌人正在等待着机会,利用异化理论去破坏马克思主义。与上述引文差不多同时发表的D. 贝尔(Daniel Bell)的文章,可以作为一个例证。^③

贝尔不仅主张,在马克思那里,异化理论仅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④,并且马克思反对人类个体的概念,而更赞成社会阶级的概念^⑤,而这显然是要贬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大意义。他的这种做法是地道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异化观念已经取得了优势,这是由于大众社会中激进知识分子迷失了方向,在大众社会中,传统的、先锋派的和中产阶级的文化彼此相互激烈地碰撞着。”^⑥这真是一位意想

6

① Roger Garaudy, On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Voprosy Filosofii*, No. 8, 1959, p. 80.

② Roger Garaudy, On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Voprosy Filosofii*, No. 8, 1959, p. 81.

③ Daniel Bell, The Debate on Alienation, in *Revisionism*, ed. L. Labedz, London, 1962.

④ Daniel Bell, The Debate on Alienation, in *Revisionism*, ed. L. Labedz, London, 1962, p. 197.

⑤ Daniel Bell, The Debate on Alienation, in *Revisionism*, ed. L. Labedz, London, 1962, p. 202.

⑥ Daniel Bell, The Debate on Alienation, in *Revisionism*, ed. L. Labedz, London, 1962, p. 210.

不到的武装起来的同志！

在所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异化理论根本无法激起人们的热情，这一理论常常被误解，被轻视和被错误地理解。如果一个人相信——像我那样——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他当然就要直面这些误解和歪曲，努力奋斗使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因此，我这本书是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那些由于对这一理论的误解而拒斥和厌恶这一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

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有价值吗？能够取得成果吗？如果人们相信通过理智的争论是可以说服任何人的话，那么当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社会心理学中有的理论认为，一些人对于合理的争论表示拒斥，这表明一种心理障碍——例如，L. 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①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和M. 洛奇赤(Milton Rokeach)^②的封闭性心理理论(Closed Mind)。我们不需要详细展开，就可以了解到，根据洛奇赤的理论，有一种人格，如果其内在的信仰遭到破坏，就很难理解合理的争论。以封闭性心理为特征的人格是费斯廷格所研究的认知失调效应的一种极端的例子。^③ 这一理论讨论了这样的情形：相互矛盾的要素出现在人的认知中(相互矛盾地坚持着的两种主张，个人坚持的信念和官方宣布的观念之间的冲突，所坚持的信念和个人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冲突等)，从而导致了认知的失调。感受到这种作为张力的失调的个体努力去减轻这种失调。这可以通过观点的改变或者行为、环境等的改变而实现。一种可能性是与以前所坚持的信念发生

① 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1919—1989)，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的期望、抱负和决策，并用实验方法研究偏见、社会影响等社会心理学问题。他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在心理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具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② M. 洛奇赤(Milton Rokeach, 1918—1988)，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致力于对信仰、态度，尤其是价值观的研究。他提出的封闭性心理理论在社会心理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具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③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1957.

冲突的信息和知识所形成的心理“遮蔽”，具有导致认知失调的危险。于是一种“封闭性心理”的人格出现了，它成为所有种类的“真正信仰者”(true believers)，宗教的、政治的等信仰者的特征，他们保护自己避免遭受他们的信仰与他们所知道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这一命题在无数次经验中得到证实。我将简要地讲述一次这样的实验，并且简要地回答早些时候提出的问题——即开展这样一种斗争有价值吗？能够取得成果吗？

这一实验是20世纪60年代末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T. 诺瓦茨卡(Teresa Nowacka)博士所从事的。实验的目的是检验信仰者能否接受合理的争论，并且如果他们信仰的信条受到威胁时能否发觉和内化客观的事实。实验选择了一个很合适的团组，一个护士培训学校的两个班级，这个学校的年轻女孩子们都读完了中学(当时在波兰这等于已经完成了11年学业——包括小学和中学。同以美国为例的中学相比，波兰的中学层次要高一些)。因此，这个实验所涉及的女孩子都相对非常熟悉历史、地理等。由于波兰人口的天主教特征，这些女孩子大多数都相信和践行天主教。实验从一张匿名调查问卷开始，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世界上哪一种宗教最古老？”“在全世界信教人口中天主教所占的比重是多少？”等等。考虑到参加实验的女孩子们的教育水平，这张调查问卷的结果是很有启发性的。压倒多数的受访者(90%以上)认为天主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并且天主教的信徒在宗教信仰者中的数量是最多的——占世界信教人口的70—90%。紧接着这张调查问卷的是实验的第二部分。经学校允许，诺瓦茨卡博士给这两个受试班级讲了两周宗教史的课程。这些课程讨论了所选择的各种世界性宗教的起源、传播和信条。由于对实验的评价十分重要，应当注意到老师和学生们的关系非常好(她们带着对她的个人尊重而听课)，而这位授课老师本人也是天主教徒——对于这一事实学生们是清楚的。课程非常生动，伴随着提问和讨论，这些都表明学生们对各种宗教的起源以及它们在世界上的传播

8 等年表很清楚。在那一年的年末,要求学生们填写一种新的调查问卷。结果55%的受访者重复她们在第一张问卷中的答案:天主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世界上天主教徒比任何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数都要多,等等。后来研究者又在格但斯克理工学院重复了这一实验,这一次受访组是一些年轻男孩子,又获得了与上一次实验相同的结果:只是在百分比上有微小的差异。^①

这种“封闭性心理”的人格只是那些相信某种宗教的人的特征吗?当然不是。涂尔干曾认为,“宗教性思维”不仅与对上帝的信仰有关,而且与某种教条的思维有关,这种思维拒绝合理的争论,“封闭性心理”理论显然与这一概念密切相关。E. 霍弗(E. Hoffer)的著作《真正的信仰者》对于这种现象的起源,对于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这种人格产生的个体的和社会的条件做了阐述。他对从事政治的人们的人格的分析尤其令人鼓舞,这是我们首先关注的。^②那么,值得同这种“真正的信仰者”沟通,同那些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接受那种他们认为失去生命意义的东西,从而其头脑拒绝任何与他们的信仰相矛盾的所有争论的人沟通吗?斯大林称这种人为类人猿(Troglodytes)。我了解这种类人猿,老的和年轻的类人猿,这些人把盲目的狂热和封闭的心理与马克思主义混淆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给予“是”的回答——他们值得为之斗争。他们至少有一个积极的特点——他们是理想主义者(idealists)。虽然理想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正统教义”表现出盲目和自大,但是与那些由于与他们本身无关紧要而一听到命令就同意和赞同任何事情的无原则的和无理想的“尊奉者”(conformists)相比,我本人更倾向于理想主义者。上述所描述的实验中的45%的女孩子表明努力是值得的。假如是选择年龄更大的,从事政治的受访者,那么这个百分比还会高一些,会是一个成功的证明。不幸的是,这样的实验可以同有宗教信仰的女孩子们做,而无法同党

^① Milton Rokeach,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New York, 1960.

^② Erich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New York, 1951.

的“真正的信仰者”来做。

我的意图很清楚：我首要的是为马克思主义者写这部书，正是要在他们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我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我想说明，就异化理论而言，这里所涉及的利益攸关的是马克思的真正的思想，而不是他尚不成熟的思想。第二，我想说明，我们所讨论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的革命活动的支柱之一。这自然导致另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承担这本书的写作？

我的意图是向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而令人信服地阐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之一。如果有人进一步询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么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即使他不同意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我的动机也必须是清晰的和可以理解的。我所关心的不只是这一问题的理论内涵（尽管这也是充分的动机），而且或许首先关心的是这一理论对于一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变革领域的实践活动的结论。

9

对于所有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家而言（在这方面，把社会哲学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的分界线是不确定的），非常清楚的是，掌握了反映在特定范畴（如异化）中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就有可能做到：

第一，把那些现象从环绕着我们周围的社会生活事件的潮流中区分出来；

第二，恰当地描述这些现象，并且

第三，解释这些现象，把个别的现象作为以科学的规律所表达的普遍规则的表现形式。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今天也包括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同样十分清楚的在于，对于现实的理论掌握开辟了自觉的和有效的社会行动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即便这些争论表面上是不相干的，有时容易陷入烦琐词句的学术之争，并且即便有时连宣传者也忘记了争论的恰当的意义和目的——这些争论归根结底

具有实践的性质；它们关涉社会主义的概念或者策略问题，关系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在给定的条件下所应采取的行动。此外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幌子或者自我神秘化。

我将举一个波兰工人运动史上的例子。波兰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在1926年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①政变(coup d'état)的背景下，党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不关心当时的争论的细节。他们是如此狂热，以致原来的友谊破裂了，婚姻结束了，等等。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们而言，这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表面看来，争论涉及波兰是处于革命的“开端”还是“之前”。今天人们读起这些，会感到这些更像克日维茨基(Krzywicki)提出的关于圣餐的形式的中世纪争论的解释。表面上是一回事儿，而深层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是某种具体的，某种与生存相关联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转向过去？可以看一下当前进行的关于如何翻译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人的本质”（“das menschliche Wesen”）术语的激烈的、热情的和狂热的争论冲突（我是争论的参加者，可以证明这一点）。它是在“人”（“man”）的意义上指谓“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还是“人之本质”（“the essence of man”）？根据所使用的术语和论据的数量，以及在“兄弟般的”争论中所耗费的打印机笔墨和唾液来判断，人们真的可以认为正在进行一种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争论。但是，这一争论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的，而且争论的根本不是关于马克思的理论表述，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赞成还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歪曲的继续发展，是赞成还是反对人道主义类型的社会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中，正如马克思所断言（当时马克思的确很年轻，但是却比现在许多老年人更加敏锐——也许那时

^①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 1867—1935)，生于立陶宛维尔诺地区，早年参加创建波兰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波兰军团，并于1918年到1922年任“国家元首”，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合法政府，成为军事独裁者(1926—1935)，在德苏之间保持平衡外交路线。——译者注

候人们成熟得更快)的,“人的最高本质是人本身”^①。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关于异化理论的争论。要了解这一情形,也就是要对上述所提出的“为什么”所蕴含的问题进行解答。

异化理论与其他对社会现象的伟大解释一样,从实践活动的角度看,其自身包含着两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可能性:

第一,对社会各种有害的现象做出病理诊断,并且

第二,指出克服这些现象的合适的治疗方法。

医学术语显然是一种隐喻,我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这个比喻具有深刻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加以区分:一种疾病永远是罪恶的,而异化并非如此。无论涉及客体的异化还是主体的异化(subjective alienation)(对此我将在后面加以区分),经常出现的把异化与对社会而言是罪恶的和有害的东西等同起来的尝试,都是完全错误的。例如,一个革命者与他所反对的社会制度相异化,并不是一种社会罪恶,而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当然,像在所有的评价中一样,在这里评价的参考体系,如同谁在进行评价,采取什么立场评价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在做出这一限定的条件下,医学的类比还是具有合理性的。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中,这不是什么问题。这一点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同。最为要紧的是蕴含在异化理论中的两个要素。第一,处在首要位置的是人的理论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论,这是许多“正统派”的眼中钉。第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开始被人们所关注,这成了一个主要的罪状。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回到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必过早地提出。尽管如此,有些事情必须在这里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理解为“相疏离”的意思,也就是人的产品脱离了产品创造者的社会控制(这个概念出现在从马克思的早期著

11

^①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译者注

作一直到他的成熟期的著作中)；如果我们像存在主义那样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去把客体的异化问题与人本身的异化问题，即自我异化或者主体的异化相等同，那么我们无法否认，在任何制度下都存在着异化的可能性。人的行为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是一种超历史的现象，并且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中——不只是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地方——对象化呈现出异化的特征。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并且理解他的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对马克思而言，不仅存在着经济异化，而且存在着政治异化(例如国家)，存在着思想的异化(例如宗教)等，这些异化的表现并不会随着制度的改变而自行消失。唉，经过非常痛苦的体验，我们非常深刻地理解这一切。但是，承认异化问题的合法性，并且因此仔细思考这一问题(而不仅仅是去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异化)，却使得某种类型的“正统派”十分害怕，并且导致其像洛奇赤的理论所说的那样闭塞自己的头脑。

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当然是涉及理论原则的争论，但最多的争论往往是涉及策略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和模式的争论。尽管这样的争论具有抽象的，有时甚至是学术化的形式，但是今天这样的争论是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与那种我们可以简要地，但是带有一定风险地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的捍卫者之间展开的。

由于我使用了“斯大林主义”的术语，我必须对我的立场加以论证。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已经成为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一场激烈争论的主题，这并非偶然。我思考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个人的明显古怪的辩护，以及反对“修正主义”的活动，这些与它早些时候的评价是相冲突的。其解释首先在于这样的事实，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批评只是片面的，这样的辩解(即“魔鬼学的”还原法，把全部问题都归结于“个人崇拜”，归结为完全来自斯大林性格的错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错误的，因为其把历史还原到杰出个人的影响之上。然而，其次，还有更为根本的一点，被假借“斯大林主义”之名而描绘的

社会现象并没有得以克服,相反,这些现象依旧具有生命力。为了清楚起见,我应当补充,我关心的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而不仅仅是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通过自己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使世人皆知的镇压和恐怖,这些是令人痛苦的,然而这是第二位的问题。我并不是要低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不是想要在任何程度上削弱特别是共产主义者首先应当秉持的道德愤慨,因为我们所有人——我谈到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要共同地为发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事情负责,为我们以某种方式推动创造的东西负责。但是,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解释这样的畸变的原因?只有当共产主义运动探察到这些现象的根源,并且通过揭露它们而使得克服它们的真正原因成为可能时,斯大林主义才不再是关注的论题。

这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是我不能隐瞒的事实是,解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充分阐发它的重要价值和辉煌,是上述任务的组成部分。但是,我要特别突出地强调的是,当我使用“斯大林主义”的术语时,我思考的既不是“个人崇拜”(尽管这一现象无疑存在着),也不是作为个人的斯大林(当然,尽管没有斯大林也不会有斯大林主义)。我认为“魔鬼学”(demonology)(即认为某一个人应当为所有社会罪恶负责的观点)与早先流行的“天使学”(angelology)(这次说的是这同一个人成为所有的善良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在所有领域获得胜利的根源)一样,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没有热情地置身其中的遥远历史时期的一个例子得到最好的理解。让我们举出卡里古拉(Galigula)的例子,卡里古拉曾经牵着他的一匹马到罗马元老院,并要求提名这匹马成为这一庄严的议院的成员。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historical interest)何在?当然,这不在于这匹马:它不过是一个客体。但是,这也不在于卡里古拉。他是一个疯人,而且举止像个疯子。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在于,罗马元老院的立场怎么能变得如此被鄙视,以至于面对冒犯而不加反对。让我们继续这个历史类比:我们摆脱了关于马的问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斯大林无疑是

一个杰出的人,是很多著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作者,这些著作在今天被忽略了,但是在一个时期它们曾经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但是,斯大林曾经是(曾经成为)一个病态的人。这并不能解脱他对于罪恶的责任:这一点需要说清楚。但是,在我们的类比中罗马元老院的立场问题则显得越来越大。因此,当我使用“斯大林主义”的术语时,我关心的是比斯大林本人以及他的个人责任更大的、更大得多的问题。

- 13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引起了争论,这主要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实践内涵。这并不意味着争论者们都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实践的—政治的动机(虽然他们有时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把关注点放到理论问题或甚至是历史问题(例如,异化理论只出现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吗?)是虚伪的结果。这样推论会过于简单化,并且很容易导致一种结论:即很难对付的对手是一个即使他在明显胡说八道时也坚信自己的立场的正确性的狂热分子。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说明了这是如何发生的。当一个人的真正的信仰与他对现实的表现、行为和影响之间,也就是与那些否定他的信念的东西之间产生矛盾时,就会出现认知失调。在这种时候,可以建立一种机制,通过使信念适应于实际的情境(对于特定个人、他的行为等具有约束力的表现)来消除这种失调。换言之,我们根据情境来培育我们的信念,以使之更加“美好”。在极端的例子中,一个人会抵御那种会干扰他已经取得的平静,并且使自己意识到正在出现的失调的认识:他在文本中阅读和寻找他想找到的东西,而不是实际上包含的东西;同样,他像其他人的言行一样,去理解和解释事件。在极端的情形中,他完全形成“封闭性心理”,一个“真正的信仰者”的特殊的自我防卫,尽管他也可以成为一个理智的和受到良好训练的人。这是一种特殊的病理状态,但是也是常常出现的情形,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受其支配。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受这种状态的支配。超过一个特定的点,当一个人在精神上变得完全闭塞,那么这是一种真正

的病态。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之一是使自己和他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和表现形式。不幸的是,心理学常常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

这种不一致的根源就在于异化理论的理论和实际的应用与现存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真正的信仰者”当然赞成现存社会主义的现实(否则他也不会是“真正的信仰者”)。另一方面,如果异化理论不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不成熟的观点,如果异化理论不是黑格尔主义的遗迹,如果异化理论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理解异化理论就无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形成充分的把握,如果我们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计划发展的概念中,在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把握中,都能发现异化理论,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克服了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社会,那么对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都将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14

异化理论发展的结果不仅确立了人在社会问题中的中心地位——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在另一种更具实践性的意义上是极具启发性的——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想要克服社会运行的自发性,也就是避免人的产品脱离人的控制的倾向,并且要走向有计划的社会,那么就应当运用每一时代和每一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语言,来具体地和历史地阐发异化的概念。因此,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异化问题转换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异化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其根基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事实,马克思已经做了极好的阐释和分析。没有必要重复这些原有的真理。但是,马克思有意识地把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因为他是一位学者而不是预言家。而在这方面的我们而言,是可以有很多收获的。因为私有制的消灭本身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而言,消灭私有制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在人与人的关系领域还有一些“具体的琐事”(trifles)

需要加以解决。然而,正是这些“具体的琐事”构成了社会生活,马克思并没有想替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我们就有义务使自己不能比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人们更愚蠢。我们当然具有更多的经验,这不只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在一个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中,而且还因为我们直接体验着马克思那时只能预见的大规模工业化的成果和新技术革命的深远后果。马克思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讨论诸如国家、民主、官僚制、生产者自治等问题的。我们则必须在现存的基础上,而不只是依据我们膜拜的而又忽视的原则,来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理论和实践之间显而易见地存在的问题。国家本应当逐步消亡;但是事实上国家却日复一日地进一步发展,并且更加强大。官僚制的情形也是如此,关于“生产者的自治”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困难,这时就不必说民主了。

- 15 我只是提出这些问题,并指出建立理论和实践相互协调统一的困难:我并不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必须强调清楚。这些问题都与异化理论相关联。这就是为什么实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真正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由于某种原因而属于“真正的信仰者”的人们,当他们面临着他们按照党的原则应当相信的东西与生活和对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学到的东西的理论概括之间的矛盾时,会感到恐惧——的确,是真正的恐惧。当然,他们努力去克服这种不一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拒绝那种扰乱了他们的平静的理论。旧制度的书报检察官常常说“为了简单明了——删掉”;不仅删掉个别内容,而且删掉整个理论。结果,在这个领域中,“真正的信仰者”就在思想上变得闭目塞听。他读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典型的“封闭性头脑”。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吗?这种方法并不可靠。19世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Saltykov-Shchedrin)^①笔下的官僚确信“美国不会被孤立”,即使来自更高的权威的命令要求这样做。希望寄于此,现实则突

^①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Mikhail Yevgrafovich Saltykov-Shchedrin, 1826—1889),俄罗斯著名讽刺作家和小说家。——译者注

破了理想。甚至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问题、人道主义的问题和异化理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尚不流行,但是却已经获得了公民权。这一领域的每一部科学的成果,只要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和有说服力的,那就是在继续开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言是崭新的和重要的斗争。而这也就是对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最好的回答。

我如何研究这一课题?

当我们考虑如何研究异化理论这一课题时,会产生三个问题:

第一,研究这一课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应当是马克思学的方法(Marxological approach)吗?

第二,一本论述异化的著作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具有政治性?

第三,一个人研究被官方认为是禁区的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问题,就是修正主义者吗?

还会产生其他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方法论领域。但是,这三个问题切中了主要难点,因此我将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这三个问题上。

1. 研究这一课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应当是马克思学的方法吗? 16
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马克思学家”一词具有否定的含义和情感的色彩,尽管这一术语具有“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这有点令人吃惊。让我们先从语义辨析开始。我理解马克思主义者一词意味着一个人应当至少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与他的信念相符合;并且他理解这些思想的含义。^①另一方面,马克思学家则指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完整体系,或是其组成部分(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着深刻的学术知识的人。这就意味着,虽然马克思学家“精通马克思主义经典”,但是他并不必然在信念上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换言之,一个不是

^① 我在 *Que signifie 'être marxiste'* (in *L. 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19, 1971) 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一主题。

出于政治原因而盲从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绝不必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术专家,即马克思主义学家。但是,马克思主义领域或者马克思主义某一分支学科的学术专家,事实上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家。马克思主义学家的范畴包含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或专家,包括那些采取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和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同样,一个熟知黑格尔或康德著作的专家,并不总是赞同他们的观点。的确,马克思主义者的范畴,作为一个子范畴,包含马克思主义者学术团体。当然,它要比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家的子范畴更为宽泛。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却因为马克思主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术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学家持否定的态度,是荒唐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区分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历史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家,和那些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家。对于这些著作的读者,应当清楚知道他们所代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阐释的方向。仅仅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学家研究这一主题所采用的立场不同于人们所考察的立场就感到非常愤怒,那是荒谬的。否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学术专家——即马克思主义学家。

17 那么,我这本书应当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希望写一本关于异化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的目的不是忠实地重复马克思的命题,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来分析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问题,在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的前提下,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这样的假定,许多问题及其解决不可避免地会有争议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科学而是宗教了。有的人会把我的观点视作“修正主义的”,因为他们通常采取“真正的信仰者”的立场,拥有自己的见解。这样的责难是当今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奇特仪式的组成部分。但是,我愿意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本书不打算写成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学的著作。在广义上,“马克思学的”术语意味着以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特殊问题的学术知识为基础。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这样的著作,而且我也一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问题的资料。然而,“马克思学的”也可以意指更为专门化的东西,例如,通过回溯马克思前人和追踪马克思思想与那些同时代思想家的思想的关联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及马克思独特观念的由来。在这后一种更详细的意义上,本书不是马克思学的。本书研究的是各种问题;它建立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要致力于分析马克思的观点,要研究这些观点的联系和由来;但是这不是本书的主旨。因而,本书在广义上是马克思学的,但是,在狭义上,在更准确的意义上,它不是马克思学的。

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主要关注的是问题和理论系统;我没有采取历史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历史性质加以考察在一定意义上是必要的,但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如此。哲学家经常错误地把哲学和它的历史等同起来。哲学家的生计首先来自他们对其他哲学家的引用、评论和批判。但是,历史逃避主义并不能为自己逃避解答相应的问题而提供合理的证明。我丝毫不反对对于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历史进行的研究。相反,这是完全必要的活动,因为人们必须懂得哲学的历史以便能够应对各种时下关注的哲学问题:在这方面,哲学不同于物理和化学。应当称赞那些勇于承担这种单调乏味的和出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人,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转述贩售别人说过的工作并不吸引人。这主要是个人的性格和研究倾向的问题。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哲学同它的历史等同起来。即便我们不像 K. 艾杜凯维奇(Kazimierz Ajdukiewicz)走得那样远,断言哲学史就是人类的愚蠢史,但是,我们也不会认为,我们通过讲述哲学的历史或者重复某个哲学家的观点,就能解决一个问题。

18

所以我本人在本书中不会一般地研究异化的理论史(虽然我将涉

及这个领域中的一些资料),也不会特别研究马克思著作中异化的历史(虽然为了反对那种认为异化理论只出现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的论断的基础,一些历史的讨论是必要的)。人们可以写出讨论黑格尔或卢梭关于异化的思想的大部头著作;可以讲述异化理论在中世纪的历史发展或者甚至在古典时代的历史发展。我曾经阅读过关于这一主题的非常优秀的著作和论文;读者可以在本书结尾处的参考文献中发现这些著作的标题。^① 我特别赞赏一个本笃会风格的意大利作者的著作,她把黑格尔所有有关 *Entfremdung* (异化)、*Entäusserung* (外在化)和 *Veräusserung* (外化)的说法都加以搜集和分类。^② 人们也可以写作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异化理论的论述的同样大部头的,并且文献丰富的著作(可惜还没有人这样做)。但是,我不想承担这样的工作。我在功能上把历史视作辅助性的,主要服务于我所面临的具有争议性质的任务或者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需要。这样做并不会使工作变得容易,但是,由于这种处理方法与本书的性质关系更为紧密,特别是同研究异化理论的政治含义关系更为密切,也应该这样做。

2. 一本论述异化的著作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具有政治性?我已经指出,关于异化理论的争论——关于异化的内涵、形式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的争论。当关注的问题是人与社会、人与社会的机构(首先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显然是在探讨政治,探讨人的政治活动。异化,特别是政治的异化把我们直接引入政治问题的灌木丛中。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至少只要国家及其机构、官僚制等存在,就是如此。

在导论中,我不准备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对此我将在合适的地方回头详尽地探讨。但是,这些起因于异化理论的特别引起争

^① 我特别推荐的著作为: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② Marcella d'Abbiere, *Alienazione in Hegel, Usi e significati di Entäusserung, Entfremdung, Veräusserung*, Rome, 1970.

议的政治问题,尤其是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有关的问题需要如何被精确地处理呢?

在那些只涉及异化的政治含义或者只从关于人的政治实践活动异化的理论思考得出结论的地方,问题相对简单。这些结论既可以多费笔墨加以阐述,也可以留给读者以想象力和他自己的智力劳动去体会。当我们从理论转向实践的时候,理论思考给不同的选择方案留下了余地。但是,这无论如何都不会减弱争论的锋芒,相反,只会使争论的锋芒更加尖锐,因为对于可选择的解决方案的理解,会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地挫败对手的胜利。

当必须就政治问题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真正的政治困难就出现了。而当面对政治权威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不允许就这些话题进行评论时,这些困难就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些决定因为没有遭到不同政见的指控而不被质疑,那么讨论就预先被关闭了。但是,政治这种讨论具有重要性。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全部问题在于面临着这种特别不愉快的境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或者必须保持沉默——尽管我们的学术良知告诉我们应当讨论这些问题——或者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时存的组织机构(政党、国家以及它们的众多机构),以及置身于这些机构之中的人们的既定的兴趣发生冲突,他们掌握着政治资源和抵御的手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像现在这样从事这一工作的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好准备。

3. 一个人研究被官方认为是禁区的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问题,就是修正主义者吗?那种认为任何人只要研究了异化课题就是修正主义者的断言,当然是荒谬的,而且也没有人坚持这样的主张。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并非完全是可笑的;事实上这样的指责是可能出现的。敢于突破异化问题的禁区的鲁莽的人,特别是那些突破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问题的禁区的人,是在冒着被认定为修正主义者的危险来这样做的,这一点在上述引述过的著作,以及其他许多具有类似倾向的著作中已经表现出来。他们断言,马克思只是在当他

的观点还没有充分发展时的早期著作中谈论过异化。而成熟的马克思对这一“早期时的不成熟观点”十分羞愧,因而放弃了异化问题以便进行更严肃的研究。如果今天还有谁提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这些问题,那么他就是对马克思怀有敌意;他至少一定是修正主义者。我把这种论点简化了,但是没有误读其主要精神。我将在这个导论结尾处再回到这一讨论。

我认为,作为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接受并且使自己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使自己认同”是什么意思?自我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者,其理论自由的限度是什么?“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可以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或者可以意味着自己的观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所说的东西完全一致;(2)或者可以意味着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相一致。也就是说,只要不违背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本命题,人们可以,也应当超越导师们所说的内容,或者依据社会生活的知识的发展而改变他们的论述。

选择第一种含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色彩,而这是任何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选择这种情形的人才是修正主义者,因为,“开放性”的方法论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根本性的(恩格斯曾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这也是笛卡尔的怀疑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曾说过,他所承认的最高原则就是“怀疑一切”。我提及这第一种含义,是因为的确有一些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圣经”里寻找每一陈述的证明。

选择第二种含义是唯一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含义。显而易见,而且也是幸运的,这种含义给不清晰性和不确定性留有余地。人们怎样才能判定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它的基本命题是什么?这些基本命题应当视作不可改变的,还是它们也要经受改变和发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欲保持科学的地位,那么这后一种立场才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接着要问: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能够走多远?

这样的问题是很令人难为的,因为不可能对其做出准确的回答。当某个人的立场的“正统性”进入讨论之中,争论几乎总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人们同意有些人或者机构具有权力或者特权去做决定,那么问题就会相对容易。然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立场,而且历史也已经完全摒弃了这种立场。剩下的只能是靠人们自己的知识和判断,当然要考虑有才干的人们的观点,讨论的结果等;但是最终我自己必须做出决定,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和行为负有责任。没有任何权威、个人或者集体能够使我摆脱这种责任。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且它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那么它的论点是要经历变化的,而且在这种意义上,它也要经受“修正”——这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当我们谈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的“修正主义”时,我们所指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是某种破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东西,而且这种破坏是不顾科学和现实的证据进行的。然而,当人们把这一公认的公式用于实践中时,便出现了困难。马克思主义原则中哪一个是基本的?我们如何遵循无论“正统派”还是“修正主义者”都诉诸的科学和现实的依据来进行判定?很难解决这些矛盾,但是又很难回避这些矛盾。“修正主义”一词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向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今天这个词已经完全贬值了,只是用来攻击辱骂他人,其意思差不多等于说“这个先生的观点我不喜欢,我非常欣赏我自己的观点”。

尽管如此,指控修正主义对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必须同那些认为异化理论乃是修正主义的表现的人进行严肃的讨论。最彻底的“封闭性心理”恐怕也不能断言,马克思所阐发的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论能够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让我们想起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Anovskii)《钦差大臣》中的寡妇,她根据警察局长的指令而鞭挞自己。因而,那种认为异化概念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观点,是后来被成熟的马克思所抛弃

的黑格尔主义残余的观点,是无知之徒想象出来的。

更为公正的说法应当是: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公民权,而不仅仅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不成熟的观点;但是,关于这一理论的某些特殊阐释具有修正主义的性质,就在于它们在某些方面歪曲或者修正了马克思的观点。然而,这样的指责必须在每一具体的情形中加以证实。而讨论的空间是开放的,对任何一方都没有成见。唯一应当排除的是那种先验地把异化理论斥之为修正主义的观点,斥之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等观点的做法。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在没有了解异化理论之前就对之封闭自己的心理。但是,我们仍然还要询问,异化理论是否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究竟确切地讲了些什么内容,它对于实践,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提供了什么样的结论。我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并且请读者给予敏锐的,尽管是批判的关注。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异化理论

我们首先必须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必须确定它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而且在成熟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地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这样的理论存在。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这仍然有待于证明。我试图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进行证明,使它们自我澄清。为此,了解一些历史背景是必要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肇始于黑格尔与卢梭的见解,但是他们也不是在理论空白上进行这个问题的写作。我们必须一方面考虑到基督教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到自然权利学派的影响。我们务必回溯到圣·奥古斯丁,回溯到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回溯到新柏拉图主义,并最终回溯到柏拉图。但我们不能迷失在这条历史路径中。因为我并不计划写作一部异化理论的历史,而是仅仅勾勒出这些问题,并指出它们的源头,在这源头中能够找到对它们更加详尽的阐释。

我不会按照出版的顺序,而是按照从成熟时期到青年时期的顺序来考察马克思的著作。为了驳斥那种认为异化理论只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不成熟思想的观点,我必须展现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仍然存在,并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进行

24 回溯的做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在他早期著作中富有创造性,并被视为他之后思想发展的萌芽。在我看来,这是理解内蕴在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思想价值的唯一正确方法。它摆脱了关于“两个马克思”的荒谬理论,这种理论将青年马克思与之后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宣称后者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并将前者作为“非马克思”而摒弃。我所使用的是一种常识性方法:探讨即使诞生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却一直保留到其晚年属于自己的整体思想体系的创作时期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的序言中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

本章的第二部分将专门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某些时期异化理论被抛弃,以及在当代这一理论复兴的原因。对每一种情形的探讨,都需要对思想史及其社会政治背景进行考察。

一、马克思论异化

(一) 马克思对于前人的借鉴

甚至最近关于马克思异化思想起源的讨论,也都主要集中于对他的构想与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而,与黑格尔和卢梭的异化理论之间联系的考察。但异化成为时尚却要求思想史学家开展探讨。几十年前,当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圣经》中金牛犊的故事是异化概念的原型时,这还不过是有趣的文学附记。今天,我们凭借着对于可靠历史材料的整理,甚至能够将异化概念的起源追溯得更远。如果说,异化理论在当代变得流行,那么它就是一种不是要回溯到我们的祖父辈,而是要回溯到我们遥远先祖思想的时尚。不仅“书各有命(habent sua fata libelli)”而且“思各有命(habent sua fata ideae)”。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译者注

至西方文化在这方面也没有做过严格的考察^①,而且展现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和印度古典哲学等中的相似概念的新观点也在层出不穷。^②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没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现。到目前为止,即便是最优秀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是浅显地触及新柏拉图主义者、圣·奥古斯丁、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a)、圣·维克多的理查德(Richard of St. Victor)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异化思想。问题已经受到了关注,却没有被恰当考察。在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中,不乏对上述这些时期思想进行研究的非常高水平的专家、理论思潮和研究者。但是,至今他们仍然缺乏刺激来创作这一领域内令人兴奋的著作。当前的这部著作,首先旨在提供这样的推动。这与我不愿将哲学问题等同于它们的历史并不矛盾:因为那将混淆哲学反思与思想史知识之间的层次。

伯纳德·鲁塞(Bernard Rousset)在亚眠学术研讨会(the Colloquium in Amiens, 1971)的公开讲演中,专注于当代世界中的异化问题,他一口气提到了佛教、新柏拉图主义、16世纪的法律概念、18世纪的医疗概念、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③,但即使如此这份名单也忽略了戈蒂尔(Gottier)、罗登斯杰克(Rottenstreich)、伯劳(Schach)及上文提到的其他人对神秘主义和基督神学问题的研究。任何对于这些课题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考他们的著作。在这里,我将回溯到古代,只是尝试建构“异化”词义的类型学,这种“异化”出现在中世纪思想

25

① 我想使对于这些历史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们注意一些关于中世纪及古代时期异化主题的非常重要的著作。Georges M. M. Cottiers, *L'Atheisme du jeune Marx*, Paris, 1959, esp. pp. 34-35; Nathan Rottenstreich, *Basic Problems of Marx's Philosophy*, Indianapolis, 1964, Chap. 7; Nathan Rottenstreich, On the Ecstatic Sources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16, 1963, pp. 550-555;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p. 13-15;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pp. 28-33.

② James C. Manley, Report of the Fifth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XX, No. 4, Oct. 1970, Univ. of Hawaii Press.

③ Joseph Gabel, Bernard Rousset and Trinh Van Thao, eds, *L'Aliénation aujourd'hui*, Paris, 1974, pp. 20-22.

的神学的神秘主义的倾向中。首先是神学的“神性放弃”(Kenosis)概念。圣·奥古斯丁援引圣·保罗(St. Paul)《使徒书信》的《腓力比书》,来诠释像基督放弃自身(emptying himself^①)这样神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希腊语文本中使用动词 ekenosen,拉丁文圣经中翻译为 exinavit,而路德在德语中使用 hat sich gesäussert(字面上的意思是“放弃”自身)。黑格尔的外在化(Entäußerung)是一个从路德的翻译中借用的名词,乔治·M.科蒂耶(Georges M. M. Cottier)^②总结如下:“根据这一理论,在道成肉身中,神性自身经历了一次断裂,成为受限的。永恒性的特质被摒弃。上帝不再是上帝。这个理论的名称起源于《使徒书信》的《腓力比书》中的章节,在这里,保罗使用动词‘ekenosen’(虚己)。黑格尔的上帝是神性放弃,外向化放弃自己的活动;这种神性放弃不是被局限在个别的基督,无论如何,它是普遍的。”^③

黑格尔神学上的解释也许是有争议的,但我们在这里涉及一个特殊的外在化(Entäußerung)概念,它能够被清晰地同植根于教父神学的异化(Entfremdung)区别开来。两种概念之间的差异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十分明显,马克思在晚年著作中交替使用这些概念,差异彻底地消失了。神性放弃或者外化是圣灵“走出自身”的结果,是道成肉身的结果,这种道成肉身使人类选择放弃神圣性成为一种必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走出自身,形成绝对精神具象化和外在化的物质性现实,这生动地提醒了我们,神性放弃的神学教义已经被移植到了历史-宇宙层面。因此,我们所面对的理论,在圣灵对自身神圣性的摒弃中看到了异化,这种摒弃作为道成肉身的结果,使圣灵具有了人的形式。圣灵遭受了它与自身特性之间关系的异化。

其次,在谈及人和人性之间的关系异化(Entfremdung)时,出现了

① Emptying 原意为排空、使成为空的等,“使自己成为空的”有主动放弃之意,故此,这里译为“放弃自身”,下同。——译者注

② 乔治·M.科蒂耶(Georges M. M. Cottier),沙夫此处的拼写疑有误。——译者注

③ Georges M. M. Cottiers, *L' Atheisme du jeune Marx*, Paris, 1959, pp. 29-30.

一种教义。不论怎样,这一异化被视为积极的,像黑格尔及其继承者一样,而不是消极的。异化与这种忘形教义(doctrine of ecstasy^①)紧密相连,其可以令人超越肉体局限,提升自我,和上帝看齐,并与之统一。正如罗登斯杰克(Rottenstreich)有趣地解释的那样,希腊语词语 alloiosis(异变^②)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但却是作为冥想教义的一部分。^③ 圣·奥古斯丁接受了这种理论,并将 alloiosis 一词翻译为 alienatio(拉丁语,意为“异化”——译者);他提到“物理感官的心态异化”(alienatio mentis a sensibus corporis),处于忘形行为中的心灵(人),从肉体世界向上帝提升。异化伴随着超自然权威之力的神秘主义教义的思想出现在圣·维克多的理查德,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亚略巴古的丢尼修(Dionysios the Areopagite)以及圣·波拿文都拉那里。在此理解中,异化是一种积极状态,因为它使与上帝的统一成为可能。然而,它依旧是人类心灵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如罗登斯杰克所推断的那样:“在对异化术语的忘形渲染中,我们清楚地发现,异化对人类精神层面的提升负责,因此,也为其在神圣境界中的在场(at home)状态负责,但是,这种在场是通过精神作为独立主体走出既定状态来实现的。”^④

最后,“异化”作为指代罪恶的人类与上帝相疏离的名称,出现在中世纪的文献中。^⑤ 这一词语在圣·保罗那里(《以弗所书》4:18),出现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相隔绝(alie-

① 原意为狂喜、迷幻药,结合上下文,此处意指精神超越肉体而同上帝达成统一,因此译为忘形。——译者注

② 疑为希腊语词语 αλλοίωσης 的英文写法, αλλοίωσης 原意为病变,结合上下文,此处译为异变。——译者注

③ Nathan Rottenstreich, On the Ecstatic Sources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Review of Metaphysics*, pp. 551-552.

④ Nathan Rottenstreich, On the Ecstatic Sources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16, 1963, p. 552. 罗登斯杰克在其著作 *Basic Problems of Marx's Philosophy* 的第7章更加广泛地探讨了相同的问题。

⑤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p. 15-16;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p. 28.

nated),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在评论圣·保罗其他的文本时, 加尔文说道: “除了灵魂与上帝的异化之外, 没有别的灵性之死。”^①

因此, 我们能够区分中世纪神学著作中所出现的外化与异化的三种意义:

1. 圣灵的具象化与外化, 即摆脱自身的神圣性, 呈现为物质形式;
2. 精神在冥想与忘形行为中与肉体的异化;
3. 罪恶的人类与上帝的异化。

这是值得关注的区分, 因为它们不仅为黑格尔的异化概念起源提供了线索, 更以概念形式展现了这个问题的悠久历史, 传承的观念(inherited ideas)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7 只有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观点出发, 这些传承的观念的谱系才是曲折和悠远的。回溯 17 世纪, 如果单就其对卢梭的影响来说, 自然权利学派和社会契约理论无疑与此相近。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战争与和平法》(*De Iure Belli ac Pacis*)中, 使用拉丁词语 alienatio, 指代自身主权向他人的让渡。相似的概念, 尽管使用的不是“异化”一词, 也被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表述过。^② 然而, 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我重申不会阐释和说明卢梭的社会学说。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一学说成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先驱。^③

卢梭承继了他的那些意识到社会契约概念的自然权利派前辈, 在提及法律意义上人的权力让渡时, 使用异化一词。正如布罗尼斯瓦(Bronisław Baczko)所言: “卢梭于语源学意义上利用它(异化一词)在传统背景下建构法律理论: 对他来说, ‘异化’既适用于物, 也适用于具

① 转引自 R.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p. 15-16.

② 参见 R.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p. 16-18.

③ Bronisław Baczko, *Rousseau—Samotność i wspólnota* (Rousseau—Solitude and Community) Warsaw, 1964; Joachim Israel, *L'Aliénation—de Marx à la sociologie contemporaine*, Paris, 1972;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pp. 49-61;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p. 18-21.

体人类权力的放弃或让渡行为,此外,还适用于其他基于社会契约的行为。”^①在这方面,卢梭不同于格劳秀斯及其继承者。差别在于卢梭否认人与他的权力和自由相异化的可能性,除非人在社会契约中向社会放弃这些权力。这种观念影响了黑格尔。^②

但是,卢梭也发展了异化概念,使其接近于当代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方式。我再次引用布罗尼斯瓦的观点:“卢梭的说明与分析,表达了和体现了一个新社会以及个体对人类生存的历史维度的敏感性。对于人来说,他自身的社会活动及结果成为异化的了。这种情况是一个人丧失自身同一性与确定性的体验,是自我招致异化(alienness towards oneself)的体验,是使他无力适应自己不再具有合理整体性特质的世界的体验。”^③

卢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在这方面有着特别的含义。卢梭在《爱弥儿》中声称文明使人堕落。与自然的背离致使人类堕落,人类成为自己创造的制度的奴隶。城镇与非自然需求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④这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主题被马克思主义所重拾。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异化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阿尔都塞认为,那种将康德而不是黑格尔作为马克思起点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论据,这些论据存在于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恩格斯去世之前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的著述中。不论是否喜欢黑格尔哲学思考的风格,为了理解马克思,都有必要了解和理解黑格尔的思想。这不仅明显适用于异化理论,也适用于《资本论》。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写道,如果不研究整个黑格尔的《逻

28

① Bronisław Baczko, *Rousseau—Samotność i wspólnota* (Rousseau—Solitude and Community) Warsaw, 1964, p. 12.

②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p. 20-21.

③ B. Baczko, *Rousseau—Samotność i wspólnota* (Rousseau—Solitude and Community) Warsaw, 1964, p. 11.

④ 参见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p. 54.

辑学》，就不可能理解《资本论》的结构与逻辑。列宁还看到，在将实践(practice)范畴引入认识论时，马克思与黑格尔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必须仔细研究黑格尔的异化理论。

但是，在我们转向黑格尔自身之前，应当重申，在这方面，他并非德国古典哲学中研究异化问题的孤立的人。恰恰相反，异化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十分流行；并且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观点出发，是值得努力展现这一决定异化理论盛行与多元(many-sided)复兴的社会背景的。路德维希·克尔齐维基(Ludwig Krzywicki)一直及时地追踪“观念的演化”(wandering of ideas)。以新的意义与光华，再现看似十分陈旧的命题和观点，往往是社会发展及其需要的基础。正因如此，我们在黑格尔同时代及之前的哲学家当中，找到了对异化理论的理解。被费希特(Fichte)所发展的外化概念无疑对黑格尔产生了影响。^① 没有使用异化名称的异化理论同样出现在了席勒(Schiller)与谢林(Schelling)的表述中。^②

有大量关于黑格尔及其异化理论的文献，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③ 有两部专著在异化问题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文引用的马塞洛·达比耶罗(Marcella D'Abbiere)的著作，他以本笃会僧侣一样的(Benedictine-like)耐心与谨慎，从黑格尔的重要著作中收集了相关材料，还有上文同样引用过的理查德·沙赫特(Richard Schacht)的《异化》。

我在黑格尔前人那里已经区分的三种倾向，全部明确地出现在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中。

① 参见 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London, 1975, p. 482.

② 参见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p. 21-25, 以及 Marcella D'Abbiere, *Alienazione in Hegel, Usi e significati di Entäußerung, Entfremdung, Veräußerung*, Rome, 1970, pp. 31-35.

③ 参见尤其是 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54; Pierre Naville, *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 Paris, 1967; Roger Garaudy, *Dieu est mort*, Paris, 1962.

第一,追溯到**神性放弃**概念,异化是精神(观念)“走出自身”,成为与其本质相区别和相异的某物(成为物质现实)。

第二,回到罪恶的人类与上帝相疏远的概念,人同他自身的应然存在(*proper being*)相异化。 29

第三,由自然权利派和社会契约论可知,异化是法律意义上的让渡或放弃。

在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中,异化与外化有着不同的含义。因为马克思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所以我们应当特别关注两者在黑格尔那里的差异。我引用马塞洛·达比耶罗的观点:

在马克思之后(以及马克思自己那里)“外化”与“异化”被认为是完全相同的。意大利语的翻译一般采用“*alienazione*”。另一方面,在黑格尔那里,两个概念是不同的。我们不应该像很多翻译者那样将它们等同起来……“外化(*Entäußerung*)”(“*Veräußerung*”)和“异化”(“*Entfremdung*”),尤其是前两个术语^①,没有被黑格尔在明确的意义上使用,来指代一个定义明确和清晰的概念……*Entfremdung*和*entfremden*(异化——译者,下同)经常具有“分裂”和“疏离”的消极意义;*Entäußerung*和*entäußern*(外化)以及罕见的*Veräußerung*具有“放弃”的意思,有着或消极或积极的意义。^②

尽管提出不同类型的含义,理查德·沙赫特也同样强调了“异化”术语在黑格尔那里的意义差别:

不能在**绝对**意义上谈及“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因为他在两种不同方式上运用这个术语。有时,他使用这一术语来说明一种分离或不一致的关系,比如在个体与社会实质之间,

① 意指外化的两种用法:“*Entäußerung*”和“*Veräußerung*”。——译者注

② Marcella d'Abbiere, *Alienazione in Hegel, Usi e significati di Entäußerung, Entfremdung, Veräußerung*, Rome, 1970, pp. 25-27.

或者(如自我异化)在自己的实际状态与本质之间可能存在的那样……他也使用它来说明个体的放弃或牺牲行为……

第一种意义来自于对“异化”[fremd(陌生的)]的通常用法,与strangeness(生疏的)、foreignness(外来的)、difference(不同的)、non-identity(非一致的)的用法相关。这里,异化首先表明某物“成为异化的”。此术语的这种用法并非没有先例。它被宗教改革家以这种方式用于指代一个人与上帝的疏离。……异化在第二种意义上源于在社会契约论中频繁遇到的向他人放弃或让渡权力的观念。这可以被认为是表明“制造异化的”。^①

30 尽管理解不同,两位作者都在精神(Geist)“走出自身”与自我相异化从而构成物质世界,以及人在同自身天性或本质的关系上成为异化的——自我异化的意义上,区分了外化(通过主动放弃或权力让渡“使某物异化”)和异化(“成为异化的”)。

对于马克思的分析观点来说,突出黑格尔异化概念中的**客体性**十分重要:关键不是人主观地将他的现实关系经验为异化的状态,而是人在实际上成为异化的这一现实。这是一个重要结论,它在存在主义的主体异化概念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之间形成了对比。

沙赫特评论了这个现实,但却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

在黑格尔的通常用法中,成为**与个体的异化**,被称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异化”。比如,当个体不再与社会实质保持一致时,(在个体的眼中)社会实质就会被说成是这种异化。今天,在另一方面,当同样缺乏统一性时,经常被说成是个体(与类似社会实质的某物)的异化。两种说法同样合理,非但不是对立的,反而是互补的。这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黑格尔倾向于使用第一种言说方式。^②

①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p. 43-44.

②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p. 49.

在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精神现象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异化概念,占据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主导地位。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上的矛盾在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讨论中所起的作用^①。这不仅关系到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关系到他的异化理论。这一讨论尽管停留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之内,但是却使两种倾向逐渐清晰起来,一种是唯心主义的,一种是唯物主义的。两者都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第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他的观点曾被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严厉地批判。卢卡奇这样描述这一倾向的特征:

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外化”根本上是意识外化,它应当**只能**被意识在**内部**扬弃。黑格尔本人对绝对知识与具有它的哲学家之间的同一性认识不清。他的客观主义拒斥他将这种同一性视为一个简单的个人联合体。但是,这种倾向仍然暗含在他的态度里。海因里希·海涅再一次以讽刺和自我嘲讽的方式,将这一问题导向它的逻辑结论……

海涅所嘲讽的,却被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的哲学》继承下来,转变为哲学和政治的原理,对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了危险的和有害的影响……^②

接下来,卢卡奇用一段《神圣家族》的引文来批判鲍威尔的观点,随即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戛然而止。没有提及鲍威尔的异化理论,没有提及这一理论的重要地位,比如在他的宗教观中。以上结果令人感到遗憾,异化理论不仅在鲍威尔的体系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而且影响了马克思的宗教异化概念(比如,是鲍威尔提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31

^① 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p. 556.

^② 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pp. 557-558. (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129~130页。——译者注)

的观点)。^① 决不能否认马克思是鲍威尔观点的尖锐批判者;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批判方面,但是也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全都对马克思的总体思想,特别是异化理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种倾向与费尔巴哈哲学相关联。它的优点在于总体上的唯物主义转向,特别是哲学人本学的转向。而它的缺点是对于辩证法的摒弃以及未能在人道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方面进行思考,这也是马克思在自身的哲学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确认识到并加以批判的。这同样反映在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中,他醉心于宗教,忽视了对社会政治方面问题的阐释,并且停留在空洞的抽象中。无论如何,人本学中以具体的人抵制宗教世界观的哲学唯物主义转向,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艾米尔·波特盖里(Emile Bottigelli)在他写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法语版导言中,出色地把握了这一点:

这样,费尔巴哈接受了黑格尔的异化过程,但是却将它颠倒过来。人将他固有的本质客体化为外在于自身的对象。但是,在显现自身时,他不只是创造了对象;这些对象成为独立的、异化的,它们与他相对立并且支配了他。人将自己的丰富性(richness)外化给上帝,奉献得越多,留下的就越少。

这真是哲学思想上的革命。对当代人来说,这一革命理论重新以足立地的形式出现。具体的人被真正地重新整合在整体的中心,并且他是这个整体的意义的唯一来源……这种人本学有它的基础,也有它的局限。^②

正如马克思1843年3月3日给卢格(Ruge)的信中所写,这个局限就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而且他也未能对与之相关的政治活动加以理解。尽管如此,其所提出的人的产物与他自身相异化、与他相对

^① 参见 Zvi Rosen, *The Influence of Bruno Bauer on Marx's Concept of Alienation*,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No. 1/2, 1970, pp. 50-69.

^② Karl Marx, *Manuscripts de 1844*, Paris, 1962.

立进而主宰他的命题,还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成为马克思的核心概念。

(二) 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思想的回溯之旅

32

在我们开始旅程之前,有必要就马克思的哲学语言及正确翻译其文本所面临的困难而偏离一下主题。有些人坚持认为德语是最卓越的哲学语言。它拥有巨大的灵活性;几个不同的词可以被合成为一个词,名词与动词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一个句子中词语的句法规则功能多样,等等。因此,除非具有巨大的语言猜想天赋,否则就根本无法翻译出语言的奇特之处。例如,海德格尔声名狼藉的“das Nichts nichtet(无之无化)”,被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正确地表述为用以表明形而上学语言无意义的本质。德语是特定类型哲学家真正的天堂,他不仅在语言猜想(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有被这个名字所命名的存在)的泥潭中捉住了他哲学的鱼,而且喜欢语言灵活性所带来的复合词歧义,乐于在缺乏明确句法规则的条件下判定新词的个别组成部分以及整体的意义,等等。德语不是一种某人可以凭借手中的字典,就能够在所要翻译成的语言中找到与特殊词语相对应的词的语言。

需要以特殊的方式来翻译马克思的德文著作,尤其是他的早期著作。第一,因为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家,拥有非常丰富的词汇量;第二,因为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语言与现代不同,有其独特的性质。除了理解那一时期的哲学问题所固有的困难之外,还附着着以恰当的语言(linguistic)理解马克思,恰当翻译他文本的困难。有资质的翻译者们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对待这一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麻烦。

我将以晚年马克思为起点回到青年马克思,回到他异化理论的起源,通过大量例子来阐释我的命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广为人知。短语“socio-economic formation

33 (社会经济形态)”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的潮流。但是,马克思从没用过这一范畴。他所提到的“*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社会的经济形态)”,应当被翻译为“*economic formation of society*”(经济的社会形态)。“*Socio-economic formation*”是一种错误的译法,因为名词“*society*”,在德语中是 *Gesellschaftsformation* 的一部分,不应该被翻译为形容词 *socio*。当马克思提及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他强调的是经济因素在其社会以及社会发展概念中的首要地位;当我们提及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时,马克思概念中的重要意义就被改变了。这里的危险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逻辑地思考两种解释的结果,就会发现巨大的差异。

在同一篇“序言”(contribution)中,马克思提到了与社会的经济结构相似的“*bestimmte 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sformen*”(意识的社会形态)。这一短语经常被翻译为“*specific 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社会意识的社会形态),导致了我们可以在所有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找到有关“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部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这样的短语,也没有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学说的任何依据。

“*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sformen*”(意识的社会形态)不同于“*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社会意识的形态)。德语中,它应该是“*Formen des Gesellschaftlichen Bewusstseins*”(意识的社会形态的形式)。德语中的重点在于形容词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e*),强调社会特性以及意识的社会状态;在翻译中,重点则在于形态。这种翻译方式含蓄地提出(在“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中)社会意识是各个部分的一个组成要素。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前言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中,明确地提出世界的精神同化(*geistige Aneignung der Welt*),它依靠意识及人化世界的各种结果来达到,而这却被对短语“*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sformen*”的失败翻译所掩盖。

这两种错误都是典型的,而且绝不令人意外。但是,就特殊词语和德文短语的用法和意义而言,当面对合成词的构词属性时,当某人在德文语法的独特性上添加特有的粗心,或者“草率”时,仍然会有更多的难题。这时,一个给定的复合词或短语就会有不止一种理解方式的情况出现。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两种表达方式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Gattungswesen”(类存在物)和“das menschliche Wesen”(人的本质)。

事实上,人是“ein Gattungswesen”(一种类存在物),一种类存在,即他属于一个特殊的类,其本质可以在类的所有个体中被找到,这种观点早已出现在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混淆来自于马克思有时在“das Wesen der Gattung”(类本质)意义上谈及 Gattungswesen(类存在物),即类的存在。“a species being”(类存在)与“a being of species”(类的存在)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如果两者被交替使用就会产生混淆。不幸的是,德文使这一区别只有在上下文的语境里才有可能呈现出来,即使这样也总是无法给出一个没有歧义的答案。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轻易地将词语 Wesen 理解为 *essentia*(本质),将马克思的短语等同为“the essence of species”(类本质)。我将引用一段意思十分明确的章节作为例子;“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Das praktische Erzeugen einer *gegenständlichen Welt*, die *Bearbeitung* der unorganischen Natur ist die Bewährung des Menschen als eines bewussten Gattungswesen, d. h. eines Wesens das sich zur der Gattung als seinem eigenen Wesen, oder zu sich als Gattungswesen verhält.)”^①这里对 *Wesen* 一词的使用如此不明确,以至于能够令不使用德文的读者彻底混淆。

34

^① *Marx Engels Werke: Ergänzungsband-Schriften bis 1844*, Erster Teil, Berlin, 1968, pp. 516-517 (English translatio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London, 1975, p. 27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译者注)

这是一个令其他著名作者都自行跌入的陷阱。没有名字,就没有麻烦(no names, no pack-drill)。关于短语“das menschliche Wesen”的翻译是一个相似,然而却更加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的这个短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是否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探讨人类个体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自明和荒谬的问题;但并非人人如此。我在《人与社会》(*L'Homme et la Société*)上与吕西安·塞弗(Lucien Sève)就此问题持续讨论了近两年;请读者参考我发表在《社会学研究》(*Studia Sociologiczne*)上的论文,在那里我总结了这一讨论。^① 这里,我只简要地概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Das Wesen”在德文中存在歧义,它有两个相关的含义:有生命的存在和某物的本质[*essentia*(实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中,短语“das menschliche Wesen”或被翻译为“the human being”(人),或被翻译为“the essence of man”(人之本质)。这一分歧是显著的,而且具有深远的理论影响。我主张“第四条”说的是人,即作为具体的人类个体的人。第一,语言的逻辑使然。在所有语言的实例中,当词语 *Wesen*、“essence”(本质)以及它们的同义词出现歧义时,如果它依照语法紧接一个名词所有格(*the essence of something*),以及像“animated being”这样有一个先于它的解释性形容词时,或者单独出现时,我们就必须将它理解为**本质**的意思。这个规则适用于所有的斯拉夫语,但是却不适用于德语粗心(*Schlamperei*)的实际用法。任何人都可以指出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少数情况下,在这种或者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人的本质”(das menschliche Wesen)。因此,进一步的探讨是必要的。

第二,如果我们分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的文本,第一

^① Adam Schaff, “W sprawie tłumaczenia na język polski ‘Tez of Feuerbachu’—Karola Marksa” (“On the Translation into Polish of Karl Marx’s ‘Theses on Feuerbach’”), in *Studia Sociologiczne*, No. 3, 1975, pp. 55-85.

句话就明确展现了马克思在“实质”^①(存在)的意义上使用 Wesen,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就会得到费尔巴哈将宗教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这一毫无意义的句子。这个思辨形而上学的命题与我们所知的费尔巴哈人本学观点没有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费尔巴哈将宗教的实质(即宗教中的存在——上帝)归结为人类(即人)的译法, 则与他的人本学及其他命题(尤其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相一致。

第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援引的费尔巴哈的文本进行了解释。为了清晰起见, 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das menschliche Wesen)之后添加了限定因素——诸如个别的、有形的等——清晰地显示他考虑到了具体的人。

第四, 在马克思进行“神圣战争”、反对“the essence of man”(人类本质)这类描述以便在现实根据上展现人的问题的时期, 他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在本质意义上使用 Wesen 这个词。[感谢奥古斯特·科尔尼(Auguste Cornu)来信授权我引用这一论据。]

最后是一个使人信服的现实证明,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几个月的一篇文章中, 使用了短语“das menschliche Wesen”(在“人”的意义上)。我记得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部分致力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 这里有一些段落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人的本质, 人, 在黑格尔看来 = 自我意识……^②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是,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就是说, 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 因而是类存在物……自然界, 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① essence 有本质、实质的意思, 沙夫这里旨在证明德语 Wesen 应当翻译为“人”而非“人的本质”, 因此译文将文中在人的存在层面使用的 essence 一词翻译为实质, 将其在本质层面的运用翻译为本质, 以示区分。——译者注

^② MECW, Vol. 3, p. 3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321页。——译者注)

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①

因此,这是明显的证据——来自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的引文,“人的本质”(das menschliche Wesen)被明确地在“人”的意义上运用。如果我们将来自于对“提纲”本身分析的固有论据包括在内(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第一句中的 Wesen 翻译为本质是毫无意义的),似乎这一争论已经被明确地解决了。没有这回事!吕西安·塞弗顽固地坚持为一种不同的立场辩护,并且在提纲文本的歧义中找寻论据。(请记住,这是一篇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私人的、简要的笔记。)

伊斯塔法·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详细说明了关于词语扬弃(aufhebung)的类似的麻烦。^② 我的目的是使读者意识到那些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相关的困难,切勿迷信于对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及基于这些翻译的结论。有必要在重要或者可疑的问题上参照原文。诚如意大利人所说:“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traditore)。

现在回到主要问题。我将围绕三个阶段——《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论述。

对我们来说,当然是《资本论》时期最为重要。反对异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异化理论及其理论作用在这一时期彻底从马克思的文章中消失了。在我的印象中,对于阿尔都塞和他的同道中人来说,人本学的思考等同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因为它非科学的。在“晚年马克思主义”这类思想者(以特殊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有鉴于他们“斯大林主义”代言人的特质,“托派”变得无足轻重)中还有阿尔都塞的先驱。皮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是典型代表;就在1967年,他为自己关于异化的著作写了一篇新的导言:

科学的进步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有进行修改的

^① MECW, Vol. 3, pp. 336-3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11页。——译者注)

^②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pp. 12-13.

必要,但只是在其次要意义而非主要意义上。通过这样的方式,马克思自己能够舍弃如此有魅力,甚至是使人陶醉的想法,如来源于黑格尔的异化,它妄图捏造新的社会哲学的起始与终结(alpha and omega)。当领会它的原始形式时,这一术语对我们来说除了可悲的文字游戏之外,不会有任何建树。马克思已经将它打发到了哲学的博物馆,并且以对于侵占与剥削关系的更加谨慎的分析取而代之。^①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清楚和明了的判断,尽管展现出对异化理论意义的彻底误解和对马克思晚年著作的无知。阿尔都塞不是唯一拒斥异化理论的人,而且也不是第一个。他所有的主要观点——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反异化,甚至反哲学——都能够在他之前的皮尔·纳维尔的著作中找到(我所引用的导言基于一系列在阿尔都塞著作之前的文章)。他们完全忽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我们应该断定他们在写作这些文章之前还没有读到过它。

37

还有些作者强调异化概念在整个马克思著作中的统一。^② 我将尝试通过马克思自我辩解的方式来证明这种立场。

① Pierre Naville, *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 Paris, p. vii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所加——亚当·沙夫)。另参见 Pierre Naville, *De l'idée de l'aliénation à l'analyse du monde moderne*, in *Études*, Brussels, No. 1, 1962, pp. 58, 60-61 以及 Pierre Naville, *Aliénation et exploitation*, in *Cahiers d'Étude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et de l'Automation*, No. 6, 1964, p. 11.

② 参见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pp. 217-253; Joseph Gabel, Bernard Rousset and Trinh Van Thao, eds, *L'Aliénation aujourd'hui*, Paris, 1974, pp. 70-72; Jean Hyppolite,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New York, 1969, pp. 126-149; Eugene Kamenska,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m*, London, 1962, pp. 144-149; Igor Narski, *Kategoriia Otchuzhdenia v "Kapitale" i drugikh trudakh Marksa*, in *"Kapital" Marksa—Filosofia i sovremennost*, Moscow, 1968, pp. 471-479; V. Rieser, *Il concetto de "alienation" in sociologia*, in *Quaderni di Sociologia*, Vol. XIV, April, 1965, pp. 135-138; Giuseppe Bedeschi, *Alienazione e feticismo nel pensiero di Marx*, Bari, 1968, pp. 109-111, 152-154, 166-167; 等等。我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放在一起,是为了呈现出他们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的一致性。

1.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成熟的标志。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成熟的马克思是许多杰作的作者。但《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和最伟大的著作,因此对我们的问题特别有价值。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当提及《资本论》时不仅包括被冠以此名的三卷著作,其中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自己发表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恩格斯编辑发表的),还包括《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第四卷,由卡尔·考茨基编辑出版),以及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标题于1939—1941年在苏联首次发表的《资本论》第一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于理解《资本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没有这部超过1000页的重要巨著就不可能了解《资本论》的体系,除非我们研究黑格爾的整部《逻辑学》。当我们追忆起整部《资本论》仍旧是支离破碎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意义就尤为重大。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真正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宝藏,其现代性令人惊异,我指的是它的预言性质,它所提出的社会及理论问题在今天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生产工具的科学的作用,自动化问题以及发展着的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这些只是一部分例子)。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明显的。遗憾的是,在证据面前阿尔都塞本应当承认,在与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的讨论中,他尚未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进行研究就构想出了关于《资本论》问题的观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① 几乎所有老一辈共产主义者接受教育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完全不为人所知。同样不被人所知的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等,包括一大卷超过了500页的名为“关于波兰问

38

^① Louis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London, 1976, p. 65.

题的历史”(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polnischen Frage)的著作,这部著作在1971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全文发表,而且仅被极少数读者所知。正如阿尔都塞与约翰·刘易斯的论战所体现的,马克思本人没有发表这些文本的事实丝毫不会减小它们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抛开《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由于作者无法掌控的原因而没有发表的著作不谈,仅就作者没有计划发表的那些概述和手稿所构成的准备材料而言,它们毫无疑问对当代将马克思著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读者来说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其中一例。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最为重要,它是特别有价值的《资本论》导言以及对《资本论》最终版本的注释。

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写了一篇犀利的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章,这位异化理论狂热的拥护者在《资本论》中找到了马克思使用“异化”术语的六个段落。^①我没有计算过,也没有在所有段落中真正地寻找过。有六段或者二十段都没有关系。它们就在这里占据着首要地位,并且这个概念在《资本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并非作者年轻气盛的不成熟思想。再者,重要的是那些我们在提到《资本论》时所涉及的文本。我们不仅要寻找“异化”一词,还要寻找异化理论,并试图去理解它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我们必须使自己关注于他的整部著作,包括这部著作在1857年的概述(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不过我们还是要从《资本论》这部著作的发表出发。我们应当发现这部著作中使用“异化”一词来描述特定社会关系的段落,但是——更重要的——即便“异化”一词没有出现,我们也应当发现这部著作中运用异化理论来分析社会关系的细节。

我成功找到的曼德尔的六段引述足以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没有抛弃异化理论也没有抛弃它的名称。它们也展现了马克思所

^① Ernest Mandel,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W. Lutz and H. Brent (eds), *O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p. 39.

认为的异化的含义是什么。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①

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②

39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③

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④

上面所引用的段落中,“异化”一词用于说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中人类的劳动产品作为独立的力量出场,与人相对立并因而成为

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1976, p. 43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译者注)

②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1976, pp. 570-5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8页。——译者注)

③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1976, p. 6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3页。——译者注)

④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Moscow, 1964, p. 2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294页。——译者注)

异化的。^① 这里“异化”一词并没有出现,但我们能够在段落中找到详尽的说明。“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②

马克思在脚注中引用了冯·杜能(Von Thünen)文章里一个典型的段落。这一方面说明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那时的著作中所占据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更充分地表明马克思想要说些什么。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1)资本本身是死的,只是由于人的活动才有用;(2)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③

马克思在这段引述中加入了“提出这一问题是杜能的优点”。同样没有使用“异化”一词,但是却运用异化理论对上述段落加以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著名论述引起了诸多关于“正统”的麻烦。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

40

^① 它们被 Ernest Mandel 收录在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fn. 68 at p. 177。

^②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 6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页。——译者注)

^③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 6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译者注)

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

这段话内容非常丰富,马克思表达了大量“令人不安的思想”。第一,在所有可能的生产方式下,旨在维持生命再生产的人类劳动都有必要同人的创造和自由相对立。第二,成熟马克思——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样——使用人类本性的概念(就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做的)。最后,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十分重要,人只有在生产活动中扬弃异化,即社会的控制以及那些在此之前支配人的盲目的、自然的力量,才能够在这一领域内获得自由。^②“异化”一词在这里没有出现,但是这种对通过赋予其计划性以扬弃自身发展混乱状态的社会的全部反映却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

《资本论》也不例外。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作为社会力量与工人的异化关系,比如说雇佣劳动(参见从第三卷引用的段落)。了解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概念”解释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论》的基本范畴是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我们对其中一个范畴特别感兴趣,当我们将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进行语义分析时就会回到它——商品拜物教。

^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p. 8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几乎所有这些我从《资本论》中引用的段落,大家都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找到相似的早期观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发展了商品拜物教理论。这对于理解马克思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方式有着相当大的方法论意义。简而言之,根据这一理论,作为生产者的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物的关系的形式所掩盖,商品间的价值关系只是体现为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拜物教,如果我们要理解市场中所展现的真实关系——作为生产者的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认清和拒斥它(方法论假设)。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

正如我试图展现的,关于商品拜物教理论不过是异化理论在分析商品生产上的应用的这一理论,有很多观点加以阐述——例如商品拜物教理论替代了异化理论。这是对于卢卡奇立场(他晚年所批判的)的附文,他在此立场上提出了物化理论,我将会回到这一理论上来。但是,当我们参照《资本论》的文本时,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一条通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异化问题评述的天然桥梁。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详尽地论述了异化问题,同时也使其在马克思《资本论》体系中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应用明朗化。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经常使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概念和语言,因此也就驳斥了存在两个马克思的论调。与此相反,异化理论在这部

^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 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0页。——译者注)

成熟马克思的著作中的活力与其早期著作相比并未减弱,《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清楚地表明异化理论渗透在《资本论》的整个知识结构当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理解的“异化”是什么?正如在其青年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所发现的一样:人的劳动产品转变为一种与他自身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以异化理论作为他经济学思想基础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将通过对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分析来阐释我的主要观点。在提及劳动是调节工人与资本之间关系的交换价值的基础时,马克思使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语言和讨论方式断言,工人无法在这一价值的基础上通过交换使自身变得富有。

42

工人必然会越来越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①作为财富的生产力**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生产力来占有……因此,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异己的权力**,总之,他的劳动既然不是**能力**,而是**运动**,是**现实的劳动**,就会是这样的……^②

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这样描述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因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

① 原文此处有“(entäussert sich)”的注释。——译者注

②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30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译者注)

的价值生产出来。^①

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②

当分析机器特别是自动化机器系统的作用时[这一段落来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文版 582 ~ 590 页(英文版 690 ~ 695 页),其中包括工人在生产自动化阶段的地位、作为生产力的科学及其与工人关系的异化等极其重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③异化概念被赋予了一种客观关系,人的劳动产品使自身与人相异化,即出现一种统治它们创造者的异化力量,无论它是一种来自于人类本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必然的关系,还是一种历史条件下的关系,问题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目前正处于激烈的讨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已经就此做出了回答。马克思根据他对资本的看法坚持认为,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提高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对象化劳动的比重:

……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做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

43

^①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46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译者注)

^②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5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512页。——译者注)

^③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69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6页。——译者注)

立的地位。^①

马克思在这一语境下为明晰异化的过程提出了极其重要的问题——异化是所有经济结构的必然现象吗？他的答案是：对象化是一种超结构的必然性；而异化只出现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并同这种生产关系一同消失。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②

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在自我异化的意义上）只存在于市场条件发展背景中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并以世界市场为极端表现的事实。在世界市场中，联结某一个体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得以形成，但同时这一关系（具有客观性质）与个体分离的独立性也在不断增强。

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

^①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8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译者注）

^②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8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译者注）

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①

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我们必须通过诸如“物化”、“拜物教”、“对象化”等相似概念对“异化”概念加以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回答了此问题,这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分析特别重要,并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卢卡奇的理论(晚年他自己抛弃了这一理论),及其追随者们[比如约阿希姆·伊斯雷尔(Joachim Israel)]的理论束缚;对他们而言,“物化”概念比“异化”概念更加宽泛,并且可以取而代之。马克思却在相反的意思上将物化理解为异化的结果。

44

对于货币的一种形式——指货币充当交换**手段**(而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这里指的是货币表现为**抵押品**,一个人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商品,就必须把这种抵押品留在别人手里。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每一种别的抵押品对抵押品持有者可以直接作为抵押品来用,而货币对于他只作为“社会的抵押品”来用,但货币所以是这

^①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16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页。——译者注)

种抵押品,只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象征性的)属性;货币^①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②

这个段落不仅说明了异化与物化的关系,而且我们在其中也能够找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发展了的商品拜物教的萌芽。这些思想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的观点,在关于被交换价值尤其是它的具体化——货币所创造的社会纽带的分析中被更加鲜明地描绘出来。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③

45 以上所述是对内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异化理论的简要概括。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得到一种与此问题相同的理论,尽管这个理论是以零散的、不完整的形式出现的。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概述,是对于未来作品的描绘。当各种各样的思想与线索被收集起来时,一个完整的论述就会被重建,那时这一理论将会展现出它的全部光辉:异化的界定、对于它历史性质的分析、异化与对象化以及物化之间的关系、商品拜物教的萌芽等等。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

① 此处,沙夫加入注释(money—A. S.),由于中文版直接将“it”所指代的货币翻译出来,所以隐去沙夫的注释。——译者注

②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16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页。——译者注)

③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15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译者注)

比,这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更加丰富并且建立在具体的经济分析基础之上。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异化观点的文章中^①,通贝格(Tomberg)的一篇认为,与《巴黎手稿》相比,《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只是使用了没有严格定义的“异化”一词,而异化理论并未出场。^②一位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作者却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错误结论。通贝格热衷于参考贝尔(Behr)毫无价值的关于异化的宗教文章(参见上文),所以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保持路线”(on the line)。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包含了对异化理论的展开,而且也使更加深刻地理解《资本论》中的这一思想成为可能。

我所提到的文本是有选择性的。我搁置了《剩余价值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他文本,并且仅涉及了《资本论》的一部分。然而,即使是这里提到的有限文本也足以说明异化概念非但不是“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资本论》思想的总体结构中发挥了作用。

现在我们能够回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了。

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神圣家族》

在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神圣家族》两部著作时,我会无视阿尔都塞假设的存在于两部著作之间的断裂。我所找寻的并不是这种断裂,而是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脉络。

异化的反对者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异化”的讽刺性评论来证明他在这一发展阶段抛弃了这个概念。

^① 在这些文章中,包括 Roman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1977。(尤其是第二部分,第五章,第三节,The Money Form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② Friedrich Tomberg, *Der Begriff der Entfremdung in den "Grundrissen" von Karl Marx*, in *Das Argument*, 1969, Heft 3.

但是这种嘲讽针对的是其所批判的他的哲学家同人们,这一点甚至被诸如奥古斯特·科尔尼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传记作家所忽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46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①

并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引用了一大段关于异化理论的传统解释与应用的论据,其后他写道:“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②

这两个段落的确都是讽刺性的,但它们所针对的并非异化理论本身,而是那些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与之辩论的作者们对于异化理论某种可悲的应用。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嘲弄的是那些来自于他之前伙伴中的抽象的哲学家的话,他们企图用关于“人类本质异化”的哲学废话代替对货币关系的分析,那么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拒斥异化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将“异化”置于引号当中,并且还讽刺性地加上了他使用这个词是为了让哲学家们能够理解的注解,这只能说明有特殊倾向的哲学家们对异化理论进行了抽象的应用(这是在他提到扬弃这种异化时强调“实际”这个词的原因),而不能说明马克思拒斥了异化理论。九年之后,当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不再紧迫时,马克思开始广泛地使用“异化”一词,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了自己的异化理论,并列举了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典的运用实例。甚至是“断裂”理论的拥护者也将《德意志意识

^① MECW, Vol. 6, London, 1976, p. 5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译者注)

^② MECW, Vol. 5, London, 1976, p. 4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译者注)

形态》视为成熟马克思的一部分。

与他的唯心主义前辈们相比,马克思没有将异化追溯到精神领域而是追溯到物质生产领域,将其与社会的劳动分工联系起来。在之后的经典解释中,马克思没有为其命名(与他过去的使用并且滥用“异化”一词的哲学伙伴论战的结果)就描述了相关的社会关系。

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①

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

^① MECW, Vol. 5 London, 1976, pp. 47-4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译者注)

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①

在这之后是马克思著作中论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扬弃异化的条件的最重要段落之一,扬弃异化并不是像马克思不成熟时的表达那样,为了使“陈旧的废话”(die ganze alte Scheisse)回到新的体系中。上面段落指出人类活动的结果转变为与他们对立并支配他们的物质力量。这一力量摆脱了人的掌控并使他们的期望与目的落空。

依马克思所说,异化的起源与劳动分工息息相关。故此,异化的扬弃必然与分工的消除密切相关。

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②

48 回到写作于一年前的《神圣家族》,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不仅是马克思相对较少地提及异化,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在“自我异化”的意义上使用“异化”。《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异化”一词几乎只在一种客体关系的意义上被使用;它是人类劳动产物的异化。“自我异化”则是人使他自己与社会、与其他人或者他自己的本性或存在相异化。因

^① MECW, Vol. 5, London, 1976, p. 4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538页。——译者注)

^② MECW, Vol. 5, London, 1976, p. 43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译者注)

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体关系。两种意义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出现过。当社会和经济理论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影响愈加深远时,“异化”本应当必然地呈现出一种更加客体化的意义,而马克思却十分罕见地提及自我异化。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践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①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②

在《神圣家族》中,“异化”一词在其客体意义上被使用,但是却相当随意。

蒲鲁东未能对这个思想(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所有权——亚当·沙夫)作出恰当的阐述。“**平等的占有**”是国民经济学的观念,因而本身也是下述状况的异化表现:**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的

^① MECW, Vol. 4, London, 1975, pp. 52-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译者注)

^② MECW, Vol. 4, London, 1975, p. 3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异化。^①

列宁在回顾《神圣家族》时,引用了上面的段落,他评论道:“这一段话极有特色,因为它表明马克思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基本思想——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②

很明显列宁并没有将异化思想看作是前马克思的。

3.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49 马克思早期简要地写作了大量关于异化问题的文章。我专注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在这里最为突出地表现出来;第二,我们能够在这部著作中找到在其之后思想发展趋势中被展现出来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萌芽。

在我们可能提出的诸多问题中,我提炼出了以下问题: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理解的“异化”与“自我异化”的含义是什么?

异化与自我异化的起源是什么?

马克思区分了哪些异化形式?

如何扬弃异化?

首先,《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异化与自我异化的限定。当代关于异化的文献尤其是存在主义者的文献,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全部异化问题局限在了精神的自我异化范围内。这完全是对于马克思的误读,导致了异化问题的主体化。遗憾的是,一些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者已经接受了它,并因此对异化理论产生了

^① MECW, Vol. 4, London, 1975, p. 4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译者注)

^②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8, Moscow, 1963, p. 30. (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译者注)

厌憎。它划分出两个马克思的理论。让我们听一下马克思自己的解释。马克思清晰地区分了异化与自我异化。在详尽论述了异化劳动命题之后,他得出结论: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①

马克思的明确表达切中了它们的独到之处(区分主体与客体的异化关系、人的产品与它们的创造者相异化以及人与他自身的活动相异化)以及精准的语义。事实上,一位刚刚确立自己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年轻人所做出的这种区分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一直保持着它的合法性,向我们展现了这部早期著作中的创造性要素。此后马克思的首要旨趣在于异化关系,即人类产物(不仅是他物质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他脑力活动的产物、他所创造的以国家为首的社会制度的产物等等)的异化。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忽视了自我异化的问题——人在与社会,与其他人,与自我的关系中的异化。不过是他的经济学兴趣使他将注意力和分析转向了这种客体关系而已。任何人都会被这种对自我异化的值得关注的解释所震惊。当代社会学对于工人及其自身生产职能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我们在青年马克思著作中所找到的相比不值一提。

50

^① MECW, Vol. 3, p. 27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译者注)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①

这种对异化的经典表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资本论》中反复出现。囿于篇幅,我省略了《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其他曾出现过这种观点的文本。这里出现了三种要素:(1)对象化存在;(2)作为独立于人的力量的存在;(3)作为对抗人的力量的存在。我们注意到后期著作有时逐字逐句地重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一表述。它属于马克思思想的干流,而不是被增补的贫瘠之地(ghetto of the *Ergänzungsband*)。^②

51 常有一些人认为异化概念具有人类学特质,而马克思将它与人类

^① MECW, Vol. 3, p. 2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完整版有两卷增补,这两卷增补没有被包括在他们正常的写作顺序之中,并且被他们“不成熟的”创作思想所束缚。在东德,它们被以马恩著作标准版的“增补”卷形式出版。——亚当·沙夫

学一同超越了。但是,异化概念与人本主义并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它所展现的是人类本质(nature)^①对象化的结果如何作为一种独立于人并与之对立的力量发挥社会作用。如果青年马克思,尤其是在异化概念中,提到了任何意义上的人本主义,那只能说明这时马克思以“人类本质”或者“人的存在”概念为起点开始他的思考。可以肯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资本论》中亦然)借用了“人类本质”这一说法,但这毕竟有限。他在对社会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谈及异化:这就是此后他在更加深入与成熟的分析中仍然保留异化概念的原因。然而这一基础却奠定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尽管仍然缺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具有的历史方法)、异化与自我异化的区别甚至是商品拜物教概念的萌芽,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找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符合他们马克思主义视野的狭隘界限而喜欢将这部著作打发到角落里,所以有时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们(Marxologists)要比他们更加正确地强调它对于马克思思想发端的重要性。当论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延期出版(1932)时,爱尔文·麦茨克(Erwin Metzke)对此进行的评论并不正确,他写道:

但是它严格地基于这个基础,在那里立即出现了反对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反对对它们有意义的评价的权威的异议。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为人所知,所以它们不可能具有历史作用,因此——这种观点坚信——它们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个略被简化的异议忽视了我们能够在这些文本中找到马克思的整体思想由此汲取力量的深层次的诱发根源的事实——它甚至包含了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最终结果。《1844年经济学

^① 此处作者使用的是“nature”一词,而非上文中提到的存在翻译争议的“essence”,鉴于习惯用法,此处仍翻译为“本质”,下同。——译者注

哲学手稿》这种根源的特征没有因它们未能显露而遭受贬低,相反只是被确证了。相似地,黑格爾的思想一开始也是潜在地发展,后来我们才从他的遗产中理解到,我们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去审视这样一种看似无形的由内部的创造性与影响力两条路径构成的生长,一种对于它哲学的新的总体理解在其中得到了发展。^①

很多词汇都是这一命题的术语。马克思经常使用词语 *Entfremdung*(异化)、*Entäußerung*(外在化),有时也使用 *Veräußerung*(外化)。52 我们注意到尽管异化(*Entfremdung*)与外在化(*Entäußerung*)意义相近,但在很久以前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它们的意义差别在黑格爾那里仍然被保留着,但是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它们通常作为同义词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两个术语在某些地方意义相同,在其他地方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②

或者在另一处:“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③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黑格爾辩证法的章节中,这些表述的含义却明显不同:“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

① Erwin Metzke, *Mensch und Geschichte*, in *Marxismusstudien*, zweite folge, Tübingen, 1975, p. 4. 麦茨克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不为人知,不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以沙夫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译者注

② MEW, *Marx Engels Werke: Ergänzungsband-Schriften bis 1844*, Erster Teil, Berlin, 1968, p. 512 (English translation MECW, Vol. 3, p. 2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译者注)

③ MEW, *Marx Engels Werke: Ergänzungsband-Schriften bis 1844*, Erster Teil, Berlin, 1968, p. 514 (English translation, MECW, Vol. 3, p. 2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译者注)

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的对立。”^①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外化(Entäusserung)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与 Entleerung(清空)、放弃自身相同,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了宗教的神性放弃。于是我们在上述段落读到了“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Die Entäusserung des Arbeiters in seinem Produkt)”^②。这对理解下述异化与外化含义明显相同的表述很重要：“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Die Entfremdung des Arbeiters in seinem Gegenstand)。”^③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④

这是一个在异化劳动和工人自我异化的命题之后的非常清楚的表述(两个问题在探讨中交织在一起,没有严格地区分)。不能否认马克思是在对工人的存在(上面简要提到的人本主义)的表述中提到这一点的,但他在《资本论》中也仍未抛弃这种方式。相反,这种思考方式在上面所提到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回归了,而且同样是稍微变化的语境下的“人的本质”。

那么,劳动的异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

① MEW, *Marx Engels Werke: Ergänzungsband-Schriften bis 1844*, Erster Teil, Berlin, 1968, p. 572 (English translation, MECW, Vol. 3, p. 3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译者注)

② MEW, *Marx Engels Werke: Ergänzungsband-Schriften bis 1844*, Erster Teil, Berlin, 1968, p. 512 (English translation, MECW, Vol. 3, p. 2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译者注)

③ MEW, *Marx Engels Werke: Ergänzungsband-Schriften bis 1844*, Erster Teil, Berlin, 1968, p. 513 (English translation, MECW, Vol. 3, p. 27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译者注)

④ MECW, Vol. 3, p. 2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译者注)

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

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①

然而，马克思没有把自我异化局限于工人与其生产劳动的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与其自我关系的异化，而是进一步提出了人与他人进而与社会的关系相异化的极为重要的要素。

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②

通过这种途径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所坚持的异化劳动导致人失去真正人类特性的立场——非人化的人是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结果。“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做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

① MECW, Vol. 3, p. 2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160页。——译者注)

② MECW, Vol. 3, p. 27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译者注)

生产出来。”^①

现在我们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与“自我异化”的区分方法以及它们的起源。马克思对异化的多种形式进行区分了吗？在他的设想中异化应被如何扬弃呢？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②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③

54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的语境下谈到了作为异化特殊形式的哲学：“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④

接下来的段落向我们指出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态势及其全部缺憾(以人的本质为起点，这是黑格尔哲学中巨大的定盘星，以及随之而来的概念混乱)，同时也展现出了马克思寻求扬弃异化途径的积极

^① MECW, Vol. 3, p. 28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译者注)

^② MECW, Vol. 3, pp. 312-3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译者注)

^③ MECW, Vol. 3, p. 29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译者注)

^④ MECW, Vol. 3, p. 3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译者注)

方向。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①

我已经表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与其经济学研究紧密相关并且以对于经济现实和生产劳动的分析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在其之后的经济学著作中仍然将异化理论作为研究工具保留和发展的原因。这个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没有被完全发展。我认为这是由于黑格尔哲学语言和将“人的本质”作为反思起点两方面的影响。然而那种所谓“人本主义”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在所有对于异化理论的决定性表述中，它都是一种基于事实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不存在于人的“本质”或“天性”概念中的生产关系。不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思想之后的发展。一条轴线连接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两部著作中充分发展了异化理论。不了解这两部著作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其整个体系中的重要性、位置以及作用。由于这些著作没有出版，整整几代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知道这些著作，自然也就谈不上了解。卢卡奇的情况是一种特例，他至少能够凭借对已出版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文本的了解，部分地推断出这一理论（就像人类学家凭借下颚骨重建人类史前史）。甚至像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这样的巨人都未能做到这一点。列宁本人毕竟还坚持认为，任何不了解黑格尔

^① MECW, Vol. 3, p. 29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译者注)

《逻辑学》的人都不能理解《资本论》的结构。如果说这一体系中的某些根本要素尚未被我们所知,姑且还存在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进行争论的可能性。

是时候公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了。这也许会扭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尚未结束的作为重要的未出版著作的命运。

那时,异化理论将不再是异端或修正主义的谎言;它是马克思的真迹,没有它人们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除非[与费斯廷格(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相一致]我们只从马克思那里选取能够被我们接受的部分加以理解。

二、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

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个普遍的因而也是模糊的悬设做出一个精确的说明。当论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conceptual apparatus)时,我所指的是它的概念网络(conceptual network),它不考虑这一理论所经历的变化,而是作为始终如一的特征被从异化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推断出来。因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依照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历史变化而进行的概念分析的差异与特质,而是是什么使这些概念联结为一个整体,促进马克思思想在这一领域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所有推断都意味着选择,此处我仍将运用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的历史分析中所使用过的方法。我将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入手寻找它们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起源。

我会广义地诠释“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这个表述,即我不仅不会止步于定义,而且还要触及相关的概念,没有这些概念——在我看来——这一定义既不能被确切阐述也不能被理解。所以异化理论非但没有局限在异化自身的问题上,而且与对象化、物化、商品拜物教等问题相联系。

因此,我对概念体系的分析不仅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重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基于根据整体逻辑以演绎的方式对缺失元素的建构,当然这是在马克思的理论精神下进行的。但是在这里出现了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精神下”必然包含主观要素。所以,自身立场的陈述应当以不同立场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的陈述作为补充,尽管我所关注的不只是他们。为读者考虑,通过创造最佳的可能性来使他形成自己的判断,这是一种应当遵循的责任。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哪些类型是我们分析的对象呢?有三种:(a)异化和自我异化,(b)物化和(c)商品拜物教。对以上每一类型逐条分析能够使我们精准把握这一概念体系,这将为对当代异化问题的进一步反思提供基础。

(一) 异化和自我异化

在我看来需要阐明和精确表述的问题如下:

- (1)“异化”术语的定义;
- (2)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德文术语 *Entfremdung*、*Entäusserung* 和 *Veräusserung* 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 (3)异化和社会发展的自发性;
- (4)“异化”与“对象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异化的历史性;
- (5)“自我异化”术语的定义;
- (6)异化与自我异化之间的联系;
- (7)异化和非异化。

1. “异化”术语的定义

让我们首先做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对那些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是自明的,但是对于当代文献中所出现的概念混淆的观点来说却是

必要的。马克思在从早期到晚期的所有著作中区分了两个概念——“异化”和“自我异化”。它们是两种彼此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名称。异化指的是人与其生产活动的产物(在这个词的广义上,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智力的产物,以及社会制度等等)的关系。自我异化指的是人对他人、社会及他自身的态度。

我们为什么称这种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呢?“异化”是人与其活动结果之间确切关系的名称。尽管性质不同,但一旦这个结构被涉及,这种关系就与认知关系相类似:人总是出现在这个关系中,与其相关的这一关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被人所创造的现实(其活动结果)也是如此。异化是这些部分的特定的分离,使它们彼此对立。不过在马克思的解释中,这种分离的特定承担者因而也就是这种异化关系的特定对象不仅是人;它还可以是这个关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人所创造的现实。然而,人总是呈现在这个关系中并且它的发生也与人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在异化关系中张扬人的地位的人是正确的。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区别在于究竟是人还是他的产品与他自身相异化。我们谈及异化时,是说人的产品在与其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中使它们自身异化(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个问题),谈及自我异化时,是说人在与社会、他人或自身之间的关系中使他自身异化(同样,我们将在下文解释这个问题)。

异化是一种客体关系;它是人劳动的产物,因而是明确的对象(不仅是物)成为异化的,不考虑人对此对象的想法,也不考虑他如何感觉或经验它。我们在自我异化中面对的是一种主体关系;它是人使自身同被他在社会中所创造的世界相异化,或者同他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相异化。异化有赖于人的感觉、经验和态度,因而也就有赖于他的主体反应,尽管它们由社会条件所制约(在这个词的广义意义上)。

我们从一直作为异化关系组成部分出现的人开始论及了一种社会关系,他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是社会的个体,即他是社会的产物并在社会框架中发挥作用。

“异化”一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的含义是什么？

异化是人与其各种各样的产品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名称，它包含着这样的事实：人创造特定的事物、观念、制度等等，其想法是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并力求在这一领域实现特定的目标。然而，人的这些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中发挥作用的产品服从于统治这一机制的规律的作用，有时候采取违背人的意愿的方式，并且这些产物摆脱它们的创造者所设定的目标而获得的自律性成为社会发展自发性的一个要素。因此，人的产品在异化的框架内转变为一种与人相异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他的意志相对立，消解了他的计划，甚至威胁他的存在并且支配他。

这种对“异化”一词的解释与战时和战后阶段广为流传的观点不同。异化的人被加缪(Camus)解释为陌生的人(L' Etranger)，被萨特解释为恶心(La Nausée)，此前被赫尔曼·黑塞(Herman Hesse)解释为荒原之狼(Der Steppenwolf)，被卡夫卡(Kafka)的全部作品反映为在当代生活中具有巨大重要性的那些东西。但是笼统地将这一现象等同于异化不过是对语言的一种滥用，它假设了异化总是等同于自我异化。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异化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关于客体关系最重要的名称，在这种关系中，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商品等等的人的产物，使自身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即摆脱人的控制将自身塑造成自为的力量，与人相异并支配着人。

这才是马克思所使用的“异化”一词的基本含义，任何不理解它的人不是认知失调的受害者就是不了解马克思的著作。

2. 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德文术语：Entfremdung、Entäusserung 和 Veräusserung 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马克思在异化问题的语境下使用了上面三个术语。有时尤其是

在早期著作中,他交替使用它们(至少是 *Entfremdung* 和 *Entäußerung*);在其他文章中他却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这些表述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应当如何在马克思的阐释语境下理解它们?应当如何将它们翻译成其他语言?

词语含义的不同与上文所讨论的历史有关。*Entäußerung* 的表述等同于拉丁文的 *exinavit* 或 *sich entleeren*,即“某物放弃自身”、“某些属性的失去”,源自于异化理论历史的神学倾向(神圣的存在在假设的人的形式中“放弃自身”的神圣属性)。*Veräußerung* 意为“处理”、“出售”、“向他者转让权力”。它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相当于在法律上的拉丁文表述 *alienatio*。最后,*Entfremdung* 意味着“疏离”、“成为异质的”。此表述亦源自于神学教义(人们在忘形中与自身疏离,或他在与宗教戒律相对立时与上帝的疏离),但却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才展现出它的全部光彩。

59

马克思是如何使用这些表述的呢?他对这些表述的用法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马克思在早期阶段像黑格尔一样经常区分异化和外化,但他偶尔也交替使用它们。在成熟时期,他则通常交替使用它们。所以一些人(尤其是关于这个命题的意大利文献)提出 *Entfremdung-Entäußerung*(异化-外化)理论。但是马克思有时明确地赋予这些表述以不同的含义。这对解释和翻译马克思的著作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当不得不翻译 *Entfremdung*、*Entäußerung* 和 *Veräußerung* 这些词语时,人们可能不会将它们视为同义词。我们试图在每种语言中找寻它们的对应词汇,以期可以不再以单纯使用“alienation”这个词作为一条简单出路。“Alienation”不是单词 *Entfremdung* 的翻译,而是 *Veräußerung* 一词的翻译,即在法律意义上的“处理某物”。[英语在这方面是个例外,对它来说“alienation”一词的意义与“alien(相异的)”一词相关。]斯拉夫语在处理 *Entfremdung* 的翻译问题时有一个恰当的表述:俄文中的 *otchuzhdeniie*(俄文中谈及 *teoriia otchuzhdeniia* 时从未使用过“alienation”这一单词),波兰语中的 *wyobcowanie*,等等。

不幸的是,波兰语中的措辞以法语为原型,致使“alienation”与“theory of alienation”两种表述成为主流。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国人走上了这一路径。这可能是由于很难从法语的 *étranger*(异化)中杜撰一个恰当的表述,也可能是由于存在主义者的影响。他们实际上是积极地还原了这一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的辉煌。但是集作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职业(*métier*)并不总是发挥出哲学的优势。不管怎样,“alienation”这一表述被明显错误地与 *Entfremdung* 及其他被认为是 *Entfremdung* 同义词的词汇等同起来,这已经成为事实。

60 3. 异化和社会发展的自发性

我们在上文定义“异化”概念的过程中提到了异化和社会发展自发性之间的联系。依我之见,这是此问题极其重要的要素。如果异化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人类的活动结果在既定社会机制下被人以盲目的方式发挥其作用,转变成阻碍人类计划目的的实现进而支配着人的自律的力量,那么我们实际上说的就是社会发展的自发性。“自发的”在这里等同于“人的盲目”,因此它有时“与人的计划对立”甚至“与人及其有意识的活动相异化”。人类活动的异化产物表现得像某种要素——火、水等等——当其摆脱人的掌控并摧毁他的财产甚至生命时就像一支入侵一个国家的部队。

我们使用一个将自然或社会力量拟人化的术语来陈述这种自然或社会现象,就好像它们被赋予了意识并且追求着特定的目标。语言的这种用法存在着潜在的危险。考虑到这一描述并没有“行动”,那么人类活动的结果、市场上的商品、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科学等等,就不是像这类术语通常意义上所表达的那样与人“相对立”、“阻碍”人的计划。无论物、制度还是如意识形态等等这样的精神产物都不具有任何意识,提到它们的“行为”、“对立”等等不过是一种想象和暗喻。只有人才可以行动,才可以创造特定的社会体系及其规律,并

且也是他们造成了人类的活动结果受到这些规律支配的事实,造成了人无法通过他的活动达到其目的设计的事实,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与人类所期望的不同甚或相反的事实。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异化是发展的自发性的原因还是发展的自发性是异化的原因?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各个方面审问社会进步的原因,并且能够以不同的手段来表达依这种方式所获得的认知。但是这些认知是互补的而非矛盾的;从认知的对象方面来说,它不是对不同现象的解释而是对现存的不同现象的不同解释。

所以我们正面对着一种个体甚或整个社会在其中向往并试图通过他们的行为实现一个决定性目标的社会进程。然而他们行为的结果并不与其目标相符,甚至是大相径庭。人生产对象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但这些对象却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发挥着商品的职能。当生产过剩的危机随之而来,它们不但无法触及消费者并满足其需求,而且还像泛滥的自然力量那样通过失业、饥荒等手段摧毁了人。人类发展科学以掌握关于世界的知识进而强化对于世界的掌控;但诸如原子能这样的知识也能扮演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量的角色。这些例证也许还要增加,包括导致宗教法庭的意识形态,通过其官僚主义机器消灭人的国家,引发人口爆炸、污染环境、耗尽自然资源进而威胁人类生存的科学。我们在以上全部事例中所面对的是社会发展的自发过程及在客体关系意义上的异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此处要探讨一种时间序列,探讨一种因果(cause-effect)的承继关系,探讨异化是发展自发性的原因还是发展的自发性是异化的原因,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同时表现出这两种性质,因而能够被从这两种角度中把握到的社会进程。在社会进程中自发出现的就是一种具体的异化,而且反之亦然;但是,将这些现象连接在一起的关系并不在于这一根源——因果关系。两者都可以被还原到共同的基础,被嵌入到特定社会的机制中。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它们之间关联和互补性的意识使重新审视两种现象并更

61

好地理解它们成为可能。总之,直到异化受人关注为止,我们所涉及的都是一个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与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中异化了的、苦恼的、沮丧的或者被病态困扰的人相去甚远。然而,这并不是—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alienation”—词的恰当用法。我们想要追问这个社会是如何发展的。

4. “异化”与“对象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异化的历史性

除了上文讨论的表述之外,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还出现过
62 *vergegenständlichung* 或“objectification”(对象化)的术语。如果说外化是依实际行为及其客观结果将人的思想转变为它的自我表露的现象的精神方面,那么对象化就是同一现象的另一方面,或者是从意识和有目的的人的思想与活动的客观结果的角度对此现象的另一种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对象化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超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要素。一旦涉及异化,这种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对象化与社会特定经济结构的本质无关,没有对象化那些客体将不会存在,而人类活动结果的异化关系的出现与此不同,还必须满足一定的额外条件。这些条件具有历史性,即它们在固定的历史时代出现并在其他时代消失,它使人类活动的结果自我确证为独立的力量,与人类活动相对立并统治着人。与对象化不同,异化具有历史性,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发挥作用并随它们的更迭而消失。我们所讨论的客体关系意义上的异化,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是一种社会中有条件的现象,而非存在主义者和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宣称的与“人类状态”相关的某种东西。因此限制它存在的社会关系一旦被超越,异化的扬弃——非异化——就会成为可能。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对抗异化的过程。让我们回想—下,资本、雇佣劳动、国家等等对于马克思来说都是异化的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谈到了异化的历史性,因而是暂时的和可以被扬弃的特性。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①

5. “自我异化”术语的定义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异化与自我异化进行过区分。尽管马克思对于经济问题的兴趣将他的主要注意力导向了作为客体关系的异化,但是这种区分的合法性也一直存在着。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将自我异化定义为一种人在其中与他人、社会及其制度或者他的自我相异化的社会关系。

63

但是自我异化是与异化不同的现象。“自我异化”意味着“成为异化的”。一个人可以与一个特定群体相异,相反,也可以接近、归属于它。那么物呢?人类的一般产品呢?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它们是“异己的”或“异化的”?“异质的”(foreign)这个词在W.多罗舍维斯基(W. Doroszewski)编辑的《波兰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不属于某一人群、问题、物品;与某物在外部相关,与某物相异,不被任何人的利益所包括,异化的。”这是一个可以将事项与物都定义为“异质的”宽泛概念。塔德斯·科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niski)反对语言的实体化,认为事物不可能是异质的,但是以特殊方式行动的人可以是异质的。但即使某人接受了这个定义,通过对于“异质的”隐喻性的使用将其扩展到物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在这里发现人类产品“异化”的概念内涵。

^① Karl Marx, *Grundrisse*, p. 83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译者注)

重要的不是这些异化的产品不属于一个特定的物的范畴,而是它们明显的表现(这里的问题出在了谈及它们的方式上),而且像在异质的和对立的条件下人的行为一样发挥作用,“自我确证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妨碍人的计划”、“支配人”。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是隐喻的。问题实际上在于人类活动的结果已经进入到他们固有的特质中——作为一件商品、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制度——进入到特殊的社会关系范畴中(归根结底,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律统治着这一领域,产生了与它们创造者意图相对立的结果——危机、宗教法庭、官僚主义统治等等。“异化”或“它们使自我异化”(alienate themselves)^①一词只有就这些产品导致了与它们创造者意图“相异”的结果来说才有意义。

64 此问题在“自我异化”术语方面看起来完全不同。拒斥某一特定社会体系并因而站在以否定方式对待他人的立场上的人,确实会在某一特定社会和其他人那里感到异化或格格不入。一旦这种“自我异化”涉及人的自我时问题就会变得复杂。然而,这也可以被人说成是在与令人真正满意的社会角色之间关系中的异化,在他实际与所希望的境遇之间的比较关系中的异化。我将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观点作为人自身方面对期望和野心(在这个词的积极意义上)的不满足加以引述。比如,热衷艺术却迫于生计沦为三流作家的人可能会感觉这是“真正”生命的丧失。一个人可能受到极权主义体制的威胁而贬低自己,放弃自己的理想并高喊他不相信的口号;他憎恨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那些致使他如此行事的事物,自知是一个恶棍却经受着他个人的灾难。按意愿行事却得到了事与愿违的恶劣结果的科学家是沮丧的,并且会感到他的生命同他想象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是相异的,是“未得到满足的”和“不真实的”。这是对自我异化命题的一个明智的、合理的解释。没有必要以“人的本质”或“人类本性”这样的想象来使某人

^① 指物的“自我异化”,为了与指人的“自我异化”相区别,因此,此处译为“它们的自我异化”。——译者注

将他的生命视为“满足的”，并使自身安于现状的假设成为可能。这里更需要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吹毛求疵”。

马克思在一段引文中谈到了非人化的人(entmenschlichter mensch)。在现代用法中，有时被说成“非人的生命”以表明什么才是“人”的形式。某些对事实的否定评价是以被接受的价值体系或“人类存在”形式为依据的判断。在这里利害攸关的看似是一些人类学的本质主义类型，但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是人类拥有借以判断事件及对其进行评价的价值体系和人格模型。因为特定的人的全部观点尤其是社会-政治观点是在历史时期中形成的，这些系统和模式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所以人类会做出不同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不可能谈论“人类本质”这个普遍的形而上学概念；不过，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拒斥纳粹主义的超人概念并且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立场辩护。

因此在自我异化的情况中提出“异己”(alienness)和“异化”(alienation)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可以用异己的感觉反作用于特定处境。当我们将这个词语转变为异化的关系，即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他的产品，它就有了一种隐喻的意义并且困难接踵而至。这主导了一些作者的偏好，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的作者，他们有意地将异化问题仅局限于人。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为客体的异化寻找另外的名称，毕竟它已经真实地出现在关于这一命题的文献中，特别是马克思的文献中。问题不是名称，而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它能为主体的和客体的异化的区分做出解释。约瑟夫·格贝尔(Joseph Gabel)是此观点最彻底的反对者，他把这一区分称为是经院哲学的。^①

65

我们应该将“自我异化”限制在人与他自我之间的关系问题，或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抑或两者的狭隘问题上吗？让我们采用马克思使用自我异化(Selbsentfremdung)指代所有这些关系的现实。但是我打算在适用于与自我关系相异化的“狭义的自我异化”与适用

^① Joseph Gabel, *Sociologie de l'aliénation*, Paris, 1970, p. 23.

于人类异化的所有表现的“广义的自我异化”之间进行区分。此外,我打算在涉及人类活动结果的异化时使用“客体的异化”,在涉及自我异化的表现时使用“主体的异化”。这些区分在马克思著作中并未出现,但它们可以被引介到他的异化理论中并且不会影响其内容。我们即将在此后对于异化问题的思考中用到它们。

6. 异化与自我异化之间的联系

那么客体的异化和主体的异化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显然我们在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将它们全都称为“异化”就会造成混乱。共同的要素是“异己”而不是“异化”。当人经历自我异化时确实会出现一种异己的感觉。第二种情况,客体的异化具有一种隐喻的含义,与此同时的现实问题是自发的社会发展与人们的计划和目的相对立。当然如果两种社会关系都能够挖掘出各自相区别的名称,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避免很多对文字性质的误解;这种典型的“词语暴政”不仅会造成文字的实体化,也会因对同名掩盖下的异物使用相同的词语而使我们认为两种现象是同质的。但与口语的应用不同,这种精确性必须寄托于一种虔诚的愿望。其解决之道就是使这个词的歧义明晰并力求使我们的意义明确。

然而也不能说客体的异化与主体的异化毫无关系。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因果关系。自我异化出现在客体的异化的基础上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被从渊源上理解。当代社会对异化研究方式的一大理论缺陷就在于没有理解这种联系,进而将主体的异化与其基础分离开来加以研究。这一难题与异化具有历史条件特质的问题息息相关。如果异化不是一种“人类状态”——一个经验主义学者不能毫无保留接受的形而上学假设——的永恒要素,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才是人自我异化于他人、社会以及他们自身的根源?被通俗的“自我异化”名称所涵盖的现象不是永恒的,但却在特定的时代和

条件下更充分地显现。它们可能在相同时期内的一定社会环境下更充分地显现或者说实际上受到了环境的制约。为什么？除非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会予以解答，否则此领域中的所有研究将是不完整的或无意义的。异化的两种类型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清晰地出现。

现存社会的个体关系与全部的社会团体关系(比如,青年人、被压迫的民族、种族群体等)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结果,出现在这些关系无法令那些人满意的时刻。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状况(在这一表述的广义上)往往是他们客体的异化的结果。总是最根本的客体的异化开启转变的过程,进而导致了主体的异化的各种形式。理解这种实际存在的关系比发现“异化”术语的普遍基础更加重要。这对非异化行为目的可能性的观点来说更是如此。

7. 异化和非异化

这的确主导了马克思对于异化的兴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社会罪恶的警醒,还在于对它的除弊与防范。被马克思视为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体系的普遍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被描绘。

所以简单地将异化等同于社会罪恶是不正确的。对于社会“好”或“恶”的任何评价当然都不是一种绝对评价,但是却涉及具体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利益关系。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异化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看来,并不是一种社会罪恶,而是相反。相似的讨论适用于任何革命的立场。我们总是假设某些价值体系以便创造这样的价值。价值随假设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异化根据定义不同于社会罪恶。

67

非异化完全与异化关系的历史性相关。如果异化是“人类状态”的永恒属性,那它将不能被扬弃。只有对象化才是一种在各种社会形式中都是必要的超历史现象,而异化并非如此,社会生活的特殊状态带来异化时是可以通过废除和扬弃这些状态的方式走向非异化的。

如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私有制与劳动分工导致了异化,那么这个社会下的非异化就必然包括对于私有制的扬弃,因为私有制的扬弃是所谓非异化的一个方面。

非异化过程的基础必然是对客体的异化、人类活动结果的异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发展自发性的扬弃,这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异化与自我异化的同一逻辑中得到的结论。在他们社会关系中的隔阂及缺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等等的意义上彻底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必须首先消除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生活条件,即必须在所需的方向上改变社会生活本身。这明显毫无疑问,但它却对深刻理解异化和自我异化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分析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实际上是尝试重建这一理论并使其系统化。这种尝试自身包含了一种主观要素;每种重建都含有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然而他自己却很难设法使这种主观因素客观化并消除它们。尤其在试图系统化一个没有被系统提出的理论和使屡遭歧义困扰的概念变得精准——特别是在研究青年马克思著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68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使概念“变得清晰”并不是哲学家们的习惯。重要的是,当代分析哲学各种各样的基调都要求哲学家对他所使用的词语负责。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理逻辑基础的危机引起了关于语言不仅是研究工具也是研究对象的认识。分析哲学的各种形式(英国学派、波兰学派、“维也纳学派”)将这种认识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哲学思维的先决条件的地位,赋予了哲学思想以全新的生命(colour scheme)。这个设想至今也未能被所有的哲学家接受。举例来说,萨特就曾附和詹姆斯(James),对于在不考虑语言的精确情况下,所有哲学家都是优秀的表示赞同。同样的想法被一个人简单并充满人性地表述出来,此人是我在华沙举办的哲学人类学研讨会的参与者之一,他反对我对于给出精确概念并消除歧义词语迷雾的设想。他说,“这不可能,因为这样不会为哲学思维留下任何东西”。我的观点正相反:

哲学只有在显明的问题被消除之后才能够面对本质问题。但是哲学思维直到 19 世纪中叶还都是被以纯文学 (Belles Lettres) 的方式完成的。哲学的语言和风格无疑比今天的更为美妙,但却使人烦恼,哲学家因将词语作为主要工具而缺乏我们所期望的对于词语的责任。这就是我个人要找寻黑格尔令人烦恼之处的原因。黑格尔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困惑者。无论如何他都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的哲学却与阿尔都塞的断言相反,为青年马克思和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创和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光辉,但我不会因为承认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而使我自己受到剪裁,使我由于同样的原因而烦恼。至少就相关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说,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于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仍然是以黑格尔的方式进行的。希望那些将我视为一个青年马克思的崇拜者并且声称我在涉及人道主义、人类个体以及异化等问题时与青年马克思保持一致的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相反!我所谈论的是鲜为人知并尚未被了解的成熟马克思;他就是伟大的人类学家,他就是人类个体理论、异化理论等等的提出者。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任何真实和明显的不同,那也是存在于他哲学思维的语言中。当然这与他所研究的课题相关,人越有经验思想就越成熟;但也必须将其与他思考和阐释的风格中特有的精妙联系起来。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了黑格尔的风格,这部著作的语言也与其早期著作完全不同。但它仍然保持了不同于任何在当代哲学中所遇到的特有的语言。马克思写得很精妙,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的著作是难能可贵的文献。不能要求这样一个思想家严格地解释每一个概念。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并鞠躬致意;但是工作仍然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包含着重构,这种重构不可避免地要激发主观因素,涉及个性、观点、偏好以及对于重构的惶恐。

69

所以不论对这一主题支持与否,那些曾写过相关著作的人的观点都应当被充分考虑到。甚至我都无法论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著作。

我甚至不得不选择实际使用哪些著作和将哪些著作列在本书结尾的参考文献中。我从所有的包括那些我不赞成的著作中借鉴了很多。

我最关心的是马克思著作中客体的异化问题,即理解为马克思在“alienation”一词特定含义上主要所指的来自于人类活动结果的异化。我不赞同存在主义影响下展开的甚至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将异化问题界定为人的主观感受、感知与态度,进而界定为自我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在这方面最为敏感。现实也是如此。苏联在1960—1970年十年间出版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与异化问题相关的著作,它们依据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内的马克思文本,提出异化问题是人类活动结果的异化,并为了反对异化与对象化之间联系的背景而强调异化的历史性,讨论客体的异化与主体的异化的关系,等等。我与它们某些作者的观点分歧只在于社会主义异化的问题。但此后的分歧更多。除了我所引用的与异化范畴保持距离的阿依西尔曼(Auserman)和达维多夫(Davidov)的著作外,大量令人兴奋和具有洞察力的著作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间的苏联。我应当在这里做一个自白。拙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在1965年出版,我在书中以一章的笔墨探讨异化问题,发展了异化是一种客体关系的思想。这一章节是那时对于这一命题最为详尽的哲学阐释。然而,我没有考虑到那些曾预先站在我立场上的苏联作家的贡献。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著作。著名的苏联哲学家,备受推崇却不幸英年早逝的玛利亚·伊萨科芙娜·彼得罗西娅娜(Maria Isakovna Petrovian)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曾因此而责备我。尽管姗姗来迟,但我现在就要偿还我的亏欠。以下作者曾在我之前将马克思人类活动结果的异化概念作为一种客体关系加以研究:帕日特诺夫(L. N. Pazhitnov)、西特尼科夫(E. M. Sitnikov)、达维多夫(他在同一著作中显得对异化理论缺乏热情)、科舍拉娃(V. Keshelava)、纳斯基(I. S. Narski)与彼得

罗西娅娜(M. I. Petrosian)。^①也许还有其他人。20世纪60年代后期,奥古尔佐夫(A. P. Ogurtsov)、巴基舍夫(G. S. Batishchev)、梅格朗比娅娜(A. A. Megrabian)以及纳斯基(I. S. Narski)^②也发表了类似的著作。这是全部我知道的苏联著作,它们使用了我所认为的对异化正确的定义。以上的一些作品意义重大,尤其是奥古尔佐夫在《哲学百科全书》(*Filosofskaja Entsiklopedia*)中关于异化的值得赞赏的文章,以及科舍拉娃的小册子《两个马克思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o Marxs*),其译本无疑使阿尔都塞学派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受益。

但出人意料的是很难在西方作者那里发现相似的理解。我将从德·曼(de Man)这位不会支持我论点的作家开始。他几乎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后就立即发表在《战斗》(*Der Kampf*)上的文章试图以马克思早期著作作为论据来支持“伦理社会主义”。这篇文章巩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界总体上反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被视为“前马克思主义”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偏见。德·曼以他研究社会问题的个人主义方式而闻名,这已经在《超越马克思主义》(*Au delà du Marxisme*)中被证实了。但他还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异化是一种客体关系,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发现这一点。

异化概念在这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亚当·沙夫)中至关重要……只要人们邂逅他带入到生活中

① L. N. Pazhitnov, *U istokov revoliutsionnogo pereworota v filosofii*, Moscow, 1960; E. M. Sitnikov, *Problema "otchuzhdeniia" v burzhnaznoi filosofii i fal' sifikatory marksizma*, Moscow, 1963; J. N. Davidov, *Trudi i svoboda*, Moscow, 1963; V. Keshevala, *Ob istoriko-filosofskom razvitiu poniatiiu "otchuzdeniie"*, *Filosofskie Nauki*, No. 4, 1963; M. I. Petrosian, *Gumanism*, Moscow, 1964.

② A. P. Ogurtsov, *Chelovek v mire otchuzheniia (po rabotam Marksa)*, in *Chelovek v sotsialisticheskom i burzhnaznom obshchestve*, Moscow, 1966; G. S. Batishchev, *Deiatel'nie sushchnost' cheloveka kak filosofskii printsip*, in *ibid.*; A. P. Ogurtsov, *Otchuzhdenie*, in *Filosofskaja Entsiklopedia*, Vol. 4, Moscow, 1967; I. S. Narski, *Kategorija otchuzhdeniia v "Kapitale" i drugikh trudakh Marksa*, in *"Kapital" Marksa—filosofija i sovremennost*, Moscow, 1968; A. A. Megrabian, *K probleme otchuzhdeniia lichnosti*, in *Problema lichnosti*, Moscow, 1969.

的作为“异己的、对立的、有力的、独立于他的对象”的物及他的劳动产品,就会发现自身与其“对象化劳动”相对立,与“异己的、独立于他的、作为这个对象主人并与他敌对的人”相对立。因此,对当代社会异化的具体表述来自于私有制下的阶级划分。^①

71 所以我们在像卡缅卡(Kamenka)^②这样的马克思学家、弥敦罗·滕施特赖希(Nathan Rottenstreich)^③或哈利姆·巴拉卡特(Halim Barakat)^④这样对异化问题感兴趣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者如斯德涅克·斯特尔密斯卡(Zdenek Strmiska)^⑤或洛斯纳(Rozner)^⑥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思考的理论家的著作中遇到将异化作为一种客体关系的理解并不稀奇。最后两位作者的分析看起来对我特别有益。在一次由亚眠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de Recherche Sociologique d'Amiens)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上,斯特尔密斯卡做出了我所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典型分析。

通过异化逻辑,某人可以区分一些彼此相关的事实。因此,(a)对象化是异化的前提,异化以对象化为出发点,但是却与其完全相同;对象化是异化起源的必要不充分条件;(b)创造者失去了对其产品的掌控;(c)这一产品的运动成为自律的;(d)产品的自律的运动(或活动的影响)成为支配

① Hendrik de Man, *Der neu entdeckte Marx*, *Der Kampf*, No. 5, 1932, p. 28.

② Eugene Kamenka,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London, 1962, p. 82.

③ Nathan Rottenstreich, *Concept of Alienation and its Metamorphoses*, in *Basic Problems of Marx's Philosophy*, New York, 1965, pp. 157-161. 弥敦罗·滕施特赖希(Nathan Rottenstreich),沙夫此处疑拼写有误。——译者注

④ Halim Barakat, *Alienation: a Process of Encounter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0, 1, 1969, pp. 1-2.

⑤ Zdenek Strmiska, *Structure et problématique sociologique marxienne et notion d'aliénation*, in Joseph Gabel, Bernard Rousset and Trinh Van Thao(eds), *L'Aliénation aujourd'hui*, Paris, 1974, pp. 69-70.

⑥ Menachem Rozner, *Aliénation-fétichisme-anomie*,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11, 1969, pp. 82-84.

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与人相对立；(e)产品的异化导致了他的全部活动、他与世界和他人关系的异化，最终导致自我异化。^①

这里所选择的些许例子将表明我的立场绝不是孤立的。现在来看看那些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持对立观点的人。有的苏联作家认为异化就是主体的异化、自我异化，我认为这种立场是不可原谅的。譬如，伊戈尔·康(Igor Kon)在《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上发表的文章。^② 它展现了作者对社会学问题的精通。但他把马克思的观点理解为一个关于工人与生产方式之间关系异化的命题；他在问及异化含义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是异化的？”并以所讨论的问题明显是人的异化的陈述来回答。他以人类本质异化的方式展现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问题；他对总是以人性为主题的异化定义的唯一批评是应当讨论社会阶级的异化而不是个体的异化。伊戈尔·康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本质，而且没有将它从当代社会学的主观主义中区分出来。

在这一点上，伊戈尔·康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并不孤单。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翰·刘易斯写道：“‘异化’术语经常被如此含糊和随意地使用，以至于它成为一些人的口头禅。这是不幸的，因为它所指的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经验形式。一个人对痛苦、困惑、迷惘以及强烈的孤独的经验是不争的事实——之后才出现术语；即使被滥用，它也保留了其所体现的内涵。”^③刘易斯明显遵循了存在主义者在这方面的观点，随后补充道：“最常见并且实际普遍存在的异化形式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类状态’或‘人类的困境’。”^④

同样的还有像实践派这样热衷于通过自治来争取民主权利并笃

① *L'Aliénation aujourd'hui*, p. 70.

② Igor S. Kon,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Social Research*, Vol. 34, No. 3, 1967.

③ John Lewis, *The Marxism of Marx*, London, 1972, p. 111.

④ John Lewis, *The Marxism of Marx*, London, 1972, p. 111.

信他们所捍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南斯拉夫作者们,可惜他们并不总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证据。我认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中心问题上是错误的;在他们的人类个体概念以及在异化理论上也同样错误的。这群思想家中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c)写道:“异化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都只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具体事例。因为没有‘自我’就没有异化……像整个自然这样的独立事物能够与人异化,但这些异化事例是人类自我异化的具体事例,是人同他自身存在的异化形式。”^①之后他从马克思那里引用了一段与此毫不相干的话。读他的文章就能够理解阿尔都塞学派反本质主义的盛怒。彼得洛维奇的实践派同僚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复述道:“在论及异化时,我们面对的只是人的异化情况。换句话说,没有人就没有异化。同样,异化出现和形成于人存在之处,并且只能在人存在的地方形成。”^②

我引述坎格尔加的文章是因为他所说的话能够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这个问题,并且我认为它展现了真理是如何与谬误混杂在一起的。将整个异化问题局限在自我异化上并声称这就是马克思的立场明显是毫无根据的,这可以被通过细致阅读彼得洛维奇为《罗罗罗经典系列丛书》^③所挑选的马克思的文章所证明。坎格尔加的第一句话是明显错误的。但因为异化被诠释为一种总是以人及其产品(包括被人改变的自然)为两极的社会关系,所以的确是没有人就没有异化。然而声称任何异化都是自我异化即人的异化,却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论(non-sequitur)。回想一下约瑟夫·格贝尔的观点,客体的异化与主体

① Gajo Petrovic, *Philosophie und Revolution*, Hamburg, 1972, p. 120. 在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23, 1963. pp. 419-426 中,彼得洛维奇以不同的话语说了同一件事。

② Milan Kangrga, *Das Problem der Entfremdung in Marx' Werk*, *Praxis*, No. 1, 1967.

③ 指德国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罗罗罗经典系列丛书》(Ro-Ro-Ro), 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出版的三卷本《卡尔·马克思论方法和实践》是该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其中的第二卷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者注

的异化的区别是经院哲学的。^①

如果这样的误解都能够出现在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的语境中,那么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们将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定义为主体的异化也就不足为奇了。^② 同样,赞同马克思主义的 E. 米兹茹奇(E. Mizruchi)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作为主体的异化与涂尔干-默顿(Durkheim-Merton)的客体的异化概念相对立。^③ 卡尔维(Calvez)虽然曾对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及其形式做出了敏锐及最具洞察力的分析,但也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定义为自我异化概念^④,尽管他在其历史分析方向上偶尔正确地将异化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异化。^⑤ 珀匹茨(Popitz)也在其关于异化的研究中认为马克思只有一个异化的人的概念。^⑥ 当然,这些只是被选择到的实例。它们证明了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和社会学中的主导趋势是将异化作为一种主体范畴进行探讨。

73

尽管在以非马克思主义为主的相关命题的著作中有一种趋势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等同于自我异化的趋势,但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个问题或对自我异化进行深入分析。但也有例外,尤其是在美国哲学和社会学文献中有效和博学地普及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弗洛姆。我应该也提到了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家爱尔兰·麦茨克的文章以及奥古尔佐夫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被当代社会学发展的社会角色理论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独创性解释。

弗洛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英译本的导言中^⑦分析了马克思关于作为人同他人及其自我相异化的自我异化概念。在此

① Joseph Gabel, *Sociologie de l'aliénation*, Paris, 1970, p. 23.

②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1985, p. 254.

③ Ephraim H. Mizruchi, Alienation and Anomie, in L. Horowitz (ed), *The New Sociology*, New York, 1964, pp. 254-255.

④ Jean-Yves Calvez,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p. 54.

⑤ Jean-Yves Calvez,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pp. 252-255.

⑥ Heinrich Popitz, *Der entfremdete Mensch*, Frankfurt, 1967, pp. 137-142.

⑦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pp. 53-58.

过程中,弗洛姆既呈现了自我异化与客体的异化的联系,也展现了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理论对于道德观念以及人学的影响。爱尔兰·麦茨克写道:

我们考虑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对于知识的探求都起源于对这些经验的反思——对人类通过其产品自我异化的理解。他以此开启了一种对我们时代人类历史命运的新的全面理解,只要人的基本境遇是被决定的,他就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他自己所创造的客体组织系统,而这些系统的自主性却在他的人类存在中利用和消耗他。所以自我异化概念在当今的社会科学讨论中已然不可或缺。恰恰是这些马丁·海德格尔在其致人道主义的信中所陈述的关于异化的思想致使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成为其他所有历史的叠加。^①

74 这些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者的言论比很多对存在主义的这种说明持有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刻,更加令人关注而且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奥古尔佐夫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少见于马克思主义者表述中的相似思想,值得一提的是,他运用了社会学的社会角色理论。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类生活的特性在两个密不可分、相互联系的进程——所有生活领域的制度化以及人类自身的职能化中被确立起来。社会现状是当今人们之间所有社会关系的中心。任何被承诺的情况都立即假设一种被多种多样的有机体所覆盖并不知不觉成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形式。人仅成为部分社会功能的一个执行者。执行此功能对他来说不是对某些客观的、社会的重要过程的表达。他反而将其视为一个他必须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尽其所能以最少

^① Erwin Metzke, Mensch und Geschichte, in *Marxstudien*, Tübingen, 1957, zweite Folge, p. 7.

的精神与体力的付出真诚地扮演。人成为一种社会角色的集合……^①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社会发展的自发性。它很少被讨论，但作为波兰对异化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先驱之一的布罗尼斯拉夫·巴奇科(Bronisław Baczko)是显著的例外。巴奇科在《异化情况的类型与结构》(The Typology and Structure of Alienational Situations)这篇极好的文章中讨论了异化情况的区分标准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己的”概念，他写道：

使用社会现象的“控制力”概念看似简单，特别是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意图与所获得的结果之间的一致……然而，尽管我们没有感觉到被异化，但社会现实中也发生了许多“不可控”的过程——如，语言创造过程或者关系体系的形成过程。因此，问题并不简单在于社会所有不可控的过程或现象，而是在于它们对于其创造者的破坏性……^②

(二) 异化和物化

我们的注意力在这里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在马克思著作中的物化(reification)概念；(2)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与术语“Entfremdung”和“Vergegenständlichung”(异化与对象化)同时出现在马克思那里的还有“Verdinglichung”(物化)。这个术语在马克思理论及最近几年来关于异化问题的具有重大影响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物化”概念比“异化”更加精确，同时它(不像异化)也能够被实际运用进而更加满足实证研究的需要。

物化是马克思“异化—对象化—物化—拜物教”复合概念中的重

75

^① Otchuzhdenie, in *Filosofkaia Entsiklopediia*, Vol. 4, Moscow, 1967, p. 154.

^② Bronisław Baczko, *Człowiek i światopogląd* (Man and World Outlook), Warsaw, 1965, p. 448.

要素。我们试图呈现的是这些概念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一种承继关系。约阿希姆·以色列(Joachim Israel)的看法毫无根据,他试图以源自卢卡奇而非马克思的物化概念来替代异化概念。^①马克思认为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是在任何社会结构中都会出现的现象,否则人们将不能生存和生产。正如人类思想的外化对于它成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现实来说是必然的,对象化作为人类活动的实现同样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②尽管来源于对人类劳动的常识性分析,但是这一命题与任何类型的人本主义都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objectification”)或“成为对象”(to be an object)不考虑也不依赖于任何认知心理,它只是表明人类劳动在客体的形式中实现自身,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形式既可以是物或理智的对象(如诗歌、音乐创作或科学著作),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国家、家庭等等这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们将对象化视为一个集合,那么物就是子集。物化(Verdinglichung,“reification”)就是这个被命名为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objectification”)的对象集合中的一个子名称。

人类的生产劳动以具有自然物体形态和典型特征的物告终。然而,这一明显表现并不是马克思思想里的物化范畴,尽管他作为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上所交换的产品与商品时研究的是物。马克思无论如何都没有谈论“作为一种物”(Dingsein),而是提及“物化”,即非物转变为物,视非物为物。这就是问题。在商品经济体系中,包括人及其能力和天赋等等在内的一切都成为一种商品,这里有一种将一切都视为商品,即可供买卖的物的趋势;而且因为物就是商品,所以这里还有一种赋予一切以物的本质、物化的趋势。在被理解为物与物的关系

^① Joachim Israel, *L'Aliénation-de Marx à la sociologie contemporaine*, Paris, 1972, p. 97.

^② MECW, Vol. 3., p. 2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译者注)

以及人类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的人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在此意义上产生并模糊了社会进程的本质。对马克思来说,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了异化,即客体的异化而不是主体的异化,正是这种异化产生了私有制,尽管异化、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随之而来。物化在马克思看来是诞生于异化的结果。这是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

对于货币的一种形式……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货币^①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②

在此意义上的物化是对象化的一种变异形式,是呈现为物的关系并归根结底呈现为人的劳动产品关系的人的关系的非人化,这一点今天甚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也能非常出色地理解。^③ 所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们没有理解这个基础概念是值得玩味的。他们坚持认为消除了人及其关系的“客观结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这种观点明显忽视了马克思自己的论述以及他为反对拜物教而做的斗争。我们好奇为什么有人会为了抛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的东西而不厌其烦地“重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

让我们转向卢卡奇在1922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④中的物

① 此处同上文相关注释。——译者注

② Karl Marx, *Grundrisse*, p. 16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页。——译者注)

③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1966, pp. 82-85.

④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的一本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写作于1919—1922年间,于1923年结集出版了德文版,沙夫这里说《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于1922年,应当是不准确的。——译者注

化。令我们感兴趣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发表之时,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基本著作尚未被人所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于193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出版于1939—1941年间。卢卡奇的作品是对那时马克思与黑格尔已知著作的杰出推理并且展现了作者非比寻常的理论洞察力;他的历史功绩在于向世界译解和介绍了马克思思想体系被忽视的理论方面。^① 不过卢卡奇的这些思想也因20世纪20年代还不被人所知的马克思著作在此后的出版而面临修正。在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导言中,卢卡奇亲自完成了这一修正。应当在这篇导言的背景下阅读与解释他的这部著作。

77 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提到的商品拜物教为依据阐释了物化问题,但他却赋予此概念以比马克思更加宽泛的意义并从中推导出异化范畴。这是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首次在哲学文献中提出异化范畴的理智壮举(tour de force)。它引发了这一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复兴,尤其是在存在主义者的著作中。不论是不承认它的海德格尔还是萨特都从卢卡奇那里得到了借鉴。正如卢卡奇自己在1967年导言中所承认的那样,他尽管是以唯物主义方式阐释异化问题,但其异化概念更接近于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研究的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文本而不是马克思的基础文本。还是让卢卡奇来自我陈述:“商品

^① 下面的信息是奇特的(不管怎样,这并不改变对于卢卡奇在“发现”马克思异化理论上的作用的评价),这是我在写完这本书之后,从大流士·乌尔里希·施拉德(Darius Ulrick Schrade)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的,即 *Philosophical Disputes i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Years 1895 - 1905* (Warsaw Univ.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1975)。在1902年,马克斯·蔡特包姆(Max Zetterbaum)于 *Neue Zeit* (1902 - 1903, Vol. 2, No. 34, 42 and 43)发表了题为 *Zur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的论文,他在文中坚持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他事实上并不了解马克思在这一领域的基础著作,但是这位作者却正确地展现了异化理论从《神圣家族》(那时已经出版)到《资本论》(拜物教理论)的连续性。这位作者拒绝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但其意义在于能够如此早地发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且领会它的重要性,尽管这位作者曲解了它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结构的本质……是呈现出物的特征的人的关系,因而获得了一种似乎如此严格合理又无所不包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自主性,但同时却掩盖了它基本本质的痕迹:人的关系。”^①

一旦商品形式成为普遍的,那么物化也就呈现出普遍的特征。卢卡奇重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话:“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②他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劳动异化范畴,就好像他已经读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那里的描绘所呈现出的意图。惊人般地正确地重现了马克思的思想!

这里最重要的是人的劳动由于自身活动的境遇而成了某种客观的并独立于他的东西,成了某种通过与他相异的、自律的价值来控制他的东西……人的活动会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之处与他自身相异化,从而成为一件商品;这种商品服从于社会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像所有消费品一样以自身的方式独立于人。^③

卢卡奇在此基础上令人钦佩地发展了与人的理论相一致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论,以及异化和非异化理论。为什么卢卡奇自己——在他生命最后阶段的1967年而不是20世纪20年代——彻底地批评了这一观点呢?因为他的论断对于我们感兴趣的观点来说不仅是根本的而且还是有益的,所以再一次让他来自我陈述。

卢卡奇认定异化问题在黑格尔那里第一次作为人与世界关系的中心问题出现。然而黑格尔的外化概念实际上是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因为是人类外化的结果创造了作为意识“复本”的对象世界。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只是在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使用

78

①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 83.

②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 86 (citing *Capital*, Vol. I, p. 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0页。——译者注)

③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p. 86-8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术语)这一点上追随了黑格尔。这一根本错误无疑成就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异化广为流传并且随即成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境遇的文化批判的中心问题。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文化批判(回想海德格尔)而言,很自然要使社会批判理想化为一种纯粹哲学的方式,将社会异化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态”。尽管其意图与此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历史与阶级意识》接近于这样的观点。被等同为对象化的异化意味着一种社会范畴——社会主义要扬弃(aufheben)这个异化。然而它在阶级社会无法去除的存在(unabrogated existence),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却使其接近于“人类状态”。这是错误地将相反概念等同起来的直接结果。对象化事实上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中无法被抛弃的状况的表述。当意识到实践尤其是劳动自身的所有现实性、包括作为人的思想与感觉具体化的语言在内的所有人类表达形式都是一种对象化时,那么显然我们在其中所面对的是一种人类交往的普遍方式。像这样的对象化是完全价值中立的。只有当对象化形式呈现出以它的社会存在来反对人(man)的存在和通过社会存在手段来奴役、取代及干预人类(human)的存在的社会功能时,客体的、社会内涵的异化才能够作为它们的必然结果而出现,所有专属于主体的内在异化也才能够自我显现。《历史与阶级意识》没有理解这种二元性。^①

79 按照卢卡奇本人所言,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发展历程使他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与这一发展相关,卢卡奇强调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阅读,尤其是他在其中发现的对象化的唯物主义阐释令他震撼。(这一点或许也被那些将之视作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青年时期的作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考虑到了。)卢卡奇在此基础上更加精确地表达了他之前关于异化命题的评述。

^①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 xxiv.

与这种想法相关……对象化是人类征服世界的自然方式,它可以是积极的事实,也可以是消极的。相反,异化是那种活动的特殊变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才能生效。这完全破坏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特殊成就的理论基础。这本书对我来说变得完全陌生……^①

依我之见,这一使异化所具有的历史条件特质明显呈现出来的自我批评还应当补充两点。第一,卢卡奇简单地将对象化和物化等同起来:不是所有对象化都呈现出物的形态,物化——基于卢卡奇引用的马克思著作中的段落——意指将人与人的关系视为物与物的关系,并非所有对象化(即人的客观存在的产品)都是一个物。第二,尽管将异化正确地视为对象化的一种特殊类型,但卢卡奇还是错误地将异化范畴局限为我们已经看到的自我异化。

我们分析了卢卡奇在物化上的立场也就不必费心于其追随者的看法了。约阿希姆·以色列的全部思想立基于卢卡奇的观点,可惜他完全忽视了卢卡奇1967年的导言,尽管他自己的书是在此后出版的。

(三) 异化和商品拜物教

有两个问题在这里出现:(1)拜物教一词在马克思概念结构中的意义;(2)拜物教、物化和异化的关系。马克思自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①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 xxvi.

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①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②

一旦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貌似他们产品之间的关系出现,那么商品就成为崇拜物、上帝般的偶像以及人类力量和特征显而易见的化身。因此,“商品拜物教”是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他们产品之间关系这一事实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名称。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形式和商品的相对价值时谈到了商品拜物教。然而他所阐释的规定性具有更加宽泛的意义和应用范围。马克思意义上的“拜物教”是人所生产的对象在其中表现为人之间实际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支配者,并以此方式掩盖他们人际间特质的一切关系的名称。例如,当交往理论中的语境被解释为词语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而使人自身受制于这种丧失了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符号时,那么我们就面临一种与商品拜物教情况相似的典型的词语符号崇拜。

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看来是简单和容易的,那么对第二个问题——拜物教与物化及异化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回答则更加困难与复杂。有人认为商品拜物教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取代异化理论构成了他关于社会现实分析的高级发展阶段。这一观点最常见于那些否定异化理论的作者。其他人则认为两种理论涉及相同的关系,只不过拜物教理论对这一关系的解释更加精准。例如罗杰·加罗迪(Roger Garaudy)写道,“马克思早期著作所称的‘异化’在《资本论》中

① 英文版原文为“The existence of the things qua commodities”,其中为突出商品以物的形式为表现,作者对“qua”一词进行了标注。——译者注

②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 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0页。——译者注)

被称为‘拜物教’”^①。我们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旅程排除了这种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道：“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②对于货币，马克思强调说：“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③

“拜物教”范畴和“物化”范畴有机地彼此相连；它们实际上是对同一种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为表现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表述。拜物教理论表明，当价值关系对外表现为商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商品交换价值以其劳动为基础的这些商品的制造者之间的关系时，商品就会呈现出偶像的特征。物化理论则表示人之间的关系对外表现为物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物化的”。两种理论谈及的是同一件事，差别在于拜物教理论研究的是这一关系中假设其为一种与人类特性相异化，并成为一种偶像类型的以商品为表现形式的物（commodity-thing）的方面；物化理论接近同一关系中被赋予物的（thing-like）特性、成为物化的人的关系方面。因此马克思没有以拜物教理论代替异化理论；他在《资本论》中将它们作为不同的理论提出。

商品拜物理论专门涉及市场上的商品关系而（客体的）异化理论涉及人类活动所有以物和非物为表现（thing-like and unthing-like）的产品；自我异化理论涉及在自身与社会、他人和自我关系中的人。商品拜物教理论“替代”异化理论的观点只是在尚未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时才成为可能。物化理论与商品拜物教理论对马克思来说是异化理论的一个结果。

在马克思异化一词的意义上，只有当人类劳动产品以及这个劳动

① Roger Garaudy, On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Voprosy Filosofii*, No. 8, 1959, p. 71. 对比加罗迪自己之前著作中所写的, *Humanisme marxiste*, Paris, 1957, pp. 30-31.

② Karl Marx, *Grundrisse*, p. 15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1页。——译者注)

③ Karl Marx, *Grundrisse*, p. 16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5页。——译者注)

的完整过程都与人的关系相异化,人的关系才表现为物(商品)的关系。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对人类劳动、产品及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异化问题的。这就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它在对于雇佣劳动和资本(异化的两个显著表现)的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想要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析就必须理解它与异化理论在渊源和方法论上的联系。

马克思以宗教异化(自然是以他的出发点——即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斯特劳斯的合理观点)为开端通过政治异化回到尘世中来,并最终到达经济异化这一基础的基础。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是异化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

82 被马克思充分发展的异化理论由四种要素组成: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异化(*entfremdung—Entäusserung—Veräusserung*)、物化(*Verdinglichung*)和商品拜物教(*Fetischismus der Ware*)范畴。它们构成了统一的理论整体。可是在这些范畴的交汇点上不仅出现了水平的等同(co-equal)结构,还出现了不排除相互作用和一种具体反馈的垂直的因果(perpendicular-causal)依赖关系。

对象化是最宽泛的范畴。异化是来自于特殊社会关系的有条件的对象化形式。因此所有异化都是对象化,但反之并非如此。因此,异化关系的结果以及异化状态的具体表现是在商品形式下作为商品拜物教关系出现的人的关系的物化(尽管物化-拜物教概念也可能被扩大到人的关系的其他表现)。

三、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命运

我希望使我的读者们坚信异化理论不仅是马克思理论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刻意指明这一问题,就是因为它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自明的。为什么它会遇到如此强烈的阻力?马克思体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为什么会被长久遗忘以

至于现在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己承认？是什么引起了异化理论在近来及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复兴？我力求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总结本章的内容。

(一) 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抛弃异化理论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原因

抛弃一种学说的一部分并且是一个被事实证明了的重要部分，必定会令我们感到惊异并促使我们去探究这是如何发生的。但这个问题是广泛的：不仅异化理论还有作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曾在一定时期内被遗忘。这对一些人来说平淡无奇，但对其他人也许是一种启示。工人阶级运动的第二国际时期（即直到第三国际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俄国社会民主党——乔治·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除外，抛弃或“遗忘”的时期。即使对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过是某种宁愿在沉默中忽略的“令人为难的”东西。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时髦的，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承认并被大加赞赏，但少数理论例外，就辩证唯物主义而言沉默占据着上风。但这并不令人意外。尽管诸如《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样的恩格斯基本哲学著作早已出版并被熟知，尽管面临着工人运动实际问题的压力，但马克思理论的诸多方面毕竟仍然亟待解决。更有甚者，一种能够“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多样化探索正处于进行当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理论家们的目光聚焦于康德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聚焦于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在俄国有着与此不同的形式，理论家们求助于经验批判主义。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奇特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那一时期并未在工人运动中盛行，也未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真实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部分的异化理论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同遭受了这种命运。

回答这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浅尝理论的工人活动家对哲学问题的否定态度可以解释为实证主义者在总体上对被指认为思辨的哲学的拒斥。我们没有忘记,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当代实证主义的立场,却坚信哲学应当被终结;哲学的任务应当由自然科学来完成。这轻视了他们无声地持续地发展了哲学的事实(仅以纯粹致力于哲学问题的著作《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自然辩证法》为例)。很显然他们像费尔巴哈一样深信这里所声明的观点至少在哲学一词原有的意义上并非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反哲学立场不可能对他们追随者的观点没有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与它所拒斥的实证主义相类似的立场。有一种谨慎的沉默笼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辩证法为特殊需要辩护,只要它所拒斥的是政治修正主义(K. 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对于伯恩斯坦的批判)的一种基础,那么这种沉默就会产生。像异化理论这样如此沉重的哲学理论显然没有任何机遇。

那一时期的理论家与领袖的这种反哲学态度无疑同他们对工人运动和政治斗争的现实问题的专注有关。并非是工人运动的现实需要使理论工作相形见绌。我们不能在字面上理解马克思关于革命运动现实事务的一小步也要比全部大量的理论更有意义的断言。马克思此前同样阐述了理论对于现实运动的重要性。可见一切取决于人们面临怎样的理论问题。承担这些问题的现实的领导者们——理论家与实践者在工人阶级运动中仍然没有“分工”——必须选择并合理提出与现实斗争紧密相关的首要问题。这为哲学问题带来了不利因素。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工作起始于哲学问题,异化理论在其中地位显著:但是,并非是起点而是目的地,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优先地位——即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阶级斗争及其形式),特别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其起源无关。

所以,因以科学拒斥思辨而起的反哲学态度与实践者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天生逃避共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领域中对哲学的反感,今天这

对我们来说如此奇怪。另一种对“遗忘”异化理论具有特殊影响的因素是不了解分别在1928年、1932年和1939年才得以出版的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基础文本。

这些文本在马克思有生之年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出版：有的是由于政治上的麻烦（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他则是由于仅是草稿而没有打算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及随后的考茨基在马克思过世后自然专注于《资本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出版。直到由弗兰兹·梅林（Franz Mehring）承担重要编辑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才被关注（始于《神圣家族》）。但是，唯独苏联学者，尤其是梁赞诺夫（Riazanov）和阿多拉茨基（Adoratsky）的努力才使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具重要意义的，特别是哲学的著作得以出版。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只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出版后才有可能被意识到。尤其是以上这个事实造成了在异化理论方面的沉默。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将他们的想法建立在异化理论之上（即便在他们没有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他们的后继者却不能理解这个理论，尤其是它在马克思体系中的定位。异化理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例如，马克斯·韦伯、西美尔（Simmel）和涂尔干]作品中的出现，这只会使审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本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社会关系必须发展到特定的节点才能够呈现出异化理论的意义并使其复兴成为可能。

85

（二）异化理论的复兴及其在马克思主义背景下再次被接受的原因

为了回答为什么异化理论再次成为“流行的”，为什么它会在社会

科学各种领域中证实了其有效性,我们就必须考察对这种现象具有重要影响的当代社会转型的基础,否则就很难解释过去被遗忘并已被视为过时的特定概念和理论却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显现出新意义的“错乱的想法”。^①在我看来,观点为某些客观需求提供理论回答时就会成为“流行的”;一旦使当代生活及其问题的解决方式得到更好理解,被适当调整的过时的和被拒斥的观点会被接受并被赋予新的活力。这就是异化理论复兴的奥秘所在。

86 这一理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普及与使人从作为“人类鸦片”的宗教统治中(布鲁诺·鲍威尔提出并被马克思接受的短语)获得解放的社会斗争息息相关。我们今天会说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社会问题观。但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只有马克思能够使自己摆脱这种局限的束缚。他逐渐在寻求此问题根源的逻辑顺序中得到了根源在于人,并且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总体结论。他的路径随后穿过对于异化形式、宗教形式、意识形态形式及政治形式的分析,最终到达了经济异化这一基础的基础。马克思在异化理论发展和具体化的过程中果断同他的战友们决裂。他批评他们的异化概念并一度放弃这个术语;但他并没有拒斥这一思想。

异化理论由于种种原因被遗忘,尤其是被马克思主义者所遗忘。但社会发展迫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异化现状上,如今首要的不是宗教异化而是社会异化,它包括客体的异化——人类活动结果的异化和主体的异化——人在与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中的自我异化。作为第二种形式的自我异化中的问题变得尤为惨痛和突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愈甚。与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和残酷战争相关的事件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程度与

^① 参见三部著作,它们的作者以这种方式思考,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结论: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1964, pp. 1-3; Walter M. Gerson, *Alienation in Mass Societ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Vol. 49, No. 2, 1965, pp. 145-151; Robert A. Nisbet, *Community and Power*, New York, 1962, pp. 3-19。

影响,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影响了宗教信仰,作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应答,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反革命活动以拒绝个体基本权利的恐怖政权为基础,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对人类的态度,新军事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彻底灭绝的威胁——这一切乃至更多将关于人及其生命质量的争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现代文明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各种“人的哲学”已经被发展以设法接受历史发展对哲学提出的挑战。诸如存在主义、人格主义等趋势的兴盛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够被理解。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种局面下的出版成为特殊的催化剂:发现了这一客观形势的名称——异化。

罗杰·加罗迪在著作《人的前景》(*Perspectives de l'Homme*)中出色地展现了这一形势及其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对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督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全部成为存在哲学,因为人类存在的基础已经遭受质疑并迫切地需要得到回应。没有当代的生存哲学,人类的这种境遇就不会得到研究,所有人都会沉沦在普遍的冲突中,沉沦在未知的命运中并面对着永恒的死亡威胁,沉沦在痛苦以及那些与痛苦程度相当足以引起它的事件中……

87

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主义最为广泛的传播发生在1918年战败后的德国以及1940年战败后的法国;社会、政治、国家以及宗教信仰的瓦解会以某种方式从外部使个体的生活与其保持一致,在破碎的世界中指引人们去意识到他的个体责任和自由。在从海德格尔到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从萨特到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法国,混乱与灾难的在场赋予了当代哲学以新的激动人心的风格。

以往的哲学不得不因此而经历由当前世界危机所带来

的深刻变革。^①

马克思的沉思将异化理论带入当代哲学。不仅在哲学而且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异化理论——尽管以一种主观地变异的形式——于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罕见的伟大成就。这是一个间接与马克思早期文本出版相关的新奇迹。我们在1936—1955年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索引中没有发现任何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而这种类型的文章如它在美国其他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期刊中那样在随后几年中如雨后春笋,维托里奥·里泽(Vittorio Rieser)就曾正确地注意到这个事实。^②

所以毋庸置疑的是两种因素共同成就了异化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辉煌——在理论上理解人在其中丧失对自身产品的统治并因此感到威胁和与自身社会相疏离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其次是其中的异化理论满足了这一需要的马克思著作的出版。

马克思理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命运如何?众所周知它是奇特而复杂的。

88 人的问题并没有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自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其运动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者们所忽略。然而撼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却在后革命时期的势头(élan)下被简易地解释为资本主义的腐朽与痛苦的表现形式。这种可能会否认类似现象也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存在的优越感与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作为扬弃生产资料私有制及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人的关系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相关。在共产主义者们眼中,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存在理应被反革命力量及与其斗争的必要性的存在所证明。一种以高尔基(Gorky)的文学、加里宁(Kalinin)和马卡连柯(Makarenko)的教育学等等为先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倾向在苏

① Roger Garaudy, *Perspectives de l'Homme*, Paris, 1959, pp. 8-9.

② Vittorio Rieser, Il concetto di "alienazione" in sociologie, *Quaderni di Sociologie*, Turin, Vol. XIV, April 1965, p. 154.

联得到了发展。从这些立场出发并以已经清除大量罪恶旧政权的社会革命为基础,就理所应当可以批判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它们向伦理社会主义的转变如果不是一种偏袒反革命的简单伪装就是一种倒退。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使列宁在弥留之际警醒,作为其结果的斯大林主义在那时还处于难以对其作用及发展方向进行明确评估的发展阶段。仍有可能将斯大林主义大量痛苦的表现视为阶级斗争可悲但必然的现象(例如集体化)。但是作为一种统治体系、政治异化最重要的特征归根结底是作为肉体控制机构异化的斯大林主义业已存在。由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解释或误读构成的服务于这一体系的理论观点也已经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这一领域中新的发现的可能性都受到了明确的限制。

真实信息的流通渠道被迅速封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著作的最早版本在出版几卷后就意外中止,并因此使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已经能够发表一些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自然辩证法》这样此前不为人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则不得不搁置到1939年。

这些阻碍是由意外或更重要的编辑任务所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还有什么比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想法更加重要?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所发表的著作明显证明他们的想法绝没有被深刻或彻底地认识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新的信息与斯大林的官方教条相反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信息渠道的封闭。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著作在上文提及的版本中还被按照马克思著作的正确时间顺序排列,随后就像受到惩罚被视为“前马克思主义”著作发配到独立的《增补》(Ergänzungsband)卷中。这一卷甚至不是该系列卷编号中正规版本的一部分。所以异化理论也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苍白之处显露在外。对之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应当不会做同样的处理,但可以在这里信赖这部著作的

深奥本质。

因此在世界哲学及社会学文献中成为异化理论复兴催化剂的马克思著作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并不受欢迎。这一阵营多年来仍然坚信异化理论是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坚信存在主义者取代了“修正主义者”并且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时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商品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为了支持这一信念就有必要阻止手稿的进一步出版。推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就是一个源自于这种观点的严重错误。这部著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保持神秘,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其他语言的译本开始出现,它才为人所知。

所有这些原因在于异化理论不适合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观念。两种原因在这里共同发挥了作用:首先,在革命之后的时代处于被包围的劣势被视为客观原因。因为国家太过羸弱并且只有发动群众参与斗争才能够保卫国家及其体系,因此不能过分强调人、自由、民主及为反对异化的多样形式所做的斗争。另一种是与斯大林自己的个人目标相关的主观原因。当一个人宣称社会主义发展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怎么能够承认政治异化观念(并因此承认为了非异化所做的斗争)呢?一个人怎么能够在默许作为一种异化的马克思的国家概念并且共产主义是最终扬弃这种异化的体系,同时却表示能够在保留国家的前提下建立共产主义呢?这些例子只是表明即使不考虑客观困难,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体系也不会接受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部分的事实。

90 两种因素对于开拓认识这一事实的途径十分必要。首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其次,始于苏共二十大的斯大林主义思想体系的解体。异化理论此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命运及它缓慢而稳步的进程只有在与斯大林主义残余斗争的背景下才可以理解。这一领域的政治讨论范围缩小到了社会主义下的异化问题甚至这个禁忌也是相对的。这个问题现在能够加以讨论——一个具有若干政治意义的事

实。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同,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们没有遵守党的“正统性”的义务,他们给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极大关注。^①他们以改良主义的精神将这部著作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解释。但马克思主义者们现在正开始重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重视个体或者异化理论的作用,而无须导向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的重新解读或者修正主义。

最为重要的是西方共产主义者们带来的新方向。著名的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及之后的罗杰·加罗迪明晰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路径。[更早引用的加罗迪在《哲学研究》(*Voprosy Filosofii*)中的文章并不具代表性。]^②西方共产主义者的指引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直接暴露在竞争对手的炮火之下而且不得不面对挑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家们很少对西方的热点问题保持敏感。加罗迪写道: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觉自身面临的历史事实与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所了解的并不相同。尤其是在极端历史时刻的张力及两极分化的力量之下,一种激进哲学不可避免地会就思想的其他来源犹豫不决;但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整合和超越存在于当代哲学中的一切就不能生存和发展。^③

但问题并不在于像期待回归由于命运捉弄而被遗忘的彻底和真

^① 在众多的著作当中,我这里要提到上文引用过的亨德里克·德·曼的著作, *Der neu entdeckte Marx*, 以及同一时期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ie Gesellschaft*, 9 Jhrg., Berlin, 1932, pp. 136-174 (英文版翻译为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1972, pp. 1-48).

^② 亨利·列斐伏尔在战后立即接受了异化问题。Henri Lefebvre, *Le Materialisme Dialectique*, Paris, 1947, (英文版翻译为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68),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 Introduction*, Paris, 1958, 以及 *Sociologie de Marx*, Paris, 1966 (英文版翻译为 *Sociology of Marx*, London, 1968). 加罗迪很感兴趣地写作了有关异化问题的著作 *Karl Marx*, London, 1967.

^③ Roger Garaudy, *Perspectives de l'Homme*, p. 10.

实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如此期待源自外部的灵感。

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才涉足这个领域,但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些著作,特别是苏联的一些著作是非常深刻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波兰有布罗尼斯拉夫·巴奇科、马列克·弗里茨汉德(Marek Fritzhand)、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亚当·沙夫(Adam Schaff)、W. 多罗舍维斯基等人。一大批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继续研究异化问题。他们包括达维多夫、科舍拉娃、纳尔斯基(Narsky)、奥古尔佐夫、帕日特诺夫、彼得罗西娅娜、西特尼科夫等人。在南斯拉夫主要是实践派的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c)、彼得洛维奇、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等人。⁹¹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早在1936年就针对异化主题进行写作的库莱拉(Kurella)的著作应备受重视,此外还有鲁夫(Ruhr)、海泽(Heise)、舒芬豪斯(Schufenhauer)等人。^① 对异化理论的反对并未完全消失。但是这种态度不再是完全消极的了。

我最后想强调一位卓越的波兰作家著作的重要性,他的著作由于语言障碍及作者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事实而没有被充分重视。我所指的是波格丹·苏霍多尔斯基(Bogdan Suchodolski)的著作,其《教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U podstaw materialistycznej teorii wychowania*)一书于1957年在华沙出版。出版的年份意义重大;正值以一记猛击重创了斯大林主义基础的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之后。作者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及文化理论中的作用的理理解,并对具有斯大林时期压力特征的不同寻常的力量进行了反抗。他在斯大林主义在波兰似乎已被战胜时才出版了上面的著作。对于这部著作的承认已经被耽搁得太久了。他在该书关于异化问题一章中的清晰深刻的分析使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在这里能够找到对于客体的异化的本质的清

^① Alfred Kurella, *Der Mensch als Schöpfer seiner selbst*, Berlin, 1958.

晰认识、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别,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异化理论差异的理解,特别是关于非异化主题有趣并且富有创造性的评论。我们今天可能而且也应该比这部著作走得更远,但它在当时尤其是在波兰的确是一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思想发展的奠基性著作。

一位被区别对待的思想家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普及及其在当代世界分析的应用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背景,为延伸对异化理论的理解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心目中的弗洛姆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以一种特别有趣并且非正统的方式将弗洛伊德的理论 with 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希特勒上台之前,与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联合在一起的弗洛姆在他的部分著作中研究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① 弗洛姆主要对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感兴趣,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客体的异化的马克思主义维度以及自我异化的衍生性质。^② 弗洛姆并不总被充分理解的不容置疑的功绩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问题得以通过其著作被尤其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意识到,并使这一主题的文献占据了备受尊崇的地位。这一点尤为重要是因为大量著作对于异化理论轻描淡写^③,其他的则不过是单纯的模仿甚至是使异化理论在学术研究之外被维系着。^④ 弗洛姆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92

①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1941;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② 参见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1941, pp. 106-120。

③ 在一些文章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晚年的马克思放弃了异化理论转而支持剥削理论,给予异化理论以特殊的意义不过是修正主义者的一种策略,认为晚年的马克思所承认的社会现实仅仅在于类而不在于个体。因此我们发现“正统的”斯大林主义不只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参见 Daniel Bell, The “Rediscovery” of Alienation,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VI, No. 24, 1958; *Sociology; A Guide to Modern Usage*, in *American Scholar*, No. 35, 1966。

④ Lewis Feuer, What is Alienation?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in M. Stein and A. Widich (eds), *Sociology on Trial*,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3.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异化是新修正主义的概念(p. 127),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它让位于剥削概念,并与之相对立(pp. 135-136)——最有意思的是——异化是一个“具有突出的性欲内涵”的概念。(p. 129)

并且毫不犹豫地公开批判他不赞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但就对马克思理论的普及与发展而言,他的确比大多数政治“正统者”做得更多。

第二章 客体的异化

接着第一章已经说过的,对作为一种关系、过程和产物的异化的内容的分析,能够被自然地划分为对客体的异化和主体的异化的分析。我们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依次仔细研究这一问题。我将继续使用在第一章中界定过的概念体系(the conceptual apparatus)。不过,我要重复“客体的异化”这一概念的定义,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里存在着基本的误解,并且这一状况对于理解整个问题具有根本意义。

在第一章第 57 页^①,我们是这样理解的:“人创造特定的事物、观念、制度等等,其想法是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并力求在这一领域实现特定的目标。然而,人的这些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中发挥作用的产品服从于统治这一机制的规律的作用,有时候采取违背人的意愿的方式,并且这些产物摆脱它们的创造者所设定的目标而获得的自律性成为社会发展自发性的一个要素。因此,人的产品在异化的框架内转变为一种与人相异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他的意志相对立,消解了他的计划,甚至威胁他的存在并且支配他。”

① 此页码为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译者注

根据客体的异化的这一定义,人的一切产物都具有异化的倾向。由于分析的需要,我将仅仅选择其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特定作用的某些种类的客体的异化:

1. 经济的异化
2. 社会政治结构的异化
3. 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

99 我们着手讨论这些问题的顺序与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将是逆向的。这里,我们将再次开启一段“逆向旅程”。

一、经济的异化

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现的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在商品交换中变得不依赖于它们的生产者的意志和目的,这是客体异化的一个经典例证。这是那些伴随着战争,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迫使人们以最敏锐和最痛苦的方式意识到,他们的劳动产品不仅会变得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图,而且甚至还会威胁到他们的健康和生存的社会现象之一。

经济的异化这种异化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着一种独特的作用并不奇怪。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的人的社会,即人不再受自发的社会发展的反复无常所支配,而是以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方式决定这一发展,那么经济的异化就必须首先被克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目的正在于此。然而,抵制经济异化的斗争还必须建立在另一个前提之上;依据马克思的观点,重要的是在经济异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其他形式的异化。这就是马克思从宗教和意识形态开始,继而将其注意力转向政治的异化,最后以作为基础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foundations)的经济的异化结束的原因。比如,这说明了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关注中心向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关注中心的转变。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正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要表达的东西。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①

100

人的劳动是马克思在经济异化领域分析和关注的起点。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得最为明晰,在我看来,“异化劳动”这一重要标题下的段落是这部著作中最值得关注的。并且这一主题,即在棘手的经济异化问题中的中心主题,随后贯穿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尤其是那些直接致力于讨论经济问题的著作中。那些主张成熟的马克思拒绝并放弃了异化概念的理论的倡导者忘记了,雇佣劳动(*Lohnarbeit*)概念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核心之一,而雇佣劳动对马克思来说等同于“异化劳动”(*entfremdete Arbeit*)。因此,异化是马克思对待全部经济问题的基础,包括《资本论》。在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为题发表于1849年的1847年的演讲中,马克思谈道,雇佣劳动作为一种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售的商品,并非他的生命的表现。只有当劳作结束时他的生命才开始。只有在工作之余人的生命才开始这一主题,始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现于《雇佣劳动和资本》,并且以一种尤为鲜明的形式返回于《资本论》。这是某种关于马克思的思维模式具有不间断的连续性的观点的诸多例证之一。马克思在写

^① MECW, Vol. 3, p. 29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译者注)

作《雇佣劳动和资本》时,虽然没有使用“异化”一词,但却运用了自己关于客体的异化的理论:

可是,劳动力的表现即(根据中文版本添加——译者注)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①

稍早一些时候,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已经大体上表述了同样的思想。

工人颓废堕落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没有什么比必须从早到晚整体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了。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干活?是由于本能?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这种强制劳动……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中重复了他1847年关于

^① MECW, Vol. 9, London, 1977, pp. 202-20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5~716页。——译者注)

^② MECW, Vol. 4, pp. 415-4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433页。——译者注)

雇佣劳动的定义：它是创造资本，即一种独立于它的异化力量的劳动。^①“……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②这一思想贯穿于《资本论》始终。

因此，马克思对经济异化问题的讨论为什么建立在分析人的劳动的基础上就十分清楚了。他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本身着手讨论的。就这一点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劳动”命名的一章与马克思后来的经济思想，绝非像“两个马克思”论的提倡者所坚称的那样，是相互矛盾的，而是被进一步发展并具体化了。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以雇佣劳动形式存在的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只有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逆向反应（the reverse reaction）才会发生。在这种逆向反应的框架中，正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人的劳动产品变得异己，并使自身转变成为一种不依赖于其创造者的力量，从而阻挠人的计划，甚至威胁人的生存。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的关于劳动产品异化的经典界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随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被重申如下：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质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

^① Karl Marx, *Grundrisse*, p. 463. (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所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曾经指出，“在创造资本的雇佣劳动的场合，它的内容实际上与我无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译者注)

^② Karl Marx, *Grundrisse*, p. 5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512页。——译者注)

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①

102 人的劳动产品异化情况下的商品,是自发的、无计划的社会发展的根基,是经济危机的基础和金钱经济以及从中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基础。

但是,劳动产品的异化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它通向了自我异化,而且由于它关系到工人自身的异化,因此将成为我们在下一章中要讨论的问题。然而这里,我们至少必须区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论及了工人对于其所进行的劳动的异己感,这属于我们在第三章中将要讨论的主体异化的领域。

第二,我们论及了与劳动分工相关联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定位为客体异化和主体异化(自我异化)的边界。这里我们将仅仅关注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

^① MECW, Vol. 3, p. 2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译者注)

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①

描述雇佣劳动(作为马克思表述的**强制性的劳动**甚至更加激烈)特征的主题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多次重现。在重复并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法的同时,马克思补充道,“自由王国”只有在工作之余才对工人开启,并且这一点适合于**一切社会形式和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这一思想出现于《资本论》第三卷。^②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早期的不谨慎的观点,它曾使官方的宣传家们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活原则问题相当头痛,尽管他们完全不必要如此。

103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经过马克思在其中从分工推导出社会阶级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并且包括《资本论》,马克思在分工及其辩证作用的问题上投注了大量精力。一方面分工具有进步性,因为它是生产发展中的一个必要因素;另一方面分工具有倒退性,因为它成了劳动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

^① MECW, Vol. 3, p. 2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160页。——译者注)

^②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op. cit.*, p. 820.

的设定。

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理解不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讲得极不明确并且自相矛盾。^①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将社会范围内专长、专家和职业的痴呆的产生归因于分工。^② 早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曾将社会分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异化的根源都归因于分工。^③ 在《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中,马克思在作为分工条件的商品生产语境中考察了分工问题。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厂和社会范围内的分工普遍来说延伸到了新的维度,并且分工所产生的异化后果也更加广泛,以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完全从属于它。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他的一部社会意义非常深远的电影中,以滑稽可笑的方式再现了装配线上的工作。当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不仅沮丧,而且迟早会显现出病态的迹象及精神的扭曲。首先是社会心理学家,比如弗洛姆,就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写到了“健全社会”的存在条件。

当我们撇开对异化,即异化的形式和原因的描述,转向克服异化,即扬弃异化的问题时,真正的问题才开始。这至少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断言社会主义的胜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束意味着一切异化的终结是不够的。这一点是彻底错误的,正如我将要在第四章中寻求证明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① MECW, Vol. 3, p. 3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译者注)

^② MECW, Vol. 6, p. 19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9页。——译者注)

^③ MECW, Vol. 5, pp. 46-4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538页。——译者注)

条件,但它对于克服异化来说是不够的。由于既涉及产品,又涉及劳动活动本身,扬弃异化的问题是极为复杂的。

就使自身转变为商品的劳动产品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是相对简单的:只有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废除以后,扬弃异化才是可能的。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充足条件;即使假定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人的劳动的物质产品继续表现为商品,因此,如果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计划,它能够变成“一种异化于人的力量”,因为市场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是真实的,而且市场规律在其中仍然发挥主导作用。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下的状况是相对简单的。

异化劳动的第二个方面的扬弃,即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的扬弃问题,更加复杂。这里私有制的自行废除不会有什么帮助;如果雇佣劳动仍然存在,异化劳动也会继续存在,即使雇主不是私营业主,而是国家或者一个合作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断言,这在任何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都是真实的。因此,只有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消除雇佣劳动,而仅仅保留更广意义上的劳动,即自由的创造性,而不是在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强制性的”因而也是异化的劳动(工人为了获取生活资料不得不工作)。

这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人为了生存必须工作。但是在马克思的时代,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或者城市里的工作与乡村中的工作之间的差异的期望,听起来就像是乌托邦。现在,三者无论如何都不再是乌托邦了,并且马克思已经预见到了它们的实现路径——自动化。

在《哲学的贫困》中,接着“职业的痴呆”,马克思写道:“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暴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① 105

^① MECW, Vol. 6, p. 19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0页。——译者注)

自动化扬弃异化的功能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再次重现。其中所阐述的更加成熟的观点备受关注。重要的是要在劳动一词的传统意义上克服它,以及通过自动化的手段扬弃它。^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假定的不仅是阶级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的清除,而且相应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自身的消除。弗洛姆从这点得出如下结论是非常正确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核心批判不在于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公平,而在于劳动被扭曲为强制性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并且人因此被扭曲为“瘫痪的怪物”。马克思关于作为人的个性之表达的劳动概念,非常简洁地表达在他关于要彻底消除一个人终身被淹没在一种职业之中的状况的观点之中。由于人的发展的目的是全面的、普遍的人的发展,因而人必须从专业化的严重后果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中心主题是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向具有创造性的、自由的劳动的转变,而不是通过私营或者“抽象的”国家资本主义使异化劳动获得更好的报酬。^②

只有消除异化劳动,换句话说,使人从强制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目的才有可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能够使之成为现实,而且人类目前正处于它的入口处(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大约要50年)。假如社会制度同时发生了必不可少的转变,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文明的开始。无论如何,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它们将被证明是必要的。当然,完全的自动化并非是与异化劳动斗争的唯一出路,但它是在这条路上所迈出的尤为重要的一步。我对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观点没有更多的补充:

自动化一旦成为**这种**物质生产过程,它就会引起整个社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尤其要参见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54, pp. 292-295 和他的 *One Dimensional Man*, London, 1964, pp. 16, 35-37。

^②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pp. 217-218.

会的变革。被推向极端的人的劳动力的物化,将通过割断把个人与机器(使人的劳动成为对人的奴役的机械系统)联在一起的链环而砸碎这种物化形式。在必然性领域内完全实现自动化,将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即人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得以形成的向度。这将是朝向一种新文明的历史的超越。^①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异化

106

(一) 国家

当代社会,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就是国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家是异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尤其在他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论战中),以及在后期,特别是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以表述。后者是恩格斯观点的最成熟、最全面的表述。

在描述了国家的起源之后,恩格斯总结道: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

^① H.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p. 218. (参见[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译者注)

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因此，国家是社会通过暴力而产生的一种异化机构，它源自社会的内在矛盾，但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起源于社会分化成阶级及其斗争，国家总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通过暴力获取被压迫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顺从。但是，当社会的阶级分化消失了，在那时，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的结果，阶级自身消失了，那么国家也将必然消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使用的表述是“衰亡”（wither away），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使用的是“消亡”（disappear），然而，马克思使用的是辩证术语扬弃（aufheben），这同时意味着“取消”和“保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更加谨慎的表述，由于国家履行着各种职能，并非所有职能都会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废除而消失。但是考虑到国家的基本职能，恩格斯清晰地提到了它的“消亡”：

107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

^① Frederick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MESW, Vol. 3, Moscow, 1970, pp. 326-327.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所加——亚当·沙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译者注)

一起。^①

在为《国家与革命》准备的材料中,以及在这部著作本身当中,列宁都参考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意上面引用的第一段话,列宁用线画出了最后一句话,认为国家变成了一种越来越异化的力量。^② (1917年7月—8月)在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小册子的简述中,列宁一开始就提出了如下观点:“异化。资产阶级在民主共和国中是怎样进行统治的?”^③

尽管事实上异化理论在那时并不“流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却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它并从中得出结论。他将“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④视为他的主要任务。为什么?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够作为这本书的主题格言(epigraph)。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做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

① Frederick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MESW, Vol. 3, Moscow, 1970, p. 3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译者注)

② Lenin, *Marxism and the State*, Moscow, 1972, p. 58. (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译者注)

③ Lenin, *Marxism and the State*, Moscow, 1972, p. 81. (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译者注)

④ Lenin, CW, Vol. 25, Moscow, 1964. p. 386. Lenin, CW, Vol. 25, Moscow, 1964. p. 385.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译者注)

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①

108

列宁倾其全力提出了国家作为一种异化力量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这就是他同时倾尽全力提出作为扬弃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消亡的方案。

上述摘自恩格斯的第一段话被广泛引用,其中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② 列宁认为“分离的公共权力”等同于“武装队伍”(bodies of armed men)。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同武装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直接符合”了。^③

列宁多次返回到这些陈述的内容和术语(“异化的权力”)。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最典型的两个机构,即官僚制和常备军。他将这些机构视为“寄生的”,并因此将国家视为一个“寄生体”,这是理解列宁关于“打碎国家机器”问题的观点的极其重要的话语。

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一致,他不仅假定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非对它的简单接管),而且假定了一般国家的废除(“消亡”,“消失”),即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废除。因为根

^① Lenin, CW, Vol. 25, Moscow, 1964. p. 385.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译者注)

^② Lenin, CW, Vol. 25, Moscow, 1964. p. 386.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译者注)

^③ Lenin, CW, Vol. 25, Moscow, 1964. p. 392.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译者注)

据马克思主义,从压迫机器、“武装队伍”的意义上来说,任何国家都是在社会阶级分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异化,因此应当随着社会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这是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更高形式,即共产主义转变的一个前提条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列宁再次提到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所得出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三个设想:(1)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2)一切公职人员,包括警察,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3)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这里还应加上第四个设想,即以兼管行政和立法的代议制机构取代议会制。根据列
109
宁的观点,当所有这些设想成为现实,并且当全体人们都学会了管理社会生产:“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①

列宁的著作写于1917年8月,即十月革命前夕。我们之所以不加评论地汇报他关于作为一种异化的国家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将在第四章中重返于此。我们之所以对列宁关于官僚制以及对抗它的斗争形式的观点保持原封不动,是因为我也将在后面重返于此。尽管如此,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作为一种异化的国家以及使其消亡的扬弃异化的必要性的观点,在同一时期的一系列文献中重新出现。一切公职人员都应由选举产生和更换,并且其薪金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报酬,这一观点出现于1917年的“四月提纲”^②。由列宁编写的1917年4月党的会议决议指出,苏维埃政权作为一种新型政权,没有警察机关,没有常备军和特权官僚。现实的发展并非如此,但那是另一回事。

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来说,为了实现向

^① Lenin, CW, Vol. 25, Moscow, 1964. p. 474.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译者注)

^② 即1917年4月党的会议决议(无产阶级在我们的革命中的任务), Lenin, CW, Vol. 24, Moscow, 1964. (参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载《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2页。——译者注)

发达共产主义的转变,国家(一切国家)是一种应当被克服的异化力量。这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如此明确,以至于不值得去引用所有那些重复过这一点的人的话。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表达的不同观点,即由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仍将保留,但无论如何它将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然而,它解释了异化理论为什么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不仅没有**流行**而且被彻底地放逐。

然而,作为一种异化的国家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没有随着国家消亡的假设而终结。这至少在理论上是相对简单的:国家,作为一种压迫机构,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将会消失,让位于“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及其自治。我们并不知道这在具体条件下意味着什么:谈论废除常备军、警察和官僚制远比实际做到这些要容易得多。谈论每个人将掌管社会事务远比在没有组织这样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哪怕只存活一天要容易得多。但是在开始第四章之前我们将搁置关于这些问题的反思。不过,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有待解决:国家的“消亡”适用于它的一切职能吗?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将毫无保留吗?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这方面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吗?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都将是坚决的**不!**

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讨论国家的消亡时,他接着重复了圣西门的观点,补充道,“对物的管理”将取代“对人民的管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的某些方面将被保留,并且正如我们所坚信的,这一“某些方面”相当值得考虑。在我们着手讨论这一话题之前,请先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们自己发言。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中的一些表述可以帮助我们。

恩格斯 1875 年在意大利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权威》的短文章。在罗马国家当中,意大利是一个表现了并且仍然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国家。恩格斯宣布反对反权威原则者,指明是生产自身将

劳动纪律强加于工人的，“真正的专制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

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倾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

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将只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①

恩格斯声明的是政治的国家将消失（这里是我的强调，但是形容 111
词“政治的”表明还有其他国家，例如“管理的”，能够存在），而且政治职能将转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这里也是我的强调）。

这些“简单的管理职能”是什么？“对物的管理”是什么？例如，道路上机动车交通以及空中飞机和未来太阳系内火箭的调节，医院及一切有关卫生保健的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国家范围内以及将来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计划，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努力，反对污染的斗争，等等——这一清单是相当巨大的。这些就是“简单的管理职能”，这就是“对物的管理”，即今天的国家履行的职能。如果社会将存在并继续发展，这些职能就将保留。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关系以及世界范围内分工的发展，这些职能将增加并且同时变得更加复杂。谁将履行这些职能？仅仅讨论“自治政府”、“自治”等等，不会让我们走很

^① MESW, Vol. 2, Moscow, 1969, p. 37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338页。——译者注）

远。毕竟,这些是需要绝对集中化的功能(这不排除从属于公共计划部门的自治),比如经济规划,环境保护,教育组织,等等。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些同样是**国家**职能,并且为了这些目的国家将继续存在。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丝毫怀疑,但依照他们杜绝预言的原则,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现成的处方。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意味深长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职能变化(不是废除它)**的观点:“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①

可见,马克思对此没有任何疑问,即国家的某些职能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将继续保留(列宁在他的包含了为写作《国家与革命》而准备的材料的“蓝色笔记本”中抄写并强调了这一片段)。他写给那些试图通过玩弄“人民”与“国家”词语(哥达纲领所提到的“人民的国家”)来解决问题的人的讽刺挖苦的话语,同样适用于那些希望通过玩弄“自治”一词来清除困难和具体问题的人。

还有其他此类表述,我们将在第四章中重返于此。恩格斯在写给贝贝尔(Bebel)的信(1886年1月20—23日)中,讨论了国家在向共产主义转变中的作用;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恩格斯声明,无产阶级只能使用一种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共和政体等等。

我们可以概括如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家”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术语,正如目前所呈现的那样,它意味着在国家中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两种社会职能。它们是:(a)一种是适用于“管理人民”的刑罚镇压职能,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一职能通过“**武装队伍**”——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集中营等等来履行;

^① MESW, Vol. 3, p. 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445页。——译者注)

(b)一种是适用于“管理物”的组织管理职能,显然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使正常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诸如像经济规划,生产组织和产品分配,医疗卫生,教育组织,科学与文化,环境保护,等等。第一种职能具有阶级属性,当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时,它至少在以前的形式上将会消失。第二种职能在一切社会经济结构中对于社会生活都是必需的,当然,尽管这些职能的表现形式甚至其内容将会发生变化。然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职能的那部分也将会保留,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国家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将继续保留。除了别的以外,关于对无阶级社会的展望,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异正在于此。

另一个问题是,那些自身并非异化物的职能的发展是否会卷入异化的危险。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回到这个问题上。

(二) 官僚制

“官僚制”(bureaucracy)^①一词也是有多种意思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给定条件下我们所涉及的“官僚制”一词是哪种意思。¹¹³ W. 多罗谢夫斯基(W. Doroszewski)编纂的《波兰语词典》(*The Dictionary of the Polish Language*)^②在官僚制的词条后列出了如下含义:

1. “官员的统治,官场对国家事务的影响。”
2. “在解决行政事务中的呆板的例行公事。”
3. “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官员整体。”

清单中的第2项是对“官僚制”的日常理解,与“对事务的官僚主义解决”相联系的不仅是“呆板的例行公事”,而且是拖延工作或者是

^① 在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文献中,bureaucracy也常被译作“科层制”,我们这里按照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习惯翻译方式,把它译作“官僚制”。——译者注

^② 参见 Witold. Doroszewski, *Słownik języka polskiego*, PWN 1958 - 1969. Wydawnictwo Naukowe PWN, Warszawa。——译者注

处理事务的无能表现。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官僚制”一词的这一意义,或者说它仅仅是官僚制的不重要的意义。无论如何,在第1和3项中所界定的“官僚制”并不必然是无能的、呆板的例行公事,以及不必要地拖延业务;相反,它可能并且经常是非常能干和高效的。我将冒险断言,这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意义上的官僚制,它在行动中越是表现为能干和高效就越危险,因为人们并不排斥它,而且它在某种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了便利。^①

正如我们后来将看到的,官僚制变成了并且必然要变成一种异化的力量,不仅独立自主于它的创造者,而且甚至违背和疏离于他们的兴趣,当论及我们对作为“官员的统治”和作为“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官员整体”的“官僚制”的理解时,我们补充两个上述所引用的词典的作者所忽略的更深层的特点。它们是:第一,这种“官员整体”从民众中的分离;第二,官员的具体的等级组织建立在其自身的法律和规范的基础之上。我们首先将讨论后一个方面。

关于这一问题有一本优秀的著作,即卡夫卡(Kafka)的《城堡》(*The Castle*),这是一本致力于描述官僚制及社会的官僚组织系统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的书。在这本非同一般的书中,第五章尤为精湛,在这章中,县治安官以他自身的情况为例,向K先生,即小说的主人公,解释“组织机构”运行的原则。想要研究官僚制的人,没有谁可以不读卡夫卡的《城堡》,而且尤其应当对第五章投注某种深刻的思考。

然而,要研究作为一种异化的官僚制,则有必要涉及专业文献,我们将讨论两部至今已经发挥了充分价值的经典著作,即M. 韦伯(Max Weber)关于官僚制的著作^②和R. 米歇尔(Robert Michels)关于政党的社会学研究^③。

^① 这是R. 米歇尔在他的近乎经典的著作《政党》中讨论问题的方式。参见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②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ation*, Edinburgh, 1947.

^③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根据韦伯的观点,从技术角度看,管理的官僚体制作作为一种专门演变的产物能够实现最高的效率(这与“官僚主义”一词的流行用法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概括出他的基本观点。

(1)任何特定的官员都被束缚在“机构”(apparatus)中,他凭借他的整个物质存在以及他的精神存在而成为这一机构的组成部分;

(2)他的活动取决于这个机构的“例行公事”,这种“例行公事”区分了每个官员的特殊功能,他们的行为或限制;

(3)任何官员都被纳入这一机制的所有官员的共同利益所维系。这个利益共同体的目标就是这个机构的继续运转(官僚制的一种特殊的团队精神);

(4)由于官僚体制的“非个人的”特征,它很容易在转向服务于新的政权或者新的“胜利者”的同时,继续它的旧习惯和旧活动;

(5)由于一种有组织的官僚机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必不可少,任何对它的活动的打断都将预示着混乱,而没有旧机构的技术熟练的力量将很难控制它。因此,为了恢复被打断的机制的运转,一切新政府和新秩序通常也都一方面求助于旧官员中的纪律习惯,另一方面求助于官僚制的社会控制。^①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团队精神**的评论仅仅是关于这种制度的异化的特殊表述,但至关重要。这里他强调了在一切社会体制中众所周知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指出官僚制的统治通过具有职业性秘密的知识环绕而得到强化,并且由此排除了公众意见并使这种统治与社会相分离。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反思不仅提供了一种关于官僚体制结构的洞见,而且说明了——没有使用异化一词——官僚制作为一种异化制度的典型特征,以及这一事态的原因。尽管这些评论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清楚地指向资本主义,然而无论如何,它们具有更广

^①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ation*, Edinburgh, 1947.

泛的意义,而且通过适当的改造,能够论及任何官僚体制,因此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制。^①

115 政党机构中的官僚制是一种有着特定功能和含义的特殊类型的官僚制。韦伯也讨论了这个问题。^②

与经济和国家管理中的官僚制相比,政党中的官僚制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选举运动手段的日益合理化,所有政党在内结构方面已经转变成了官僚化的组织。尽管各种政党在这条道路上所获得的发展步伐有所不同,但是就大的国家而言,这条道路的总的方向是一致的。英格兰的 J. 张伯伦 (*J. Chamberlain*) 的核心小组 (*caucus*)^③,在美国一向被称为严密组织的发展以及总的来说日益增长的政党官僚的重要性都是这一现象发生的同等阶段——同样在德国,在社会民主党中发展最为迅速,可见,恰恰是在最民主的政党中相当自然——政党的力量主要取决于这些官僚制组织的质量。例如,实现政党融合的难度也更多地在于这些政党官僚系统之间的相互对抗,而不是方案的差异。^④

韦伯很自然地认为,在他的时代德国最民主的(在他看来)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展现了官僚化的最发达的特征。在其他具有贵族化或者大的产业化联系的政党中,地方赞助人(“显贵绅士”)的作用以及他们对政党政策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然而,没有这些有影响的赞助人的存在的运动 (*movement*) 才是真正的大众运动,才是运动民主化的标志。但是这会使作为政党的唯一组织力量的职业政治家成为领薪

①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ation*, Edinburgh, 1947.

②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ation*, Edinburgh, 1947.

③ Caucus 最初是英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 于 1868 年在伯明翰地方选举中创立的一种负责竞选的官僚团队,后来逐步演变,成为政党中进行决策的核心小组。——译者注

④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ation*, Edinburgh, 1947.

水的雇员,并使自身转变为一种官僚系统,即使他们自称为“职业的革命家”,并创建了政党机构。

韦伯在分析这些政治机构的功能时也论及了关于“超凡魅力的领导”,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行话来说,“个人崇拜”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的工人运动中也是如此热门的话题。他并没有将这种现象看作一种扭曲或者偶然,而是视为源自机构的组织及其作用规律的一种必然。更加有趣的是,这篇论文追溯到了20世纪初,即作者谈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并且也没有预见到今天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韦伯的分析从这一状况开始,即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那些将政治作为一种副业的“有功的人”(“显贵绅士”)却在政党的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16

最重要的是,这种由有爵位的绅士和国会议员统治的田园诗般的状况现在受到了非常不同的政党组织的现代形式的反对。这些都是民主政治,大众选举权利,大众运动和大众组织的需要,以及领导权和严明的纪律的最高程度的发展的产物。有爵位者的统治和国会议员的管理已经走到了尽头。国会议员之外的“职业的”政治家正把管理掌控到他们的手中。要么是作为“企业家”——如美国老板以及英国“选举代理人”实际上所是那样,要么是作为高薪官员。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民主化正式地发生了。议会团体不再制定有影响的方案,地方有爵位的绅士也不再控制候选人的选择,而由有组织的政党成员的会议来选择候选人和代表成员进入更高层的代表大会,能够进入的人数越多越好,直到级别最高的党的代表大会。事实上,权力自然而然地被把持在了那些在组织中连续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手中……决定性的是,这整个机构的人员——它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被形象地称为“机器”——或者更多的领导它的人都处于一种彻底击败国会议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

会议员的方位。这对于政党领导层的选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领导者将是这一机器所要追随的人,甚至要反对国会的意愿。换句话说,这样的机制的创建意味着国民投票的官僚制的出现。^①

上面所提到的第二本著作,以对政党的社会学分析为背景,讨论了政党官僚制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官僚制的问题。^② 出版于1910年的米歇尔的书,与许多经典著作具有同样的命运:备受称颂,但很少被理解。一个更复杂的情况是:作者曾是一名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在自己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认为寡头政治的不可避免性和一种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式的特殊的“精英循环”理论,后者永久地定居在意大利,经历了一种亲法西斯的演变,加入了墨索里尼,归根到底,他们的生活模式是相似的。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米歇尔的书包含了大量涉及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社会民主党的确凿的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或者完全不为人所知;出于这一原因,每一个政党社会学,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应当认真研究米歇尔的这本书。此外,这本书不仅包含了独特而确凿的材料,而且包含了关于政党官僚制问题,特别是在工人阶级政党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有趣的理论反思。当布哈林(Bukharin)在苏联政权下写作他曾经非常著名的教科书(这本书在今天已被遗忘,仅仅由于作者作为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受害者的悲惨命运)时,他考虑到有必要讨论米歇尔的一些命题,这并不是偶然的,尽管他的讨论不是太成功。今天,与我们关于“个人崇拜”的知识相比,米歇尔关于“领导权”的结论在新颖度和时事性方面仍然是引人注目的,尤其在于,当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还没有取得过政权。

就理论性的结论而言,在韦伯和米歇尔的观点之间存在着相当大

①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ation*, Edinburgh, 1947.

②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的一致性。奇怪的事情是,韦伯对与他自己的结论一致的米歇尔的观点保持缄默,并且毫无疑问他是知道这些观点的。

根据米歇尔的观点,政党中官僚制的必然性与国家中的相应倾向具有同样的根源;人员不够多的政党受到了可能的大众运动的威胁,因此必须扩大其成员基础,但这种增长的一个作用就是必须组织和领导它的成员,因此就需要一种政党官僚制。随着政党官僚制——或者,正如我们今天可能会说的机构——的发展,目前,这一机构的日常工作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以及各个部分的特殊性的损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关注。^①

社会民主党创建的目的是反对和废除资产阶级国家,它是以国家组织为模型来构造自己的组织的,并且随着社会民主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它就竭力避免与国家之间的正面对抗,因为如果与国家对抗,这些组织可能以灾难而告终。社会民主党甚至会扭曲它自己的理论来适应新的形势,因此而背叛它自己的前提。在米歇尔看来,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经验表明,政党的发展导致了固定性和保守性,由于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集中到了自身系统的维持上。^② 结果,“组织”变成了目的自身,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言,“组织”使自身异化了。“如此,组织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自此以后,唯一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避免任何可能阻碍这一机器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远远偏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他仍然活着,应该会第一个投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堕落。”^③

当然,以上所涉及的对于老的议会类型的政党的一切论述都很尖刻。作者没能考虑到政党的其他组织模式。但是他所说的关于老的社会民主党的异化的一番话对于其他类型的政党组织可能并非完全不相关。

米歇尔关于寡头统治在一切组织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谈论甚至

118

①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p. 189-190.

②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p. 335-339.

③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p. 338-339.

更加令人感兴趣,因为这些谈论在当前更加热门,并且在他的观念中极为关键。在米歇尔看来,“领导权”的原则应当从对劳工运动的经验观察中推出,而不是如他自己被迫所做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对事实的描述。然而,运动自身却与这种研究相对立。(鉴于这种争论与里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密切相关,它是非常有趣的。)

社会主义政党,如同工会一样,是社会生活的存在形式。他们本身会尽最大力量去反抗任何分解其组织或者性质的企图,仿佛它是一种活体解剖的方法。当科学知识达至与他们的**原有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结论时,他们将用尽其一切力量来抗争。然而他们的辩护是极其脆弱的。^①

这种现象在今天也同样存在。

立足于每一个体都力求获得重要性和权力的心理学前提,米歇尔系统阐述了他关于寡头政体和“领导权”甚至在工人阶级运动中也不可避免的命题。(他从19世纪后半叶劳工运动的历史中举出了典型的却不被人知的例子来论证这一命题。)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任何运动中的领导人物在**技术上的**不可缺少。

这一由于在政党中的功能分化而开始的过程,通过领导人与大众分离所获得的复杂品质而得以完成。一开始,领导者是**自发地**出现的;他们的功能是**辅助的**和**无偿的**。然而,他们很快成为**职业的**领导者,并且在这个第二发展阶段,他们是**稳定的**和**不可移除的**。

由此得出结论,上述情况所导致的寡头政体现象的原因部分是**心理学的**;也就是说,寡头政体起源于政党中的领袖人物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灵转变。并且,寡头政体更加依赖于我们称其为**组织心理学的**东西,也就是说,依赖于由每一个训练有素的政治集合体的联合所引起的策略

^①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 366.

上和技术上的必要性。用最简洁的表述来归纳,政党的基本¹¹⁹的社会学规律……或许可以用下面的阐述来表达:“政党是产生被选人对选民,受托者对委托者,代表者对被代表者的统治的组织。”^①

这里我们再一次通过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获得我们众所周知的事情以及造成工人阶级政党中领袖异化问题的一个原因。

从这些前提出发,米歇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一个无阶级社会是不可能的。他的推理路径如下。政党作为一种政治机制与阶级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当一个政党成为目的本身时(换句话说,当它从群众中异化出自身时),它就会从阶级中分离出来。这就使政党机构的利益从大众成员的利益中分离出来。职能和利益的自动化规律(我们可以说异化的规律)有一个普遍的特性。

按照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规律,由于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集体的每一个机构,都是为自身而创建的,随着它的巩固,它只对自身感兴趣。^②

寡头政体的一个特殊的规律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一个统治阶级必然被另一个统治阶级所取代的原理,以及从这一原理所演绎出的寡头政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巨大的社会集合体的共同生活的命中注定的形式的规律,不但不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相冲突或者取代它,而是对这一概念的完善和补充。历史是关于一系列连续的阶级斗争的记录^{的学说},与阶级斗争总是以与旧寡头政体融合的新寡头政体的产生而告终的学说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矛盾。政治阶级的存在与被视为一种历史哲学而非经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并不冲突;因为在每一种特殊的情况中,政治阶级的统治都是作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争霸关系的结果

^①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p. 364-365.

^②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 353.

而出现的,这些力量当然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而非数量上的。^①

120 这里米歇尔是作为一种“新阶级”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而出现的,这一理论在我们的时代是由吉拉斯(Milovan Djilas)提出的,而他可能并不知道其先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盟,米歇尔还参考了瑞典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斯蒂芬(Gustaf F. Steffen)的观点,他在他的《英国的民主》[*Die Demokratie in England* (Jena, 1911)]一书中同样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将存在社会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不是一个无阶级社会。

曾引起布哈林的争论并且加以反对的米歇尔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取得胜利,但社会主义不会取得胜利,它将在其拥护者胜利的时刻死亡。人们倾向于称之为悲喜剧,用尽了全力的民众,只是满足于他们的主人的变更。”^②

在与米歇尔的争论中,布哈林绝对没有搁置他的情况。相反,他试图通过确凿的事实争论来驳倒米歇尔的结论。^③ 布哈林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不存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了新阶级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私有制将会消失,并且作为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结果,米歇尔所谈到的“民众的无能”也将会消失。布哈林相信,即使那时会出现一个常设的管理者集团,它将仅仅是对机器而非对人的控制。

尽管如此,布哈林并没有否认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依然存在着异化(尽管他没有使用异化这一术语,但这在他的结论中是明确的)的危险。

然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

①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 354.

②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 367.

③ N.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n Arbor, 1969. 作者引用的是英译本:致使原始文本无法获得的原委是众所周知的。

专政时期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工人阶级虽然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群体,但它取得了胜利。工人阶级获得了胜利,然而,生产力却在下降,从而使伟大的阶级在物质上毫无保障。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种“腐化堕落”的**倾向**,即以**一种阶级-病菌(class-germ)的形式存在的领导层的排泄物**。这一倾向将受到两种相反倾向的阻碍: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教育垄断**的消除。来自工人阶级自身的日益增长的技术专家和组织者的普遍繁殖,将会削弱可能产生的新阶级的联合。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哪种趋势被证明是较强大的。^①

正如从这段引文(它是这本书的倒数第二段)中可以看出的,布哈林在与米歇尔的争论中并没有觉得自己太强硬;无论如何,他承认,领导层在过渡时期“腐化堕落”(事实上它就是异化)的可能性。然而,当他论及共产主义的未来时,让我们重温他的强硬的口吻。

他的推理如下。话说回来,即使“组织者”阶层将会存在,也不必担心异化的需要的产生,因为,第一,这一阶层“腐化堕落”的经济或社会基础没有了;第二,他们将控制机器而不是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将再次回到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即政党官僚制及其异化。

121

布哈林声明,阶级通过政党来领导,与此同时,政党则通过它的领导者来领导。因此,阶级和政党各自都有其领导干部。这在技术上是必要的,并且,显而易见,这种组织工作在未来也将会保留。^② 其余的阐述的目的在于表明,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异化具有必然性。然而,布哈林讨论的薄弱之处在于这一事实,即在他的这部分阐述中,他完全忽略了政党的问题。通过领导者发挥作用的政党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仍将存在吗? 社会注定将保持这一状态吗? 即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甚至被认为都是天才的政党领袖最终也将在政党的名义下行动并裁决吗? 假如这样的话,那它就不仅仅事关“技术组织者”,政治异化

^① N.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n Arbor, 1969, pp. 310-311.

^② N.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n Arbor, 1969, p. 305.

将会继续。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on应该表述清楚,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的消失问题,以及政党的消失问题也应被表述清楚。在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消亡的设想的语境中,“砸碎国家机器”的问题必须被明确地提出,否则,马克思的“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口号将被认为是伪造的。皮埃尔·纳维尔对布哈林的评论是相当正确的:

争论的焦点在于弄清,组织作为我们一切集体生活的原则,是否必然不会导致一系列除了官僚以外什么也不是的组织者的产生。布哈林在此将自己限定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类比中。他断言,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组织者,无产阶级也将会有自己的组织者,这就是全部。不同之处在于,资产阶级组织者是为了剥削无产阶级而工作,而无产阶级组织者将不允许任何资产阶级进行剥削(他们必将会消灭剥削),并且资产阶级也将不能够对自身进行剥削……

尽管如此,这一推理仅仅是一种糟糕的抽象,正如苏维埃俄国的历史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事实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是任何其他统治阶级都不能直接管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而要通过严格意义上,即技术意义上的组织者这一中介。尽管国家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政治形式,但它所具备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事物的技术层面。当国家成为经济体系中一切事物的控制者和占有者时,这种功能甚至会变得更加广泛。经济管理变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国家的一切其他职能,比如军队、警察、民政管理者、外交人员以及诸如邮政、交通、通信等公用事业的维持,都不仅仅是技术的方面。此外,政党自身的存在是以“组织者”,甚或一个系统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一系统的功能不仅仅是技术的,其根本在于对社会的政治领导。^①

122

^① Pierre Naville, *Bureaucratie et révolution*, Paris, 1972, pp. 56-57.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出发点,即在官僚制异化和国家异化之间存在的关联。

考虑到官僚制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它在异化研究中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对象。官僚制(在“官员的统治”的意义上,或者更加中立,“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官员整体”的意义上,在广义上把“政府的”一词等同于与“私人的”相区分的“公共的”)是共同体的一种足够强大的允许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需要的职能。它也是一种关于将要被掌管的领域的职能,当这一领域足够大,并且已被给定共同体(这些关系对具体条件的依赖性使一种先验的经过推理的精确的安排成为可能,这里我们有意识地使用了一般定义,如“足够大”或者“大多数”)的绝大部分所占据。满足特定共同体的共同需要的一些组织成为必须;关于由谁负责履行这些职能以及他在和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中拥有何种权力的决定也成为必须。

一个共同体能够通过两种形式解决这一问题:自治或者官僚制。两种形式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的制度化,并且它们都拥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使得关于它们的现实可能性或者适用范围的评价成为可能。

显而易见,自治是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的早期形式,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一需要的“自然的”实现。那时,根据积累起来的经验,特定共同体的成员自身通常采取神圣的戒律的形式来履行一切相应的职能;特定共同体的生存所必须履行的职能在两种性别的人以及不同年龄的群体之间有所划分,包括“长老议会”的功能,它历史性地取代了部落首领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构成人类社会生活基础的原始自治的基本要素。

今天,当我们谈论“自治”并使其与“官僚制”相对立时,我们必须留意不知不觉渗入当前讨论中的关于“生产者的自治”问题的模糊性(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也是如此)。当我们谈的不是人类社会生活黎明时期的原始自治,而是现代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的自治时,这一表达

123

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它们有时会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相互混淆。

“自治”一词首先意味着“通过成员自己管理共同体事务”,这与为此目的而特别雇佣并付酬给一些人来管理这些事务的情况相反,即使这些人来自同一个共同体。人们自己履行这些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来说所必需的职能。他们如何做这些,以及他们中谁干什么,都是他们内部组织的事情,要么被传统所认可,通常是宗教的(“它总是这样”;“上帝的安排”;“祖先精神的指示”),要么被纳入规范的框架(习惯法或者甚至采用书面形式)。对这种治理形式来说决定性的和重要的是一切职能都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体成员来履行。这些职能如何划分在这里是个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些职能并不是在一个人必须被委派去履行这些职能,因为其存在的理由就是履行这些职责的那种意义上是独立的(“祭司”,也就是在原始共同体中与神灵交流并将神的旨意传达给共同体成员的人,在这方面是个例外)。这一意义上的自治就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当时所考虑的,就傅立叶而言,他们的构思是一个法朗吉社会,就欧文而言,其构思是一个公社社会。今天各种各样的“公社”的建设者正是沿着他们的路径,不论是那些对经典模式的继续,还是那些主要强调“性的”共同体,都把完成它的希望寄托在自治生产公社的基础之上。

然而,“自治”一词还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它的内容的另一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与中心权威,尤其是国家的统治有关的较大共同体的部分的自治。在这种情况下,“自治”意味着“相对于中心权威的自治”,然而,这种自治的范围以及它的权利要由相应的制度来决定。这样的“自治”在中世纪极其普遍,今天,各种各样的聚居地,特别是大城市,都是“自我治理的”。很明显,除了名称以外,或者除了诸如城市议员等等一些制度的残余之外,这种形式的自治与以上所分析的那些自治很少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第二种形式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能满足自治的基本需求,即人们自己,作为特定共同体的成员,履行

与共同体的生存相关联的一切职能,并且在委派某人(或某些人)来专业地履行职能的意义上并不是独立的。简言之,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选择“自治或官僚制”,那么,一旦特定共同体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足够大的领地和社会职能的质的专业化),那么,第一种意义上的“自治”是可能的,但第二种意义上的“自治”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对一些较高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说可能是自主的,但这种“自治”职能仅仅在借助于一个相应的有时是巨大的官僚机器时才能发挥作用。(以纽约为例,它在第二种意义上是自我治理的,但同时它又是可对数以万计的一大批官员进行自由支配的国家中的一个州。)

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个词的第一种意义上的“自治”。很明显,其局限性在于领地(在组织所覆盖的人群数量以及他们的领土分布的意义上),一定社会及需要发展水平上的职能类型,需要专门的技能(从而,还有为了准备履行他们的事先的教育)以及实施的连续性。如果我们关注的对象不是原始狩猎或者农业社群,而是高度发展的当代工业社会,那么,很明显,绝大多数社会职能,尤其是那些国家范围内的社会职能(将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职能),不能以业余的方式来履行,因为这些职能需要专业的、更为复杂的技能以及连续性。

因此,尽管丝毫不否定关于决策和管理的合理分权的积极方面(在这种意义上“自治”也同样如此),任何人在今天都不可能寄希望于以严格意义上的自治取代官僚制。官僚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个阶段具有必然性,然而目前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一些未来的技术“奇迹”的可能性,这适用于任何已经达到了相应发展水平的社会结构。假如通过“官僚制”一词我们不能理解在处理事务中的怠惰、无能和残暴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事情自身是真正恐怖的。不!我们将要谈到的是一种试图满足人的需要并且对社会来说必不可少的高效的官僚制,正因为如此,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才尤为危险。

125

如果官僚制的积极方面包括处理更加复杂的、需要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的技能,以及履行这些职能的连续性,那么所有这一切会导致

一系列危害社会的特征,这些危害是一直以来我们正在遭遇的。

首先,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中有我将称之为“官僚制异化的内在倾向”的东西。较大的官僚机构构成了一个具有严格限定结构的紧密的整体,它由包括执行任务的一个或多个官员的组织基础构成,并被体制结构所严格决定。官僚系统中的人因此永远只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被迫执行体制结构所分派的工作。如果他被从“系统”的其余部分分离出来,他将丧失任何重要性或者行动的可能性。因此,“系统”中的人总是通过等级森严的“向上”和“向下”的依赖性,通过顺从和依赖、命令和责任联系在一起,这具体取决于特定依赖系统的等级制度,并且这种等级制度总是被给定的。另外的一个后果是一种与“系统”的其他成员团结一致的感情,即一种团队合作精神的氛围。归根结底,“系统”中人受制于系统是由于他自身的各种利益(从社会地位和晋升的可能性的意义上说是物质的,但也是道德的)。因此,他将倾向于依赖这一“系统”,并倾向于“掩饰”这些,以备不时之需[法国陆军军官成员对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①的阴谋的态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

官僚系统成员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以及这种高度发展的团队合作精神,对于“系统”来说导致了一种倾向,即使自身与众不同,将自身从外在世界中分离出来,从而对其他人和他们的需要置若罔闻。这就是异化的基础,这一点在任何构成一个独立实体的系统中的强烈性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受到。

126 官僚制(以各种“机构”组织的)的结构和它的异化有利于趋向“领导权”,并且因此趋向另一种对社会尤其危险的异化的形式。每一“机构”(即使将废除官僚制统治作为自身目的而设立的革命机构)都

^① 1894年,供职法国陆军参谋部的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军方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德雷福斯是被阴谋陷害的,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得到平反,被判无罪。——译者注

是按照等级制建立的;否则它就不能运转。每一等级的“终端”必然是它的最高阶层。因此,阳关大道是向“领导者”敞开的。每一“机构”,即使它的组成部分扮演着次等阶层(sub-class)的角色,都有这样的虚伪的领导者。然而,真正的领导者出现于政界,即一个结构涵盖了社会生活总体并使其他机构从属于它的系统之中。一个领导的诞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客观上存在需要一个人物来作为社会意志的象征并赋予社会一种方向的非常时刻,以及存在一个拥有适当的超凡魅力特征的个体(由于他的性格的真正力量通常是与反常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陈旧的真理是:当社会需要存在时,那么通常就会找到一个履行这种必要职能的人;最糟糕的情况是波动会造就一些“劣质的”领导。然而,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中没有被足够强调的是这一事实,即社会制度的官僚化结构促进了这一进程,并且甚至有可能制约着这一进程。这不仅是因为当建造一个金字塔式组织时,一个人,无论想要与否,都必须构造出某种最高职位,而且是因为这一系统感兴趣于推出一个“领袖”;这就是在结构上“向上”和“向下”依赖的系统的逻辑。这通常会造成这样的看法,即“上层”所获得的支持和报酬是用所提供的服务换来的。最后,这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重要因素造成的,成为一个“领袖”给人一种相对于下属而言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感觉。

其次,官僚体制除了具有使自身异化的“内在”趋势外,也具有一种使自身庞大化的“内在”倾向,这有时呈现为社会癌症的本质。众所周知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表明,系统中的每一个职位都有一种创造新的从属于它的职位的倾向。这种现象不仅是受主观影响的,它的根源在于客观情况;随着职务的专门化发展,越来越多的综合职位在事实上被分为了越来越精细的职位,因此对履行职能的协调和控制的需要也随之增加。这还要补充一个心理学因素:工作人员和职务的数量是官僚组织形象和声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我们找到了帕

127

最后,关于官僚制的消极方面,还应当补充的是控制活动的困难。与外行相关联的官僚制的“封闭的”特征,它的成员的团结一致,以及因袭的(和心理学上所理解的)隐瞒职能的倾向,这些都是这一困难的组成部分,它们强化了官僚制使自身与外行分离的倾向。

官僚制存在和运行的这些消极方面激发了反对它的斗争,或者至少是一种限制它所造成的危害的努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斗争对准的通常是表面现象,尤其是对准了一种坏的、无能的官僚制。异化理论使得深入洞察和感知内在于一种高效的官僚制的危险成为可能。

很清楚,这最后一个问题并非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并且,实际上它尤其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官僚制及其异化的危险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忘了,一旦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废除,就会造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没有的包括社会生活重要部分的公共领域。随之而来的是强化官僚制的需要以及它实际上想要囊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倾向。结果,就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工业与贸易、农业、政治与社会生活、科学与文化等领域中),伴随着它走向异化的“内在”趋势(即与其管理模式相关的趋势),这可能会造就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特征。更何况官方控制组织正是官僚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官僚阶层实际上是唯一的雇佣者,唯一的组织者以及社会生活的唯一的控制者。政党官僚制和国家官僚制的相互联系在这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然存在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系统(因此,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的一个官僚制系统),并且由于这一系统具有使自身异化的持久危险,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必须进行不断的斗争以扬弃异化。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回到这个问题,那里我们将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和官僚制的异化,但是对一些普遍的问题,即使冒着在后面重复的危险,也必须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同样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

扬弃异化(在其最根本的形式上)在于消除异化产生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要的是社会预防,即认识到异化产生的规律,并动员社会力量来抵制这种产生或者甚至使其不可能产生。

已有的经验表明,在同官僚制异化做斗争的方式中,有三种最为重要:(a)岗位轮换;(b)社会控制;(c)通过限制特权来降低“机构”中工作的吸引力。

(a)众所周知的对那些对执政系统具有影响力的人员的强制性轮换的原则,主要是来自美国的经验。它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在于,如果对权力的掌握不超过一个有限的时期,并且权力的掌握者在执掌权力期间相应地要对行为负责(即使仅仅是道义上的),那么这些就是对企图进行独裁的或者非法的事业的真正的抑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提议之间的鲜明的反差,呼吁对这一原则的坚定运用。只有到那时,各种“崇拜”和“微型的崇拜”才会消失,但由于非偶然性的原因这些还会经常性地再次出现。

对岗位轮换制存在两种异议。第一,将会产生一种情况,其中陷于轮换境地的人在行使权力期间将设法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①;第二,由于政治路线缺乏那种被一个“领袖”所提供的连续性,将会产生消极的总体后果。

对这两种异议的回答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抵制这些弊端的保证来自于社会控制,这种控制既能在任期内也能在任期后实行。如果惩罚各种各样的滥用是确定的,或者甚至是高度可能的,那么几乎没有人将会明显地玩这种简单的游戏。

第二,至于所关心的政治路线缺乏连续性的危险,那么它仅仅适用于最高官员,而非较低等级的官员(轮换仅仅适用于政治系统中)。因此,尤其是政治系统中的“显要人物”构成了真正的问题。应该极力强调的是,无论一个人何等高贵,避免历史已知其结果的“个人崇拜”

^① R. 米歇尔提到了这一点,参见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p. 97。

129 都是更有价值、更重要的。雅典人,古典民主的创造者,当存在民主过度普及有可能伤害民主的危险时,毫不犹豫地对那些最值得尊重的公民[例如亚西比德(Alcibiades)]行使流放的处罚。

(b) 社会控制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抵制权力滥用及其腐化危险的主要预防措施。但历史经验表明了这在实践中是多么不可靠。无论如何,尽管有这些保留,社会控制仍然是社会所拥有的防范那些想滥用他们权力的人的唯一手段。因此,重要的是要维护这种手段本身,阻止其腐化。基于历史经验,这将被再次声明,即存在一种服务于各个集团角逐权力之目的的绝对可靠的手段。这种角逐消失的时刻,当不再留心观察角逐权力的对手的行动和错误时,当一个集团的垄断继而产生时,那么控制手段将不再是有效的。这样一种结果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在社会中打交道的不是天使,也不是完美的人,而是带着所有缺点的普通人,这有可能会发生,并且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种可能性会使自身迅速转化为现实。因此,格外重要的是,在一切社会中都应该实行多党制。这不是抵制一切弊病的绝对保证——无论如何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正如经验所表明的,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控制的保证。这适用于一切政治制度,包括社会主义。一党制模式在目前的盛行是各种条件历史结合的一种产物,而非必然。毕竟,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联系起来。相反,恩格斯充分意识到了他在说什么,他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是一种民主共和国,因而是一种多党制。同样,列宁一开始在俄国也没有考虑一党制,而是数月都在热切地寻求在多党制政府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不管怎样,从反对异化的斗争的角度来看有许多的收获,并且这至少应该被那些在未来会引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所牢记。

如果多党制,作为抵制既定单一集团政治垄断的一种壁垒,被认为是对官僚制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技术手段,那么,无论如何,它的有

效性的根本前提是所谓的民意的存在以及它影响普遍决策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企图通过控制来限制官僚制权力的任何步骤的成功之前提是民主,这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要想方设法根据民意就社会生活进行决策,并为每一个体创建这样一种自由领域,使其依照自己的信念和选择参与舆论的制造和表达。多党制,即政治多元主义,是民主概念和政治自由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这里并不打算深入地讨论民主的本质和形式;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是,以上所概括的民主生活的原则对它的一切形态来说是共同的,尽管它的范围和阶级内容会发生变化,并且,离开这一原则的实现,无论一个特定制度以何种名义装点自己,民主都将不复存在。任何制度所声称的“更高形式的民主”都不能抛弃这一基本原则,否则就会使民主转变成一场闹剧。

130

我并不打算制定一份关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详细的控诉书。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的扭曲,将其设想为一种更高形式的民主,个人的政治自由已经受到限制,并且因此,舆论对与社会生活问题相关的决策的影响也被严重削弱了。这些决策因此转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失去社会控制的官僚制,并且,在这些条件下,官僚制系统变得无所不能。它成为一种异化的和危险的社会力量。如果不在上面所概括的意义上修复民主,要克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种异化将是不可能的。重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名称,而是制度的民主内容。人们可以考虑,在既定的不利条件下,民主目标是否会在这些国家获得不同的发展——在我看来,这不可能。但这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在**这些**条件下,官僚制的权力必定会无限量地增长,并且不再受制于社会控制,从而必然会使自身越来越异化。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就其缺陷而言,不改变这一基本的状况,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制的异化将继续存在。

(c)遗留的问题是行使权力及源于它的物质特权的诱惑力。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写了很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重复了他们的结论:发给官员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酬,并

131

且不赋予其任何特权,等等。现实却走上了不同的轨道,人们必须承认,一种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在这里将是有害的;毕竟,需要有能力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并且,如果不以某种方式激励他们去承担工作的话,他们将逃避负责工作。除此之外,应当被重申的是,可以通过提供适当的生活条件,使占据负责位置的人自觉防范腐败的诱惑。让我们不那么激进地表述:直到那时——它仍然是那么遥远——当保障人类生活的物质方面不再构成一个问题,并且整个物质特权问题将因此而以某种自然方式消失时,人们将会注意到,官僚制体系,尤其是它的较高阶层,将不再喜欢这样一种拥有物质特权的位置,比如创建一个“封闭的共同体”,以有利于其产生各种形式的异化。

官僚制话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经反复地把我们引向了介于官僚制异化和国家异化之间的问题。这是因为官僚制与国家的存在是相关联的。因此,为了总结我们关于消除官僚制异化的讨论,请允许我们提出下列问题:这一问题如何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提出的作为社会革命第一步的打碎现存国家机器的设想的影响?鉴于我们所关切的国家和官僚制的异化,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设想?

让我们从这一事实开始,即如果人们不用附加说明补充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打碎国家机器”是含糊不清的。毕竟,为了在原地构建一个新的国家机器而“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是有可能的,但是人们同样能够将“打碎”理解为在普遍意义上废除国家制度。这里明显的困境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包括写作《国家与革命》时期的列宁)是在我们的第二种意义上来阐释这一设想的,即作为对国家制度和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的废除来理解。另一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目前所知的形态中——这一假设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忽略纯粹词语甚或真正的差异),普遍都被阐述为第一种意义,即它被理解为,意味着将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被打碎的”国家机器。这有两个后果:第一,首要的是,这一“新事物”在关于这一国家机器服务于谁和服务于哪个阶级的问题上使人感到失望。除此之外,真

正的差异还在于,只要考虑到结构和运行的模式,那么,新的“机器”是建立在“旧的”模式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会看到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机构人员的构成上,尽管其并不总是确定的。(正如韦伯所表明的,新的力量在构建新的国家机构时必然会借助旧官员的服务。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无数的旧官员返回到了他们的岗位上;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人民民主中。)^①第二,由于这一局面,官僚体制不仅没有被破坏,而且相反,由于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和雇主,只要考虑到官僚机构的社会地位,那么,它在量上被无限扩大了,并且在质上也被无限加强了。正是这一局面使列宁将苏维埃国家定义为一个带有官僚制扭曲的“工人”国家(我们将在第四章回到这个问题)。自从列宁写下这些话之后,无论在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都更加恶化了。

这一问题已经完全清楚了:只有当真正尝试实现废除国家和政党的任务时,废除官僚制的可能性才会存在,因为这些制度假定了官僚系统的存在。当人们仅仅将一种国家机构转变为另一种国家机构,将生产资料的唯一所有者和唯一雇主的功能转移到这一国家机构,并因此无限地增强这一国家的重要作用和作用,那么,人们必定会提升官僚机构的地位和重要性。

列宁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在废除国家的语境中,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抵制官僚制的斗争的问题。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

^① 参见 Jean Elleinstein, *The Stalin Phenomenon*, London, 1976, pp. 14-15。

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①

我们无须接受列宁关于国家职能(监督和记账)的本质是越来越简化,最后任何想从事的人都能履行的观点;这在我看来是不真实的和不切实际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当旧的国家机器被

^① Lenin, CW, Vol. 25, pp. 425-426.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221页。——译者注)

“打碎”之后,官僚制的废除才能实现,它不仅仅是人员的更新,而是从一开始采取的步骤就是要废除这一机器,即废除国家。通过什么方式,怎样做到,这是进一步的问题,应该在经验的基础上具体解决。列宁在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性和容易性上存在幻想(这已经被苏联的历史所证明)的事实并不能改变这一问题,即如果官僚制应该被废除,那么就**必须提出这项任务**,并且完成它的最好的途径是**必须从革命的一开始就寻求机会**。

列宁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对任何人都能够轻松履行的国家职能的简单化性质的一般评论中。他试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普遍化。在恩格斯 1891 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的基础上,列宁强调了通过引入随时替换原则以防备自己的官员从而维护新政权的必要性。他引用了恩格斯关于设立有效的壁垒,限制官员的薪酬,“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①的观点。因此,列宁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宣告了废除国家的设想,这应该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结果,而且探索了废除国家的具体途径。这在抵制国家和官僚制异化的斗争中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些制度都是有机联系的,因为异化的各种形式也存在于扬弃异化的斗争中。

134

这里我们在理论层面上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具有实际的—政治的方面,不仅是在实际结论遵循本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精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而且(这一点常常被忽略)是在实际结论遵循着认为在既定状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可能性的意义**。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必然会发生,为了使社会主义革命**真正成为可能**,必须满足一些必要的条件,这一命题听起来微不足道。然而,对这一假设的忽视在过去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多少损害:这一假设在当前是多么经常地被忽视,甚至被那些声称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却不考虑必要的客观条件的狂热的革命者视为机会主义和

^① Lenin, CW, Vol. 25, p. 452. (cf. MESW, Vol. 2, p. 188).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9 页。——译者注)

“社会民主主义”的表现？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尤其是作为一种异化的国家和官僚制中得出的结论，构成了又一个重要的“值得记住的东西”（memento）。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旨在逐步废除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的措施来开启，因此只有当这些措施成为可能时，即当它们的适当的主客观条件存在时，这一革命才能成为当前的口号。由于缺乏这种条件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呈现为官僚异化形式的革命的退化——不幸的是，我们从在没有满足这些必要条件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深知它的一切后果。

135

三、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

异化的经典例子是宗教，作为与人类行为相关的信仰、戒条和禁令的复合物，它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将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区分开来的是这一思想的起源是否被视为是自发的，或者人们是否相信它起源于先验的根源。关于这一异化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尤其是创始人的著作中已经谈得太多，这足够读者来参考其来源。

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是异化关系的一个更独特的组成部分。在特殊的情况下，语言不仅“变得独立”，而且开始借助于一种“语言暴力”支配人，把与客观现实不一致的思想强加于人，尤其当媒体所传播的陈规旧习与这些话语有联系时。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其他可以异化的精神产物，如科学、艺术等等。今天这些话题中的每一个都可以通过专门的文献来讨论。讨论这些话题是吸引人的，但是它将打破当前工作的限制，从而分散我们对主要思潮的注意力。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将忽略甚至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论及的话题。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发展了传统的异化的概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

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①

考虑到实际的人类活动的立场的重要性,这里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异化上。

这可以从双重角度进行理解。第一,意识形态可以在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意义上被视为一种异化的产物。这是马克思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利奥·科夫勒(Leo Kofler)专门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来分析问题的这个方面。^② 但是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成的产物被接受时,认识到它的异化同样也是可能的。意识形态可能会与它的创造者所给予它的内容不相容。这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意识形态异化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136

我通过意识形态,即根据已被接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来理解人们的看法;看法决定人们的态度,即他们对特殊情况中的特定行为以及他们自己在社会事务中的行为的认可。在运用这一定义中,我们必须强调,宗教本身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至少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宇宙起源的说法等陈述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怎样,与宗教和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戒条和行为习惯相关联的价值体系,在源自这一价值体系的社会目标的领域中,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因此,宏大的宗教体系总是构成一个由两个次级层面(sub-strata)组成

^① MESW, Vol. 1, Moscow, 1969, p. 39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译者注)

^② Leo Kofler, Entfremdung und Ideologie, in Leo Kofler, *Der Proletarische Bürger*, Vienna, 1964.

的实体,在意识形态一词的严格意义上不是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层面,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然而,由于这些次级层面被连接成了一个不可分解的实体,只能通过抽象的方式才可以区分,因此,谈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是可能的。这里我们对基督教的命运尤为关注,由于异化的耀眼性质在这一领域中显而易见。

基督教的历史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话题,诸多文献曾致力于此。我们只关注它的一个方面:原始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内容在其历史中发生了什么。

这一领域中存在相当多的文献和诸多的思想流派,从原始基督教作为一种由奴隶阶级构成其社会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观点,到基督教作为一种功能是麻痹被压迫阶级的斗志的反动的意识形态的评价。我将根据常识搁置关于这一话题的所有争论来表明我的态度,站在那些在原始基督教中看到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人的一边。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对待过去的反历史的态度,才能使构想出针对一种两千年前的思潮的指控成为可能,它并没有使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比如,阶级斗争等等。如果人们没有失去常识,那么在圣经《新约》关于社会不平等、对信徒的生活方式的要求等问题的语句中就不可能察觉不到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内容。这一思潮,起源于艾赛尼派(Essenes),并且它——这已被死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并不容置疑地证明了——甚至在基督出现之前,在当时犹太的社会斗争中就提出了它的思想,同样在罗马的奴隶中也找到了共鸣。那就是为什么这一思潮,并且只有它,受到了罗马如此可怕的和残忍的迫害,毕竟,在那个时候,罗马引入了并效忠于一切东方的宗教,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一思潮,鉴于它的社会内容和“煽动性的”性质,它被认为对国家是危险的。在基督教的早期发展中,教义的社会内容发生了什么?接踵而至的东西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异化。

由于诸多原因,基督教在许多国家成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尤其是在它曾遭受了数世纪迫害的罗马帝国。教会从受迫害变成了

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基督教和教会发挥作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结果,教会的社会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紧接着宗教也由此得到颂扬。这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情,即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对同一个《圣经》的解释如何变得不同,或者怎样转变成了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毫无意义的礼拜仪式。只有那些坚持回到原始理想,并且为此而想要根据其文字和精神来解释《圣经》的异端(heretics),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基督教从穷人的宗教变成了强者的宗教,他们在斗争中支持对进步社会运动的反对。这就是对早期基督教的否定性评价的根源:从现在到过去的一种非历史的反映。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种为了具体社会目标而创造的意识形态能够转变成它的对立面。一旦这种意识形态被创造出来并被编纂成书,它就变成了一种客观存在并会开始自己的生命。不仅无视它的创造者的愿望和意图,而且明确地反对这些愿望和意图,它阻挡着这些意图实现的道路,威胁着它的创造者及其追随者的生命。没有什么比伟大的宗教裁判所和它在全世界的数以千计的,如果不是上百万的受害者,更能够一针见血和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种意识形态异化的道路了。没有任何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在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通过庄严的审判者与在地球上再现的基督谈话的场景,更强烈地呈现过这种复杂的辩证法了。异化的逻辑恰恰在于这一事实,即人的精神造物作为一种威胁他的存在的力量站立在他的面前。

难道这仅仅适用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吗?当然不是。显然,这是一个能够并且应该被扩展的命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更加宽泛的解释中,出现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不可抗拒地具有第一位重要性的问题:同样的异化的危险也会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吗?毕竟,在我们的运动中,我们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大审判的时期(a period of a Great Inquisition),它所牵涉的受害者比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还要多,并且我们仍然还没有超越各种各样的小审判的时代。

任何在政治上不是视而不见或阴险狡猾的人都会抑制不住地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尤其是如果他极为关切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其命运的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十分微妙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可能性问题时迂回地回到这个问题上。这里我们将仅仅表明我们的立场,坦率地回答上述问题。

是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具有异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在社会条件的基础上,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果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被引入到一个没有为之做好准备的社会,那么,由于经济和社会力量发展的不充分,反革命暴动的危险就有可能发生。然而,如果由于守卫新秩序的外部力量使这样一种公开的暴动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一种和平的反革命将会形成威胁。当还保持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统”(decorum),以及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表面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与此同时,这种意识形态被赋予了一种不同的内涵,结果也导致了这些制度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变化。这种社会的一种夸张的情景可以在扎米亚京(Yevgeny Zamiatin)的《我们》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中找到,在其中,某些社会主义口号导致了相悖的结论,例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同一。我们从经验中深知,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旧论题下所进行的这样一种新的、异化的内容的替代,是有可能转变成为一种礼拜仪式般的准则。由于诸多原因,没有进入关于这一问题的详述,让我们仅仅声明,这样一种异化在具体的条件下是可能的,并且,归根结底,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那些喜欢重复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净化而斗争的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成为一种警示。

第三章 主体的异化(自我异化) ¹⁴¹

本章分析自我异化或主体异化,其含义是与确定的参照系统相关的人的异化现象,相对于客体异化,相对于那种异化的产品同其创造者,即社会的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这个主题中有限的一部分,但几乎所有当代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致力于异化的实证研究都会涉及这个方面。所以,有必要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观点来讨论关于这一主题的数量庞大的文献,但要对文献进行选择。

当说到与人感觉到(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异化了有关的“参照系统”时,我们想表达什么意思?这里我们关注两点:(1)社会以及在给定的社会中以个人或集体形式出现的其他人;(2)人自己的“自我”(ego)。当然,这两点可以进行细分,因此他们的一般形式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

从异化讨论的复杂且语义混乱的本质来看,需要特别注意术语的

精确性。^①

我们需要分析一个术语——失范(anomie),以及失范与异化的关系。失范这个概念和理论出现在本章使我们感兴趣的文献当中。概念混淆的现象严重,不仅“失范”概念和“异化”概念的相互关系理解有误,而且对失范的理解和解读也十分混乱。

一、失范和自我异化

142 如果能说出一种异化理论的“方式”(fashion),那么对于失范同样也可以。在文献中,特别是在经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中,这些概念都是同时出现的,甚至有时候可以互相借用。但是,异化的方式和失范的方式二者之间并没有遗传的联系。后者——尽管这一理论起源于法国——更适用于美国。我们可以推断这两种“方式”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在其中,人客观地失去了对其产品功能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这威胁到自我生存,表现为之前接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行为准则的崩溃。只有这种对实际社会需求的参照才能合理地解释更早的那些思想的复兴,那些思想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同那些未被赏识的思想一样在沉睡中被遗忘或者丢失了。

“失范”这个术语是埃米尔·涂尔干创造出来的,是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境(situation),在他看来,这种形势是由劳动分工所导致

^① 然而,我们已经从人类个体的角度介绍了“人类”,从人类性格的角度介绍了自我意识和社会。人们应该从这个例子中的这些术语的定义开始。这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整个作品的结构,因为这是些复杂的问题,主体异化分析需要相当大的空间。然而,我在其他的书中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本书实际是一种延续。那本书出版于1965年,题为《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作品详细讨论了“人和社会”的关系,并且分析了所采用的术语的含义。今天我完全同意我在1965年所写的内容,我请读者们参考这本书。只是在涉及我们所使用的“自我”(ego)到底指涉什么的主题时,我们必须在眼下这本书中做一些探讨。

的自杀现象和社会畸形的基础。^① 涂尔干说,从“失范”的语源角度看,这种社会情境以人类共存的社会规范的缺失为特征;更为准确地说,以之前义务规范体系的崩溃为特征。在他的两部著作中,涂尔干发展了“失范”这个概念,但是在他丰富的理论体系当中,这个概念仍然是比较边缘的,这既体现在他没有发展这一概念上,也体现在这一概念缺乏精确性上。他在上述提到的著作中分别给出了这个理论的不同解释。

失范这个理论首先出现在涂尔干关于自杀^②的经典研究中。作者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率的上升和下降呢?涂尔干排除了各种假设。特别是,在一项统计分析中显示出了在经济危机和经济繁荣时期自杀率都提高了。从个体的情感和行为的角度的角度分析自杀问题,涂尔干认为这些情感和行为受到社会的控制,因此,这种强制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与自杀的社会指数之间一定存在联系。为此,任何一种现存社会秩序的紊乱——不仅是带来贫穷的经济危机,还有繁荣危机导致的财富膨胀——都会带来消极影响。

因此,如果工业或金融危机导致自杀率增长,这不是因为危机导致贫穷,因为繁荣的危机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危机,换言之,集体性的指令失调。一旦均衡被打破,即使它让人获得更大的舒适、提高了整体的活力,也会促使自愿死亡……这怎么可能呢?^③

涂尔干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个体的感觉和情感。为了减少自杀,有必要控制人的情绪。由于个体本身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只能通过外力解决,而由于起因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因此必须要通过道德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体力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只有社会能够发挥

143

① 为了更准确,他用了这个术语:在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术语“失范”可至少追溯到16世纪。(cf.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l., 1957, p. 135, fn. 6)

② Emil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1952.

③ Emil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1952, p. 246.

这种可供支配的能力。“或者直接地、从整体上,或者通过其中的某个部门,社会独自就能发挥这种缓和作用,因为社会是唯一一个比个体高级的道德力量,是人能够接受的权威力量。社会有规定法律的必要的权力,能够为人的情感设限。”^①

特别是,从舆论的意义来说,是社会调节了社会职能的履行、个体需求的满足以及它们的限制和规模等等。通常,这种社会准则被特定社会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个体的情感不应受到强力的限制,而只能受到受人尊敬而非恐惧的权威的化身的限制。因此,人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是不正确的。作为宇宙中的沧海一粟,人始终与限制和束缚自己的其他部分共存着。在这种情况下,人和非动物界本质的不同在于约束他们的力量的特质不同。

在这一点上,矿物质和思考的人之间只有程度和形式的不同,人的典型特点就是所接受的关系不是物理的而是道德的,也就是社会的。人不是受粗暴地强加在身上的物质环境的控制,而是受到高于自身的良心的约束,这种优越性人能感知到。因为人的存在更强大、更优质的部分超越人体本身,人才能超脱肉体的束缚,服从于社会。

但是,当社会受到痛苦的危机的困扰,或者发生好的但是剧烈的转型时,它立刻就无法施加这样的影响;此后,就会出现我们上述提到的自杀曲线突然上升的现象。^②

这种社会失去限制能力的状态,涂尔干称之为“失范”：“解除管制或失范因而进一步受到情感的夸大,恰恰是需要更多规范纪律的时候,人的情感反而变得更加无序。”^③

144

对此涂尔干这样总结道：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失范在自杀行为中是一种有规律

^① Emil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1952, p. 249.

^② Emil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1952, p. 252.

^③ Emil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1952, p. 253.

和特定的要素,是每年偶然事件发生的根源之一。所以,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区分与其他形式的不同。该形式与其他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独立性,不仅体现在个体依附于社会的方式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如何控制个体层面上。自负性自杀的原因是个体在生命中找不到存在的基础;利他性自杀是因为生存的基础对个体而言已经超越生命本身。第三类自杀,其存在性已经展示过了,是由于人的活动缺乏控制而随之遭受的痛苦导致的。根据它的起源,我们将最后一种自杀形式命名为**失范型自杀**。

当然,失范型自杀和自负性自杀有亲缘关系。二者都源自社会不能满足个体需求……在失范型自杀中,社会缺乏对个体基本感情的影响,因而导致个体成为脱缰的野马。^①

对涂尔干来说,社会劳动分工是正常并且积极的现象。^②然而,像其他社会因素一样,这有时也会引起病态现象的发生,我们需要研究这些现象,从而能够更好地决定社会常态的条件。例如,这种病态现象包括工业或商业危机,表明社会功能并不是相互调整的,或者劳动和资本的对抗是存在的。^③这些以及相似的例子表明器官之间的关系——涂尔干喜欢用生物学术语——是一种失范的状态。

这些不同的例子是同一种类的变体。如果劳动分工不能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中产生团结,这是因为没有管理好器官之间的关系,它们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的根源是什么?

既然一系列的规则作为一种确切的形式能够最后自发地建立起社会功能间的联系,可以说,一个**先验**的结论,无论连带器官在哪儿充分地联系和持续地存在,**失范**都是不可能

① Emil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1952, p. 258.

②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1933.

③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1933, pp. 353-355.

发生的。^①

涂尔干补充说道,重要的不仅是持续的时间上的接触,而且是空间上的毗邻(作者喜欢用这种隐喻语言)。在我们看来,他加的一个脚注包含着一个有价值的理念:

145

然而,有一种情况,尽管邻近条件满足但仍然会产生失范。当必要的规则只有通过已经处于瘫痪之中的社会结构的转型才能建立时,会产生这种失范。社会的可塑性是不确定的。当达到极限时,甚至极为必要的转变也不可能发生。^②

涂尔干是如何理解失范这个术语的呢?我们从《自杀》这本书中引用的段落中找到了答案。在这里他谈到了“当社会陷入混乱时的违反常规或失范的状态”。因此,从明确的规则和法律缺失的意义上讲,“失范”就无异于“违反常规”(deregulation)。从另一层面上来说,涂尔干在分析与劳动分工的影响有关的反常现象的原因时,认为这些反常现象证明了“器官之间的联系不受约束……它们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因此,涂尔干将“失范”理解为规则和法律的缺失。

涂尔干认为失范现象的根源是什么?他说这个问题在上述提到的两本书中都做过分析,但是他的答案却不同。在《自杀》这本书中,涂尔干认为失范的根源在于过度的激变使得社会不可能(至少暂时不可能)行使限制人感情的功能。^③我们必须得意识到涂尔干是“集体意识”理论的作者,在上述引用《自杀》的段落中,在讨论失范之前,他阐述人是“通过高于人自身的意识”来接受法律的。因此,如果只有当社会处于动乱时期,才无法行使其职能,那么,我们正在处理的是高级意识导致的混乱,因为按照涂尔干的观点,物质环境无法强加法律于人。涂尔干宣称,“失范性自杀”与其他形式的自杀不同,它是源自人

①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1933, p. 368.

②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1933, fn. 25 at p. 369.

③ Emil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1952, p. 252.

的活动“失去调节”,即失去了主导法律规则的限制。^①

在《社会和劳力分工》一书中,涂尔干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失范的根源。在这本书中,失范的根源是由于社会有机体的器官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造成的。^② 这是一个极其隐喻又模糊的表达,因此对其解读也多种多样。然而,很清楚的是,涂尔干在此处的立场与《自杀》一书中不同。在《自杀》中,他提到的社会混乱是从能够影响法律和限制个体情感的“高等意识”角度来讲的;而这本书是从社会功能,即社会器官的联系角度来讲的。让我们先暂且不顾那些花哨含糊的语言;两种解释的不同显然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考虑到我们已经引用的补充说明,二者的不同更为明显。在这本书里,没有华丽的短语,没有隐喻,当规则不复存在时,社会结构不允许发生变革是因为社会的可塑性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涂尔干补充道——当这样的变革成为必要时,失范的可能性就存在。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结论,但对失范的解释,特别是失范的起源,与《自杀》一书有所不同。在《自杀》中,集体意识功能中的主要角色是社会动乱,而在此书中,主要角色是社会结构的可塑性。在第一种情况中,失范与社会意识有关,而在第二种情形中,与客观的社会结构有关。在两个例子中,我们面临一种处境,在这种处境中规范个人的社会行为的规范制度(我们也应当加入价值观系统)正在崩溃。但我们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得到了两个而不是一个失范的概念——这一点却往往被忽视。

146

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具有模糊的表达,不着边际的处理,甚至缺少连贯性,但是我们正在研究一个重要的理论。毕竟,随着现行的秩序逐渐消亡,这个理论能够吸引那些为社会相关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人士的注意,这绝非偶然。为了简短地陈述主要观点,否定任何形而上学的推测,我将使用短语来描述它。鉴于目前的构成,现存社会结构不可能发生进一步的改变,所以随着整个社会结构解体的发生,先前内

① Emile Durkheim, *Suicide*, London, 1952, p. 258.

②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1933, P. 368.

化的价值体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人的行为准则,也会随之崩溃。这些情况,我们都称之为“缺失规范的”。失范剥夺人们之前有意或无意接受的行为准则。这种特殊的道德混乱,在人类社会共存体系的消亡中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也许通过用新的社会结构替代旧的社会结构,并因此将新秩序,包括统治新秩序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引入整个社会体系中,其才能被克服。本质的革命性变革的出路就是既定社会的垮台。

我不知道涂尔干是否能够接受这种失范的理论;但是这并不重要。这是解读和呈现这个理论的一种可能的方式。还有其他方式的事实证明这个理论的丰富性和启发力。

147 现在让我们看看失范理论的现代版,即罗伯特 K. 默顿(Robert K. Merton)^①的理论。尽管在当代文献中(特别是在美国),就这一话题,埃米尔·涂尔干的名字应当作为受到尊敬的先锋加以提及,但是默顿的理论才是真正流行的理论,这一点更为重要。

默顿有意识地求助于涂尔干的理论(就像他求助于异化理论一样),但他的立场与涂尔干的绝不相同。我应当通过其他事物确定他们理论的相互关系。默顿有两部著作与此有关——《社会结构和失范》^②和《社会结构和失范理论的连续性》^③。

默顿清楚地提到,他的起点是寻找背离人类社会行为准则的根源。他指出这种背离的原因应当是社会原因而不是生物原因。^④

根据默顿的理论,在分析人类社会生活结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区分两种主要因素:文化和社会结构,尽管在具体的情况下这两种因素会融合。“文化因素包括从文化角度定义的目标、目的和兴趣,是所

① 罗伯特 K. 默顿(Robert K. Merton, 1910—200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功能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失范、科层组织、大众传播、职业等方面研究成果突出。——译者注

②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131-160.

③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161-194.

④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32.

有人或处在社会各地的成员的合法目标。这些目标或多或少相互协调(……),并在一些价值等级中粗略地进行排序……这些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①

这一文化结构的第二个要素决定、管理和控制着取得这些目标的可行方法。在现有的习俗和体系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团体通过为目标的实现而采用的可行方法的规范将其制定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些控制人的行为的规范,与技术规范或保证成功的规范绝不相同。相反,它们排除了从个体角度来着的能够保证成功的方式,例如,偷窃、欺骗和暴力。“在一切情况下,为取得文化目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都受到惯例的约束。”^②

在社会行为中分析文化目标和体制规范的相互关系构成了默顿分析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失范理论。

这并不是从社会生活中文化结构共同产生和发挥作用,其相互关系是永恒不变的这一事实推断出来的。在一种具有广泛可能性的极端情况下,目标绝对处于主导地位;在人的眼中,它的重要性非常大,因为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任何行为都是允许的。这是未整合好的文化的一种形式。在第二个极端的例子中,当完全盲从变成了中心价值观,体制化的行为模式就转变成一种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传统约束的社会出现了,一个“神圣的”、惧怕创新的社会。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进行大幅度的相互适应的可能。缺少这种适应会导致偏离规范。“的确,我的中心假设就是异常行为应该从社会学角度被认为是文化愿景和实现愿景的社会建构途径之间分离的征兆。”^③

148

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实例中,在这个社会中,文化目标在人的意识中支配着社会努力实现其目标的准则。这会导致把对他们赞成技术效益的行为的社会规范因素从人的意识中排除。这种极端

①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p. 132-133.

②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33.

③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34.

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的失调以及失范。“不管在文化上是否合法,这种技术上最有效的手段成为体制上规定的行为的首选。随着衰减过程的持续,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产生了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现象(或者无规范现象)。”^①默顿用很多运动和赌博领域的例子来形容这种现象,这些领域对目标的痴迷导致人们对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准则的否定。“这个过程由此最终产生了字面上的‘道德败坏’,例如手段的去制度化,发生在很多团体中,其中社会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并没有高度地结合。”^②

默顿注意到“被放大的失范概念”(expanded concept of anomie)在关于这一主题,即它的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主题的文献中的出现。作者基于两部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的著作:麦基弗(R. M. MacIver)的《我们守卫的城墙》^③和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④。默顿指出这种心理化与涂尔干最初的概念相背离:

最初由涂尔干发展的失范概念指的是社会和团体中相对无规范的状态。涂尔干明确地说明了这个概念指的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性质,而不是与这个结构对抗的个体的性质。不过,由于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各种偏差行为效果明显,这个概念又扩展为指个体的状况而不是他们所处的环境。^⑤

他批判地指出:

失范的心理学概念有一个明确的指代对象,指代的是明确的特殊个体的“意识状态”,毫无疑问,正如病理学家病历本上所证明的那样。但是,这种心理概念不过是失范的社会

①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35.

②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36.

③ R. M. MacIver, *The Ramparts We Guard*, New York, 1950.

④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1950.

⑤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61.

学概念的复制品,而不是替代品。^①

这样,通过假设失范的客观特征,默顿更为精确地确定了他的理论的概念。然而,最初他谈到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能够使一个人假设存在两种结构,后来他指代一种结构类型,即文化结构当中的两种因素。个体生活的环境一方面是由文化结构组成的,另一方面是由社会结构组成的。当组成单一实体时,这两种结构能够并且应该独立分析。失范现象就是从这些结构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

在这一点上(为了进行分析——亚当·沙夫),文化结构可以被定义为控制行为的一套有组织的规范性价值,对特定的社会和团体而言十分常见。社会结构就应当是一套有组织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社会或团体的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联系。失范被认为是文化结构的崩溃,特别当文化准则和目标与社会成员的社会结构和能力之间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会产生这种结构的崩溃。在这一概念中,文化价值观可能促进产生与价值观本身有分歧的行为……**当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能很好地协调时,首先需要行为和态度,然后才是阻止。有一根弦连着行为准则的崩溃和无规则感。**当然,这是有助于失范社会状况的唯一方法,进一步的理论和研究是寻找高度失范的其他模式化的根源。^②

在如上引用默顿第二篇文章的段落中,出现了与第一篇文章细小的,但是很重要的不同点。

在第一篇文章中,虽然刚开始接受了文化和社会结构存在于社会中这一事实,默顿提到了文化结构的两种元素;第一种元素由文化意

150

^①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62.

^②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p. 162-193.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社会的文化结构,一方面我们将与目标和行动有关的价值系统强加给社会成员;另外一方面,规范系统又规定了这些行为的模式。第二篇文章体现出一个不同的概念:有两个结构(而不是一个),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第一个与规范价值系统相一致,这对社会和团体成员来说很常见。第二个是社会关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社会成员互相联系。因此,第二个结构与第一篇文章提到的文化结构中的第二个元素不一致,第一篇文章处理的是关于个人行为的社会管理功能和道德体制规则。第二篇文章处理的是社会关系的客观结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社会成员相互交织而不受个人意志支配。这种结构或者有助于社会成员通过固定的价值体系达成目标。在客观解读社会对于构成这一社会的个体的影响方面,有着明显的转变。这个转变在解读实体内部两种结构适应不良导致的失范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二,因此,在强调失范解读方面有一个基本的转变。基本的思想还保持不变,即失范的基础在于社会生活的两种元素之间的不适应关系;但是这个基本思想的具体化在默顿的两篇文章中的表现不同。在第一篇文章中,关于与人的行为准则相偏差的根源,其中心假设是“文化愿景和实现愿景的社会结构之间分离的征兆”。这与两篇文章的结论相一致,但是在第一篇文章中,默顿通过说明失范的根源是文明化目标控制体制规定的行为,将他的思想具体化;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形容失范是文化结构的崩溃,这种崩溃源自文化目标和准则同那些与这一价值体系保持一致的社会成员的可能的行为模式之间的矛盾。¹⁵¹ 默顿确切地补充道:“当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能协调时,首先需要行为和态度,然后才是阻止。有一根弦连着行为准则的崩溃和无规则感。”这不仅和他在第一篇文章中的立场不同,而且也让他更接近涂尔干的立场。这种将失范解读成客观社会情境的转变与默顿表达的对“失范延伸概念”的厌恶很有可能有关——这是很多美国作家对失范的心理學解读。

让我们回想一下,默顿的失范思想的起点是他想寻求人的行为不

能适应社会的原因。默顿接受这些元素基本的划分,把这些行为调节成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管理着人向目标前进,并列举了五种可能的个体适应方式。(1)因循守旧,个体接受这两种方式,并且能够将行为与态度很和谐地融入其中;(2)创新倾向,个体将目标内化(即社会上接受的价值体系)的同时忽视体制强制要求的活动方式;(3)形式主义,当适合体制化的行为模式的规则在个体的思维中占主导地位,达到与他们相冲突的目标被决绝的程度时;(4)逃避现实主义,当遇到冲突或挫折的结果时,个体会同时抛弃目标和体制化要求的活动方式;(5)反叛,个体拒绝结构内的现行元素,旨在创造一个完全新型的结构。

在研究关于人的行为和态度上,所有这些都十分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乐趣。但是我们对最后两种个体适应类型特别感兴趣。这是默顿对完全来自社会生活的态度的描述。(第四种适应类型,逃避现实主义)

正像第一种适应类型(一致性)仍是最常出现的,第四种适应类型(拒绝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可能最不常见。严格说来,以这种方式适应(或不适应)的人们,是内在于这个社会,而不是外在于这个社会。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些是真正导致异化的因素。不共享价值观,他们只有在虚构的场景中才可以被归结为**社会成员**(与大众相区别)……

从其社会结构的起源角度来看,当文化目标和制度实践都完全被个体吸收,并被灌输情感和高尚价值时,这种适应模式才可能出现,但是可行的制度并不能产生成功的结果。这导致了加倍的冲突:深入内心的道德责任,采取了制度的方式,与诉诸不正当方式(可能达到目的)所面临的压力之间产生冲突,而个体不再采取任何合法和有效的手段。有竞争力的规则依旧被保持,但却将与这种规则格格不入的沮丧无能的个体剔除。失败主义、无为主义和顺从在逃避机理

中体现了出来,完全导致个体逃脱社会的要求。因此这是一个权宜之计,起因于不能使用非法手段,因为有内化的禁例。这个过程产生的同时,具有成功目标的最高价值未被放弃。通过放弃起沉淀作用的因素,把目标和手段都放弃,这种冲突得以解决。这种逃避方式是彻底的,冲突被消除了,个体回归社会。^①

这是一个特别刺激的结论,特别是关于我稍后对革命性态度的分析。默顿真正关心的是研究自我异化的形态,特别是自我异化的根源。[默顿对“异化的东西”(aliens)说得很简单,就是异化的人(alienated people),但并未谈及异化的形式和定义。]为了精确地找到某种异化的起源,默顿将注意力集中在冲突的重要性上,即社会决定的人的活动的社会目标,以及社会限定的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冲突存在于“背离”(deviation)现象的基础上。然而,正如默顿强调的,并不是失范导致背离现象,因为不仅保留着价值系统,而且价值系统还受到那些挫折和逃避生活的个体的尊敬。即使我们接受失范的定义,失范能够包含这种情景,那对默顿而言还存在一事实,那就是失范现象只是异化现象的起源,是异化现象产生的基础。

说到第五种适应性——反叛,默顿关于革命的态度(特别是革命性态度和仇富之间的细微差别方面)提出了很多吸引人的观点,这一点人们可能会觉得很有用。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失范理论。我们能从默顿对革命性态度的反思上学到什么?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

这种适应性(反叛——亚当·沙夫)使得在社会结构之外的人去面对和寻求一种新的,也就是高度改良的社会结构。它以支配目标和标准的异化为先决条件。这些形成了所谓的纯粹的专制。准确地说,专制是既不强求忠诚,又不合法,因为它可能指的是其他方面。在我们社会中,有组织

^①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p. 153-154.

的反叛运动很明显是打算引入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成功的文化标准被改良,并且为促进才能、努力和奖赏之间更加紧密的一致性做好准备。^①

这段文章告诉我们异化现象在塑造革命态度上的作用,但是并未告诉我们关于失范的问题。问题回到《对失范的压力》一文的结论处。默顿之前区分过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在这里,他坚持认为,社会结构(美国类型的)导致了失范的趋势和产生了偏离规则的行为方式。社会秩序的压力,像美国的资本家承受的那样,使一个人想要赶超他的对手。只要没有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最后的结果——“成功”上,那么行为手段的选择仍受体制框架的控制。“然而,当文化强调将源于竞争本身的满意度转移到几乎只关注结果上,这种压力导致了管理结构的崩溃。”^②

最终,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失范”含义上另一个细微之处。“失范”是这样一种社会情况的代名词,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人类社会行为的可预测性接近于零,因而产生社会混乱。

明显的是,上述讨论不能放到道德主义的水准上进行。不管读者的情绪多么关注社会结构的目标手段的协调的道德愿望,但很显然,两者的协调不一致会导致失范。尽管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为社会行为的可预见性和规则性提供基础,但是当这些社会结构元素分崩离析时,它的效用越来越受限。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预测性最小化,这可以说是失范或文化混乱。^③

默顿那里有一定的概念混乱(有一个结构中含有两个元素,或者有两个结构,即含有一个社会结构和一个文化结构的吗?)。但这是一

①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55.

②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57.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③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p. 159-160.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154 个美丽的错误,一个小瑕疵。基本思想是清晰丰富的——它是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为社会特定成员提供理想目标的内化价值观体系传达出来。他们也通过行为系统来传达,这种系统决定了何种行为模式在社会上可行,并规范社会成员的活动。冲突导致不均衡甚至削弱在社会中内化的规范价值系统,根据默顿的第一个版本,冲突源自价值观系统的主导作用,其定义人的行为目标高于行为模式的规范系统。因此,这导致后者的不均衡,并且,结果出现了一种情况,即缺乏社会成员的行为的义务规范。根据第二个版本,冲突源自目标之间的失调,价值观决定了社会成员和他们达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他们被嵌入其中的主导性社会关系。(默顿没有定义“主导”的精确意义。)这些社会关系必须解释为客观的,这能从默顿反对取代失范的社会学概念层面来理解。这两个版本的出现不能用缺乏术语的准确性来阐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在第一个版本中,我们仅仅停留在社会意识领域;价值目标和规范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第二个版本中,我们所处理的是规范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客观体系的关系,实际上,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促进这些社会内化的目标的实现。根据默顿的观点,对基本冲突的解读的不同导致失范,其也一定影响了失范这个概念。

事实上,在默顿的作品中,至少有三种失范的解读。

第一,当目标超过制度上允许的社会行为,导致适当的规范陷入不平等的程度时,就会产生失范,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社会行为准则不被认可。这就叫作失范^①——它与一种心理趋势相对,这种趋势是将失范状态从社会转移到个体身上。在默顿的第二篇文章中,他说失范的概念,最初是由涂尔干发展的,这个概念与一种情境有关,在这种情境中,在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相对缺少行为准则。默顿坚持认为,涂尔干清楚地强调规范是社会结构的属性,而非个人的。如果失

^①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35.

范概念转移到个人身上,我们就是在对失范进行心理上的解读,这可能和社会学角度的解读相同,但并不能用社会学解读来代替它。^①

第二,默顿用“失范”形容社会文化结构崩溃的社会情况——即价值目标体系的崩溃,以及社会行为管理体系的崩溃。社会成员的社会限制的行为要与这些目标和准则一致是不可能的了。^② 行为规范体系崩溃和以无规则为特点的状态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的冲突(见默顿第二篇文章)。但第一种和第二种解读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种情况缺少价值目标和行为管理的一体化,第二种情况缺少文化结构(包括价值体系和行为体系)和社会关系体系的一体化。默顿强调,后面这种观点显然接近涂尔干的理论。

第三,在社会情境概念中,人的行为模式预测的可能性消失,文化混乱随之而来,这种文化混乱被称为“失范”。^③ 而毫无疑问,在缺乏社会接受的行为规范的情况下,不可能(至少非常困难地)去预测人的行为的模式,更不必说识别既定社会情境的结果之一也不能使原本足够复杂的事情变得清楚明了。^④

综上所述,默顿的出发点是偏离社会规范的人的行为(异常行为,越轨行为)。一方面,这与涂尔干的观点接近,其出发点也是偏离常态的人的行为(毕竟,自杀是这种行为的终极体现);另一方面,这超越了涂尔干的思想,后者强调失范的客观性质是涉及财产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对涂尔干而言,失范和社会规范体系有关,其管理人的情绪和行为,也与人有关,人在失范的社会中活动。虽然涂尔干的“集体意

①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p. 161-162.

②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p. 162-163.

③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p. 159-160.

④ 关于默顿的失范理论以及该理论与涂尔干的理论关系,有一个很有趣的分析,这个分析与赫伯特·迈克克劳斯基和约翰的那篇文章《失范的心理学规模》当中提到的不一样。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0, No. 1, 1965.

识”概念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观点认为失范现象更接近客观存在的社会情况。但一个人在处理偏离常态的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唯物主义者,那就可以避免进行心理分析。默顿犹豫不决(例如他对失范的解释),但是当面对失范的心理学解释时,他显然倾向于客观社会的解释方向。由于他的立场不明确,这就导致一些问题,由于他的失范理论
156 与异化理论(或者自我异化理论)是交叉的,所以困难就更大。一种情况,异化是导致社会失范行为的前提(例如反抗性适应^①)。另一方面,异化状态相当于失范的结果(逃离社会适应的例子^②)。这不是对缺乏一致性的指责;一切事物都取决于具体情势以及失范与异化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使得我们去检验失范和异化的相互关系。我们应该从涂尔干和默顿的理论开始,但目的是确定理解和评价现代的,特别是美国的文献在经验、社会和心理研究的领域使用的概念工具,在这些领域中这两个术语常常被使用,有时被滥用。失范和异化的关系是什么呢?

让我们从那些社会关系开始,它们的名字一方面可以叫作“异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叫作“失范”。“异化”意味着人的活动的产品与生产者有特殊的关系,当这些产品脱离生产者的控制时,其功能社会性地独立于,甚至相反于生产者的意愿,有时甚至变成一种生产者的敌对力量。“自我异化”是人对于社会机构、他人和自我的异化关系,它有着各种形式。根据涂尔干的说法,“失范”是社会接受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崩溃后的社会情境,它消极反映了社会管理危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甚至被这些名称所涵盖的社会关系的简单并存也表明它们之间的范围不重合,也不是一个比另一个更狭窄。它们是不同的关系,可能是互补的,但并不重叠。在具体的事实上,作为失范或异化的,

①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 155.

② Robert K. Merton,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pp. 153-154.

当给社会情境下定义时,我们了解的会比只谈及这个或那个多得多。它并不意味着如果特定的社会情境的特点是异化的(在客体异化的意义上),那这个社会同时就是失范的情境。即使社会对其产品逐步失控向着不平衡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发展,既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也可能继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深入调查这一危机的原因,社会关系的客观结构不稳定是可以理解的。反之亦然,失范状态的存在,即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状态的起因是异化现象,因为失范的原因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

157

在具体情况下,当我们拥有更深刻的关于社会关系的知识,这种异化和失范的互补关系会让步于社会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就失范和自我异化的关系而言,情况尤为如此。当社会接受的价值体系正在失衡或者崩溃,社会上会出现上述提到的三种形式的自我异化的趋势。失范解释了自我异化的来源。

从对比分析失范和异化两个概念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其前提是接受合适的定义,即具体理解这些概念的内容,以及其背后的理论。我寻求一个尽可能客观的方法,并确立了概念的定义以及在分析相关文本基础上的相互关系。定义不同,它们相互依存的画面就不同。当前(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在美国社会学著作中,使用这些术语的确能给

人们一个不同的画面。^{①②}

“失范”这个术语的增加对于我们的概念体系是必要的,因为第一,它在这个学科文献中被广泛使用;第二,在一个恰当的“客观”解释中,它为异化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不同的角度。我们拒绝将失范和异化等同起来,我们把“失范”理解为这样一种社会情形,在其中,由于社会体系的无秩序,社会所接受(从内化的意义上讲)的价值行为体系的崩溃,导致社会成员被剥夺了选择社会行为标准的结果。失范强调了社会成员的自我异化,也解释了自我异化的根源。在分析异化的具体表现时,特别是人对社会及其机构的异化,或者某个生命(所谓存在的空虚)无意义的感觉,等等,这些对于失范的类别有所丰富,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更多情况。

① 我想到了如下作者及其著作: Ephraim Harold Mizruchi, *Success and Opportunity, Class Values and Anomie in American Life*, London, 1964; Alienation and Anomi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in I. L. Horowitz (ed.), *The New Sociology*, New York, 1964; Murray Levin, Political Alienation, in Eric and Mary Josephson (eds.), *Man Alone,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1962;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 Sebastian de Grazie,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Chicago, 1948; Robert M. McIver, *The Ramparts We Guard*, New York, 1950;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1950; Leo Srol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ertain Corollar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1956; Dwight G. Dean, Alienation: 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1961; Melvin Seema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1959.; John Hort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Anomie and Alienation: A Problem in the Ideology of Sociology, 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1964; Gordon Rose, Anomie and Devia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Studies, 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7/1966; Bernard Lander,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 York, 1954; Albert K. Cohen, The Sociology of the Deviant Act: Anomie Theory and Beyond,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965; The Study of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nd Deviant Behaviour, in *Sociology Today*, New York, 1959; *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the Gang*, Glencoe, Ill., 1955; Marshall B. Clinard,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Today*, New York, 1959.

② 关于异化的有趣文章, Il concetto di “alienazione” in sociologia, in *Quanderni de Sociologia* (Vol. XV, April 1965, p. 154) 评论说,据美国社会学评论在 1936—1955 年的索引来看,在该期刊里关于异化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从 1956 年起,这类文章才增多起来。

二、个体与社会、社会机构以及他人关系方面的异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可以挑剔那些把自我异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异化相等同的学者,但是人们不能据此来反对他们,说他们强调了问题的社会意义。考虑到在所有发达社会,不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系如何,这一现象都具有广泛的维度,并且考虑到这一社会现象呈动态增长,他们还是值得赞扬的。目前世界处于革命性转型期,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转型到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也必定导致传统内化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失衡。部分来看这个世界,这些体系是破碎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的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我们也面临着不同形式的自我异化引起了失范的局面。为了克服它们,更重要的是有必要了解它们,描述它们和检验它们的起源,以及明确地把握它们的发展规律。我们需要科学的思想。这是纯文学喜欢的话题。杰出作家的和生活的观察者的直觉,借助适当的艺术手段和视角,能把大家带入开阔的视野,这是“冷”科学无法达到的。在这个领域,文学可能会刺激科学,可以激发研究者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卡夫卡、黑塞、加缪和萨特的作品一定能发挥这个作用。但文学不能取代科学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应该是在这个范围内的社会行为的基础。科学对自我异化现象感兴趣是正确的、恰当的(我把哲学归于科学领域);如何引导科学思考有很多困难。我们只解决假设问题,在证实的过程中,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系统的调整。

在阐述我们的解释之前,让我们调查一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谁在这个领域做的贡献多。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东西不仅是一种“时尚”(fashion),而且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文献发挥着先锋作用,并且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原则上,这些文献都十分详细,涵盖范围不大,都是经验性的研究。数量上,文献已经十分丰富。然

159 而,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却是极其温和的。弗洛姆的作品占据不同的地位,我们应当单独研究他的思想。但首先我们应当从那些从事经验研究的理论家开始。

在这些文献中,梅尔文·西曼(Melvin Seeman)^①的作品首先映入眼帘。像里欧·史汝尔(Leo Srole)、德怀特·迪恩(Dwight Dean)以及一些其他作家已经有了研究技术,他们首先提出尺度测量,然后将相关的概念投入运行。但西曼是提出了异化的五种元素结构这个概念的作者,其对美国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使对这个领域的态度研究成为可能。

在现代文学中[西曼引证了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罗伯特·默顿,埃里希·弗洛姆,埃里希·卡勒(Erich Kahler)],西曼承认异化概念的普遍质,他给自己两个任务。第一,分析之前给定的异化的五种含义(他自己的观点);第二,为了经验的研究,让这五种含义可以操作。^②为此他清晰而明确地将这个问题解读为社会心理学问题:“我建议,在下文中,从行动者的个人起点角度来对待异化现象,也就是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待异化现象。”^③作者列举了“异化”的五种含义:无力、无意义、无规则、孤立和自我疏远。在第一个含义(无力)中,作者指的是马克思的言论,即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没有决定权,因为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在生产领域是无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是被异化的。西曼提出通过经验、问卷来揭示异化的含义,这样个体对自己行为的期望度就会影响生产的结果。在第二个含义(无意义)中,西曼对情况记得不清楚,所以个体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持什么样的观点。异化概念的实施包括通过问题获得个体的期

① 梅尔文·西曼(Melvin Seeman),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现代个体的异化进行了分类研究。——译者注

② Melvin Seema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4, 1959, p. 783.

③ Melvin Seema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4, 1959, p. 784.

望值,不管它是否能够通过满意的方式预见行为的结果。根据西曼,异化的第三层含义(无规则)在个体的主观情绪上,与涂尔干的失范一致。同样,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个体犯罪的数据,个体的犯罪是为了达到目标做出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第四个含义(孤立)与个体在社会文化中的异化感程度有关。最后,第五种含义(自我疏远),作者觉得最让人感到困惑。这个词的含义来自弗洛姆的“异化”,他在《健全的社会》中说:“异化应该是一种经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们体验异化感。人们会说,他变得与自己疏远了。”^①西曼解释了这句话(在我看来这是唯一合理的方式),他认为“自我疏远”意味着成为与理想模式截然不同的一种事物。^②同时,作者试图采用自我异化这个含义,自我异化是马克思提到劳动对工人的意义时提出的,作者用这个概念给异化下定义,“某种有预期回报的行为的独立可靠度”^③。

160

在美国文学中,人们普遍支持西曼的概念。鉴于理论文献的贫瘠,以及为了能够进行技术调查和计算而形成的使用概念的趋势,这一点并不奇怪。西曼提供了这两个元素,一个替代的异化理论,它可以按照简单自然的普通方式进行实证研究。还有其他必要的吗?有一系列的作品抄袭西曼的研究和证实他的概念。^④

其他人批判性地接受西曼列举的五大元素的某些思想。^⑤ 当讨论

①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p. 120.

② Melvin Seema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4, 1959, p. 790.

③ Melvin Seema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4, 1959, p. 790.

④ 能在 Arthur G. Neal 和 Salomon Retig 的文章中看到一个例子, Dimensions of Alienation among Manual and Non-manual Worker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8, No. 4, 1965.

⑤ Dwight G. Dean, Alienation: 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6, 1961; John P. Clark, Measuring Alienation within a Social System,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No. 6, 1959.

转到欧洲,西曼的概念受到了尖锐的批评。^① D. 维达尔(D. Vidal)强调了西曼五元素中的元素的异质性。它们不仅来源不同(马克思、涂尔干、曼海姆和弗洛姆),并且它们不是由统一的成分组成的。每个元素解决不同的问题(行动的结果,行动者情景的理解,指导行动规范的缺乏,共同价值观的失去,没有达到行动预期)。这种多样性导致问题越来越多,并且使得异化概念不再趋于一致。^② 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认为异化概念是不重要的,对社会学毫无价值(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减少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链破坏问题)。^③ 所有那些参与讨论的人都批评西曼的概念考虑了异化与社会结构的联系,认为他是失败的。

161 在上面引用的关于异化的文章的最后,德怀特·迪恩参考戴维兹(A. Davids)的异化综合征概念,提出异化可能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综合征。^④ 这种异化综合征是美国文学异化实证研究领域的第二个理论概念,我们应当予以重视。^⑤

戴维兹对统觉(apperception)组织选择中激励因素的心理问题感兴趣。为此他引入了激励因素,将其归为“异化”,把异化现象当作综合征,即大量因素同时出现。“综合征”这个词的解释来源于医药领域,它是指所有症状同时出现并导致某种疾病,尽管这些症状之间不一定有联系。戴维兹写道:“特别是,这个研究是关于动机综合征,也

① *Sociologie du Travail*, Paris, No. 2, 1967, published Seeman's article *Les Conséquences de laliénation dans le travail* and the discussion in which, as well as Seeman, Daniel Vidal, Michel Amioe and Alain Tourain participated. 为了公平起见,呈现一幅完整的图画,必须承认在美国有对于西曼的概念的批评:Joseph C. and Elisabeth C. Mouledous, *Criticism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70, 1964, pp. 79-82。

② *Ibid*, p. 186.

③ *Ibid*, p. 198.

④ Dwight Dean, *op. cit.*, p. 758.

⑤ Anthony Davids, *Generality and Consistenc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Alienation Syndrome and Cognitive Progresses*, i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955; Anthony Davids, *Alienation, Social Apperception and Ego Structure*, in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Vol. 19, 1955.

就是‘异化’和这种功能的措施,是关于独立刺激物的,是关于不完整的刺激材料的完成。异化……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综合征,由下列相关的个人性情组成:以自我为中心,不信任,悲观情绪,焦虑,以及怨恨。”^①

这一点有如下几方面要点:

第一,这里的异化的问题,不仅如前面的例子从心理学层面来加以解释,并且严格地被解释为个人的特征。

第二,包含在“异化”术语中的个人特点形成了综合征而非有机体,即从结构上讲,他们受共存主义的约束,而不受动态规则的约束。

第三,有这种综合征的人在孤独的个体中十分典型,他们悲观,并且怀疑他人。

抛开对这个问题的心理效用的分析,完全没有异化的社会问题的分析。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种形式的概念是无用的。

这两个理论建议大体上说明了美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弱点。在我看来,上面给出的建议是,第一个有意识地采用连贯性,试图为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创建一个理论基础。这在美国文学领域极其罕见,在那里它更像是一种对于问题的相关性的“运算”,而这些研究的理论基础却十分边缘化。那么作者给我们提出了怎样的建议?

162

首先,要把自我异化的问题与客体的异化和社会基础分开来加以研究。在讨论西曼刊登在《工作社会学》上的建议时,这一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让我们记住,尽管“异化”这个名字让人自豪,整个时代这个问题的要害主要限于人对于某物的异化,因此,按照我们的术语,这就是主体的异化或者自我异化。)这个建议是将自我异化当作不同问题来研究,当作本质性问题加以研究,而预先谴责那些无论如何巧妙地运用技术手段,但是没有取得成果的研究。

其次,如果上述批评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共同弱点,那么其中的

^① Anthony Davids, Generality and Consistenc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Alienation Syndrome and Cognitive Progresses, i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955, p. 61.

每一个概念都有值得注意的特点。西曼建议对有研究可能性的异化进行分析,也只是将我们限制在五种元素之中。更深层的是,他的建议引入了不合逻辑的元素,很难找到彼此的相关关系。(例如,暴徒认为只有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才能取得成果,他并不恐惧无力、无意义等;而是恰恰相反。)由于不是基于异化的原则的划分,西曼的元素论打破了问题的统一性。(异化是个人感觉无力或者某种现象毫无意义,理论上讲与自我异化完全不同。)西曼没有把自我异化当作特定的生活领域和人的活动来分析,他提出了一种个体感觉的特殊分析方式(他并没有连续地实施这一方法),这种方式能够通过抽象的方法区分那些我们认为具有异化特征的人们的行为和立场。

再次,戴维兹提出将异化当作个性特征的综合征来研究。因此他切断了“异化”包含的大量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而且他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即异化,即使在其狭义的解释上,也不是全部的现象的总和,而仅仅是他列举的个性特征的综合征,并且这些特征共存的原因是未知的。我坚决反对这些提议。

163 弗洛姆的观点既被他的理论立场与所谓的经验主义学者的观点相比较所具有的明显不同所证明;也受到他在美国异化理论文献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弗洛姆在美国社会十分活跃,他像很多德国和奥地利学者一样,移民到美国逃离纳粹的统治。但他继续阐述欧洲思想的一个特定的趋势,因此形成了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像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一样,来自旧的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给美国带来了智慧风潮,这与美国传统格格不入,但是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心理概念的发展。如果在美国文学界异化理论作为一种时尚“爆炸”,如果像雷塞(V. Reiser)上述引证中建议的那样,这个事件的时间分水岭是1955年,那么让我们记住这一年出现了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这不是他解决异化的问题的第一部著作,但它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使异化问题成为当代文明的核心问题之

一。弗洛姆与美国社会学和心理学观点的其他代表人物不同,后者是在自己的研究中从事异化问题的研究,而弗洛姆则在社会科学领域鼓舞美国的理论思潮。

然而,分析弗洛姆的观点并不容易。他在美国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领域的地位和角色很难描述;并且他的理论概念是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却并不统一。弗洛姆试图将精神分析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结合,正如他本人清晰地告诉我们的一样。^①他并不总是取得成功,有时候这两点不连贯。但分析和理论评价的难度并不否定作者多产的能力。弗洛姆从事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至少从1941年《逃避自由》的出版,直到1961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发表)。在此期间,他的解释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理解弗洛姆问题的统一性有些困难。当粗略地概括弗洛姆异化的问题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四本著作时,我们应当寻求一个表现他观点的方式,这四本书为:《逃避自由》(1941),《为自己的人》(1947),《健全的社会》(1955)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关于弗洛姆第五部探讨这一现象的著作,即《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我们将稍后讨论。我们可以做一个术语学上的评论:除了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时,弗洛姆谈论客体的异化以外,他所谈论的“异化”在原则上总是同我所说的“自我异化”相吻合。

164

在这些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中,对我来说,最有创意的原创作品是《逃避自由》^②。这部著作于1941年出版,因此写作的时间更早一点,当时处于纳粹的野蛮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环境下,这本书包括这些思想的雏形,此后弗洛姆也重复和发展了这些思想。

正如标题所示,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自由,正如弗洛姆所说,人服从权威体系和接受因循守旧的观念,放弃或者逃避自由。代表着对

①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1962.

②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1941.

人的自由的否定的潮流——即纳粹主义——怎么能够获得胜利？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在政治理论的帮助下，而且以更深入地渗透人的灵魂中的方式试图去解释这一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面临的作者是心理学家。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尝试，讨论政治层面而忽视任何心理分析是众多学派思想的致命弱点，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与人的心智和社会塑造的品格相关联的不合理现象，即使是十分了解社会发展的法律的知识，也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按照弗洛姆所赋予社会性格这个词的含义，他是把这个术语理解为社会所塑造的人们为从事特殊类型的活动而具有的准备状态）。因此，弗洛姆调查了个体的历史发展，人的自由，以及现代文明。根据弗洛姆，人已经掌握自然，这当然对个人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人并没有掌握自己的社会发展。从社会各个方面而言，生产技术的合理性被生产系统的不合理性所伴随。经济危机、失业和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

165

人建立自己的世界；他建造了工厂和房子，他生产汽车和衣服，他种植粮食和水果。但是他与自己生产的物品日渐疏远，他并不是他所建立的世界的真正主人，相反，这个人造的世界成了他的主人，他得对它点头哈腰，尽量安抚和操纵它。他手中的杰作已经成为他的神……他幻想成为世界的中心，然而，就像他的祖先曾经对神怀有的渺小和无力感一样，他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①

在这段里，不难感觉到马克思的影响。如果作者讲得不够清楚，那就让我们记住，那个时期美国当局特别注意，防止任何与左翼有关的移民。弗洛姆继承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谈论在与自己的产品的关系方面使自己异化的人；同时当他说到世界被人创造，世界变成人的主人时，他用的就是客观疏远的概念。在这种

^①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1941, pp. 117-118.

情况下,人感到无助和缺乏意义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变成了人的敌对面。

然而,弗洛姆更进一步采用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和拜物教理论。人们之间的关系如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所以人把他人,甚至他自己,都看作商品。

人和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个人关系上都有异化的特点;他们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也许这种手段和异化现象最重要的和最具破坏性的实例就是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不仅出售商品,也出售自己并且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体力;商人、医生、文员,出售他们的“个性”。如果他们要出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他们必须要有“个性”。^①

上述论述显然是受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商品拜物教思想的影响,作者谨慎地做了一个脚注。这里的异化明显是客体异化,甚至是在涉及人自我的异化时,涉及人把自己当作商品时,也是如此。阐释的结论是自我异化出现了,但是这与人的产品的异化和人际关系的物化具有有机的联系。在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资本主义时,弗洛姆同样指出这种发展的异化性趋势:“个人变得更加孤独,变成外在于人自身的强大力量的工具,他成为一个‘个体’,一个困惑、无安全感的个体。”^②

166

这些是弗洛姆异化理论的基本思想,作者在他的后续作品,特别是在《健全的社会》中发展了这一理论。内容上也发生一个基本的变化。强调的重点转向心理学的层面,虽然其在后来的作品(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公开提到马克思,并且参考其观点(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马克思的客体异化理论的原始冲动以更加微弱的方式得以呈现。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刺激的想法,对理解

^①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1941, p. 119.

^②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1941, p. 120.

人在当代文明中的状况是必要的,但尽管如此,异化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以主体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当我们讨论分析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时,它成为一个趋势增长的刺激物。西曼是从弗洛姆那里得到这些元素的:无力、无意义、孤立和自我疏远。

西曼在导言中指出,《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回到了《逃避自由》的问题,《逃避自由》是以价值行为起源和伦理为基础的,这些伦理价值塑造了人的个性。这个问题本身就给人的生活和活动的客观因素带来了一定的转变。因此,异化的问题在这里假定了形式清晰的自我异化的问题,特别是人从他的“自我”异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可能在文献中明确地表示出来。我认为弗洛姆很明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弗洛姆谈到了“与自我的认同感”。至少,当人们刚碰到这个词的时候,还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人同“自我”的异化是和人与自我的认同相关的。弗洛姆写道:

……成熟的和富有成效的个人源自从经验中得到的身份认同,这种感觉可以简要表述为“我做故我在”。在市场取向中,人把自己的能力当作同自己相异化的商品。他不是拥有这些能力的人,而是这些权力成了他的面具,因为重要的不是在使用这些能力的过程中他的自我实现,而是在此过程中他成功卖掉了它们。他的能力和这些能力所创造的东西都与他相疏离,变成某种与他不同的东西,某种供他人加以评价和使用的东西;因此他的身份感变得像自尊那般不可靠;这一身份认同是由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构成的:“我是你想要的那种人”。^①

在这种“市场取向”中,即把一切当作商品,人的关系是基于自己和他人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肤浅,因为,重要的不是他人作为特

^① Erich Fromm, *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New York, 1947.

殊的不可替代的存在,而是作为可交换物品的特性。根据弗洛姆,这也反映了爱的水准降低,爱不能消除市场带来的人的孤独。思考是同样由这个市场取向所决定的,感觉也是。知识本身成为商品,因此使用定量措施和比较的方法,同时避免进行深入的定性分析。^①

我只是报道这些观点,也不对此采取任何立场。我更感兴趣的是创造一种特别的氛围和反思风格,而不是分析这些问题。这本书的思想被高度地浓缩了,表明作者对周围消费社会的负面表现反应强烈,但是,将其概括到如“异化”这样特定的范畴,他并没有留意细节和表达的准确度。

这种浓缩在《健全的社会》中消失了,但是就用词的准确度和表达的清晰而言,这本书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为弗洛姆更多地转向分析被认为是已经“异化的”人的主观经验。^②

人在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和“市场取向”使得弗洛姆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不会导致社会病态吗?答案是肯定的。“市场取向”的世界导致异化,从而导致社会病态。作者用他的书做了分析。

异化是什么?弗洛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异化是一种体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或者说,他已经疏远了自己。他没有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自己行为的创造者——而他的行为和产生的后果成了他的主人,他得服从或者膜拜它们。产生异化感的人与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和他人失去联系一样。和其他人一样,他用体验物的方式来体验自己,他具有感官和常识,但同时和自己以及外面的世界没有建立起富有成效的联系。^③

168

^① Erich Fromm, *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New York, 1947, pp. 74-76.

^②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③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pp. 120-121.

从狭义词义来看(我们的专用术语),异化就是自我异化,因此,异化就是与自己的“自我”的异化。

但幸运的是,弗洛姆在这方面绝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因为同时,他在客观意义上解释了异化,人的产品变得独立并把自己转变为一种支配人的力量。他从宗教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解释为偶像崇拜,因为人的创造性的外在表现是对物质组成的神像的膜拜。除了拓展“偶像崇拜”这个概念,包括与之相关的范畴,弗洛姆忠实地遵循了费尔巴哈的观点。

因此,“异化”在这里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混合体;它是指“失去”自我的人的状况,但也指人与其产品的关系,这种产品把自己视作与他疏离并比他优越的力量。这样,客体的异化以其受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回归了,因为人们不仅可以悄然谈论人从某物的异化,而且可以在与人的关联中,谈论人造的世界从人的异化。

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异化现象几乎是到处存在的;在人和他的工作的关系中,人和消费物的关系中,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乃至人与他人的关系,甚至与自身的关系中,都渗透着异化现象。人创造了一个此前从未存在的人造物的世界。他建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机器去管理他建立的技术机械。然而,他创造的东西要凌驾于他之上。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创造者和中心,而是他自己创造的机器的仆人,那是他亲手创造的。他释放的力量越强大,他越感到自己作为人的无力。他面对自己创造出来的力量,与自己渐行渐远。他被自己的创造所拥有,他失去了对自身的所有权。他塑造了一只金牛犊,并说“这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①

这是非常正确且漂亮的说法。不过,这显然违背了弗洛姆对异化的定义,但在思想史上人们认为是矛盾成就了作者的伟大。

^①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pp. 124-125.

弗洛姆使用一个模糊的概念很好地揭示和分析了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的表现;他有时谈论自我异化的表现,有时谈论客体异化的表现,这是一个反映现实的生动画面。工人感到异化,经理也感到异化,正如资本家一样。消费的过程就是异化,我们使用的所有东西都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发挥作用或如何生产出来的,社会力量、他人、“自我”变成了商品——所有这些都构成异化。总之,全部当代社会生活都是异化的。

我再重复一遍,特定的表现和外观被描述为有色彩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异化。但是在何种意义上说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至少起点还不清楚或模糊不清。

这种模棱两可也影响弗洛姆的道德崇高的工作,即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① 这在本章第一段关于异化的描述中清楚地解释过了,这个概念出现了大量相关但是不同的含义。

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否定**(negation of productivity),即**异化**的概念,积极的、有生产力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掌握这个客观世界的概念就无法被充分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不断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异化的过程。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就是人回归自我,实现自我价值。

马克思认为,异化(或“疏远”)意味着,人在把握世界时,并没有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代理人,而是感觉世界(自然界、他人,以及他自己)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它们作为客体,凌驾于他之上,并反对他,即使它们或许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从根本上讲,异化就是**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消极地和接受性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②

^①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②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pp. 43-44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因此我们有另一个异化的定义,即自我异化。在这一点上,我不想深入讨论,我只对弗洛姆的观点及其多面性感兴趣。这无疑隐藏了很多思想的价值,也存在着迷失在“异化”不同含义之中的危险。其中哪一点是真正重要的?当我们定义“异化”时,我们究竟说的是什么?弗洛姆的概念有一个相当大的弱点,就是模棱两可。这也是为什么它能使思想活跃的原因,但这不能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170 然而,尽管如此,我不仅要强调我与弗洛姆在分析当代人自我异化时,在很多观点上意见一致,而且要强调,事实上,我的很多思想是来自他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个负债延伸涉及人的自我异化问题的文学领域,虽然除了加缪和萨特,“异化”这个词可能并不被那些伟大的人所知,例如卡夫卡、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zulc)(只是因为波兰语言写作的障碍,使他不能享誉全球)、赫尔曼·黑塞(Herman Hesse)。

在这一评论的最后和阐述我自己的观点之前,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上述所提到的我反对西曼和戴维兹的见解的论辩。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点,各个基本点又包括为进行深入反思的基本指南。

首先,以某种方式把自我异化问题同产生这一问题的社会基础联系起来,在方法论上是十分重要的。当我说“社会基础”时,我在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作为其基础的客体的异化,以及与之相连的社会发展的自发性。

其次,基于反对那种根据其中的某些组成要素而研究异化的做法,我的目标是完全呈现自我异化的表现,使其内容的各个方面具体化以用来分析整个现象。因此,我不接受任何关于异化或异化的个性的特征的混合清单,但我会把人的异化现象的具体社会表现作为我的出发点。举例来说,一个不参与政治的人对行动效力失去了信心;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革命者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独行者”,不愿见人,讨厌他人或者害怕他人是因为他们感到沮丧;一个人不满意他的生活,因为他不喜欢他正在做的事情和做事情的方式,这

与理想社会的“完人”形成对比,人逃离让人厌恶的现实,进入到酒精、毒品,甚至充满精神病的世界,等等。这就是全部方法,特别是“反自然力崇拜”(西曼或戴维兹的概念的含义)。

再次,从广义上解释自我异化(正如我们分析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时已提到过),我是从基于某种参考体系来谈论人的异化。¹⁷¹从人与“自我”的异化意义上讲(从这个短语的各种含义上讲),自我异化只是一般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不可能把它们当作相同的、当作某种建议;用我们的术语来讲,这是自我异化更为狭义的解释。

让我们再立足于这些指导准则来思考自我异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1)人与社会和其他人关系上的异化,(2)人与他的“自我”的异化。根据源于社会及其体制连同他人的人异化形式的尖锐程度,第一部分分为三点。首先是政治异化,然后是文化异化,最后是与社会共存的基本规范相异化的犯罪行为。

还要做点一般性的评论。上述每个观点都能写成一个独立的著作,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文献也很多,但这不是我的目标,如果这样一种方法能够激励目前的框架和结构就够了。

(一) 政治异化

如今,最先在美国出现了大量有关选民行为与态度以及以政治异化为主题的实证性研究。这是该问题很狭小的一部分,其对剥削的理解集中于正式的民主体系中隶属于选举的实践利益,尤其是对操纵选民可能性的关注。毋庸置疑,这当然构成该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该任务业已完成且没有重复的意义时,我不应再对此进行分析。^①我在这里只引用上述提到的著作的作者,阿瑟·菲舍尔(Arthur Fischer)的总结评价。我与他的观点完全一致。

^① Arthur Fischer, *Die Entfremd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heilen Gesellschaft*, Munich, pp. 65-82. (作者分析了这个领域的基础性著作,书的第二部分列举了这些著作的简易翻译。)

如果有人看政治异化相关的著作,就会知道关于异化与政治体系的结构特征之间关系的问题鲜有研究。相反,作者将研究局限在较容易应对的主体层面。与此同时他们还遇到了方法不足的难题,这些方法只能源源不断地引起旧的偏见。虽然有一些作家提到过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差异,但从未把这方面当作研究的起点。结果仍然是孤立的;只有在从未产生源于迷信社会体系稳定性的理论层面才能获得完整且综合的理解。同普通的异化和失范一样,个体的政治异化也是被强加的;快乐完整的资产阶级对比画面出现了。这项研究导致了一个结论,即政治异化只是个体的症候,而与政治体系无关。^①

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评论,其中包含有趣和恰当的程序化的特征——政治异化应该在社会系统中研究,应该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考虑改变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而不是将异化现象局限在个人。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假设。

首先,让我们确定初始概念和问题范畴。当我们说“政治异化”,我们想说的是人们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表现形式——机构的运行,意识形态的发展,等等——相异化。因此,我们认为的是关乎其政治问题的感情、态度(对行动的准备)以及个体的行为被异化了。举个例子,某个政党或某个人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就会传播一种价值观,给这个社会政治体系带来稳定,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人没有为相似目的参与斗争,他们不关心斗争的结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们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游戏”。但我们也谈论一些人,对这些人而言,这些政治问题被“异化”只是因为反对体系,他们想要推翻体系,从而实现完全不同的政治目标。至于参与政治的人群与给定的政治相异化正是该原因在作祟。一个想要通过武装斗争废除

^① Arthur Fischer, *Die Entfremd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heilen Gesellschaft*, Munich, p. 82.

主流体系的革命者,通常与努力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策略格格不入,因为他感到无法与之共同奋斗,只好选择拒绝加入其中。

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种与社会相关的自我异化的特殊类型。政治上被异化的人在于其被社会所异化,当然,这种异化适合某种社会生活。然而,从政治意义上讲(国内和国外),这是非常重要的表现,与此同时,又是严格制度化的表现,即,与诸如国家机器及其机关、引导政治生活的制度(例如议会)、政党等体制相关联。异化感和相应的行为,包括对统治机构的革命斗争,总是能通过具体方式进行引导。然而,政治异化通常不只是一种源于社会的异化的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异化,即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表现不可分离。

173

一方面,上面提及的异化的二元形式在分析问题中有着重要意义。根据默顿的类型学,一旦现有的社会结构不允许行动的社会接受性目标得以实现,并且个人已将价值及行为(逃避现实)的主导体系内化于自身,以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且与之脱离为形式的个体的政治异化,就同个体适应性的第三种形式相呼应。另一方面,当个人反对主流的价值观体系以及规范时,一种以反叛为表现形式的个人的政治异化就会出现,这与默顿的第四种适应形式相一致,即反叛。

美国理论家们在研究逃避现实主义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这绝不是社会最重要的形式,而是在沉默中传递一种反叛,这在美国各种社会团体中广泛传播。这一事实,正如菲舍尔强调的那样,毫无疑问的是与他们迷信地对待系统稳定性相联系的,而且比起将相关数据简单地计算,他们更缺乏能力进行相关的分析。

因此,我们要应对两种个体政治异化的形式——一种是对普遍的政治问题的“逃避”,另一种是以否认给定的政治生活形式且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为内容的反叛。但是,这并不是拒绝政治本身,而是有意识地参与不同的政治,需求的实现粉碎了现有的结构。这种“粉碎”有两种形式:第一,激进的形式,当目标是通过不同的体系替代现有的文化结构(价值系统)和社会结构(行为规范系统),即当以革

174 命为目标时,其目的是对现存体系的变革。第二,温和的形式,是指当目标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大体上保留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例如,需要“强大政府”,反对社会混乱,但并不以毁灭现有制度为目标,而是加强现有的规则)。重要的不仅是“逃避”的异化和“反叛”的异化之间的区分,更是在现存体系的框架内,颠覆一个系统的“反叛”与改变政府形式的“反叛”之间的区别。为后一种趋势所表征的是与之息息相关的现有政治生活形式和机构的异化,虽然他们的政治计划的内容是保守的,并且是公开的保守派。就把异化理论应用到实际当中,特别是就非异化和防止异化而言,至关重要的莫过于不能忽视这一由政治异化人群所构成的团体意义及其活动。该人群可能会扮演一个重要的反革命的角色,他们联合身边那些虽然对现状不满意但无意通过革命的方式以拒绝现有价值观系统和规范,反而意欲加强这些价值观和规范的人。这是所有类型的法西斯运动及反革命的后备军。

因此,在政治异化的领域中最有趣的是——事实上最重要的是——问题并不是政治“逃避主义”,而是那些引发当前政治生活现状出现异化的趋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两种异化形式的出现,大多时候彼此不会严格区分,即不会采取纯粹的形式出现。这让他们的研究仍存在诸多困境。政治异化的外在表现,它的一些形式在实证研究中特别受欢迎,且后者被冠以两种特性(例如,对外力或个体行为失去意义时候的无助感)。在研究中,拒绝对这些形式做出区分仍然是其中的不足之处。

175 让我们从参与政治生活的问题开始谈起,其中特别受人们关注的政治选举问题,是实证研究最受欢迎的话题。除了考察“选举冷漠”,还有其他众多可能性。毕竟,具有明确的政治规划的政党或政治社会组织的成员存在着问题;这是政治领域中最具活力的指数。其次,对社会政治机构职能的参与,它们建立在自愿原则之上,但受制于既定的国家机关条令(例如,市政委员会或类似的地方行政机构)。之后是参与竞选活动,在竞选活动中,国家或地方机构本身支持其中的一个

政党。并进而支持一种隶属于政党纲领的意识形态(从积极参与传播这种意识形态角度,形式可能是多样的,团体或个人以集体的感觉,抑或是与其影响力做斗争的形式对其进行掌握)。最终,读某种政治倾向的报刊,或者,参与更高层次的活动,参与宣传,售卖著作,等。这些只是例子,但是在不同的组合群体中,这些相似的现象,组成了个体参与社会或者政治上的异化的全景,这可以用适度的规模予以展现。

政治异化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政治生活的表现是个体的“异化”,即如果一个人失去参与政治生活或团体的感觉,那么他当然可以给出一个如此做的个体动机的借口,对他自己和一般人来说,当对自身无法干预的事件(谁会当选毫无意义,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既然无法影响整个事件,根本不值得参与政党或者其他政治机构,等等)产生无力感(“无能为力”)之后,问题是否会以某种方式确定,是毫无意义的(西曼的五个元素列表中的“无意义”)。这些个人异化的感觉的因素确实出现了并发挥着作用;错误在于将它们视为分离的元素且未使之综合,况且更进一步的分析也止于此。个体在面对事件时,着实会产生诸如无能为力以及任何行动均无意义等感觉。但为什么个体会这样看待这个状况?是由于它看起来就是如此,抑或个人的政治活动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没有丝毫意义?当然,如果一个人认为某一系统的关系是不可侵犯的,那这就是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因此,任何相信这一点的人终将成为沮丧的“逃避者”,同时,在另一方面,革命并未气馁,而是努力有意识地朝着废除限制个体自由系统的方向发展。

当然,以上所述均与这样的社会有关,在其中个体至少在一定限制之内,有选择自己行为方式的自由:诸如成为某些党派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成员,参与或不参与选举,选择一个党派或另一个党派,抑或当他参与选举时,成为一个或另一个候选人,等等。如果不满足此条件,通常在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系统中会不满足此条件,那么将不会有上述所讲的行为。一个人隶属一个组织,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

(如隶属工会),他这样决定并表达任何东西,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当在一党制系统中的党派成员提供各种类型的特权和利益时,那么无法区分那些人想要成为这个党派一员是为了获得这些特权和利益还是他们的初衷包含着积极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元素。当选民参与率接近 100%,那就确实存在强迫参加选举的事情,随后大量的成功表示至少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并没有失败。但从政治异化的观点来看,尽管缺乏正常的量化指标,此类事情并非不重要。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这都是增加政治上的异化以及政治冷漠最好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对所有选举的过程的影响(他不得不投票,并且不仅如此,他甚至以不进投票间的“张扬的”方式,来强调他对所有制度改变的狂热支持),那么这样的选举对他有什么意义?只是残酷地说明他是无助的,他的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剩下的只有自我异化。这个问题有点夸张,但我相信这场闹剧的组织者并没有意识到后果。从经常谈及的激发社会主动性的角度说,例如,达到 52% 的“赞成”选票就是一个胜利,而作为政治影响的结果,在预先就已经确定选举“成功”的条件下获得 98.5% 的赞成票则是沉重的心理上的失败。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于没有被强迫的相对多数人,他们并不会投 100% 的“赞成”票,他们会给奄奄一息的机构增添一丝生机。那种降低到每一种运动都要请求上级批准的水平上的“自豪感”,不仅是“上面”情结的产物,也是完全无视心理学以及缺乏认知的结果,那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主动权被扼杀,人为地导致政治异化,这毫无疑问是一些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我大胆断言,尽管存在着为了有意展示而组织起来的大众的政治“热情”和表象,但是,正是在这些把各种决定自上而下地强加给人们的体制中,政治异化(例如冷漠甚至政治愤世嫉俗)打破了系统中的所有记录,加剧了人们的无助感和使得他们做出无意义的行为。从表面上很难掌握这一点,无法进行适当的研究(不只是因为缺乏有关部门许可,而且还有恐惧和疑心)。但对愿意观察和倾听的人来说,真相显而易见,对大事的不关心,公共财产的盗窃、破坏事情越来越

多,对公共设施的无想法,劳动生产率降低,酗酒,最重要的是,所谓的青年人去意识形态化只是掩盖现实负面思想的手段。异化现象不是单一地出现而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特别与政治异化有关系,政治异化直指所谓的公民的态度的核心。

这就提出了问题——什么途径可以消除这一领域的异化,并且这对于社会生活如此重要? 答案十分简单——唯一有效的途径是改变产生这种消极动机,并且导致异化的社会关系。其他的一切只能治标,因为对人们的欺骗,即通过聪明的宣传来操纵他们,从长远来看也是无效的。政治异化的根源在于坚信政治是“肮脏的游戏”,因为本应该代表社会利益的人是腐败的,他们只对个人优势感兴趣或者与犯罪有关,甚至得到犯罪界支持——这在现今的国家是存在的。如果想克服政治异化和从政治上激励那些了解问题的社会的成员,只有废除导致异化的关系。一个政党想要宣告对这恶势力的斗争,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它为目标认真努力,那就很容易聚集“被异化”群众参与斗争。政治异化被掩盖了,人被教导认为他人会为他们做决定,他们除了举手“赞成”不用做任何事,而且还鼓励他们这样做。只有当这些不正常的条件改变,并赋予人真正的主动权和责任感,让他们真正决定事项,这种被掩盖的政治异化才可以克服。必须教导他们要有勇气和做决定的责任,必须允许公民组织发展,在其中每一个公民觉得有合适的个人动机,每个公民可以积极参与,不用理会党和国家的“关怀”。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宣传本身,“意识形态教育”本身,即话语本身,在不改变恶势力相互间的关系时,并不能消除政治异化。相反,它会进一步加深政治异化,并且它会再一次表明对心理学的无知和不了解它的含义会带来多大的坏处。当话语明显与现实不一致,这些词还含有意识形态的内容,那么,从长远来看,它是将会迸发胜利的意识,而否认现实,伪造现实的意识形态就会失去所有的价值。结果将是,在根本上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异化会变得更加严重。

(二) 文化异化

从一个特殊的观点来看,政治异化是指个人与社会相异化;他拒绝行为规范中的某些价值观隐喻,那些有关机构和社会政治行为的规范的行为规范。这可能假定反对现有体制和政治价值观的革命斗争中“逃避”冷漠的形式或反叛的形式,目的是为了进行激进的社会转型。但除了这一点,个人仍处于社会之中,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他仍可以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但个人的异化可以进一步发展,超过界限,拒绝整个现有的规范价值体系,即用默顿的话来说,拒绝社会现有的整个文化结构。

这是可能的吗?一个人会拒绝他所处的社会的全部个体模式吗?答案是可能的,虽然可以质疑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来自个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假设。例如,当个人和团体不仅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而且或多或少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就是如此。¹⁷⁹拒绝整个文化结构必将导致无序,相应的情感和主观态度(个人或团体)通常反映出涂尔干提到的客观失范,这是从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的崩溃以及无法适应整体的社会结构的意义上而言的。

很明显,反对有着标准价值观系统的整个文化结构绝不像那些反对它的人那么激进。没有人,可以把自己从压力、陈词滥调以及社会通过教育传递给孩子的价值观中完全解放出来,即使是最尖锐的在道德上反对现有的社会罪恶的人也不能,通过既定的语言不仅是概念上有联系的,不仅是世界上的特殊发音,而且通过相应现象和情感上的刻板印象来释放自己。因此,口头上反对所有现实的声音越响亮和越极端,可以感受到那些希望通过大声呼喊以将自己内心的反抗击败的人们心理怀疑就越大。这样,对全部社会生活加以拒斥的人强调的是他们的想法和行动,而非革命性改变存在的体系,但是会让观察者最震惊的是,他是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当然,并非总是说,无

论他们的焦点是谋杀,是性道德禁忌的违反,是无视传统服饰的行为,又或者是拒绝任何权威和纪律(同时说明自己所处的周遭这方面最严重的程度),等等,这些“极端分子”都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沮丧、心理压力和人格焦虑的牺牲品。尽管罕见,但是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即我们关心的问题十分严肃——是某种社会政治异化的激进形式。然而,这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它是社会生活中异化日益严重的信号。

兴盛一时的性习俗的消解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当一个社会走向衰落而新的社会尚未建立时,性混乱的趋势伴随着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瓦解。例如,放荡的罗马帝国时期奴隶制解体出现了纵欲的现象,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以及法国封建制度衰落时贵族统治期间,出现在黑死病和瘟疫蔓延的中世纪欧洲,那时完全普遍的失范在严格控制人们生活的社会中形成了性混乱现象。其他的例子有:在战争时期,军队不再受传统习俗的束缚,他们会在所征服领土上强奸妇女,甚至有天主教信仰的士兵也会凌辱修女(有史实记载)。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生活的这一方面?出于对社会共存的理解,社会禁忌在此时表现出特别的力量。因此,违反性禁忌是失范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迹象。因此,当代的“性革命”,包括过分旨在成为“留下深刻印象的资产阶级”,甚至更真实地,尽管经常是对新型家庭失败的拷问,组成文化异化的表现,应当引起关注。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家庭异化的背景下,回归这个问题。尽管冲击的力量较小,类似的范畴关注奢侈的装束和外表,但这些从现有的规范中产生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抛弃传统认可的外表可能是一个异化现象的外在表现,因为这一点人人都可以看得到。

180

另一种文化异化的形式是“躲进”遗忘——酗酒和毒品。这不是叛逆,而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逃离使他们受煎熬的问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默顿称之为逃避主义(逃避客观接受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之间的冲突,同时个体未准备好拒绝文化结构或社会结

构)。这种形式的异化中,意识和良知的“麻痹”(lulling)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方式。酒精和毒品都能“治愈”这种疾病,但不幸的是它们最终杀死了病人。考虑到这种疾病的社会性质,不论在西方和东方,如果要摆脱疾病的前提和条件,即如果想找到它的社会根源,认识它的根源,意识到这是异化的事实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消除异化。

文化异化现象适用于任何人的所做和所想的事情。它包含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从大量问题中,我们选择上述讨论的那些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社会上体现得很明显,并且能够引起公众注意,能够让人们面对面地谈论异化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在此处理的问题——除了酗酒和毒品问题——是文化异化现象“好的”(benevolent)临床表现。犯罪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那绝不是拒绝一个价值体系,像拒绝人的社会行为的标准体系那样。这种现象的特殊社会害处使得把它与其他的异化形式分离开来是必要的。

(三)作为一种异化现象的犯罪

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与上述所提到的文化异化紧密相关。

当然,如果把犯罪问题简化为异化问题是十分幼稚的。从弗洛姆定义的社会性格层面上讲,其他一系列因素,如从促使人偷盗甚至谋杀的贫穷和饥饿到性格的细微问题也能列入其中。但主体异化现象也可列入其中,主体异化现象可以拓宽社会生活的一些消极表现的规模,对它们的废除正是扬弃异化的目标。

犯罪的概念是指违反一些社会共同生存的准则。因此,尽管犯罪并不一定必须与完全违反社会内在化价值相关,但犯罪总是意味着拒绝社会所接受的行为规范。当犯人违反这些价值观念(例如,诚实、对他人生命的尊重)的时候,他们可能接受现存的价值观念体系(他的动力通常源于此,如把财富当作首要价值),服从于自己的行为准则,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根据默顿的类型学,当冲突发生在文化结构(人的行

为设计目标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决定何种准则和行为是社会可接受的规范系统)之间时,这是人的行为失范适应第一类型的一个典型例子。超越人的意识的所有其他因素,包括与被许可的行为相关的社会责任规范,可能是一个犯罪行为动机——例如渴望自己变得富有,妒忌对手,等等。这是出现在“理性的”犯罪的,与人的相互之间关系的某些领域相关的异化的阐述,也就是目标的潜意识,例如一个贼、流氓或者“被雇佣的”谋杀犯等等。这些人并没有完全与社会内在价值系统异化这一事实表现在,他们尊重这些价值和准则,他们通常是好爸爸,有时是宗教信仰者,无论如何,都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些在他们亚文化世界必须遵守的准则和价值。即使最后一个事实——这种环境下特定亚文化群的存在——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文化异化只是局部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是相对的。

182

青少年犯罪的现象更为复杂。我在这里使用“青少年”犯罪术语的狭义含义。我并不关心年轻人的所有犯罪行为(例如,当一群小偷或匪徒中包括一个或多个年轻人),只关心那些与青少年亚文化有关的犯罪。界限在这里并不是清晰的,但重要的是犯罪不是纯粹的“理性”动机(例如,一群偷车贼偷汽车为了向海外出售),而是在其他动机的影响下,或者至少,还有其他的动机的影响下(例如,当一群年轻的偷车贼偷车去兜风,去比赛,摧毁了汽车,等等)发生的。以这种方式不可能区分一群年轻的强奸犯的动机和类似的一群成年人的动机,但是,抛开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差别确实起作用了,并且使得区分出现在两个实例中的异化形式成为不可能。它们与一种特定的亚文化相关,如果与“成人”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相关的异化在这里决定把这些行为包含在“异化”范畴之中,那么我们不只拒绝一种特定文化,而更根本的是,要拒绝与这些规范相关的行为。

……问题青年亚文化不只是一组规则,而是一种生活设计,它不同于或是无关于,甚至冲突于“可敬的”成人社会准则。这些准则限定的“负极性”似乎是合理的。那就是,犯罪

亚文化从更大的文化当中获得准则,但却把这些准则颠倒过来。根据亚文化群标准,过失行为是正确的。根据更广文化的标准,过失行为是错误的。^①

183 正是因为这是问题的答案,在这个例子中,有效的扬弃异化路径也是相同的——有必要消除组成这些亚文化群的社会关系。大概思路是清晰的,在这个例子中,当我们希望决定什么社会关系应该被废除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不能达到目标。毕竟,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即使社会制度剧变,消除私有财产,以个人的方式消除消费者社会,克服破坏传统家庭的代际冲突,等等,都并不能消除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还是如此。另一方面,如马卡连柯所倡导的那种人格的出现,以及他在《教育诗》中描述的影响方法,也没有消除后革命时期的混乱情形,如痛苦、饥荒、孤儿和被忽视的孩子等。社会变革的出现在这个例子中也没有产生决定性作用,这样的“奇迹创造者”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他们没有马卡连柯的文学天赋,也并没有留下像《教育诗》一样的作品,这种作品使马卡连柯获得荣誉,留在了人们记忆中。例如,这有一个波兰的利谢斯基(Lisiecki)“祖父”的例子,利谢斯基是“流浪儿童之家”的创立者,最初是部分地通过罗兹的报童的捐赠,流浪儿童之家得以维持。这些儿童之家的亚文化是呼吁收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同时公平对待这些入住的人。进入小屋,必须把小刀留下,通过工作来偿还住宿花费是道义上的责任。新会员亲吻利谢斯基的两个脸颊,称他为“祖父”,这是他从年轻时就一直在扮演的角色。在世界上,如果有,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祖父”——通常是凭直觉——把他们优秀的知识,不仅是实践的教育学的知识,而且是理论的知识,用于一般的青少年的环境中,并且在特殊的青少年罪犯(或者倾向于成为罪犯的青少年)的环境中扬弃异化。

^① Albert K. Cohen, *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the Gang*, New York, 1955, p. 28. 作者也提及了 Frederick M. Thrasher 的作品, *The Gang*, Chicago, 1936, pp. 94-95.

三、个体与其“自我”、自己的生命和自己行动相关的异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个体对社会制度以及他人层面的异化层面论述了自我异化。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孤独者”,这里所说的孤独者,并不只是文学层面上所说的那些独来独往者,这些孤独者在社会中感到与他人相异,他们害怕与他人联系,有时甚至过度厌恶他人,更有甚者,甚至犯罪。这些看法总是以社会为条件,但通常在特定的心理生理基础上发展。这些人的社会化,恢复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也是扬弃异化斗争的重要性的意义所在。

184

但是自我异化也达到了个人“自我”的更深的程度,他自己的形象看起来似乎来自外部,他似乎是一个旁观者在看一个物体。文学中的异化,黑塞的“荒原狼”,或者加缪小说中的“局外人”,都不仅与社会和他人疏远,而且与自己、与他们自己的人 and 他们的“自我”疏远。只有自我异化到达了最低点才能触到他们的底线,这个问题的社会重要性显而易见,必须从哲学社会角度来分析异化问题,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一) 与自我意识有关的异化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当谈到与个人“自我”相关的个人异化时,我们关心的是什么。“自我”与个体自身是相同的,那就意味着,每一个正常人都能够通过生理或心理体验直接感受,与自我认同,并区分于他人或环境。与“自我”相关的异化在什么情形中发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人把自己的自我当作相异的东西,当作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不能鉴别的客体。但是这可能吗?一个人不能识别他的“自我”,自己的外表和自身?归根结底,“自我”的概念假定和意味着自我异化。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这样做。

185 首先,失去自我认同感出现在特定的心理疾病中,当一个人没有失去自我意识,但是经受精神分裂症病痛的折磨,他不能清楚认定自己的“自我”。在一种更温和的形式中,它不是疾病,而是一个在“与自己的冲突”中的不同态度和趋势。(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我的身体中住着两个灵魂。”)

其次,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对比个人所具有的模式时,也就是与他想要成为什么,他想要在表面上看起来像什么进行对比时,我们能感受到“自我”的异化。他在现实中是什么,令他不满意,相反,产生强烈的自我批评。一个具有艺术天赋、科学天赋或其他天赋及志向的人,由于生活中的地位,被强迫做他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有时甚至令他感到羞辱。一个人,因为恐惧,背叛了他的理想,憎恨那些强迫他这样做的人,但同时也因为自己屈服了而鄙视自己。一个人高度重视某些才能和活动,但自己却并不具有这些才能(科学或艺术的)时,意识到他在这个领域的成绩很少;这个人通过教育把特定的价值规范内化,但是并不能履行这些规范,因为他放任自己的激情。概括来说,一个意识到他所接受的个体的模式与现实(在实际的可能性和行为意义上的现实)之间的分歧,甚至是冲突的个体,可能感到——在大多数情形中的确感到——远离自己,或者是不喜欢(在极端的情形中是蔑视)自己。当我们在这个例子中谈论与某人“自我”相关的“异化”时,我们意识中已经有概念的组合或者可能性;不满某人的实际境遇,感觉在履行自己的意图和期望方面是一种失败;对自己的努力与内化的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不满;等等。

再次,当个体把自己投身市场关系中,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自己的特定特质,能力和行为是异化的,是商品或是物品。马克思写了关于这种现象的文章,弗洛姆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问题的这个方面——当一个人成为商品时的个人异化。个体有特定的才能,艺术才能,科学才能,组织才能,等等。因此,他希望成为作曲家、画家、哲学家、经理人等等,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希望获得公众掌声,更多的是从

自己的活动中谋生,并把这项技能变成自己的职业。因此他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是必须努力为自己的行为和可能的成果找到客户。因此,他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创作,以便获得评论家和公众的支持。绘画,哲学写作,经营一家企业等也是如此。今天作一首前卫的音乐,画一幅无代表性的画仍是必要的。否则“市场”将抛弃这些“商品”。创造者屈服于“潮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只是“跟随潮流”,其他时候,讽刺的是,他为“市场”工作。但是这种情况下,个体总是向市场需求低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市场和市场需求生产,结果开始把自己的才能、行为和生产看作商品。通常情况下,个体开始承担市场角色,即这样一个所需要的角色;他开始这样做,好像他是市场命令下的社会角色的结合,他所展现的不是他实际上的样子,而是别人想要看到的样子。否则,他将找不到工作,也没有订单,也不会获得掌声、成功和晋升。人们学会了角色扮演的游戏,最终,这成了一种自动的功能。个体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认为这是外在的他自身的“剧院”。他的“自我”参与到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社会大舞台的戏剧或喜剧当中——如弗洛姆所称,这开始成了一件异己的事情,为了生存,他必须接受,但是他并不喜欢,甚至有时感到羞耻。这就是为什么当市场导向条件的废除使克服痛苦自我意识认同成为可能时,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提到“无人性”的人和“人回归自己”。

因此,这种与人的“自我”相关的异化或者以个人失去对自己的认同感的形式出现,即把自己作为观察和评价的对象,处于他自我意识之外;或者是它采取个人形式,同时保留自我意识认同,消极地评价自己的行为 and 可能性,有区别地参考一些他赞同的个人模式,或者最终,把自己的能力和行为当作事物——受市场和商品经济法规影响的商品。

因此,在已经明白了“与自我意识相关的个体异化”这个短语的合理含义后,在开始分析相应的社会现象之前,我们现在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这种自我意识异化的出现与什么有关?异化在两种形式

187 中总是伴随着一些事物出现,为了能够谈论异化,一个相应的参照系统必须存在——从什么当中异化?具体地说,从人的“自我”中异化,参照系统正是“自我”。麻烦在于我们总是有“自我”,伴随着相应的意识的认同——除了精神异常的情况。精神异常情况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应该被分开对待。但当我们说异化时,当个人认为某物异化,是一件东西,是一个商品等,正是这个自我意识。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个体疏远的是什么?即感觉与“自我”疏远的某物是什么?逻辑的混乱和明显的悖论来自于自我这个词在这里有两种含义,这两种含义是在两种语义层面上的,一种是作为异化的“自我”,另一种是异化的自我疏远的“自我”。因此,人们假设实际上存在两个自我,一个是异化的自我,一个是真实的、未被异化的“自我”。这里以一种缩写形式,好像我们的“自我”分开了,独立于我们,从而导致与自我相关的异化概念的出现,但同时可以认为,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概念,我们会陷入奇怪的形而上学当中。没有“自我”与基于他的体验而进行自我认同的个体意识相分离。“自我”认同的意识可能包含不同异化的特点,但是——尽管谈论异化问题的模式,由于采取叠加的形式而复杂难懂——出现在这里的不是来自于我们“自我”的异化,相反,我们“自我”的异化来自别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种可能。首先,最直接的答案是如果我们的“自我”异化了,我们感知到了,那么必须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我”隐藏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与之相对,我们称之为表面上的“自我”,一种被用于日常使用之中的“自我”。以这种方式表述,这一观点呈现得并不充分,但是当我们说到人的“本质”(essence)和“人性”(human nature)的时候,正是用非常哲学的措辞来表达思想。如果我们在区分人和动物的基本特征的意义排除“人性”这个短语的平庸意义,那么,“人的本质”和“人性”在意义上是相同的。“人性”可以看作是一个本质复杂的,历史地不可改变的品质集合。尤其对于现代人(Homo sapiens)来说,区别于动物世界,同时组成所有“自我”的异化意识的参照

系统可能有双重来源。或者是上帝的礼物,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给了人完美的灵魂,因此,真正的,未异化的“自我”是人的精神财产,或者是大自然的礼物。通过物种进化,大自然的礼物使现代人进入一种拥有恒久不变品质的状态。在接受这两种假设其中之一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测量杆来测量人们“自我”的真实性,从而可以解决在异化参照系统下的所有问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幸的是,人们不能接受这两种假设中的任何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第一个假设的原因是,第一个假设像宗教信仰一样是无法核实的观点,在科学思想的框架下,是毫无地位可言的。我们不能接受第二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违背科学。现代分子生物学提到外部影响是不可能改变遗传密码的,现代分子生物学认为遗传密码在所有人当中都是相同的,或者在突变基础上遗传密码是不改变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遗传密码决定文化价值观。(相反,这一领域一些出色的工人,例如,雅各布认为在现代人的发展过程中,有第二种密码,一种历史限定的文化密码,决定谁在基因上是重叠的。)因此,有关测量“自我”异化的测量杆的简易观点可归结为幻想的范围。短语“人性”继续被一些严肃的学者所用,这既不是生动的比喻,也不是一些有关生命特性和心理功能的某种不变的,超越历史复杂联系的平庸断言,最终,是对形而上学哲学的被征服的敬畏。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死胡同。

因此,我们只剩下第二种答案,在我看来,这是唯一合理的答案。“自我”是异化的或者是一种不正确的但却广泛传播的说法,说到“与人的自我有关的异化”的参照系统,是历史地形成的,并通过社会内在化的人格的理想模式。除了极端混乱的阶段,每一个社会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同时也拥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和性格特点,创造自己的行为模式。因此,我们是依据社会的和个人的

人格模式来衡量“自我”的,即这种“自我”的特定模式。这些模式完全不一致,但是能确定一个特定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在自身和社会层面上与这个模式相异化。异化程度通过所接

受的模式同真正的事态的偏离程度来加以衡量。很显然,异化的社会感不需要与主体的个人感觉相吻合。一个雇佣杀人犯从社会角度讲是极端异化(也与“自我”相关,这是社会理念模式的反映),从他个人感觉来说,他可能认为一切正常,他完全符合硬汉的形象,而硬汉正是他的理想模型。

我们必须特别关注这些模式,包括社会的和个人的模式的历史特征。举一个国外的例子,战利品掠夺者社会的人格模式。这个社会的人如果剥掉被打败的对手的带发头皮会忍受当代社会成员的道德顾忌,将是完全异化的,甚至在他自己的感受中也是如此;在今天的社会中喜欢剥掉被他击败的对手的带发头皮的人完全会被视为一个疯子。我们着重强调一下,在这里关键的不仅是与社会制度有关的异化,更是与“自我”有关的异化。在两种社会当中,“异端分子”,也就是在战利品掠夺者社会中不想剥掉对手带皮头发的人和在我们的社会中想要这么做的人,都会在意识到他们与自己的“自我”的异化关系的背景中经历各种情感和挫折,因为在两个例子当中,他们内在化的个性模式,都无法轻易地或者不受惩罚地加以拒绝,因而都强迫他们把与他们事实上所做的事情相对立的一面视作正常的。这是一个一般问题:尽管与社会存在基础相关的道德准则的某些因素具有超越历史的特点,但是不存在一个超越历史的人格模式。因此,人格异化的问题以历史为条件,并且随着历史不断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考虑,与社会塑造人格模式有关的异化问题和丧失自我意识认同感意义上的自我异化,二者之间存在一个与精神疾病有关的连接吗?

190 让我们回到丧失自我认同感的问题上来;上面提到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与精神正常的人的“自我”有关的异化。确实如此,但是这一领域的疾病症状给这个问题增加了新的思路;在罹患丧失自己的自我的疾病期间的体验,毕竟只被我们视作这类一般现象的一个极端案例。

安东尼·戈宾斯基(Antoni Kępiński)^①,一位著有一系列有关精神疾病的优秀著作的作者,他提出了一个饱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病人失去自我意识过程的问题。根据布洛伊勒(Bleuler)^②的经典解释,有心理障碍的这个群体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孤独症/自我中心主义(与外部世界分离,生活在远离现实的自己世界中)和心理功能瓦解。随着疾病的发展,病人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变少。他使自己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即没有完全处于“自我”中。病人经常不做或者感觉不到他想要做什么,或者他的感受是什么,但是却有被强迫去做某事的感觉,好像别人在做,而不是他自己在做这件事。他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同。生命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体验,他逐渐丧失了闵可夫斯基(Minkowski)^③所说的“居住感”。^④这种自我异化的感觉导致丧失“自我”,随着疾病加剧,病人无法做决定,意志的行为是“自我”的检验。当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他丧失了“自我”,不再是自己。身份感取决于“自我”,人身上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周围的世界是变化的,有时根本无法认出这是同一个人……然而他确实是那个人。^⑤

病人之后经历失去意志力,因此,遭受“自我”失调(人格解体,丧失人的自我现实感;现实解体,丧失周围世界的真实存在感)，“自我”的改变,统一的自我意识分裂成碎片,最终,形成了精神分裂症,“自我”的完全瓦解。身份感是否依靠“自我”还不确定——如戈宾斯基所认为的——或者相反,“自我”的感觉与“非自我”相反,这是关于个体发展中的身份认同和关于环绕着他的世界中的变化的一种感觉功能。不管怎样,不可能质疑这样的命题,即“精神疾病可以说是与自己

① 安东尼·戈宾斯基,(Antoni Kępiński,1918—1972),波兰著名的心理医生,曾被德国法西斯关押,后逃亡到西方,先后在西班牙和英国继续他的医学研究。——译者注

② 保尔·厄根·布洛伊勒(Paul Eugen Bleuler,1857—1939),著名瑞士精神病学家,其《精神病学教材》(1924)是精神病学的范本之一,曾多次再版。——译者注

③ 鲁道夫·闵可夫斯基(Rudolph Minkowski,1895—1976),美籍德裔天文学家。——译者注

④ Antoni Kępiński, *Schizophrenia* Warsaw,1972,p. 182.

⑤ Antoni Kępiński, *Schizophrenia* Warsaw,1972,p. 194.

的异化”，至少在各种解释中可以这样认为。^①

191 弗雷德里克·维斯(Frederick A. Weiss)认为,异化不仅仅是精神分裂症和神经官能症^②,而是心理疾病的一种现代形式。从卡伦·霍尼(Karen Horney)的基础著作《神经症与人性的成长》来看^③,维斯引用了如下关于“自我”异化的句子,这依赖于“……神经偏离于他的自我感觉、愿望、信仰和精力。失去了成为自己生命的一个积极的、决定的力量的感觉。他丧失了感觉自我作为一个有机体整体……一种真正自我的异化感”。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对此不一定要有特定的医学知识,那么心理健康和疾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当中生病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些行为,在超出了正常界限后,被当作疾病对待。研究病人丧失“自我”的重要性变得十分清晰,尤其是研究这种疾病的根源和症状,不仅仅是在心理疾病领域。

卡伦·霍尼之后,维斯认为自我异化是神经衰弱症的结果。然而,这种从人的“自我”中撤离不仅是疾病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一种防御操作,一种从引起困难和痛苦的状态下的逃离。但是“健康人”总是用这种方式表现,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作者在这一基础上区分三种异化(在我们术语中的狭义含义中)——自我麻醉、自我淘汰和自我理想化。

(1) 异化可以阻止令人不安的自我意识。异化病人经常抱怨在迷雾下,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想要待在迷雾中。他十分喜欢自我麻醉。

(2) 顺从得像个机器人,异化使自己免受对自己和自己身份的承诺的负担和责任。自我淘汰。

① Antonia Wenkart, Regaining Identity Through Relatedness,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 227.

② Frederick A. Weiss, Self-alienation: Dynamics and Therap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 207.

③ 参见 Karen Horney, *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New York, 1950, 第六章。

(3) 异化在其最活跃的形式中,拒绝成为自己,试图成为别人,理想的自己。意味着通过**自我理想化**逃离讨厌的自己。^①

最后一个例子当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种与“自我”异化表现相关的疾病类型,作为参照系统,特定时候的人格模式,或者社会上可接受的理想的“自我”。(在这里关系与镜子中的相反,如果病人假定这种理想的“自我”,逃离他自己的“自我”,一个健康人的异化在于他“生活在”他真正的“自我”之中,尽管在极端情况下,别人会认为这种异化与类型有关,即理想的“自我”。)但在其他两个例子中,疾病类型和正常人的异化行为是一致的。维斯经常参考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中的分析。

192

这是克尔凯郭尔在“逃离自身”中所描述的,与上述所提到的自我异化疾病形式紧密相关。“通过转移,或其他方式,如以工作或忙碌作为分心手段,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情况不被注意,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对他来说,为了不被注意,他做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没有变得清晰。”^②

这是对这个问题的非常简洁的描述。有多少正常人在生命中,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把注意力从那些令他苦恼和担心的问题中转移出来。每一根因焦虑而点着(通常是立即熄灭)的烟或者是想要喝的酒,都是这一现象的表现。当我们的私人世界轰然倒塌,当人们正在遭受战争的饥饿,或者正在遭受死亡痛苦的亲爱的人的身旁,我们却无能为力,还要激情地进行学术工作,也是这种情况。[这是一个人的记录,这是我的博士论文怎样在战争期间写成的,

^① Frederick A. Weiss, *Self-alienation: Dynamics and Therap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 210.

^② Frederick A. Weiss, *Self-alienation: Dynamics and Therap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 211.

以及现在的这本著作如何成书的。但是贝特汉姆(Bruno Bettelheim)^①在集中营时通过这种方式为他的作品收集资料,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因此,“生病”和“正常状态”的界限是不固定的,一个病人为了混日子,只是继续着所谓的正常人适用的操作,大部分是无意识的。

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另一幅自我异化的图景也是非常杰出的。再一次,正常人和有自我异化(根据我们的术语,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个词)症状的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

通过变得聪明,知道了世界的事情是怎样的,这个人忘记了他自己……他发现成为自己太危险了,而成为别人要容易和安全得多,于是他成了人群中的一个模仿者、一个数字、一个密码。这种绝望不容易在世界中被察觉。这类人通过这种方式丧失自己,在调节过程中,获得完美。^②

193 一个病人模仿一个机器人(如贝特汉姆在《乔伊:一个机器男孩》中描绘的惊人例子)^③,但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为了不被看见,为了让自己消失在人群中,通常“调节自己”适应环境。有时候环境使人们在放逐的威胁下,强制不与他人区分。“阳光的人”在学校通常不被班级的同学所喜欢。适应是接受关于穿着、外表上(如头发,化妆)的禁令。有一段时间(或许这种现象仍存在)剑桥大学的学生在社会放逐的威胁下,不能展现巨大的才能。人们受停顿说话方式的影响,开始结巴地问问题,以显示自己并不聪明。这种“训练”有时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一个人可以通过调节自己以适应恰当的体面的行为规范,而在实际上,并且可以用自己的一生来成为人们所要求他成为的人。

自我异化的第三种类型最激进,包括偏爱一种理想的“自我”而抛

① 贝特汉姆(Bruno Bettelheim, 1903—1990),美国心理学家,儿童自闭症经典研究的发起人。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译者注

② Frederick A. Weiss, Self-alienation: Dynamics and Therap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 211.

③ Bruno Bettelheim, Joey: A Mechanical Boy, in Eric and Mary Josephson. *Man Alone*, pp. 437-438.

弃其自己的“自我”。患者逃离“自我”而进入一种幻想状态。但是最终同样的现象在“正常”人当中出现了。当他们抛弃自己,寻求一切方式模仿偶像的时候,他们试图把自己变成偶像(在外表、打扮、行为上;因此电影当中宣传的一些偶像,特别是对年轻人具有危险的影响)。

这一领域有一个特定实例,人们忍受生理或者社会“耻辱”,精神上或生理上的“自我”感到耻辱,有时由于他们所必须经历的苦难而憎恨自己。由于他们是他们自己,想要成为另一个“自我”,那个能使他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自我”。一个毁容的外形、跛脚可能成为这种“耻辱”,但同时也是社会根源(国家、阶级等)、工作和社会地位等引起的歧视。“打上烙印”的人创立了一个特别的群体,不同于社会,尽管内部是统一的(例如,聋哑人或者是一个组成被迫害群体的少数全国集团,例如,黑人、犹太人,等等)。这引起了与社会相关的异化,同时与个人“自我”相关的异化,尤其是经过暴力过渡到一个“被污染”的群体,有人认为这个群体是异化的。这有一个陈述,许多相似却通常是悲剧中的一句,构成了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①著作的主题。有一个年轻人,他得了小儿麻痹症,疾病的后果是不能再用腿了,他讲道:

24年来,教育、演讲和家长的训练似乎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现在能为我做任何事情的人。我像每一个其他人一样——正常、喜欢争吵、快乐、充满了计划,突然间,某事发生了。发生事情之后,我成了一个陌生人。我对自己来说更加陌生胜过其他任何人。甚至我在梦中都不认识自己了。^②

出现在心理疾病的案例中,失去与人的自我相关的自我认同和疏离的分析报告,使人们对“正常人”的自我异化(这个词的狭义含义)

^① 尔文·戈夫曼(Ervin Goffman, 1922—1982),加拿大的社会学家和作家,其主要著作是出版于1959年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在该著作中,他首创戏剧透视法的符号互动论研究。——译者注

^② Ervin Goffman, *Stigma*, Harmondsworth, 1968, p. 48.

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的这一现象分析使我们明白了在正常人身上的雏形包括什么。甚至更多,因为认真的学生往往怀疑精神健康上的“疾病”和“正常”间的明确界限。弗洛姆甚至认为病人(神经官能症患者)有时比正常人更少异化,因为他们比“正常人”更多关注“自我”。正常人通过完全适应环境,因此使自己完全疏离了“自我”,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反对异化的自我防御形式。一个在社会背景下生病的人,只要个人关怀继续,他比“正常人”更健康。

如果我们区分正常和精神病这两个概念(一个表达社会需要的观点,另一个表达个人存在的目标——亚当·沙夫),我们将得出以下结论:一个就好好适应而言的健康人还不如一个从人类价值观角度来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健康。为了成为他所相信的或者所期望成为的人,通常情况下,他在牺牲自我的代价下,使自己很好地适应社会。所有的真正个性和自发性可能已经丢失。另一方面,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可以刻画为一个在自我战争中不愿屈服的个性。的确,他试图保持个体的自我并不成功,因而他通过神经症状,通过回到一种幻想生活寻求拯救。然而,从人的价值观的角度上看,他比那些和善的正常人健康些,那些人完全丧失了个性。^①

关于自我异化(从狭义上讲)和神经官能症(或者广泛地说,上文提到过的心理疾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弗洛姆在后来的一本著作中说神经官能症是异化的一种作用。^②“异化作为一种自身的疾病可被认为是现代人精神病理学的核心,甚至是在与精神病相比不那么极端的形式中。”^③根据弗洛姆的观点,任何的神经官能症都可认为是异化的结果,因为当一个人屈服于支配他整个人性的激情时(对权力、金钱

195

①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p. 139.

②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1962, pp. 52-53.

③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1962, p. 53.

和女人的渴望等),他变成了“自我”的奴隶。^①他行为的根源是努力克服内在的空虚和无力:“他(成年病人)是神经症患者,因为他是异化的。为了克服内在的空虚和无力,他选择了一个可以倾注他所有一切的载体:爱、智慧、勇气等等。通过屈服于这一物体,他感到与自己的品质紧密相连;他感受到了强大、智慧、勇气和安全感。”^②

我们从弗洛姆作品的最后一个引证介绍了自我异化问题的一个全新维度,后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个异化的人内心空虚的感觉。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关心与“人同‘自我’的异化”有关的事情,那么现在是时候提出新问题:如果我们不谈论一个明显的生病特点的现象,奇怪的异化现象源于哪里?在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关注人的异化来自他自己的生命,来自于当他失去了意义感,即当他看不到目标,看不到为什么而继续活下去的时候。这就是弗洛姆所称的空虚感,维克多·弗兰克尔称之为生存空虚,把这一理论与他的意义疗法合并。

(二) 与自己生命相关的个人异化—— 生存空虚

人能在与自己的生命的关系中异化吗?他能体验这种异化的感觉吗?

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地破译这一问题,但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因为在这群异化人中,不仅能找到存在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他们直接表达与生命有关的异化,也能找到那些表达感到生活空虚和存在无意义的人,为了逃避这种生活,他们酗酒、吸

^①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1962, pp. 56-57.

^②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1962, p. 52.

毒、滥交、流氓甚至犯罪等等。

196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说到与某人生命相关的异化时,意味着什么?现在看来这非常简单和平常——一个人没有看到他生命行为的意义,及其所作所为的实质,他感到被剥夺了价值,在他看来,一些东西远离了生命本来的样子。这种意义上异化的人绝不是被剥夺了价值系统,相反,他反对自己的生命,因为其与这些价值不符合。从人生命活动目标的意义上来说,生命意义的问题成了最突出的问题。

“生命的意义”真正意味着什么?在众多可能的解释当中,我们最感兴趣的解释是——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的目标。当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所从事的活动目的的时候,当我们内化这种目标的时候,生命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并没有一个清晰或内化的目标时,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乏味的。在这种意义上,生命的意义问题逃离了“魅力”和形而上学的秘密,成为一个健康合理的范畴,对此我们可以从每天的经验中得知。

一个不具备这种内在的目的的人,一个失去了生命意义的人,是一个异化的人。但是可能吗?任何人都能感觉到生命异化吗?他可以不用拥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吗?这难道不是出于势利,说服自己来做的?这难道不是把运筹学作为过多财富的幻想吗?当然这种人可以假装异化,或者是一种势利的表现。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也就是说与某人生命有关的异化,例如失去了生命意义、失去了生命的目标的感觉,这是一种出现在社会范围的现象,它并不仅限于特定的系统或社会阶层。在现存的社会制度当中有许多酗酒者、吸毒者、性变态和犯罪分子,盗贼、恶棍、流氓和少年犯,等等,出现在每一个今天存在的系统中,绝不是只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因为这种“令人欢快的”品行,在所谓的“低级”阶级当中,在社会上和心理上是完全可接受的。任何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这种状态的人,当他们承担社会角色时,都使自己不可能理解这种社会现象,如青少年犯罪、酗酒和毒瘾等等的根源。

维克多·弗兰克尔^①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任何认为自己生活无意义的人，不仅不快乐，还不适应生活。事实上，只有一个人能经历过一些事情时，他才能体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这不仅适用于个人经验，同时也适用于人类。”^②

关于生命的空虚感，失去生命的意义和他的特定异化的问题，哲学家长久以来就知道这些问题，也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来处理了很长时间。然而，这些问题周期性地引起注意，当在不同纪元的转折点时，当社会基础不均衡，价值观和标准系统被打乱——如涂尔干所说——即社会失范时。由于失范所带来的生命意义的丧失，或是反过来，丧失生命的意义引起失范，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这种现象同时出现，都在社会结构中有更加深远的变革作用，都组成了澄清这些变革的综合征的元素。这就解释了今天为什么“生命空虚”现象，不仅出现在诸如文学、哲学及社会学等研究中，它不过是我们这个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变化的时代的一种特殊的痛苦问题。这种现象出现在许多研究领域和许多与处理人的异化现象有关的作品当中，这种特定形式的异化已经发现了根源，并且启发式地出现在维克多·弗兰克尔的作品中，首先在“生存空虚”(existential vacuum)的概念中，这为他的意义疗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名理论家，同时也是一名精神病领域的实践治疗师。现在我们暂且不考虑意义疗法作为精神病治疗的一种特定方法，尽管它与“生存空虚”理论紧密相关。最初假设是失去生命的意义会导致不同的心理疾病，因此，在与这些疾病做斗争的时候，病人需要重新获得生命的价值，他在自身内必须形成自己的生命意义。毕

^① 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 M. D., Ph. D. 1905—1997)，是出生于奥地利的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言语疗法的奠基者，其治疗理论被称为维也纳第三精神治疗学派。他强调，人的主要动机是要理解生存的目的与意义，揭示自己生存的秘密。——译者注

^② Victor Frankl, *Der Wille zum Sinn. Ausgewählte Vorträge über Logotherapie*, Vienna, 1972, P. 34.

竟,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生存空虚”理论。

198 与人为自己创造的模式无关的生命中引起的挫折,和他所接受的价值观不同,导致不满足的人生感,失去生命意义的基础。如果没有原因,为什么生活,为什么挣扎?这是大部分现代人都了解的一种状态,其结果是生活空虚的感觉,一种生存空虚。有更多的人甚至遭受丧失生活内在社会目标的痛苦。这不仅适用于那些被多舛的命运击败的人(现存有很多这样的人),由于战争和迫害,他们失去至亲,虽肉身尚存,但已如行尸走肉;还有这些不得不承认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在实践运用中遭受惨败的人;以及当他们评估了自己的能力,并发现自己缺少力量,而不得不放弃的人。一些刚刚开始生活的人也是一样,但却被剥夺了生活中的有社会价值目标的自信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寻找替代目标,寻找生命的“替代”意义——酒精、毒品、性等等。或者发现一种完全顺从这种模式的方法,或者他人的意愿?

当我被问到如何解释生存空虚的形成时,我经常提到以下几点:与动物相比,并没有直觉告诉人们他应该做什么。也没有任何传统告诉当代的人们他应该做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因此他通常处在一种或者希望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情,或者做别人希望做的事情的状态中。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讨论盲从,第二个例子,我们讨论极权主义。

除了盲从和极权主义,这里有第三种生存空虚,一种特定的神经过敏症。因此一种新的神经官能症出现了,我称之为“心理性的”神经官能症。^①

1971年维克多·弗兰克尔在华沙发表演讲,表达了有关这一主题的重大思想: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经官能症,任何时代都需要心理治疗。今天精神病学家很少与古典形式的神经官能症打交

^① Victor Frankl, *Der Wille zum Sinn. Ausgewählte Vorträge über Logotherapie*, Vienna, 1972, p. 12.

道,更多地是与新形式的神经官能症打交道。兴趣减少,主动性丧失是最明显的症状。这个阐述本身很少在临床症状中表现出来,但是更多是一种动机的干扰——微弱的动机是目前神经官能症的特点。但是正如一个调查显示,这取决于他的基础,一个更深远的**合理感觉**。^①

维克多·弗兰克尔不仅是在个人心理学层面,而且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面引用的第一段,他谈到个人和人类幸存的可能性)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他和弗洛姆的立场是一样的,弗洛姆提出了“健全的社会”,同时伴随着一些社会神经官能症和与现代文明环境相关的问题。因此,他呼吁人们重拾生命的意义,重拾自己在生命中行为的社会内在的目标。弗兰克尔甚至提到培养年轻人增强意志以加强生命的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目的感蔓延的时代。但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教育不仅要传播知识,更要增强意识,人们要更加细心地处理每一种情况下所面临的挑战。^②

199

作者谨慎地补充说,重要的不是道德说教,即价值的教导,而是价值通过生活本身的传播。

我们不能学习价值,我们必须体验价值。因而我们不能赋予生命意义,相反——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给予什么,其方法更加容易,只是一个范例,我们自身的一个范例。关于人的生活的终极意义这个问题的回答绝不能是理智的,而是生存的——我们并不用言语回答,我们的整个生命构成了回答。^③

古人有句话说“言语易逝,行动胜之”(verbal volant, facta-

① Victor Frankl, *Der Mensch auf der Suche nach dem Sinn. Zur Behumanisierung der Psychotherapie*, Vienna, 1972, p. 11.

② Victor Frankl, *Der Wille zum Sinn*. p. 27.

③ Victor Frankl, *Der Wille zum Sinn*, pp. 28-29.

trahunt)。这无疑是正确的,尽管范围有限,在弗兰克尔案例中,是受制于他是精神病学家治疗师这一出发点。对一个个体而言是好的和正确的东西,不能也不应机械地推衍至社会性的规模。一个精神病医生对言语疗法的运用,旨在恢复其病人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向他表明,在特定的情况下他的状况不是最糟糕的,其他人承受的比他更多,并且如果灾祸没有发生在这个病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他至亲的身上,情况会更糟,诸如此类,这样就能得出结论,这个病人具有活下去的理由,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如果他遇到一个正在等这样一场争吵的病人,实际上,准备接受争吵,然后,或许可能通过这种方法得到出乎意料的治愈结果。(被反复提到的例子是一位因丧偶而几欲崩溃的老教授,他在获知倘若他的亡妻因他之故侥幸生还,她将承受如他一般的煎熬时,又重新恢复了健康。)我坚信,只要涉及类似的“社会性”疾病,要获得如此结果的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既非说教,亦非示范性的行为模式能解决社会机制低下的运转功能所造成的结果。如此,默顿所说的混乱的根源,就可以被还原为人的活动特定目标由以发轫的文化结构,同导致这些目标无法实现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言语或行为模式在这里爱莫能助,只有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才能消弭冲突。

200 不仅精神病治疗学家的信条如此,而且凭借宣传和政治教育,试图对诸如酗酒、盗窃、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意识形态或政治上冷漠(尤其在年轻人当中)等现存的社会恶习进行谈论的理论和社会实践亦然。如果恶习的根源在客观的社会环境,其中人们不想或无法改变,之后借助宣传机构的帮助与恶习所做的斗争,将导致宣传机构声名狼藉——这本身是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甚至通常会加剧“疾病”。人们的信念已被这样的事实挫败,其中没有能够消除这些困扰他们且愈发深重的恶习的济世良方。

与提出的扬弃异化操作(为生命的意义规划意志的方式)相关的怀疑主义不适用于“生存空虚”理论本身。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最深刻的表现形式(在广义上讲),即与人自己的生命相关的异

化,在这种情形中,他的生命对他而言变成某种陌生的东西,甚至是应当加以谴责的东西。当涉及人的生命过程的时候,也会涉及人的生活各项活动。由于“人的活动”是一个包含工作在内的范畴,因而它就介入到人的生存的基础层面,并且因此还需要区别对待。

(三) 与其行为相关的个人异化

一个对自己生命过程反应消极,并且把它视作某种陌生的东西的人,必然如面对异化事物一般对自身的行动做出消极反应。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特定人的行为。

说到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时,马克思也是从人的行为开始假设工作的形式。

让我们以一个未能理解诸多误解的语义区分作为开端。例如,令我们记忆犹新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著名篇章(相同的观点以同样的形式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使得劳动——在社会的所有形态中——成为人的真正的生命得以发端的界限。各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并且依旧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否认马克思的这个论述的存在,也不能把它归结为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结论。当我们懂得创造性(creativity)和劳动(labour)作为行为形式上的区别时,许多困难会消失,尽管困难仍然存在,但我们稍后即将解决。 201

如果我们通过人的活动理解他所有的功能,包括改变现有的自然现实,或创建新的现实,如文学、音乐、科学工作等等,那么这个解释过于宽泛的领域可能分为两部分:创造性和工作(work)。

为了生存,人必须以某种方式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说生活是活动。然而,如果我们不考虑独立于人的意志的有机体的功能,那么他的有意识的行为将以创造性(肉体的或精神的)或工作(身体的或心理的)形式得以呈现。

创造性和劳动之间的区别既不是精确严格的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存在能够在这些人的活动的范畴之间画一条“严格且固定界线”的统一且具有概念敏锐性的标准。体力(physical effort)不是这样的标准,因为它有时伴随着纯粹的创造性表现(例如,米开朗琪罗用大理石雕刻圣母怜子雕像)。能够标明创造性的脑力(mental effort)也不是这样的标准,因为没有一种类型的人的活动,或意识活动能够在没有脑力的前提下完成,有时,单纯的脑力活动——如记账和相同的功能——毫无疑问是工作,有时是困难的工作,尽管这不是体力劳动。产品的类型也不是标准,例如,当能量被一个缝制连衣裙的裁缝消耗时,这无疑是工作;但通过一个不是想要赚钱,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衣服更好看的艺术家将花绘在衣服上的活动,从狭义上讲,同样的能量消耗就是创造,而不是工作。作为人的活动既定类型的物质性收益的要素,同样未能提供标准;毕竟,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有时在没有成为工作的时候,作为创造的活动可能特别有利可图。(例如,一个既不是因为兴趣,也不是因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栽培鲜花,及该活动的成果,如兰花新品种,能够找到好的买主。)这种差别的困难是通过一个我童年时代记得的故事阐述的,那时候,我正通过贝利茨(Berlitz)的课本自学英语。作者介绍了一个并非是创造性和工作之间的区别,而是伴随创造和工作的两种行为感觉的区别,即喜悦和工作(这里理解为令人反感的東西)。一个试图运用这种区别的天真的调查员看到人打网球,炎热天出了很多汗,于是得出结论打网球是艰苦的工作,但后来让他吃惊的是,恰恰相反,打网球很快乐。另一方面,他认为在森林里伐木工人的工作很有乐趣,后来他发现这真的是艰苦的工作。

我们认为人们自愿从事的活动是创造性,人们的行为是来自内部动机,满足感使他感到快乐(消除了紧张的感觉,这种需求产生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人们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的手段,如由于身体或经济需要,所从事的活动是劳动。这里,在获得生理生存的最小需要或通过物质手段使生活处于较高甚至奢侈水平之间,对二者的应对

方案并未做出区分。

针对界定不同例证时遇到的困难,我们不应该在外围予以应对。然而,该情形的相对性应该被强调,对一个人来说,同样的客观的行为是工作,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创造,即,简单活动提供一定的满足感(攀岩者征服喜马拉雅山的珠峰,当地的搬运工陪伴着他们)。同样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是“纯活动”而在其他情况下是雇佣劳动(例如,一个抽象派画家能通过画色斑表达他的观点和经历,为了给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企业家做昂贵物品的包装,这个画家画了上百幅同样的作品)。

最后这个例子中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上面所提到的两种形式,在什么条件下屈从于异化?我将像以前一样回答,当人的活动成为商品,受市场规则支配的时候。此时即使是创造性活动也失去了自然而然的特征,不再满足人的创造性需求,受市场经济支配,成了一些异化的东西,一些压迫人的东西,不仅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和志向,与之相反,这使他感到人生的缺憾及各种形式的挫败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创造他希望创造的东西,而是创造买者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不仅是创造的产品,就连创造本身也成为商品。

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人的关系的商品化,以及人的活动的结果的商品化未免过于简单。类似的结果是由于党和国家对于所许可的创造性活动时尚的决策权的垄断而导致的。这等于说创造者的决策标准,与他的意愿无关且通常与其相悖,并强迫他——如果他想要生存的话——成为“市场”所要求的主体,这不仅限制了创造者的自由,并将其置于商品市场的影响之下。

这说明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是扬弃人的活动,特别是创造性活动中的异化所必需的?

需要废除这些把人的活动(包括创造性活动)转变为商品,从而使其异化的特定条件,后者产生与人的相异化的事物(如果他没有受他所生活的现实影响而变得迟钝),它通常违背人的意愿,且与人的反抗

相抵牾。我清楚地记得,不仅是这些社会关系,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把创造者和活动变成商品,同时这些社会关系通过政治系统也带来了相同的影响。在这些政治系统中,创造者面对着商品的封闭市场。只有这些符合官方标准的商品能够被“市场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创造性的”活动。这里的答案相对简单。现在我们转向最基本的人的活动——工作。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客体异化,尤其是我们称之为经济的异化。我们现在来看主体异化。两者有重叠的地方。

工作异化的问题已经如此充分地出现在文学作品的主题中,尤其出现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因此,涉及原则性问题,我们将限于简要的提及。对马克思而言——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人的工作提供了异化的经典例子。工作的产品——商品,和工作程序、劳动工资,最终工人本身,都进入这张图画。因此主体异化和客体异化出现在工作过程中。但是如果简单地探讨工作异化的起源和来源,那么在工作异化的扬弃时,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20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私有制和分工的相互关系中分析了社会分工现象。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功能角度,看到了劳动分工的消极影响,但他强调了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劳动分工的进步意义和必要性。这的确是个核心问题:为了消除工作异化,我们必须克服劳动分工,但这只有拥有了高度的生产技术才有可能实现。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善良意志。私有制的废除,尽管可能导致消灭市场经济,但并没有克服社会分工,以及工作异化现象。废除私有制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扬弃工作异化的充分条件。

工作的异化不仅由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引起,它还包含社会分工的原因。这种分工既存在于宏观领域(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工作划分,体力和脑力工作的划分),也存在于微观领域(产品生产的进步细

分为更加专业的流程,这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至少是在发展的特定时期是如此)。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工人逐渐失去了与其产品的联系,也逐渐失去了那是他工作的一个产品的感觉。

因此只有当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废除为社会分工的废除所伴随时,工作异化的扬弃才能发生。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有机体下的社会功能的分化现象会消失(这种建议并不仅是空想,还是一个愚蠢的乌托邦空想),但是把特定的人束缚到特定功能上的分工链将消失——工业和农业、城镇和农村的区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将消失。人必须停止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由于没有考虑到科技进步的必然性,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探寻了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没有用“异化”这个词,但他们很清楚异化是什么。在这个领域,马克思继承了经典的空想社会主义学家的愿景,譬如傅立叶与圣西门。但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发展的相对进步性,因此看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在于消灭社会发展,而在于推动社会发展不断实现自动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该主题的意见,可谓远见卓识高屋建瓴。

完全的自动化不仅能够消除生产领域的专门化影响,而且能够首次²⁰⁵在历史上创造一个基础,以便废除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工,甚至废除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届时,看似乌托邦的东西会变成很好的体制和美好的愿景。

自动化对于劳动异化的后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也被当今的社会学家所强调。例如,布劳纳(Robert Blauner)受马克思启发而写的著作。基于他的实证研究,布劳纳确信生产的机械化和随之增加的劳动专门分工加重了工人的异化感:

……当一个工人在工作过程中被机器系统所控制时,他成了一个机器装置。因为是对一些机械节奏的反应——而不是以独立的和自主的方式活动,所以他完全接近于物性(thingness)的功能,即异化的本质。

生产流水线的研究表明工人们十分厌恶技术主导,不断地寻求办法来控制机器系统的方法。^①

布劳纳在自动化中找到了解决的方案,后者旨在解放工人,使工人不再作为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关于工厂中异化和自由的历史前景揭示一个明显的和一致的模式。因为立足于科技的世俗发展,劳动分工,以及工业社会结构已经在同样的方向上影响了异化的维度,在工厂工人和他的工作过程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长期趋势的聚合。异化经历了一个可以通过倒 U 曲线加以绘制的进程。

在早期,由手工业主导,异化处于最低的水平,工人自由最大化。在机器工业时代自由减少,而异化曲线迅速上升(特别表现在其无力感的维度上)。异化曲线继续增长,在20世纪的流水线工业到达最高点……但是在自动化工业中,发生了相反的趋势,一种我们幸运地期待在未来将变得更为重要的趋势……随着置身于自动化工业之中的工人通过责任和个体作用的感觉获得尊严,异化曲线开始从之前的最高点降落……^②

206 完全的自动化预期将在未来50年之内出现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考虑到社会经济系统的改变和私有制生产资料的废除,这将导致工作的废除,工作被人的自由创造所取代。人不再需要通过每天工作的汗水来换取面包。工作的苦恼将被废除,人能回归到自由创造的天堂。这将既不是奇迹,也不是虔诚的空想家的希望,而是生产技术的发展。对于马克思来说,人和他的命运不再依赖超自然力量,人创造

^①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 p. 20.

^②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 p. 182.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自己的命运。

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劳动力异化的扬弃,却会导致并不总是符合“正统”思想的结论,他们把他们的“正统性”定位于服务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前利益。首先,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重复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时,他是正确的。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工作构成了人力作用的界限。马克思谴责的不是人的活动和努力,而是由这一活动所产生的异化——工作,这种工作在一切实社会形态中,包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保留异化的性质。人们能够明白那些人的警示,他们正确地要求工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高生产率,至少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水平。我的建议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对工作持负面的评价,并且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动时间,尽可能给工人更多自由时间,这是马克思在赞美懒惰吗?绝对不是!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要人们懒散地生活在安乐乡,肥鹅从天而降,啤酒流入口中。马克思不赞成安逸的生活,他倡导用自由、创造性的活动代替强制性的劳动,这能够满足人们的内在需要。在这种活动中所投入的精力和努力要远远多于在工作中的投入。运动员的努力远比所谓的艰苦工作要求的能量更高。学者写书,画家作画,作曲家谱曲,他们的能量输出绝对超过了各种形式的所谓的精神劳动范畴。从生理和心理角度来讲,其目的不是让人的活动变得简单,而是使其在质量上不同,使其变成一种能满足人的内在需要的活动,给人一种工作所无法给予的满足感。工作有时会给人这种满足感,但只有当工人有了创造性的观点时,才会产生满足感。如果我们懂得前面引证的《资本论》的正确含义,就可以预期废除工作的项目,并且用创造来替代工作。

207

其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作并没有简单地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废除就不再是异化的工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国家和政党的中心管理为个人活动创造了一个特定的“市

场”，只要劳动分工存在，并且保持工农分工，脑力体力分工，保持工业生产的专门化，造成工作异化的主要原因就将继续存在。只要这些因素存在，工作异化不会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创造者想要它消失就消失，或者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的体制比资本主义体制“看起来更好”就会消失。当使用西方的营业执照，大批量引入技术，以及改变国家的体制时，在汽车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与别的工厂也并无不同。在这个生产线工作的工人会与在资本主义工厂生产流水线工作的工人具有同样的异化感。只是制度不同了。当工厂不再属于私营的资本家而属于国家时，“理想主义者们”就认为该制度的变革消除了导致工作被异化的其他因素，因为工人们懂得他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如果他们真正相信自己的话，理想主义者们的解释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他们没有理解马克思教给他们的理论，特别是他们不明白“工作”概念的含义。因此，当人们提醒他们马克思的真正想法时，他们会感到愤怒，并且试图错误地解释这段话——尽管这种思想观点来自马克思早期的作品《资本论》，并多次被晚年的恩格斯使用。

从工作异化角度上讲，无论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难道制度的改变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影响吗？当然，会有不同，而且是根本的不同。但是为了使这种差别呈现出来，我们必须反对那种关于制度的改变本身，即废除私有制本身就可以解决异化问题的毫无根据的断言。

208 就工作的异化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异化现象，而在于这样的事实，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是由于废除了私有制——所以形成了扬弃异化的条件；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就不可能克服异化现象。差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异化，而在于是否存在扬弃异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下面的结论：要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异化，首先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种废除是在这个领域所有进一步努力的“必备的条件”。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集中力量废除

社会分工,废除工人工作性质的无差别性。其中一个关键词叫“自动化”,专家,不仅是工程师,而且是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他们的工作使得自动化成为可能。

让我们回到实际问题上。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作也是异化的,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纪律来提高工作质量是正确的吗?当然是正确的。从这方面来讲,没有其他方式克服社会主义国家的缺点,没有其他方式来达到废除工作的水平,并使完全自由的创造性成为可能——这是实现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每个人依据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需要。今天,这听起来仍然像是空想。但是我们更深层思考工作中的异化和扬弃异化,与废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的发展准则相联系,同时贯彻科学技术革命,那么产品分工原则,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愿景,在完全自动化的时代中完全可以成为现实。

号召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其合理化是合理的。马克思经常强调,他所激烈地批判的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经之路。从这层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代表着相对的进步。但是马克思并未停止,他同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这一中间阶段必须克服。因此,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如今不能沉浸在提高生产率的号召中;这只是扬弃工作的异化,并用创造性取代工作的一种手段,这次总创造性不再包含异化的因素。

我们呼吁工人——这是正确的——加强纪律和组织性,并提高他们工作的生产率,这难道不会使工人们沮丧吗?如果我们是公开地、诚实地和积极地做这件事情,以便向人们说明这一领域的基本问题,那么工人们是绝不会沮丧的。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和清晰。那些害怕公开性的人,假如他们自己能够理解这些问题,那么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的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薄弱。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长期以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当人们理解并赞同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就有能力做不平常的工作;当

209

民众经历饥饿寒冷时,出现的革命的或者民族的“热潮”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是,当面临生存空虚时,当对个人或民众来说,形势并不明朗,当没有人能清楚地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原因是什么的时候,这些力量就会十分微弱,或者归于零。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就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基于“复杂”的分析,采取这种方式,能够在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方面获得任何积极的结果吗?这不会使他们沮丧吗?工作中没有异化感对每个工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即人们不是在经济压力和社会强制力下做事的社会生活,身处其中他将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并且他们把精力发挥到不同性质的行为中。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很难说服现在的大众。这听起来很矛盾,但是想一想,我们揭露了事实。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和想出更深入的观点,因为人们以前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体验不完全具有吸引力。倘若在过去,对资本主义的邪恶的批判很容易就能支配大众,那么现在必须向他们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我们必须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珍贵的东西——即扬弃工作异化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人们只会相信那些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是真实的,并且努力去承载这一任务的人们。

210 我们已经从狭义角度阐释了各种形式的自我异化——人与“自我”的异化,与个人生命和个体行动的异化,现在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一个相同的大问题的各个方面。正如人感觉和体验的那样,人的生命总是最值得关注的。当人质疑生活的目标和内容的时候,当他以一种方式或是另一种方式受到“自我”召唤的时候,出于被强迫的原因,当他感到这是在虚度光阴抑或毫无价值,且他的行为无法使自己满足的时候,他对待生命目标的态度随之会变得消极。这会使他的“自我”感到不和谐,或者异化(不考虑精神疾病)。但是,相反,如果对异化的扬弃以一种人对自身生活的态度的形式出现,那么必然会出现其他形式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谈论一种现象的症状,而是谈论一种由

因果关系和相互关系连接的实体。但是我们不能像存在主义所做的那样——绝非偶然——把主体的异化同客体的异化分裂开来。这就导致我们要研究主体异化和客体异化的相互关系。

四、主体异化和客体异化的关系

虽然老套,但有必要强调,在社会研究中总是有必要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整体。这个假设被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所接受,但是它在马克思主义中扮演一个特定角色,且与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辩证原则密切相关。

这个假设在社会科学中更加重要,尤其在实证研究领域,假设的直接对象是而且必须是具体的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具体方面。社会科学在这个方面和其他科学没有不同。我们的研究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整体。除非我们记住这一点,否则不可能深入研究这种现象。我们操作的过程就像我们在显微镜下检查一个有机体的某部分一样。这就是我们在分析系统框架中进行操作的方式。我们把自己限定于共存的规则下,自觉地排除从物体的动态视野来检验事物,反之亦然,当我们审视某种物体的力度时,把共同法则丢到一边。总之,在研究任何物体的时候,至少在研究的特定阶段,我们应当使用选择性概括的方法。至少在某个特定阶段,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开展研究,而且这是一个可接受的、科学的探索法。然而,与此同时,在某个时刻——记住你所检验的物体整体,它也是一个更大的实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这一对象与它所从属的更加复杂的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对象对这一体系的依赖的基础上,回到一种关于这一对象的全面的研究。任何时候,我们都既不可能彻底完成这一综合研究,也不可能彻底把握普遍的联系和普遍的依赖——这是一个无限的系列,按其本性来说,没有什么人可以数清这个系列——但是,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我们所倡导的方法论假设。

让我们把这条准则应用到异化问题上。当我们审视异化现象时,我们正在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只有人的抽象才能把它们同整体分割开来。然而,除非“细致入微”地观察社会生活,否则我们无法研究这个现象。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细分成组成要素,每一种组成要素会在特定时间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物。

我们将我们的领域分为两个亚领域(使用逻辑语言和数学语言),即主体异化和客体异化,并区分每个现象的具体形式。我们注意到,关于主体异化这一亚领域的经验性研究不仅寻求区分这一现象的表现形式(政治异化,人的活动的异化),而且寻求在每一种表现形式中都划分出异化感的组成要素,以便对主体而言可以进行量化的把握。

所有的这些操作都是有效的且科学可行的。这通常会导致有趣的结果,尽管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科学的案例中,这些结果扩展了我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不想导致科学思想的偏离,那么在运用这些程序时,我们必须记住最终目标是将这些元素综合成一个实体,并且从整体上看待这个问题,它们是系统地与其他元素相互依存的。

我们这里的工作存在局限性但被严格界定;去考虑主体异化和客体异化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便于识别潜在的扬弃异化行为。

在把异化理解为关系时,该关系的两极总是人和他的产品:一方面,我们从挣脱人们控制的产品的异化(即客体异化)的角度来审视异化;另一方面,我们从感到异化的人与自己的产品的异化(即主体异化)方面来审视异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和丰富的区别,因为它能保护我们,以免客体异化这一基础的亚领域被我们的研究视野所忽略——这在存在主义和现代社会及经验心理学领域都发生过。我们的工作是把问题的方面和因素整合起来,这些问题我们在抽象的基础上区分过。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两种形式异化的纽带和共同依托是什么?

让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出发,为了不使经验的实证人员泄气,他们不关心抽象反馈(这正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因为他们不仅应该提

供对这种现象的描述,而且应指出如何克服这种现象)。

想象一下,有人希望研究一个工业的异化现象,例如,在汽车工业中,并且希望运用西曼的类型来研究工人的无力感。让我们假设,他在流水线上执行这一任务,并且感到高度的无力感。假设这个测试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公司考虑到生产,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做的——那么,如何做才能克服,或者至少是减轻这种无力感?我们的研究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只关注如何描述这种现象。(怎样回应?他从类似的研究中接收不到更多的讯息。)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他将寻求与工人经验有关的解决方案,然后他自己本身在面临无力感时感到无助;或者是他超越主观经验,寻找客观原因。其他的异化因素——如无意义感、孤独、无聊等,仍在西曼的类型下,和大部分研究人员做的一样,可以被控制和改进(在适当策略的帮助下)。人们感到无助的时候,是无法进行生产的,工人在生产中必须服从自我。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答案是,工人痛苦地经历着无力感,因为他无法控制生产过程。如果调查者得出这个结论,他将再次面临两种可能:或者——像莫里哀戏剧中的茹尔丹,他无意识地念散文——他意识不到答案的理论意义;或者是其他的(人们所希望的),为了克服主体异化他从理论上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为了克服主体的异化,必须从主体异化领域消除隐藏在基础背后的导致异化的原因。因为在确定这一点,即工人感到无助的原因是他不能够控制生产过程的客观情形时,我们的研究者强调——他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主体异化的原因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客体的异化(在组织生产情况下,人的产品摆脱了他的控制,从定义上讲,这就是异化的特点)。

213

但是,这不仅仅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的调查者能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了克服至少是减少工人在消极生产中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使他们异化并且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影响生产,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他现在知道我们应当在生产异化过程中找出原因。他将告诉管理层,工人应该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接近控制生产过程,

参与决策。这就需要——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落实——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答案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还来自于有能力从这个声明中得出结论的社会学家。工人应该被赋予生产过程控制的实权)。

这个例子对社会主义关系具有启示:(1)让工人有机会控制生产过程和做决策是很有必要的(这正是生产中工人自治的准确含义), (2)我们认为,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具有现实可能性,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已经社会化,不再属于私有者,他们不再服从私人利益。虽然意识到这一陈述的第二部分的重要性,因为这一部分确定了实现所设定的行动纲领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局限于此。为了使自己像一些“热心者”所想的那样,生活在一个非异化社会的天堂里,单凭废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不够的。如果计划和决策被集中化,无力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会爆发出巨大能量。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社会中的异化是一个统一体,我们只有通过抽象才能把它划分为客观的进程和这一进程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从
214 这一点出发,可以推导出主体异化和客体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客体异化在人的意识中以多种形式的主体异化而产生。因此,方法论的结论(就研究这个问题而言)和实用结论(视情况而定)是相同的。我们必须在客体异化的现象中寻找主体异化的根源;为了克服特定的主体异化,有必要在客体异化基础上消除主体异化的根源。

正如一个复杂整体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所通常展示的那样,这里出现了从主体异化到客体异化的反馈。主体异化的根源在于客体异化,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主体异化的存在以及人的意识无法克服这种异化增强了决定其存在的客体异化。继续使用这个例子:如果工人没有克服意识中的无力感,那么,对生产过程的无力控制——即客体异化——就会增强,并获得不可侵犯的额外保证。我们在一种比之前更宽泛的意义上解释“无力感”;在第一个例子当中,无力感只是指工人们对于生产程序不在他们控制下的一种无力的感

觉;在第二个例子当中,无力感是指决定这一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不受工人控制所产生的无力感。再重复一遍,最关键的不仅是要求废除在原则上阻碍工人在生产中自治的资本主义和产权关系,而且假定废除那种不允许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尽管理论上社会主义可以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阻碍工人自治也会导致异化形式的生命的延长。

我们现在来谈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

第四章 社会主义与异化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通常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是否有异化的问题。“正统的”马克思的解释者们拒绝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按照定义把异化现象限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或者,更广泛地说,限定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社会制度中);他们的对立面则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异化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它们称为“异化”,可以用其他可代替的名称,但它们并不能从社会现实中消失: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字游戏,而且对每一个词义的争论都因为误导而毫无新意。但是,我们必须研究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就这一问题与这些伪正统派和伪教条主义者(他们并不像我们平常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变成教条,而是简单地拒绝它,利用“正统派”的幌子作为伪装真正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争论仅仅是关于语词的学术分歧。无论如何,所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基于革命实践的理论的人,都不能忽略一个使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感到不安的问题。但是出发点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异化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具有何种作用?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理论信念出发,即确认社会主义存有异化,而且从其规定性上讲,否认这一现实只是

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那么,异化理论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除异化的斗争是否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是否在这个意义上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问题,就成为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检验异化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意义。 219

一、论异化理论对社会工程的效用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而且常常引起字面上的误解。如果我们把“理论”理解为“科学的理论”,那么它必须满足至少三个要求:(a)它的意见(主张)须是主体间能够相互交流的(比如,它在规定性上与无法同其他人交流的神秘体验截然不同);(b)它的陈述须是主体间能够观察到的(前面的区别在此情况下依然有效——同时,所有的科学概念都认为,基于观察的陈述不能仅仅被指定的人接受,而应是同时能够被其他人重复和证实的);(c)这些关于事实观察和对观察结果的阐述的陈述,必须都是基于一种明确的方法,也就是基于一种十分确定的研究现实的方法。这是对“理论”这一词语的严格的、限定的解释,也是我所理解的“理论”。我们理解的与这种“理论”相对的“实践”,是指以实现明确目标为目的的人类活动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并不是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称为“实践”,只有那些基于某种明确的理念,明确地想实现某种特定目标的活动才可以被称为“实践”。以这种方式定义,“实践”概念仍然很宽泛,包含着所有自觉的人类行为,从那些基于偏见和累积的经验之上的活动,比如,萨满巫师的神秘治疗手段,到那些基于自然或社会规律之上的科学认识活动。即使如此精准的概念也会出现更多的误解和模棱两可。实践,或实践活动,是以人类思维为基础的,在特定情况下,是以理论思考为基础的,但是理论思考本身可能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得以实施,这种情况下,它起到了元理论的作用。例如,物理学某领域的理论思考可能是一定数学理论的实际运用。当实践以理论为基础,与此同

时,理论本身就是实践时,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混乱,如果可能采用别的术语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些。

220 在社会活动领域,这当然是可能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这一术语在这一领域日趋盛行,我认为这个术语很贴切。严格说来,工程活动是理论和技术知识基础之上的人类创造(建筑物、改造等等)。同样地,在关于社会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人可以创造某种新的东西,他如同社会问题领域的工程师一样。这里确实也遇到理论和实践范畴,但它们的关系还是不同。这里并不是要把二者进行对比,否则会导致概念上的混淆,而是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到社会行动中,这样就可能会避免上述的理论上的两难困境。如果你愿意,这种活动可以被定义为“社会规划”(social planning),但它具有不同的内涵而且有点偏离我们的兴趣。在《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我们找到关于社会规划的定义:

规划在传统上被定义为一种理性决策的方法,这种方法重在对比分析规划的手段和目的,力图评估这些要素如何以最低成本通过优化和统筹来获得最大成效。这种构想倾向于重视决策手段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它的潜在性假设是:决策目标是可以清晰地被界定并且能够被测量的。但如果我们认为规划的目标或施行都不确定的话,那么技术方面的偏见就会降低到最低程度,规划的理念也将重新制定。^①

社会规划的这种界定,作为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相对来说是一种更加狭义的概念。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工程,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知识和法律法规;具有预期目标的行动规划,既是社会工程的结果,也是它的内容。社会工程是社会行动和理论思考的统一体,其前提很清楚,社会规划是其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把“社会工程”这一术语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以此解释,“社会规划”是它的组成部分。

^①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2, *Planning Social*.

什么理论在社会工程领域有用？一种具有哲学 - 社会特征的理论，比如异化理论，是否具有这种用途？^①

由于我们把社会工程的概念与技术工程加以类比，那么，物理、数学等领域的一般理论在工程企业中，比如，在桥梁工程中，是否有用？很明显！实际上很难在基础理论和实用理论（具有应用特性的理论）之间划一条界限。更重要的是，原本从所有实践应用中产生的理论在实际工程应用领域中有时被证明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工具。典型的例子是微积分已经运用到电网建设中。但是，这里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远离”实践的理论上的意外发现，而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对每一位精通自己工作的技术工程师而言，为了恰当地完成专业职责，他必须具备相当于狭义的实际工程知识的基础知识（物理、数学等），同时，这些一般理论不仅有用，而且对工程活动来说是绝对不可少的。技术知识是一般理论的一种特定应用，而且不可或缺。

221

依此类推，这同样适用于社会工程学。《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所收录的《社会规划》一文的作者，间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重要的不仅是技术方面，不仅是决策的方法，比如在成本效益方面的理性，而且包括行为的目标和规划的理念。最重要的是社会规划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模式。这些要素都是在对社会行为的输入和输出量经过纯粹的技术运算后得出的结果。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很显然，这是一种自觉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建立在以某种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知识之上的。其中的联系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举例来说，如同力学常数与在特定条件下修建桥梁的指令的关系一样。但社会理论与社会工程之间的这种联系

^① 1965年，在 Nowe Drogi 讨论的基础上，我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中提出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很平庸。有参会者质疑异化理论作为哲学理论的资格，因为他用异化理论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这么说吧，对于这样没有头脑的问题，我们不能期望一个理性的答案。就如同有人想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诊断肠道疾病，当然也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但既然问题已经出现，我们就应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重要的是，其中出现了很多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实际上的确存在。任何理论都不会“抽象”到与社会建设的实践没有任何正面的或负面的联系。只有真正的技术和能力——而不是轻率和无意义的冲动——才有可能将一般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工程结合起来。

如此看来,异化理论在社会工程方面的作用如何呢?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它能成为全社会克服异化的基础。

222 社会工程学的含义是人们以实现特定目标为目的的、有意识的行为:首先,是创造有利于向某方向发展的新的社会关系;或者其次,是抛弃那些阻碍进一步发展的现有的社会关系。异化理论指出了人的活动的产物摆脱社会控制的条件,这是克服异化的社会行动的基础与理论动力,从而可以摆脱那些产生异化的条件。我们将之称作扬弃异化(disalienation)的活动,它属于上文所说的第二种类型的社会工程学的范围。异化理论与旨在克服社会关系异化的活动的有机结合,便成为这一理论的作用和工程的职能。

这种推理的基础是两个假设的前提。

第一,异化是一种可以克服的社会关系,它并不是什么人与生俱来的东西。

第二,异化是一种社会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在社会的任何经济结构中。

从表面来分析,这两个前提似乎存在着矛盾。

人们反对某种社会现象并最终克服它,是因为这种现象是可以克服的,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不是研究对象永恒的、无法改变的特性。因此,关于永动机这种类型的发明,或者换用关于人类有机体的语言,关于人类拥有永恒的生命们的想法,都具有幻想的性质,因为二者都是和自然规律相矛盾的,而且死亡也无法同“人类状况”相分离。如果根据定义来假设,异化与人类的状况是不可分的,那么考虑扬弃异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正如讨论使人长生不老一样没有意义。然而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特定的和历史的暂时条件下的产物,它不是永恒的,不

是与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相联系的。认为异化与人的状况无法分开的人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异化等同于自我异化。他们没有看到人的产物异化的客观关系有着明显的历史性,所以把主体异化(自我异化)问题神秘化了,相对于客体异化而言,主体异化具有派生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个合理的解释。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特定条件下,人类活动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是生活的必然现象,具有超历史性,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异化,是人的活动的社会动能的扭曲。既然如此,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要摆脱异化,就要改变导致这种扭曲产生的各种条件。尽管很明显,但仍需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具体的异化**,是异化的**具体形式**,而非“一般的异化”。因为“一般的异化”属于抽象的范畴,而我们是在具体地研究这一范畴内部的特殊形式,这些异化的具体形式之间并不存在层级方面的从属关系,所以消灭其中的主要形式并不会自动地消灭其他的派生形式。

223

如果异化是历史地形成的现象,那么消除异化就是可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观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样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异化与扬弃异化的有机结合;也就有了异化理论的社会工程学的作用。马克思社会理论的一切主题,都服从于社会斗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一主要任务。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理论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工程学方面的作用。而这正是异化-扬弃异化理论所具有的功能。总的来说,这一理论指出了各种社会“疾病”产生的根源,是因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无法控制自己创造的精神的、物质的和制度的产品,这就是造成社会发展脱离人的控制的原因,因而对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危害。在指出异化是一种历史地形成的现象的同时,我们也就看到了异化理论提供了扬弃异化活动的根据,因为只要铲除了异化产生的条件,也就铲除了异化本身。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目的就是铲除剥削的根源与条件、取消社会阶级差别和为有产阶级服务的国家制度以及修复扭曲的人性等等,这正是克服异化的行动。而这恰恰就是异化理论社会工程学方面的功能。

异化是历史地形成的这一性质,证明它是可能被扬弃的。但这里所指的乃是异化的一种**特定的形式**,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异化会随着这些关系的消失而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克服了“一般的异化”。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象化——而它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里都是绝对必要的存在——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下,对象化就可能转化为异化。而且这是不能预先知道的,因为这是由一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的整体状况所决定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翻译”为与资本主义形态相联系的具体理论与范畴的语言。但是这种“翻译”并没有消灭在历史上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异化理论的功能与意义。但异化理论绝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它有超社会性,而且至少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也有关系。

我坚持认为异化现象有超历史性,同时也主张它具有历史性,脱离不开人类的生存条件,这是否自相矛盾呢?

如果我们说“异化现象具有历史性”和“异化现象具有超历史性”,二者似乎存在明显的矛盾。我们可以仔细地研究一下。

从逻辑上讲,矛盾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判断坚持某件事情,而另一个判断在相同意义上否认这件事情,那么二者就是矛盾的。很清楚,上面的两个陈述只在表面上存在矛盾,因为它们所指的是不同的内容,是对陈述主语的不同方面的说明,而不是对同一方面的说明。

当我们断言异化现象具有历史性,并不构成人的生活条件的永恒内容时,我们的陈述是一个省略语;它缺少了“特定的”这一术语,因为在这里重要的一直是**特定的、具体的**异化现象,而不是一般的“异化”。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并不能具体地干预社会生活,或者以其派生的形式干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总是讲“社会的人与其产品”之间的关系,当这种关系表现为异化所特有的特征时,我们便说异化具有历史性,即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这些社会关系产生于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也消失于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关系的消失意味着异化

特征的消除。所以“异化现象具有历史性”这句话应改为：“一切具体地出现的异化现象都具有历史性；换句话说，异化总是同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而且会随着形成它的那些社会关系的消失而消失。”

另外，当我们断言“异化现象具有超历史性”时，我们的陈述也有些简略，这种说法掩盖了其内涵的丰富性，所以比第一种说法的问题更大。这里重要的不是异化现象的特征在时间上的持续性，这是前一个陈述的论题，而是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人类活动的对象化是否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演变成异化？在其他条件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也会演变成异化？所以应该把“异化现象具有超历史性”这句话改为：“对象化现象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影响下，可能表现出异化的特征，不仅在个别的社会制度（这里所考虑的情况，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中如此，而且在其他的社会制度（这里所考虑的情况，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中同样如此。”

225

现在解决了表面的矛盾。这两个陈述讲的是不同的问题，研究的是异化的不同方面，这就把矛盾的可能性排除了。关于任何异化都是在具体的条件下形成的，它的存在与形成它的社会关系的存在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关于对象化在任何制度下都可能演变为异化的陈述，这两个陈述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但从形式的观点来看，它们的确是不矛盾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对第一个陈述的说明没有也不可能招致任何反对。但是第二个陈述却是马克思主义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

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存在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

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①

226 根据异化的定义而排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可能性的人们,把上面的这段文字作为他们的依据;这也是我们从这里开始讨论的原因。毕竟马克思自己也说过,消灭私有制就意味着消灭了一切异化,既然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那么社会主义也就消灭了异化。^②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把手稿里的这段既不清楚,也不有趣的话作为他们手中的尚方宝剑,但很讽刺的是,他们却同时否认手稿是马克思成熟的著作。这段话实际上同引用它的人的意图恰恰是**相反的**。它清楚无误地说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在这句话的前一句里还提到了道德、艺术、法,甚至科学)都是异化的表现形式。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亡了吗?经验告诉我们,它们并没有消亡。那么,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仍然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幼稚的问题。之所以花时间研究它,是因为它是目前讨论的主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有两个发展阶段:狭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仍然保留着被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很多残余,比如:社会按照阶级来划分,体力和

^① MECW, Vol. 3, p. 29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译者注)

^② 加罗蒂在《哲学研究》(Voprosy Filosofii)上发表的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共产主义不仅消灭了劳动异化,也消灭了所有形式的异化”。

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城乡之间的差别,国家以及官僚制度,等等,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那些坚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也知道,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的和人的(也是道德的)前提条件,这需要很长一段时期。在此之前,旧制度残留的人的活动的异化产物,由于暂时仍是社会生活必需品,所以仍然是异化的产物。这些异化产物的性质和作用方式等等,在新的政权与社会关系之中当然会有新的变化,但是它们作为异化产物的基本特点,却没有变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无法改变的。即使所谓的自由市场已被计划经济所取代,但只要商品经济还存在,就会出现商品的产物,而根据马克思的定义,这些产物就是异化的一种形式。只要专业化的劳动分工还存在,劳动过程的异化就会继续起作用。我不知道是否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线上工作就比在“资本主义的”(这里的引号是为了强调,把制度间的差别转移到不同制度里完全相同的生产技术上去的做法完全是胡闹)生产线上工作不那么令人麻木不仁。只要国家还存在,作为一种暴力的强制机关,即使国家的阶级打击方向发生了改变,它仍然是异化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消除这种异化。只要国家和政党的官僚体制还存在,那么,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仍是异化的典型表现。这些都是列宁曾说过的,我们很难质疑列宁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同样,诸如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民族主义与种族仇恨等社会现象,也是异化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异化的表现,但其中任何一种现象也没有由于社会主义带来的不容置疑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国家的服务对象改变了,阶级关系不同了,工作关系和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很多学者在讨论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善意向我解释这些变化。他们总想尽量说明我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思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这样做就能使异化不再是异化了吗?当然不能!按照定义“循规蹈矩地”解释这些现象并不能增加什么论据,只能说明有些人害怕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社会主义

中。这些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消除异化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至关重要的在于,并不是因为满足个人的理论需求而制造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而是为了动员各种力量来抵制异化,并为扬弃异化而斗争。异化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具有社会工程方面的功能,而且,至少在理论上,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性,这种功能得到了加强和发展。从理论上说,扬弃异化的斗争应该得到最高水平的社会发展计划的协助。但这么做绝不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对于扬弃异化这一进程的严重的阻碍之一就在于,那些声称按照马克思主义来规划社会生活的人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这个缺陷就明显地表现为不理解(所以低估了)异化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工程方面的作用。

228 但情况也正在变化,给人带来希望,常识终究会取胜,理论上的付出是有价值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关于异化问题的理性思考的分水岭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有些人只是根据定义就断然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一个非常“正统的”环境里,却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路。1966年3月,主要是为了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而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会议。会议总结了讨论中的分歧,内容如下: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的分歧可以总结为三种观点:

(1) 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有异化的残留表现,彻底消除它需要一个过程。

(2) 异化的特点是同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的,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残留,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复杂矛盾和条件的发展,它时常以官僚体制、个人崇拜和宗教的形式再次出现。

(3) 因为异化现象具有严格的历史性,所以异化范畴不

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完全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的。^①

根据会议报道的补充,只有莫德朱恩斯卡娅(Modrzhyanskaya)坚持第三种观点,而这一观点遭到了大多数参会人员的反对,其中包括许多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现象的出现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且还暗示除了旧的异化形式(如宗教)以外,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会产生新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异化形式(如官僚体制和个人崇拜)的各种条件。这次讨论不但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异化范畴的正确性(在此之前的几年,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曾怀疑过这一点——见本书第一章),甚至承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存在。这是一种新现象,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内容和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双重压力下,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方面取得了进步。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异化现象表现了理论上的无知,更糟糕的是,这种“保卫性”的做法的确危害了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这种做法,即使没有破坏,也至少削弱了旨在扬弃异化的活动的动力,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扬弃异化的活动都包括什么呢?

有两个方面决定了异化理论的价值与社会工程方面的作用。首先,异化理论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一种特殊的联系和分类,从而辨别出具有异化特征的现象;其次,异化理论揭示了一种一般的可能性,即通过改变产生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方法来克服异化。了解了这个一般性陈述的人会觉得它平淡无奇,对于质疑它能否真正地影响到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人,我愿意再重复引用一下来自另一领域的一个例子,即万有引力定律及其结论对工程实践的意义。对于那些“幼稚的”人,他们今天还在怀疑牛顿定律基本公式的实践意义,即每个物体都有吸引

^① A. A. Shevchenko, Chelovek v sotsialisticheskom i burzhuaznom obshchestve, in *Filosofskie Nauki*, No. 4, 1966, pp. 155-156.

其他物体的属性,更不用说爱因斯坦对牛顿定律的复杂概括了,他们就像那些不值得与其对话的文盲一样。毕竟我们知道,这一定律的运用后来被拓展到计算行星运动、弹道学和原子能等方面,从而渗透到人类生活和实践的所有领域。我们对于那些对支配社会发展的规律“幼稚无知”的人的包容度就更高了,在那里,无知被美化为“一种观点”或“坚守原则”。也许那是“坚守原则”,但是坚守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正好相反,坚守的只是后来在全体会议上由这些“坚守原则者”制定的具体策略的原理和规则。由于抛弃了马克思理论中这项主要的内容,这就等于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从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力。

我一定是夸大其词吧? 否认异化理论及其作用的人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吗? 当然不,我没有夸大其词,但是不了解这种理论知识,或者尽管了解,但知之甚少,也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很多实例都能证明。然而,如果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充分的了解,工作自然不会做好,行为的目的当然也无法达到。从另一方面来说,不了解这种理论知识会使消极现象进一步蔓延并掩盖这些现象。然而这些消极现象最后一定会出现,在终极意义上是以对社会发展采取紧急刹车的形式,以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人格扭曲的形式而出现,这些成员的意图不是去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而是与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甚至似乎有计划的社会行动的不可靠性或者崩溃的鲜明特征会普遍出现。

最重要的是,把异化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的目的是克服那种由于人失去了对人的活动产物的控制而引起的发展的自发性,从而可以实现按计划来发展,也就是说,根据社会成员自觉地树立的目标与愿望而发展的原则。

具体说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扬弃异化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 (1)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层面;
- (2)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层面;

(3) 人与其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的层面。

当然,我并不打算详谈所有的这些问题。这么做的话,就相当于撰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政策的教科书,这不是我的目的,我也没资格这样做。我的目的只是说明,异化理论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中的作用。

(一) 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的层面

从这个领域的大量问题中,我挑选国家、政党与官僚体制这三个经典的问题来讨论,因为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提出来的。还有许多由人所创建的制度本身变成了异化的产物。我挑选的这三个问题具有特别的相关性,不是因为它们曾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以说明异化的实例,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深受其害,它们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认识到这些就是异化的实例,就能改变什么吗?既能也不能。说不能是指,即使最进步的认识,例如国家是一种异化的认识,也不会消灭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即国家的逐渐消亡,因为国家的职能,包括它作为强制机构的职能,对一定的社会生活与继续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说它能,它的确绝对有用,如果我们关心的还是旨在减少弊端,并最终消灭弊端的自觉的社会行动。我们不是在谈论奇迹,因为社会工程学并不生产奇迹;我们谈论的是指向某个确定目标的自觉的变革过程,即使这个变革的过程类似于通向一个具有无限性的数学上的“极限”。

231

1. 国家。让我们从国家开始谈起。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是建立在“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具有强制性的、管理人的机关,永远具有阶级性;同时国家也是管理事务,自然也包括管理经济计划的机关。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第一层含义表明它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产物,永远是一种异化,而共产主义社会将成为没有国家的社会,因为这一异化必将随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消亡而消亡。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

的那样,国家“管理事务”的职能将继续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将继续存在。正是这一立场把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别开来。

我们有必要重复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原理,虽然在第二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尽管道理很琐碎。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探讨。列宁说过,要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只承认阶级斗争还不够,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这番话,是同当时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特殊条件和目标密切相关的。列宁的阐述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而且还必须承认,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的、有强制性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会逐渐消亡,并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完全消灭。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适当的行动,每个理解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人都会这么想。

我们现在就来证明国家是一种异化,不用根据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用根据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或《反杜林论》等成熟的著作,而是根据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并没有使用“异化”一词,但他的理论的确是严格地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对比一下列宁的这部著作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很多问题就浮出水面了。

重要的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即国家、常备军、强制性机构等等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开始消亡,相反的是,它们却走向强化(特别是那些强制性机构);它们的扩张已给社会主义社会投下了阴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国家通过发展自己的“自律”,已经成为经典国家的范例。毕竟,革命不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来发展的(在世界上先进的国家里同时爆发革命),而且也不同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设想(链条会在最薄弱的环节破裂,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开始,但随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也会爆发革命)。然后便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武装干涉,还有两种制度间军事力量上的竞争等等。这一切的确是真实的,这种情况下,只有疯子才会要求具有强制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形式立即“消亡”。但无论如何,一定的“残

余”是的确存在的,它提醒我们丝毫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内容之一的异化理论的成果。国家是异化的产物,它由人创造但又凌驾于人之上。只要国家还是一种强制性机关,其本质就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本质都如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例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也不会如此强烈地宣布必须废除这种机关,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恩格斯)。因此,虽然要考虑特定的历史环境,虽然还有必要延长这种“古董”的生命,甚至在某些方面(国家的防御能力)还要加强,但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仍然不需要那种奥威尔式的世界。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对此绝望和屈服,并憎恶共产主义。虽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就是绝对的罪或恶,但我们必须记住,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一切伟大的革命事业都要经历曲折的道路。对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我们似乎还应该变得更加善良,更加聪明,更加理性。但我们实际并非如此,而其中的原因的确是可以解释的。这么做是值得的,而不是躲藏在“斯大林主义”的强权统治背后。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想看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辉煌前景破灭的话,我们必须设法找到医治政治异化的药方。我要强调的是,重要的不是“奇迹”,也不是在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天堂的梦想基础上,去消灭国家及其机构,而是要通过理性的社会工程,通过可行性的计划,这种工程和计划将制约罪恶的发展,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为消除异化而开辟道路,这正是异化和扬弃异化理论发挥作用的地方。

如何做?异化和扬弃异化理论对此的建议是什么?我不打算写本社会政策方面的教材,更不打算“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什么建议。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真理永远是具体的,重要的是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化和复杂的关系下,必须根据国内外情况的不同,具体地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无论什么情况,永远要以异化理论作为出发点,牢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加深和加强政治异化,而是要克服并最终完全消除异化。如果我们扩大

了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国家的“各种机构”的权力,那么这就是一种必要的恶——只要它是真的局限于我们坚持的必要范围以内——并且,如果它的力量让我们备感骄傲,就像我们在游行和节日集会声称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非常关注,并采取积极方法来限制这个我们赋予了它生命的巨人(Golem)^①。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记住艾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警告:一切权力都倾向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已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但不幸的是,教训并没有结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那些指引我们的思想家的教导,至少要牢记:国家是一种异化,不消除它,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任何背离这个原理的人——像斯大林做的一样——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并不重要,因为它并没有提供直接的、完全的和有保证的解决办法。那是一些“急躁的人”的说法,并且这种不耐烦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特点。不仅是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深知一个革命者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有毅力和耐心——而且还有社会科学的专家,在总结了社会发展经验以后,都懂得这样的意识一旦被群众运动所内化,就会变成一种力量。思想一经群众掌握,就成为一种物质力量,正如青年马克思所写的那样,这在精神上已经是成熟的思想了。如果我们能够让广大群众关注到异化和扬弃异化的理论同国家的各种问题,当然群众有权利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通过特定的条件将理论具体化,这样的话,经由群众掌握的理论就会对社会工程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些“群众”中也包括“领导”,毕竟没有他们的参加,绝对是不可能的。这样,这一理论似乎作用不大,但同时它的作用又很大,特别是在将一般的理论同具体的实践结合的时候;这种理论没有提供直接的解决办法,但创造了间接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动力,这种力量往往非常有效,如果没有这种理论基础推动的话,是不可能取得任

^① Golem 是希伯来传说中用黏土、石头或青铜制成的无生命的巨人,注入魔力后可行动,但无思考能力,被译作魔像、假人、石人、有生命力的假人等。——译者注

何效果的。

这个问题更为有趣、更为重要,因为它同将来的一个问题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即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管理职能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一问题一直保持缄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没有论及这个问题,“预言”遥远的未来会怎样,可能会陷入一种乌托邦主义者的错误,这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的原因。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当时看到的问题与危险并不像今天这么明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仍将保持其“管理事务”的管理职能。这是很明显的。在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要协调不同线路上的各种活动,包括宇宙航线;必须要关心人民健康,所以要建立医院;必须统筹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与分配,范围还有可能更大;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可以举出更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仔细地看看其中的几个例子。这一切只能依靠某种组织起来的力量来完成。我们也许只是不满意目前的组织方法,但总是要用某种方法来组织的。这种“管理事务”的职能,是由不断壮大的各种类型的自治来承担的,它们的特点就是组织集中、效率突出和分工专业,甚至有必要的话,还要开发强大的超级电脑,而且还需要广泛地扩大干部管理者的队伍。这种组织,以及类似的机构,将会代替国家的组织职能,国家将以这种形式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继续存在。这一设想会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因为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的只是幻想和毫无用处的计划。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幻想。在当今世界生产关系发生剧变的情况下,他们会怎么做呢?如果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在这方面表现得无知,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的国家两种职能的区别视而不见的话,那么他们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相关的著作阅读得不够。

235

下面选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的话(我们在第二章曾引证过),用来说明他们从来没有沉迷于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完全消亡的想象中。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制度的变化(而不仅是消亡)。列宁在笔记中对此做了重点标记,并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这句话。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①

这样来看,马克思毫不怀疑国家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所有职能的消亡,而是要求对此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

在给倍倍尔(A·Bebel)的信中(1886年1月20日—1月23日),恩格斯用不同于拉萨尔(F·Lassalle)等人的方式解释了合作社,他说道: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②

尽管恩格斯谈的只是向“一种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但毫无疑问,他心里想的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国家。

1891年,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也写道,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下才能获得政权,“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列宁在其著作中强调了这点)。恩格斯反对小型共和国的观点,重视国家集中化(state centralization)的价值,“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在我看来,

^① MESW. Vol. 3, p. 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445页。——译者注)

^② MEW. Vol. 36, p. 4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译者注)

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共产主义条件下异化的潜在危险,这个问题在我的作品《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中曾谈到,我的观点曾引起那些试图根据定义来解决社会难题的人们的愤怒。我们都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大批的武装人员”,所以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但是那里将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大批的管理人员”,因而存在着这种意义上的国家(重要的不是名称)。在这种条件下,信息、效能和政策的连续性对于生活的正常运转来说是必需的,所以要求全球范围内的管理者、规划者、组织者等等必须组成一个干部队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幻想,在未来社会里,将有一种全面发展的人,在一天里他可以去捕猎、打鱼、绘画或做别的事(引用马克思的话)。人也可以由于厌倦,到“宇宙计划委员会”那里,吩咐那里的负责人去同他的女朋友谈恋爱,而他自己可以替别人做做计划。把这样的想象当成一个寓言故事也不错。由于未来的世界和今天如此不同,所以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我们就放弃对这一领域的所有研究吧),也根本不能谈论未来的任何事情,但我们还是能理性地预见到,在那里将有许多人民团体,他们严守纪律,密切联系群众,相对来说,这些团体比较固定而且掌握着全球的管理权力。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吗?尤其是关于对管理权力的讨论,比如它的类型?我们在这里正处于区分科学预见和“科幻小说”的前沿。但要看到并说清楚的是,这里可能产生对象化演变为异化的条件。社会控制职能中的一个错误就可能使这些“管理者”以及类似的组织获得自律,这就完全可能产生异化的条件。

那么,即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都不可能先验地排除异化的危险。从扬弃异化活动这个更广泛的视野来看,这自然提高了异化理论在社会工程方面的价值。它将推动我们的后人把这个理论的前提纳入到

237

^① MESW. Vol. 3, p. 4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译者注)

社会规划纲领里,甚至不排除用电脑程序来预报共产主义社会的“异化危险信号”。

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异化理论的社会工程方面的作用仅仅局限于一般的理论及其消极的结论;国家是异化的产物,因此扬弃异化就应该创造消灭国家的条件。公共舆论掌握的这些真理都有其实践的价值,但这些理论都是一般性的,并没有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即哪些条件是在国家消亡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呢?不管怎样,不要孤立地把握异化理论,而是要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获得新的重要的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要全面地发展**生产者的自治制度**。这可能也是一个一般性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没有告诉我们在特殊情境下该如何行动。然而,任何想从一般性的理论中得到这样回答的人,都没有了解一般性理论的作用或者歪曲了它的作用。这个答案能使从异化和扬弃异化理论得出的结论变得具体,而且这个答案可以让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而具体的思考成为可能。任何过分的要求都是不可能而且不应该的。

自治制度的设想应和民主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而加以考虑。同议会制相比,自治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因为它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形式把代表性与执行性融于一体,这一设想是马克思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继承而来的——其中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同样优秀——这个设想也是他们关于社会新秩序的核心理想。自然,如果人们不想把公社和法郎吉等名词转换为当代一种社会新秩序的基础的话(这么做毫无意义),自治制度的观念就仍为一般性的观念。但是,如果我们加上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经验得出的结论——他要求所有等级的官员实行轮换制以及严格限制官员薪水,这时这种一般性的自治制度就带有了特定条件下的特殊性。不过这仍是一般性的提议。可以想象自治制度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在不破坏中央计划原则的情况下的严格执行,这种中央计划原则在当今的社会中越来越成为绝对

命令了。但只要国家作为强制性机构存在,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继承者意味着什么仍不明确。只要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国家继续存在,国家绝不会随着最激烈的反对者的魔棒一挥就消失。

马克思没有解答这一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不想预言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而且也因为他假定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后,国家必将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立即消失,并且在一定时期彻底消亡。然而,我们今天生活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制定出现成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有意识地在世界范围内,并且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基础上陈述这一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仅不能找到解决方案,甚至连这种方法都难以找到了。

从这一点来看,南斯拉夫党决心把自治问题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强调出来,是值得高度赞扬的。至少它没有任由这个问题被遗忘。那些被这种决心所搅乱,并且或明或暗地把这种思想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拒绝的人,似乎忘记了:我们在这里谈及的是包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最权威思想。但是,南斯拉夫的经验绕过了这个主要问题,因为如果在自治制度问题上,我们忽视作为强制性机关的国家的职能,把我们自己限制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上,而且仅仅限定在社会和经济的非常狭隘的范围内,那么这将是事倍功半(the mountain gives birth to a mouse)。我并不是想说这些事不重要,或者说,主张当其他的问题依旧不能解决的时候,应该去解决能够实施的问题是无意义的,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相反地,我认为有必要去考虑所有的问题,包括那些目前还不能实施的问题。不能允许对这些事情置之不理保持沉默,而且不让舆论知晓。那种担心舆论将被败坏,相应地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将被削弱的观点的人,尽管看来似乎是为了国家利益,但是却是配不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与马克思主义者不相称是因为他们应该把眼光放在更加具有战略性的目标上——即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那里,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工具没有

存在的余地。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允许国家以异化的形式畸形发展,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扬弃异化道路上的更大障碍。另一方面,那些主张如果舆论知晓了全部的压迫性工具(不排除安全机构、监狱、军营等)必将在发展中被取缔这一点将会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官僚主义者的头脑中才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公民对它的信仰之上,而且如果他们确信社会弊端仅仅是暂时现象,这种信仰只会逐步增强。

2. 政党。列宁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国家会消亡;民主作为一种阶级社会统治的形式,也会消亡。列宁的论断听起来匪夷所思,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式去取代民主。但是得出的结论很重要,那就是,如果民主会消亡,那显然,民主制度和政党也必然会消亡。

政党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也是阶级利益有组织的表现方式。如果国家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形式(一种强制机构)会消亡的话,那么民主作为统治的具体形式,也一定会随着政党的消亡而消亡。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适用于所有的政党,当然也包括工人阶级的政党。显然,如果工人阶级和他们的特殊利益都已不复存在的话,那么,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还有何必要存在呢?没有国家、没有政党,甚至也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存在的社会,这并不是科幻小说一样的想象,尽管在当前,可能会给人那种感觉。这个论断是为了阐明政党只是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它们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会出现,并且将在以后的阶段消亡。它们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也可能会异化。因此,国家和政党之间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尽管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但国家永远都是异化的产品,而政党则可能异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产阶级政党的确是异化的政党,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它符合所有的异化关系的标准。但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呢?是否像定义中所说的那样,它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所

以,它不会异化?

还是如此,定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希望一个政党是否异化,而是一个政党在实际上是否表现出了异化的特点。

这是我们思考中最微妙和最困难的领域。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了异化特点这一事实已经在理论上被承认,即使是那些保守的“正统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党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疑是不可原谅的异端邪说。这个事例中,我们触及了现实问题,也遭到了既得利益者(包括那些出身高贵和政治原则性很强的人)的反对。但无论如何,我必须阐述一下政党的问题,至少是它已经表现出来的问题。

我们先从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开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不复存在,政党也是如此。政党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是在距今较近的时期才出现的。此外,尽管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但工人阶级政党的概念和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在20世纪初,列宁通过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职能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创造了新型政党的概念,从而改变了原来代表着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的权威性的旧概念。

我的观点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在较近的时期出现的,它总有一天会消失,在它从诞生到自然消亡的过程中,它的组织形式一直在变化,这种变化是由特定历史时期这个政党面临的任務所决定的,也同样取决于完成任务的条件。列宁抛弃了旧式政党,也就是适应了议会民主的条件概念的议会党的概念,提出了新式政党的概念。他的逻辑前提是:在沙皇专制统治的条件下,非法斗争对于政党来说是必要的,同样,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建立在严格集中原则下的政党也是必要的。在沙俄统治的条件下,很显然的是,适应西欧议会政治的政党无法完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革命任务。列宁的立场被后来的结果所证实,只有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才能胜任十月革命的任务。在争取政权的条件下,新型政党已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它的优越性。

241 尽管如此,这种说法表明了某种历史局限性,也含有来源于异化理论的警告。党的概念改变了,并且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甚至恩格斯也满足于旧式政党。他没有提出新的概念,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将可能是议会共和式,是在议会制下领导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在19世纪末,这并不是一种猜想,而是从社会民主党派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方面的普遍规律,尤其是在德国。马克思在更早的时间就预见了许多国家可以和平迈进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只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沙俄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促使列宁改变了党的概念,毫不犹豫地打碎了代表着最高权威的旧传统,哪怕这个传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确立的。在提出新概念时,列宁并没有宣称这是一条绝对性的组织原则,而是强调要把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以及党斗争的条件具体而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几十年来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政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于为争取政权而斗争的具体条件,那么这种形式在党行使政权的时候,在一党统治的体制下,是否依然是最好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呢?列宁的事例已经说明,讨论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列宁很投入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不仅是针对着国家官僚主义,也针对着党的机构的官僚化。毕竟,道路才刚刚开始。此时,革命时期的热力仍在激发着人们心中的崇高热情,尤其是党内和党的机关里的那些人们。

在一种情况下这个党的成员是由那些职业的革命家组成的,他们靠着党的微薄薪水忍饥挨饿,同时要冒着牺牲自由的风险,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投入到造福群众的崇高革命事业中去;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党的成员是由那些职业的权贵组成的,他们享受着物质和社会地位上的特权,掌控着常常是不受控制的、几乎绝对的权力,我们所说的还是同一个新型政党吗?对处于后一种情况中的党员来说,唯一的危险就是冒犯他们的上级。党的组织形式没变,但是内容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这类人,使用“职业革命家”的字眼是很讽刺的。特定

242

的形势使得他们变成了职业的墨守成规者(conformist)。既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用定义来讨论是否已经出现了新的阶级是没有任何结果的,我们这里谈的并不是一个阶级,或者是一个社会阶层。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集团,这就足够了。这个案例中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财产,尽管从阶级这个词的含义来看,是财产把不同的阶级区别开来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也就是按照等级标准、从属关系和服从关系参与到权力机构中的官僚体制,这才是“个人崇拜”这类事件的根源所在。这是一种疾病,一种社会疾病。它不断成长,反复出现,根源就在于权力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制约着这种社会疾病的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社会疾病并没有随着斯大林的死去而结束,只要这种权力的组织基础还继续存在,受其制约,被其诱发的这种社会疾病就会在不同的地方不断地出现。

我只是触及了这个极其重要问题的表面而已,并且刻意地没有谈及细节,不仅是由于这是个危险的话题,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远离我们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异化理论及其工程学的职能。政党能够异化吗?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能,而且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一切做法都只能在一定时间缓解,或者掩盖这种疾病的症状,特别是在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后,除非能够改变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条件。有些人被称为“国家的救星”或者“新时代的开创者”,一旦他们成为“正统权威”,就会让旧的幽灵死灰复燃,很多国家和很多人的身上都出现了这种可悲的现象。既然这种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就不应将其归咎于个人人格或品质的缺陷,尽管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

有人对党可能成为异化的对象这种观点的反应很情绪化,这是不对的。对党和革命的感情不应用对明显事实的语言上的否认来证明,而应着眼于如何纠正错误。不仅是党,就连革命本身都可能异化,这种看起来更激进的观点,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本人说的。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就会看到,

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①

在这封信的手稿里，有一段话，后来被删去了，这句话特色显著：
243 “这可能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它的确发生了。这样描述革命的命运很显然是不被允许的。但恩格斯这么做了，这也使我有勇气提出这个与如何诊治党的异化相关的问题，这个做法未必完全是错的。

那么该做些什么呢？在这个案例中，对于“社会工程”，异化理论暗示了什么？当然，对于异化理论，有些人可能会反应过火，得出激进的、通常很极端的，而且没有任何结果的结论。那就是废除一党统治和新型政党。这种做法无异于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都泼出去。不仅不应该这么做，更不该以革命的名义这么做。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工程采用的解决方法，一定不要那么激进和极端，更不要采取很可能是功利和现实的手段。

同样地，我并不打算从“哲学的高度”提出建议。行动计划必须是具体的，要适应于时空的具体条件。但准备计划的人必须要有指导思想，也就是源于异化理论的总体指导，要把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关于巴黎公社的经验牢记于心。要斩断异化之根，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严格地实行人事轮换制，尤其是高层和最高层；二是要无情地把党内职务和物质特权之间的直接关系链条打碎。做不到这两点，党内民主的基本假设，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各种类型的“崇拜”，无论是个人的专政还是集团的专政，将会层出不穷。

没有必要对这些条件进行评价。重要的是，首先，要废除在党内工作所带来的物质上的诱惑力，从而使党内职务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是每个只考虑自我利益的人都不想背负的责任。其次，要废除由于权力无限延长而导致的官员不受惩罚的特权。有人可能这样回

^①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1965, pp. 384-38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译者注)

应这种提法,他们认为这么做会削弱党的力量,因为有能力的人都另谋他职,另外由于缺少领导的连续性,也会降低党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希望应对党的异化问题,我们就必须废止这种把党内工作看作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有诱惑力的职业的现状。很明显,领导的连续性也不取决于某位领导人是否永远领导,而应取决于政治路线的连续性,政治路线是由党组织集体确定的,这不仅应体现在口头上,更应表现在行为里。任何其他的行为都可能走向异化。

3. 官僚体制。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官僚体制的问题是上文所谈的国家和政党问题的一部分。这两种组织的基本要素就是它们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官僚机构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必需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只要有国家和政党这样的组织存在,也就必须存在着集体形态的人类,它们成为一个被适度结构化的系统里的成员,这个系统的职能就是执行适合于这个组织的任务(适合的含义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在第二章讨论了官僚制的概念以及它的异化状态。我们认为,任何把官僚主义和机构的运作不良等同起来的想法都狭隘地理解了官僚主义的含义。国家或者政党机构里的官僚体制运转得越好,它就越危险,因为它不会引发冲突、不会导致不满,因此,用异化的方式,更容易掌控权力。国家和政党内部出现官僚主义,问题在于权力,因此,这里的异化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异化、政治的异化。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异化形式。它也潜藏着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全部权力“机构”的危险。 244

官僚体制及其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相对于在其他的体制下,要更加危险。正如历史上所出现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人方只有一个,它同时也是唯一的政治权威,并且拥有着实际上无法被社会控制的行政权力。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两种官僚“机构”都受党的机构的庇佑的话,就会看到一幅完整的图画。从方法和手段的要求来看,科学的语言太贫乏、有限,无法充分而信服地描绘它。对此,我们

需要求助于一些文学作品,如奥威尔的《1984》和卡夫卡的《城堡》。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通过直接的生活经验,向我们确证了这种危险的存在。这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至关重要,而且这不仅仅表现为一些次要而有限的问题,比如能力不足,动力不够,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等等。类似这些对官僚制的指责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大单子,但这却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正是列宁,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确认了这种危险性。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列宁在革命以后,直到他
245 去世为止,对苏联国家和党内机构日益膨胀的官僚体制问题的忧心忡忡。他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多声明,并且试图发动反对官僚制的斗争,也直接地呼吁群众,这些都表明了他对官僚制危险性的重视。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意义以及它的“复杂和棘手”,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的卖弄,我会引用列宁的一些讲话和文字增加我的说服力。我想,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对于那些希望从源头上分析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

让我们从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开始。列宁来到彼得格勒后,在4月4日的会议演讲中提出了这些提纲。在提纲的第五部分他宣布,不要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而是要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列宁提出:“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①

并且列宁提到了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

然而,列宁是在十月革命之前阐述这个经验分析的,他对马克思的经验分析会有何反应?1918年4月,也就是《四月提纲》发表后的一年,列宁发表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这里,他提到了苏维埃机构中出现官僚体制的不可避免性,并且试图从国家的小资产阶级

^① Lenin, CW, Vol. 24, Moscow, 1964, p. 23.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译者注)

特性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根源,而且他还建议要让苏维埃**全体成员**,包括工农代表在内,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

列宁希望发动“一场战役,以使全国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学习管理和开始管理”。所以,这将为国家的消亡创造条件。“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是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①

列宁很有预见性地关注了苏维埃政权官僚化蜕变的危险,并且提出了斗争的方法。

当然,小资产阶级涣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发势力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中,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落后以及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对苏维埃产生影响。

246

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8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

^① Lenin, CW, Vol. 27, Moscow, 1965, p. 272.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译者注)

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①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之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

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②

1918年12月,列宁在《论工会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工会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1919年1月18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再次转向了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官僚主义和投机活动……官僚主义腐蚀着我们,要克服它非常困难。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

^① Lenin, CW, Vol. 27, Moscow, 1965, pp. 272-273.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505页。——译者注)

^② Lenin, CW, Vol. 27, Moscow, 1965, pp. 274-275.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507页。——译者注)

争,多派一些工人到机关里去。然而反对官僚主义如果不对准目标,情况就很危险,对待专家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①

1919年3月,一个新主题出现在列宁的《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回答问题》之中,这就是苏维埃机构中官僚体制的复活。 247

下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有许多官僚主义霉菌滋长蔓延的现象,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官僚,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建立了苏维埃。它赶走了旧法官,把法院变成了人民的法院。但做到这点是比较容易的,用不着懂得旧法律,只要本着公正的态度办事就行了。法院中的官僚主义容易铲除。在其他方面,这就困难得多了。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控产党人”,因为不敢说是共产党人,他们戴上红领章,想捞到一个肥缺。怎么办呢?要反复地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就要清除他们,赶走他们,通过工人党员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②

1919年3月,在准备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详细阐述了俄共(布)纲领草案。(文本于1930年首次发表。)在纲领草案的第一条,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消亡背景下的官僚制问题。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

^① Lenin, CW, Vol. 28, Moscow, 1965, pp. 405-406. (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9~420页。——译者注)

^② Lenin, CW, Vol. 29, Moscow, 1965, pp. 32-33.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页。——译者注)

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248

(9)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①

这篇文章很重要,不仅因为这是纲领草案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基于苏维埃政府的职能,尽管它成立的时间还很短。这里包含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成分。

首先,列宁仍然认为,官僚体制就是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的阶级异己分子以伪装和欺骗的方式占领新的国家机器。

其次,列宁认为,完全地消灭国家,以及同国家连在一起的官僚体制是一个现实的目标。

再次,列宁认为,要呼吁群众,要使全体劳动居民无一例外地独立参与到国家的管理工作,这是打击官僚体制的灵丹妙药。

1919年3月1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做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中,用更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他不仅强调了官僚体制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是提到了官僚体制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

^① Lenin, CW, Vol. 29, Moscow, 1965, p. 109.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加的——亚当·沙夫)(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译者注)

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象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①

1919年4月4日,列宁回来主持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会议上,他抨击远离中心的农村官僚制的问题,在那里“一些自称为党员的人,往往是一些横行霸道的坏蛋”^②。

1919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中写道:

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的党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官僚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以及怎样防止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尽量节省这些力量,尽量减少拖拉现象和繁文缛节,尽量精简机构,尽量使这个机构不仅知道群众的疾苦,而且能为群众所了解,能使群众独立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③

249

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题目是《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他的分析比以往更尖锐,他第一次详细地谈到了党内官僚主义的问题。

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同时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又复活了。这是大家公认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

^① Lenin, CW, Vol. 29, Moscow, 1965, pp. 182-183.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译者注)

^② Lenin, CW, Vol. 29, Moscow, 1965, p. 265.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译者注)

^③ Lenin, CW, Vol. 30, Moscow, 1965, pp. 421-422.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页。——译者注)

是要彻底消灭旧的机构(就象十月革命时那样),把权力交给苏维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又承认,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许多工农没有文化,不识字,更谈不上较高的文化。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过去都忙于军事任务。无产阶级为完成军事任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不得不动员千百万农民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且必须吸收满脑子资产阶级观点的分子参加工作,因为再没有其他什么人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党纲这样的文献中指出,官僚主义已经复活,应当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显然,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这就是说,既然我们意识到了,旧官僚主义这种坏现象可能在党的机构中表现出来,那么在党的组织中有这种坏现象的各种迹象,就是很明显,很自然的了。因此,这个问题已经列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议程,还引起了这次代表会议很大的注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①

列宁在《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全体共产党员大会上的报告》(1920年11月29日)^②中再次谈到了党内官僚主义的问题,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指出:“官僚主义的脓疮无疑是存在的,这是大家公认的,必须同它作有效的斗争。”^③

会议期间,列宁的言辞更加猛烈,他说:“有些人,譬如库图佐夫(Kutuzov),有一部分话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们机关中的丑恶的官

^① Lenin, CW, Vol. 31, Moscow, 1966, pp. 421-422. (引文中的着重是我加的——亚当·沙夫)(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页。——译者注)

^② Lenin, CW, Vol. 31, Moscow, 1966, pp. 434-436. (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译者注)

^③ Lenin, CW, Vol. 32, Moscow, 1965, pp. 190-191.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译者注)

僚主义现象。我们回答说：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我们号召非党工人也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①

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中，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拿官僚主义问题来说，从经济方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吧。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又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党纲，在这个党纲中，我们讲得很直率，我们不怕承认祸害，而愿意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唤起同祸害作斗争的想法、意志、毅力和行动，我们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讨论了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②

很明显，党内已经出现了关于官僚主义根源的争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对争论进行了总结。如同我们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争论对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列宁不断地在寻找官僚体制的经济根源。他认为原因在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

^① Lenin, CW, Vol. 32, Moscow, 1965, p. 212.（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译者注）

^② Lenin, CW, Vol. 32, Moscow, 1965, p. 351.（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218页。——译者注）

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那时四面被封锁,被包围,与全世界隔绝。“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①

一个月后(1921年5月21日),列宁回到了同官僚主义斗争这个问题上来。在他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的第8条《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方法和效果》中,他写道:

起先对这个问题的汇报大都可能是很简单的:既谈不上什么方法,也谈不上任何效果。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人们都读过了,但是也都忘掉了。

251

这方面的情况虽然令人失望,但是我们决不能学那些灰心丧气撒手不管的人。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主要是同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的。同这种弊病作斗争只有经过多年的顽强努力才能取得成效。^②

当时情况一定非常糟糕,所以列宁非常尖锐地说了这个问题。考虑到讨论的时间以及反对派的指责,他非常愿意相信官僚主义的问题主要是由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破坏而引起的。“这项工作无疑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虽然不会象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快,这些人不是为采取各种具体措施而进行坚韧不拔的工作,而往往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变成空谈(或变成重复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所散播的诽谤)。”^③

1922年,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

① Lenin, CW, Vol. 32, Moscow, 1965, p. 352.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219页。——译者注)

② Lenin, CW, Vol. 32, Moscow, 1965, p. 389.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译者注)

③ Lenin, CW, Vol. 32, Moscow, 1965, p. 390.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页。——译者注)

草案》里,列宁解释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出现罢工的现象,他认为原因是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①。

那时候,列宁已经重病在身,但他仍然同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保持着通信往来。在一封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提纲的信件中,他用非常激烈的言辞诅咒“共产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②。在一封给政治局的信中,他建议要教会工人管理的技巧,同官僚主义斗争。^③

我的目的很有限,就是要说明列宁看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制(并且认识到官僚制的危险),是异化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列宁写道,官僚主义已经是一种性质全新的现象。任何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能确认官僚主义的存在。

在这个实例中,对异化的扬弃都包括什么呢?对于扬弃异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自治。还是先回到国家消亡这个问题上来,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列宁总是要求要吸引所有的工人参与到国家的管理工作中,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最主要手段。不管是否我们使用了自治这个词,这都意味着已经最大范围地实现了自治。如何实行自治,又如何组织自治,对此,列宁并没有采用现成的方法。有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那就是多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然后总结他们的经验。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敬仰的总结,指出,对所有的官员都实行选举和召回制度,限制他们的薪水和物质特权。这就是列宁给出的全部答案,内涵很丰富,足以给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虽然寥寥数言,但幸运的是,完全可以给予任何现成的方法以操作层面的

^① Lenin, CW, Vol. 33, Moscow, 1966, p. 187.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页。——译者注)

^② Lenin, CW, Vol. 33, Moscow, 1966, p. 239.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莫斯科,1966年,第239页。——译者注)

^③ Lenin, CW, Vol. 33, Moscow, 1966, p. 354.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莫斯科,1966年,第354页。——译者注)

启示。

说到“幸运”，是因为当前社会工程领域里的教条主义如同厄运一样，成为阻碍解决真正问题的绊脚石。今天的情况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当年被看作是导致官僚制问题的原因，诸如战争影响、文化落后等等，都早已不复存在。列宁时期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工作作风懒散，效率低下，这些问题同今天社会主义国家里的问题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虽然存在着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但同样的现象如同被“复制”一样，可以精确地多次重复发生，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必须找出一定的规律性，才能够有效地解释官僚制的新变种，而不仅仅是列宁当年所强调的那些。）今天，我们要应对的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行动效率和能力都很强的党的官僚机构，它比列宁时期更符合官僚制的规定性。最重要的是，也让我们感觉最危险的是，这个官僚机构非常强大，强大到离开了它，按照现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哪怕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它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将自身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经常同社会发生矛盾和对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异己力量。这也能够准确地说明，为什么它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控制的明显例子就是把异化理论从“官方”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中“驱逐”出去。（这里会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历史上的罗马天主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同列宁时期相比，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如同要打扫奥吉亚斯的牛圈（Augean stable）一样，需要力大无穷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an）才能完成这项艰巨无比的任务。列宁当年热烈地呼吁人们同官僚主义做斗争，他的讲话里也不时地流露出悲伤的语气。清扫奥吉亚斯的牛圈需要巨大的力量，然而今天同官僚体制的斗争，它的艰巨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清扫奥吉亚斯的牛圈。同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能的党的官僚体系做斗争，勇气也很重要。任何想试图搬动这座“官僚主义的堡垒”的人都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对手非常强大，并无情地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利益。更危险的是，官僚

体制通常利用其信徒的狂热信仰,甚至通过那些完全切断了自身同外部世界,以及同任何可能侵害其“信仰”的信息的“封闭的头脑”,来维护其地位。然而,世界不断在发展,这种异化现象也必然要被克服。我们看到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现实的压力。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看到,当前形势的僵化保守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灾难,最终会导致官僚“机构”的保护伞,也就是这个迷信的破产。第二,“机构”的成员是人。随着越来越年轻的人成为机构的成员,他们的思想相对来说不那么封闭,他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当前这种形势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这里必须要看到的是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和赫鲁晓夫的人格魅力。赫鲁晓夫完成了赫拉克勒斯式的艰巨任务(Herculean task),打碎了斯大林的神话,“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绝不是直线前进的。

我们这里所谈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为了解决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极端思想充斥其中,我们看到那些思想单纯、容易轻信和盲从的人们是如何迷失于其中的。这是“极左”思想的典型特征,有想通过无政府主义来拯救人类的,也有想通过宣传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实在是非常困难,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已经知道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就是高级形式的民主——也就是自治。(考虑到历史上由于实践高级形式的民主而造成的悲剧已经超过了高级形式的民主这个词本身,所以要谨慎地补充一点,高级形式的民主通常包含着低级形式民主的积极成分,要增加新的成分,而不是把人类历史的文明成果抛弃。)另一方面,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在实践层面实现高级形式的民主。那么,重要的是要打开社会反思和试验的大门,不受任何禁忌的限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头脑中是没有任何禁区的。在这个过程中,要看到官僚制是异化的一种,那么任务就是要找到一条扬弃异化之路,消除滋生异化的社会条件,认识到这些是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的。当然,同那些需要完成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因

为实践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但认识同样很重要,因为它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他们的思想绝对化,而是坚持认为他们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

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很多的社会机构也有异化的表现。我们暂且不论这些,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现象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人与自然、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254

(二)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层面

先从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开始吧——自然界或者同自然相关的现象能否被概括为异化?我们所谈的是客体的异化,但所谓的客体的异化实际上掩盖了人类的一种特殊关系,即产品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自然能否被看成是“人类的创造”?自然界是否是一种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的存在?

在这些问题里,很明显有两个问题被混为一谈了:第一,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自然状态是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第二,我们实际上面对的自然界是否是人类的创造,或者它仍然拥有一种“原初”的属性?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站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当然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当然具有客观性,它独立存在于人的认知之外。但这绝不意味着唯物主义者否认自然是人类创造的产品这一哲学观点。很清楚,这种表述有特殊的含义,也就是,以世界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自然,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力量和自然规律单独作用的结果,相反,不管是好的抑或是不好的影响,人类都已成为自然界当前存在形式的共同创造者。

这里,我们对消极意义上的人对自然的共同创造(co-creation)尤其感兴趣。这个问题是和“人与自然”或“人与人的自然环境”的关系有联系的,并且被罗马俱乐部称为“人类的困境”,这些问题现在引起了大众的普遍关注。我在这里谈的主要是同人口激增相关的生态问

题,人类生活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消耗问题,最重要的是食物(饮用水)问题,生产物质必需的原材料(包括作为能源的原材料)问题,以及不断加剧的自然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等等。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我并不打算提及问题的细枝末节,也不想对此进行讨论。重要的是,人类不能不考虑任何后果地控制着自然界,否则势必会受到惩罚,被这样“利用”的自然界将会成为一种反对性的力量,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也就是人类的自然环境,可能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

让我们从与人口问题相关的生态学来探讨。生态规律是客观的,人类不能无视规律。澳大利亚的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当年人们单纯地为了消灭成灾的田鼠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却引发了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猫的过度繁殖是并不明智,也不是深思熟虑的措施,最终引发了这样的后果。如果人类无限制地繁殖的话,那么地球将会怎样?这就是设定的“人口激增问题”。毫无疑问,“指数级增长”的计算方法,并没有考虑到当今世界的社会差异性,这个世界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富得营养过剩的人,也有穷得食不果腹的人。这种方法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问题,对于那些生活在落后、贫穷和饥饿中的人来说,它也不可能解决在他们看来更迫切、更重要的问题。但是,那种不承认人口问题,并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发明”和幌子的逻辑,也是错误的。即使我们接受了所有的指责和批评,这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们坚持的基本论点的正确性。这个基本的论点就是,世界人口不受限制的繁殖会引发严重的危机,在人类无法控制的极端情况下,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无论是革命的宣言,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尔萨斯的新人口论”,都无法改变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最后的“争论”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在19世纪,一切和我们今天都有所不同,恩格斯当时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这个观点和他更多的

255

代表性观点都有密切的关系,后来,斯大林批评了这个观点。斯大林认为:社会发展既是由物质资料的生产规律决定的,也是由物质资料的生产者的规律,也就是人口规律决定的。我不想对历史发展的一元论问题进行争论,只是想说明,草率地把人口问题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并认为这样做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存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必然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对自发性人口繁殖的限制。但不幸的是,赞扬革命与完成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在大多数我们关注的案例中,考虑到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明确反对控制人口的做法。

256 那么,是否我们就该把人口激增问题束之高阁,等待到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地取得胜利的那一天,而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不受控制的人口激增问题的第一批受害者和牺牲品呢?这当然是一派胡言,而且目前的形势也并没有那么严重。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在口头上把人口激增问题看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阴谋”的人在本国的实践中也表现得非常理智。他们非常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生育——甚至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可以看到通过立法对人采取绝育的手段来控制生育率的做法。

所以,不否认某些人口爆炸理论在意识形态上具有资产阶级属性,也不否认帝国主义的压力会导致人们对人口问题的真实状况和背后原因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此。当前对于全人类来说核心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前人类人口发展问题是否表现出了一种指数级增长的趋势?如果想要避免在人口增长和满足其生存需要之间出现失调,那么是否应该自觉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异化问题就展现出了它的全貌。

最重要的是,是人自身的追求增长的力量摆脱了人类的控制,演化成为一种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力量。在过去的时间里,人类同疾病的斗

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人类寿命,这一切都降低了人类的痛苦,提高了幸福度。然而,由于没有考虑到生态因素,由于没有控制人口,人类正进入到一个人口激增的阶段,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果就是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势必从根本上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人口爆炸,以及富裕国家对消费的人为刺激,将会使全球自然资源处于被耗尽的危险中,而且,替代性材料的生产只能部分地弥补这种消耗。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要消耗资源,而为了保障这种消耗,人类又必须生产。生活水准高的人必然消耗得多,也生产得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将会产生双重后果。首先,除非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是无限的,但很明显,并不是如此,那么它们可能会被耗尽;并且,如果找不到替代品的话,对于地球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令人惊讶甚至难以置信的是,人类目前发现的原材料是多么有限,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维持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其次,没有节制地发展生产、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化工产品(包括农业)以及没有办法避免有害物质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将导致对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因此,人类的单方面行为导致了始料未及的结果,这个结果由于已经摆脱了它的创造者的控制,因此,对人类的生存形成了威胁。 257

这些都是异化的典型案例。在所有这些或相似的案例中,扬弃异化就是要消灭能产生异化过程的关系。这意味着必须总是具体地确定问题;就人口爆炸这个问题来说,扬弃异化就要控制社会的生育率;就原材料的消耗问题而言,需要更经济地开发和利用资源,限制富裕国家的消耗,回收旧产品,提高创新水平,用人造品来替代自然材料;就污染问题来讲,需要采取适宜的保护措施或净化手段。扬弃异化的这些行为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正如与之相对的异化现象一样。然而,无论在异化或扬弃异化的典型表现中,主导性的问题都是人口问题。

同样,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分析具体问题——这样的做法在大

量的文艺作品中存在——我只是想说明,这些都是异化现象,它存在于当今世界所有的社会制度下,当然也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不仅和异化的出现有关,更是和扬弃异化的可能性相关。在“人与自然”这个层面上,这个问题的特点就是它的**全球性**,不管是从异化的起源,还是从是否能扬弃异化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也不可能是在世界的局部地区。这就给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问题的克服带来了光明,同时也表明,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异化,并且试图通过文字游戏的方式来还社会主义一个“清白”的做法是错误的。

258

(三) 人与其社会地塑造的性格之间的关系 的层面

我们把自我异化理解为一张关系网: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身性格的关系。这些关系中的主体都是人,因此,异化的正是人本身。

很显然,像自我异化这种形式的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对于那些对社会和他人存在敌意的人来说,这种异化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犯罪行为。当然,会有一些“热心肠的人”否认这点,或者认为我们只是看到了社会上的少数派,这并不是社会的典型代表。我并不关心这样的“政治宣传”,但任何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都可以从直接的生活经验中看到大量的这种异化的“产物”,而且这并不局限于社会的少数人群。像盗窃公共财物、不参与公民事务这类自我异化的表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于与社会相关的异化,我在第三章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这里就不再赘述和补充了。但人与其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因为这个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之一有关,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反对用形而上学的观念来看待与“人性”或

“人的本质”相关的人的异化概念,因为这种观念总是假定有某种超历史的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而这些又表现为某些可以列举出来的要素。从物种的角度来看,是某种生物特征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而形而上学的观念不可能比生物科学研究得更深入,因为它概括出来的某些要素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既不鲜明,也不精确。一切都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都是发展变化的,都是社会的产物。

当我们谈到人同“自我”或性格异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又是什么呢?在极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有些人有某种心理疾病,无法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表现在病理学上就是个人身份识别障碍,从广义上来说,“异化”或“自我异化”是可以适用于这些案例的。但我们这里谈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自我异化,指的并不是这样的案例。恰恰相反,我们指的是心理上正常的人,他们可以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自我”,即使他们无法科学地定义“性格”的概念,他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自己性格的特征。

然而,确实存在着某种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解读方法,它的含义是具体的。我们这里所思考的并不是假定每个个体所固有的、超历史的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的模式。它是基于某种社会认可的价值体系而形成的,是一种人应该是什么的模式。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个体“自我”或者一种特定的性格,而是这样一种“自我”或性格的模式,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新人”的构想。 259

这种解释问题的方法并不新颖,也不特别,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当人们谈到作为一种尺度的“人性”或“本质”的时候,它事实上总是求助于一种模式。它假定有某种固有的、超历史的人“性”,但实际上运用了一种构想,也就是建构了一种在一定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模式。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很容易把人性的行为和非人性的行为区别开来,但如果我们将这样的价值判断转换到另一个时代或者另一种社会条件的话,我们一定会感到困难万分,除非我们不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价值体系当作是“天

然”正确的,而成为一个历史相对主义者。这个问题同关于道德规范到底是绝对精神决定的还是历史决定的争论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来自于一定时期社会认可的价值体系。

正如人可能同社会机构或他人的关系异化,他同样也可能同他形成的被社会认可的性格发生异化关系。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尤其普遍。我们有个“社会主义新人”的模式或理想。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存在着人的性格特征同这个模式矛盾、冲突的现象,如犯罪、盗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等。“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实际上就要扬弃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性格异化的表现,也就是,采取社会手段,斩断异化之根,形成新的性格。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因为在异化-扬弃异化的理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扬弃异化,因此,全部的理论,包括描述性部分,也都应服从于此。

那么,该怎样描述这些问题,尤其是人同其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呢?我们的目标是一种积极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某些活动来实现对性格异化的扬弃。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角度来说,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典范的就是马卡连柯(Makerenko)的《教育诗》,这是一部有名的作品,但它的理论价值却远被低估。这部作品也可以被叫作“扬弃异化之诗”。

我想采用马卡连柯的展示法来描述我打算处理的问题。我们并不关心表现出来的自我异化的类型。如果我们想实现扬弃异化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把人培养成符合“社会主义新人”的模式的话,那么运用《教育诗》的方法,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行动。

这个模式是什么?虽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和阐述它,但这个模式总是向上的和美好的,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现实,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超人”。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完美的人是美和善的统一。马克思心中的完美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接受了全面的教育而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今天,我们似乎已经“遗忘”了马克思的观点(遗憾的是,很多人觉得这是不现实的目标。但它

却能给那些追求美好未来的人以力量和提供现实路径)。对于那些致力于社会事务、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并时刻准备为崇高理想和正义献身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品质,更应从文学的高度,而非清晰的理论指向上,去判断它的价值所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个体的品质,而是一种“新人”或“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表现。在韦伯看来,这太理想化了。但这是一种模式。任何偏离这种积极模式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异化的特征。应该通过适当的社会手段来克服这种异化的表现。但该怎么做呢?

最常见的回答是,应该为这种转变创造客观条件,而且,应该在这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采取方法来塑造人的社会品质。这个答案虽然看来很空泛,甚至很平庸,但它的确有助于我们把握深刻的真理,那就是,在人的教育方面,光有政治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宣传也是必需的。如果人们并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再好的宣传也无法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人们的心并没有对宣传的作用“敞开”大门。这是和客观条件有关的。换句话说,扬弃异化,也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活动,不是单纯有好的动机就可以做好的,更不能凭主观的意愿来进行。它在结构上与社会关系的转变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它取决于社会条件的“成熟”。

在上文所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中,马克思强调,如果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条件并没有成熟,这个条件就是社会发展到很高阶段(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以及许多高度发达的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一切旧时代的沉渣”都会重新泛起,尽管可能会改头换面。马克思对此的理解并非在政治上反对革命,而是说人们之间仍然是适应于旧的阶级社会的那种肮脏的关系,而不是适应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模式而建立的新关系。

马克思说:“只有当不足和贫困成为普遍状态,为争夺必需品的斗争才会再次开始。”马克思是在赞颂“消费社会”的理想吗?而这种思想目前受到发达国家各种程度不同的左翼团体的攻击。答案当然是

否定的。消费社会是一种具有异化的需要的社会,这种异化的需要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即经济繁荣的普遍化的假设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情形有所不同,不是人为地开发的需求的普遍化,而是根本需要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普遍化。这是人们对于政治宣传的新理想能否“敞开”大门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用正义、“清白廉洁”、社会团结(可理解为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反义词)等字眼更容易打动人心,更容易同消费社会的态度做斗争,这种态度是建立在被人为开发的需要的基础上的,把消费变成了自身存在的目标。相对来说,衣食无忧的富人比起饥饿、贫困的穷人更容易接受这些思想。实际上,这些政治宣传口号在特定的时期会对人们产生极大的影响,如革命热情高涨、民族危亡或者大规模热潮发生的时候,虽然它持续的时间很短。

对于人们而言,向政治宣传的“社会主义新人”开放,或者换言之,向社会主义的人的扬弃异化开放的第二个客观条件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实现了政治自治和社会自治。自治的形式是具体的,要适应于特定的条件,但是,自治的总体思想是清楚无误的。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自由生产者”,应该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而掌握社会生活的**所有**事务,这样才能把那些凌驾于公民之上、在社会生活中取代了公民的、异化了的**所有**社会机构排除出去。消灭国家、政党和官僚制度等等并不是乌托邦式的要求,而是要创造有利的条件,以推动这种变革的进程。因此,当我们使用“自治”这个词的时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机构,而是这个机构自身经历变革的过程。只有这种机构和过程的存在,才能使人们对社会参与和社会责任的宣传敞开心扉,也只有它的有效措施才可能使人克服对社会的“异化”表现和态度,也就是说,只有它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在这方面实现对异化的扬弃。这是自我异化与客体的异化,以及与扬弃异化的进程相互关联的经典范例。为了克服某种形式的自我异化,必须首先克服自我异化的基

基础,也就是客体的异化。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首先完全扬弃客体的异化,以便后来能够开始推进产生于客体异化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活动。从社会工程的角度来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完全是瞎胡闹,这也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同样胡闹的想法是认为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异化就能自然地克服掉。语言本身,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打造的宣传话语,也不是足够强大的武器。马克思的确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掌握群众”是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意即要为重要的宣传思想能掌握群众而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思想才能广泛地被群众内化和吸收,他们才能“敞开”心扉接受这些思想。尽管语言很重要,但光有宣传语言还是不够的,必须为人们接受这些思想创造可靠的基础。正如古语中所讲的那样:“话语容易消逝,行动才更可靠。”

第三,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全面发展的人”。为了使这一点不停留为空洞的口号,就必须要为人的能力和技术的全面发展创造客观条件。这要求在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上进行彻底的革命,进而在社会教育系统上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消灭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也就是工农差别)的目标。这些源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看起来是乌托邦式的目标,在今天生产自动化的进步过程中,已经有了实现的现实基础。问题的关键是生产的完全自动化,以及相应的在社会教育的所有领域爆发的革命,这才能为新社会的人们接受“全面教育”创造可能性。同时也要避免因为人们空闲时间过多,而造成的无所事事的“空虚症”的出现,即空闲的堕落。要澄清和补充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再次重申,问题的关键是,不能等到生产的完全自动化完全实现以后,才开始推动变革;而是要在现在就开始采取措施推动变革,并且要清醒地认识到生产自动化过程的基础性作用,它对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在涉及宣传功能的技术时,应该创造客观条件。这不仅在于上文所说的古语“话语容易消逝,行动才更可靠”,并且宣传口号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能否创造出让人们内化和吸收这些思想的客观条件,而且还在于,如一句德国谚语所讲的那样,我们不能“用水来传教,自己却喝着红酒”。言语不能明显地偏离行为、偏离事实。从人的人格转变方面来说,尤其要注意这点,也就是从个体的或集团的利己主义到对平等、友爱等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很显然,一个盗用公款的人无法教育别人清白做人;同样,一个滥用职权、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的人,却在鼓吹社会平等;一个在理论上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却在实践中实行的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如此种种。所以,毫不奇怪为什么政治宣传如此低效,是因为现实已经证明它是个明显的谎言,尤其是当那些宣传者的行为和他们的语言不一致的时候。

第五,要达到一定的政治条件,要保障政治自由,也就是个人的言论、集会、出版和信息自由,要鼓励独立思考、激发公民精神。要成为真正的、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具有主人翁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就必须培养他们的这种素质,也就是独立意识和公民精神。这种素质应该得到鼓励,特别是同社会黑暗现象做斗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公民的勇气和精神,更应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回报。换句话说,应该唤醒并培养人们的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以同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做斗争。这些都和政治体制关系密切,只有在最广泛的民主条件下,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计划才可能成为现实的目标,而不是成为背离民主行为的烟幕。再次强调,我的目的并不是批评,而是提出同异化斗争的必要条件,这对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要。不再有人否认这种民主不是“我们的”民主,因为拒绝民主就等于拒绝社会主义民主。

264 我们关注的是人们的社会性格的培养,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性格”?

社会心理学的不同学派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代表性

的观点有拥护本能理论的一派,有支持环境决定论(行为主义)的另一派,也有处于二者之间的调和观点。也有试图把精神分析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这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是一种特别的解释。弗洛姆就属于这种流派。在我看来,他的理论推动了目前个人,尤其是社会性格理论的发展,这是最有创造性的理论,也是我们分析时必须要考虑的内容,不管他是怎样解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关系的。我个人认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有创见,当然这本身就是争议性极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弗洛姆对社会性格问题的解读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哲学上和心理学上的一些理论预设搁置起来,接受他的社会性格理论。研究成果往往是独立于其理论创造者的,这是科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当然,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理论创造者的作用,是他把通向研究成果的道路和研究成果自身有机地联系起来的。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弗洛姆的许多著作都推动了社会性格理论的发展。他和米歇尔·马可比(Michael Maccoby)合著了一本书,名字叫《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一项社会心理分析研究》,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清晰而完整地阐述了社会性格理论。^①他写这本书的动因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很有意思,他就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把马克思的上层建筑依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用一个具体的实例表现出来。弗洛姆引入了社会性格这个概念,像通过过滤器一样,人们的行为基础就渗透在他们的社会性格中,他解释了为什么在相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上层建筑。在另一本论及人的攻击行为的重要著作中,他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社会性格理论。^②在经弗洛姆授权的德国出版商对他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部著作的思

^① Erich Fromm and Michael Maccoby, *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 Englewood, N. J., 1970.

^② Erich Fromm,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ew York, 1973.

想精髓。^① 如果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推荐去看下这个访谈,这个访谈用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对弗洛姆的理论进行了阐释。^②

说了几句题外话后,我们言归正传。按照弗洛姆的概念,我们理解的“性格”是什么?“社会性格”又是什么?

265 我们理解的“性格”是(当然也有其他含义)人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并决定着人的感知、思想和行为的,为生存而奋争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性格不仅仅是生物体身心作用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由特定的人的个体经验所决定的,它更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通过不同的方式(社会教育),基于一定社会所认可的价值体系而为人量身定做的人格模式就会传递给每个个体。正是这套价值体系成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行为选择的动机基础。决定动物行为的基础是本能,而本能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影响很小。人类的强大,正是由于另一种动机基础取代了本能,这使得人可以做出迅速的抉择。这就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性格,他起到了“第二本能”的作用,可以使人迅速地、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当代分子生物学提出了遗传密码的理论,他们认为人还有另一套密码,那就是文化密码。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社会性格”的概念。有一种很陈腐的观点认为,人在性格方面都是一样的,那么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就是个体的身心条件(遗传密码),以及个人经历的作用,尽管他们受同样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然而,这种陈腐的观点对于更深刻地分析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否认人的性格中存在着个性,但个性是在一定时期内在社会中形成的,从根本上说,个性是普遍存在的,它当然也存在于人的性格中,理解这点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性格”是特定的个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为生存而奋争的一个体系。重要的是,人们通过其社会性格而拥有了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行为

① Erich Fromm, *Charakter und Aggression*, in *Wissenschaft und Weltbild*, Vienna, No. 1, 1975.

② Cf. Francois Jacob, *La Logique du vivant*, Paris, 1970, p. 342.

(认知、思想)的动机。一个武士社会会对其成员传递武士模式的信息,这个社会里的人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和寻找满足感的。一个崇尚和平与合作的农业社会,在对其成员性格施加影响时,会传递完全不同的个人模式的信息。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同主流的社会性格相抵触的“社会适应不良的人”、叛逆者和异化分子,但这并不会危及主流思想。这种理论能够解释反抗现存社会秩序和争取变革的“叛逆”萌芽是如何产生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格是适应于“消费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想让人们“敞开”心扉接受宣传口号和新的个人模式的话,也必须(重要的是为社会生活的新秩序而创造客观条件)要培养适应于这个社会的社会性格,也就是说,要实现人们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而愿意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实现人们按照社会的需要去思考问题、体会感受和做出回应。这不是灌输,也不是“奥威尔式的专制世界”,这是每个社会都存在的必需品。重要的是,这必须是其自然的、独立的发展结果,尽管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主动地培养和唤醒这些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要素。强制性的做法将会使问题扭曲,而且不但不会出现理想的结果,相反,只能将通向理想结果的大门紧紧关闭。

266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格。假设这样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如果要提高社会成员扬弃异化的效果,就有必要展开一场坚决而持久(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战役来宣传新的社会理念、人格模式和新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要教会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直接地要求人们接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效果最差的方法。通过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等间接渠道施加影响效果要好得多。但最重要的是,只有那些在身边出现的,并被社会所认可的个人模范才是教育效果最好的方法。

原始社会的人们对“话语容易消逝,行动才更可靠”这句格言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尽管他们只是很模糊地通过教育传统来表达这个含义。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这些团体里有教育年轻人的传统,因为对于社会

性格的培养,最主要的就是在年轻时期,即使这个时期不是唯一的接受教育的时期。例如,当一个由武士组成的社会想要对社会中的年轻人的性格进行培养时,就会在社会实践生活中展示给他们勇敢的社会性格。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勇气、对肉体痛苦的忍耐力等等的正面评价才会以主流价值观的形式得以表现,同样,这种主流价值观在歌曲的传唱中得到了升华,也通过英雄们的社会地位反映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教育年轻人准备吃苦,勇敢地面对危险与死亡。这些简单的教育仪式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我们从这些仪式中发现了上文所提到的种种表现,也就是,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人格模式、给人们灌输重要的价值观,以及社会性格形式的内化。有了这样的社会机制,无论是同社会相关的自我异化,还是同人的性格模式相关的自我异化,实际上都无法存在了。关键不是把这样的教育工作复制到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可能而且必须要做的是,如果我们想取得好的教育效果的话,将这三者(社会实践、教育工作、个人模式的内化)之间的关系运用到社会性格的培养中。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会破坏整个工程的结果。

言归正传,如何克服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问题?如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并且主动地将适宜的人格模式灌输给人们,以培养人们的社会性格。考虑到特定时空的条件的不同,这些一般的原则可以转换为具体的方案以解决具体的问题,单纯依靠药方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有一个问题需要再次强调,那就是,政治宣传本身胜任不了这个工作。如果没有适当的物质条件的创造,如果没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且是实际的民主而不是口头上的民主,如果没有赋予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模式以鲜活而生动的生命力,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宣传工作不仅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恰恰相反的是,空洞和虚假的政治宣传只会让那些口号和价值观因失去公信力而变得一文不值。

教育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不是一种单独的行动,而是一个

过程,而且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马克思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教育和培养也同社会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的变革和转型要求人们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社会性格的变革也是如此。这个变革没有终点,所以社会教育工作也不可能终止于哪一场“战役”。原始狩猎武士部落传授给年轻人知识的传统一直保持不变,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社会中所有的要素都是可变的,因此他们的个人模式和社会性格也处于变动之中。

自从斯大林时代开始,马克思的永久革命理论即便没有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也沦为了边缘化的背景。斯大林同托洛茨基(Trotsky)的矛盾主要是和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有关,同马克思对政治斗争实践的解读和结论有关。托洛茨基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论据,批评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这个理论“消灭”的做法,丝毫也改变不了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实,任何一个配得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称的人,都不能把这个理论从自己的政治设计里排除出去,而不受到任何惩罚。撇开这场20世纪20年代的争端的焦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理论不过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思想。我们不对中国这场政治事件做任何评价,我们应该同意,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发展,那么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也必须不停顿地继续发展。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文化不仅表现为功能和结果,也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是塑造社会性格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要忘记,文化革命的口号,不是别人,正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

没有哪种社会形态,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在内,能摆脱异化的危险,因为人的对象化是一种超历史的现象,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对象化会演变为异化。那么,无论从异化还是自我异化的要求来说,都存在着

同这种危险斗争的必要性。因此,同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斗争,或者同它们出现的可能性的斗争,是一种不变的先决条件,一直会延续到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使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变成可能的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是,使人免于异化的社会制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说道:

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要求摆脱一种十分明确的发展方式。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我们还曾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會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①

在古罗马,当共和国遭遇严重危险时,元老院通常会宣布“为了共和国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这种对异化的“警惕”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应是必需的。要保持警惕啊!

^① MECW. Vol. 5, pp. 438-4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516页。——译者注)

代跋语 论革命的异化

271

对革命理论的关注取决于革命形势的增长,这样的断言似乎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无论从常识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这一断言还是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因为它在社会实践展示出不断增长的革命可能性时表达出对理论关切的需要。

这样的情形正构成目前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即使是外行人也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已经确立的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在许多国家,包括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开始失去平衡。另一方面,对新的结构的探索也在不断增强。这两种现象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新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寻求及其实现,总是伴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和摧毁。社会革命理论以人们的意识形式来反映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

当然,那种导致某种社会政治结构被其他社会政治结构所取代的转型,并不必然总是表现为革命的转变。有些结构和机构可以被适宜的改革所重建。尽管如此,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的和基本的转型通常意味着革命。

我在这里是把“革命”作为“进化”的对立面来使用的。就革命而

言,我们所讨论的是与量变相对立的质的变化,是连续性的断裂。这个定义并非强调在全部细节上都是充分的和精确的(例如,与“量的”变化相对立的“质的”变化意指什么?)。但是,这个定义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已经足够普遍和准确了。“社会革命”的说法被用于意指那种导致(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改变,而不是只影响内在于这一形态的特殊机构的变化。可以用事例来有效地说明。继承法和高收入所得税的变化(甚至是它们的激进的变化)只是资本主义结构框架内的改变,而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工人阶级接管政权(即便某一措施的实施有所保留)则是一场用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取代另一种形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革命。类似地,“政治革命”的术语指涉给定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变革(例如,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议会制转变为极权制等),这不同于这一体制框架内的具体机构的改革。这些例子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即在我们讨论“革命的变革”时可以防止被误读。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变化的年代。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并非总是社会主义革命;非殖民化和所谓第三世界的兴起,是继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后 20 世纪最深刻的政治革命,但它们绝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与此同时,在西欧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所展开的预示着社会主义的进程也变得非常引人注目——这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低潮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一个高潮。中国革命是一个具有国际历史意义的现象,但是它发生在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东欧和南欧的人民民主制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与大国的关系的结果而产生的,而不是作为欧洲自发的革命浪潮的产物。只有历史才会证明这种独特的“革命输出”(export of revolution)的效果。目前在意大利、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不只是这一浪潮所采取的新形式的表现。这是一种具有很大吸引力的现象,对于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于政治家,以及对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家而言,都是如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自己

的见解。

一、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处境要好于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社会后果的经验。他们还拥有马克思主义传播所形成的丰富的理论传统。 273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革命的形式(form)问题(指的是从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向另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的转变)。这种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会在某个历史时期得以实现,这是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都接受的观点(那些已经自觉地转到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立场,而把原有的政党的旗帜只作为传统的象征的政党除外)。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转变方面并没有达成一致,而这种转变的方式本身按其内容就是一场革命。

“革命”和“革命的”术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含义。首先,是在质变而不是量变的意义上,即是在中断连续性而不是保持连续性的意义上的转变。然而,“革命”一词不仅作为“进化”一词的反义词,而且也作为另一组反义词中的一个。这种向一种新的质的形态转变的形式既可以是暴力的(借助于暴力或者更多的强制的辅助来实现)或者可以是和平的(借助于其他手段的辅助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这种区分涉及这样的问题,例如,社会形态的变革是某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还是由具有法律授权的机构通过和平的方式所做出的决定而产生的(例如议会投票、立宪会议的决定等)。如果我们把社会革命与通过运用强制而实现的暴力革命必然地等同起来,那么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乱。如果把“社会革命”的表述理解为这种形式,那么“和平的革命”就成为一个矛盾的术语了。我们要谨防自己忽略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马克思主义承认不止一种实

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其中也包括和平的革命。

274 马克思和恩格斯绝没有把社会革命完全等同于建立在物理力量基础之上的暴力形式。对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荷兰等,马克思预见到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曾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时,列宁断言,马克思所提到的那些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预见在一些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小国里,有可能向资产阶级“赎买”政权,并且在1917年列宁曾寻求俄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因为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比较便宜的”解决办法。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讨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确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学术化的研究。但是,这里不必做这种学术化的探讨,因为事实已经如此清楚,根本不容置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统观念”的捍卫者在今天已经看到了西方革命进程的发展,但是还是坚持在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武装革命,运用暴力(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肯定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相违背。从实践的观点来看,由于国内合适的社会力量的缺乏和外部干预的不可避免性,因此武装起义显然注定要失败。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切证据都在表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以及一种新的、原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在一些西方国家中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对于这一观点,有两种反对的论点。首先,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复制苏联革命的模式,因为它已经是被历史地证实了的,因而带有必然性。其次,认为,由于外部的和内部的不可避免的反革命力量的干预,所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都注定要失败。

第一种论据在理论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尽管如此,它依旧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因为那些不赞同这一观点的人们被那些在工人运动中依旧数量不少并且依旧具有影响力的宗派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

集团指责为“修正主义者”。那种认为任何一种革命都具有绝对的价值和必然的力量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所谈论的革命历史地看是一种卓越的和值得赞扬的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显而易见的在于,我们在这里所应对的问题是依赖特殊的历史条件的,而这些历史条件本身是变化的。过去的革命,甚至是最伟大的和最具历史意义的革命的经验,都不能被看作是绝对的必然,因为新的革命所赖以发生的条件已经彻底不同了。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适应于1917年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条件,并且是适应于这些条件的特殊表现形态,因为列宁当时还设想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种可能的模式,即在政治多元化,至少是在依靠左翼力量的基础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正统派”坚持认为十月革命的模式应当在所有国家都被忠诚地复制,而同时又坚持认为没有一种革命模式可以不顾发生这种革命的社会进程的条件而有效运作,这种不同观点的混合听起来有些奇怪;在“宏大的”政治中,也可以发现“微小的”政治。在革命进程中,当条件适宜时呼唤和平的革命的做法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我们完全应当把这种指责归结为奇谈怪想。至于所涉及的原则问题,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从另一方面看,如何判断这种具体的条件依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接下来是反对和平的革命的第二个论据。他们认为,众所周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力,因此任何推动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抵抗。这些统治阶级在面临真正的威胁时,就会采用国内的和国外的反革命来进行应答,因此会迫使革命的倡导者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革命。这样,反对和平革命的可能性的人就会得出结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必然要采取武装革命的形式。

现在我们再仔细地加以研究。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是在反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中,对于反革命都缺少关注。人们往往把这一问题简单化了,把反革命等同于军队的反动分子所发动的内部叛乱或者

来自其他国家的反革命力量的武装干涉。但是,情况要比这些复杂得多,需要做更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革命浪潮高涨时更要认真研究;伴随着某种形式的革命前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反革命的危险也在增长。肩负着领导革命进程责任的社会运动,也必须充分意识到任何给定条件下反革命进程的威胁。

276 那些否定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人们坚持认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地放弃自己的权力。这与历史经验相一致吗?的确如此!然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们自己加以论证,承认和平的革命的可能性。明显的误读主要在于对“自愿”这一包含歧义的词的不同解释。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是非受迫性地——在这种意义上就是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力。但是,断言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在没有受到强迫的情况下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力是一回事儿,而断言每一统治阶级都必然诉诸武装抵抗以保卫自己占有的政权,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儿。如果统治阶级没有足够的武力去打败革命,情况会怎么样呢?如果社会已经无法在旧的生产关系的框架内运行,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没有足够的力量保卫旧的秩序,那么情形会怎样?如果公共秩序的瓦解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面临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混乱的威胁;如果这种状况在普遍的意义上导致了变革的必要性,并且在普选中表达了这种要求,进而以议会的方式把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政党手中,那么又会怎么样?诚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也不会自动地放权力,也就是自发地和不加抵抗地放权力;但是,如果教条地断言在没有足够的力量的情况下,在或许有极端右翼团体发动的这一绝望的步骤必然会陷入灭顶之灾的情况下,这一统治阶级也必然发动武装的反革命,则未免夸大其词了。在一些西欧的国家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着的。那种认为军队必然会采取一种反革命立场的假设,在当今可以证明是错误的。这正是一些西欧共产党的纲领强调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原因所在;而它们完全是正确的。

然而,有人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外来的反革命干涉是不可避

免的；国际资产阶级将不会不加反抗就允许社会主义在西欧国家取得胜利，必要时它们会采取军事干预。当然，这是可能的；在国际资产阶级极右翼阵营中有人会主张这种冒险活动。但是确信这种干涉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则至少有些古怪。假如无论有人如何想冒险，但是由于无法做到，而不出现这种干涉的情形呢？如果世界战争的阴影产生威胁，唤起了想进行干预的国家的公共舆论，不允许进行这样的冒险活动呢？通常的回答是引证智利的例子。但是，智利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首先，智利不在欧洲；其次，在智利，反革命活动不是由外国干涉力量推动的——即使在智利一个人也不会允许自己干涉自己——而是由获得外国支持的本国军队进行的干预。左翼力量拒绝联盟的政治错误促生了支持军队干预的国内社会力量。在欧洲情形与此不同，我们至少可以期望左翼不会犯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

277

“正统派”的观点经受不住批评。西欧的国家今天面临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前景，因为国内和国际上支持这种过渡的政治条件都存在。当然，只要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具有敌意的社会力量，发生反革命的可能性也就存在，工人阶级政党当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危险。但是，反革命不是必然发生的，它的危险也未构成取得和平革命胜利的绝对障碍。只要具备条件，人们就应当为这种和平革命的形式而努力奋斗，因为这种向新体制的“经济划算的”转变方式可以使社会避免许多损失和灾难。

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革命可能出现的变质问题，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采取和平的反革命的形式。我们应当对此而感到忧虑，尤其在当今国际形势和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的增长引起人们对新型社会主义的建立产生希望的时候更是如此。

二、革命的异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社会主义”一词至少具有双重含义。狭

义的“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它表现为一种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例如，国家所有制、联合生产者所有制等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序言中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社会的经济形态的；这就忽略了这样一点，即这里把指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表述与指涉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体制，也就是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社会的—经济的形态”（*gesellschaftlich-ökonomische Formation*）的表述混淆起来。这是一种不同的、广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含义。

278 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在于，把原本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归于马克思而导致的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经济的形态理论，而马克思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一点。在许多语言中，把“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的经济形态”）这个表述翻译为“社会的—经济的形态”，这不仅表明缺乏关于德语的知识，而且还表达出“改良”（*improve*）马克思的意图。

我们所讨论的是狭义的（即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种理解存在于每一社会之中，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土地除外），因此也要消灭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阶级。那些对现存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人，由于拒斥这些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令人不愉快的现象而认为，这些社会没有权利给自己加上“社会主义的”修饰语，这些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尽管如此，这些社会毕竟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社会主义的。

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制度是由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那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什么样的？

当我们强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时，我们所“期待拥有的”是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

展的上层建筑。我们在这里主要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或者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形态**)。“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存在并不自动地获得了上层建筑的含义,也不意味着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是同质的。不存在这种“强制性的”模式。任何不懂得这一点的人,都不会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的运动依赖经济基础的运动的论断,这一论断同时强调上层建筑运动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上层建筑滞后于经济基础运动的倾向,强调上层建筑对文化、传统等历史因素的依赖等。

由于马克思谈论的“社会的经济形态”不仅涉及社会主义,而且也涉及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制度,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关于资本主义经验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曾经存在于,而且现在依旧存在于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社会中——共和制的和君主制的、议会民主制的和集权专制的、多党制的和一党制的、允许思想多元化的和禁止思想多元化的等社会之中。但是,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济的、历史的 - 文化的条件的差别,考虑到传统的差别、这些社会中历史地塑造的人们的社会性格等,并且如果我们同时理解,在马克思主义中,当我们谈论其本身的运动能够决定上层建筑的运动的基础时,那么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原料和劳动工具意义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专门知识和科学,根据马克思的理解(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理解),这些内容也构成社会的生产力。正如我们解释马克思主义时要防止原始的“经济主义”,我们同样要拒斥任何关于存在唯一的和强制性的模式的观点。显然,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可以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专制的政治制度,可以是多党制,也可以是一党制。甚至也不排除它成为一种专制制度的可能性。然而,尽管存在着政治制度的差异,经济形态依旧是社会主义的,正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依旧是资本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一个给定的经济形态框架中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公式(formula)是简单的和规格一致的,但是,对于上层建筑而言则不存在这种一致性的公式。然而,这一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性质如何,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新社会的上层建筑应当塑造的东西,因为在社会主义取得经济和政治胜利之前,这些关系不会也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形与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是不同的。但是,“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普遍的公式在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同条件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重要的是理想,是塑造新人的纲领。在这里,没有自动的活动机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虽然是成功地实现这一纲领的必要前提,但却不是充分的条件。的确存在着无法实现这一纲领的条件;甚至会出现背离预期目标的结果,出现一种倒退的运动,它“吞噬”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但是,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的政党不仅要在“经济形态”的狭义上,而且要在包括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广义上,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负责。这里重要的是一种促使创立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纲领得以实现的**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的建立必须根据具体的条件,但是不能违背自由的规范、个体的全面发展的规范等,这将使人有可能获得幸福。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那些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不仅必须渴望获得胜利,而且必须有**能力**在特定的条件下获得胜利。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是狭义上的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且是在广义上人与人的新型关系的彻底建立)不只建立在为之奋斗的人们的愿望之上,而且建立在为塑造一个新社会所必要的条件的生成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方法的重要一点。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随意地引进,而是只有在具备了必要的条件的地方,在经济的和社会的条件都已经成熟的地方才会存在。

在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论述中,我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

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①

我不想对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特别是关于世界革命的假设做出详细的分析,这个命题后来被列宁做了修改,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非要在全世界同时爆发,而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开始**。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马克思断言,社会的相应的经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必需的(以免导致“贫困的普遍化”),此外还需要有这一社会的成员的相应的文化发展。马克思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对生产力的掌握则需要使用这些生产力的人们具有高水平的文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清楚地指出,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不可能被人的主观意志所取代。^②

因此,马克思提出警告,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客观条件尚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539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译者注

281 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要轻率地引进社会主义。或者换言之,有时甚至当政权似乎已经唾手可得时,也还是需要革命的耐心。一个领导革命斗争的政党,特别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为今天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而负责,而且要为明天在外部反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维护政权负责,还要为未来新的制度的塑造和更为长远的发展负责。也可能有必要在一个国家尚不具备客观的条件下克制自己,放弃采用社会主义的努力,虽然旧制度崩溃后的混乱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可能掌握政权(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不仅有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而且还有一些不够发达的欧洲国家后-专制政治制度)。这里重要的是对表面上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的关切和责任。人们通常指出武装的反革命的危險。当社会主义尚不具备相应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时,那些不可避免地积累的各种困难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可能为反革命力量的行动创造一个基础。这无疑是在政治估量中必须考虑到的一种危險。然而,在关于革命主题的文献中,另外一种现象被忽略了,人们对之保持沉默,尽管我们从政治经验中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足够的材料去充分讨论这一问题:这就是革命的异化的现象。革命的歪曲和变质也构成了一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險,它缺乏充分成熟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基础。在这里,异化理论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我谈论“异化理论”时,我思考的是某种不同于按照存在主义的文献所理解的这一表达,尽管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法国形式——强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一点应当特别强调,即当前流行的异化概念是在存在主义的压倒性的影响下形成的。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保持沉默,甚至否认它的存在。这个理论不仅存在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一;而且政治异化理论是异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82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客观的意义上把异化理解为人,即所有财富的生产者,同他的产品(物质的或精神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产品不依赖它们的创造者的意志和意图而发挥作用,甚至同

这些意图相对立,挫败人的计划,甚至威胁人的存在。在这种以社会发展的自发性表现出来的客体的异化(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计划性本质的否定)的基础上,人的自我异化得以发展:他对社会事务的疏离感和无法参与感、对他人的敌意,或者由于无法实现自己的生活计划而产生的挫败感,并伴随着一种与自己的“自我”(ego)相疏离的感觉,人们公认的人应当成为的典范与他的自我相对立。这样,自我异化就是客体的异化的结果。只有消除了客体的异化产生的原因,我们才有希望消除自我异化。

人的所有产品都容易走向客体的异化: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国家和政党等政治机构,或者类似革命的人的活动的产物。人们可以发动革命(经济和政治结构转型意义上的革命)以便实现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但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革命可能会以并非所期待的,甚至是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摆脱它的发动者的控制。于是,人们会说这是对革命的背叛,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客观地说),是革命的蜕变,甚至是变质,但是,最准确地说,人们可以谈论革命的异化。这就是恩格斯给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信中所思考的东西: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就会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在接下来后来被删掉的一行话里,他补充道,“也许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会是这样”。^①

今天,当从事革命斗争的力量面对着他们的革命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时,他们必须重视革命异化的问题。即使对社会制度的真正的革命变革也不是必然直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尽管它可能——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是必须——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导向社会主义。在对被推翻的秩序进行直接的革命变革时,保留一个完成社会主义变革之前的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无论对于保持无产阶级的同盟(首先是农民,但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译者注

是也包括像少数民族这样的力量),还是对于让物质条件成熟起来,同时让支持社会主义变革所必需的群众意识成熟起来,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并不否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作为革命的原动力,即使在特定时期,革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特征,特别是当其他社会阶级及其政党还无法履行这样的职责时,情况也是如此。关键之点在于放慢革命的速度,把革命的最后阶段推迟到后一个时期。列宁在1905年就是这样做的,那时他反对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时的沙皇俄国的直接任务,而把直接的斗争目标确定为革命的—民主的目标。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可以为革命运动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因为社会主义世界及其军事力量的存在可以提供某些保护,以反抗外部的干预和武装的反革命。当然,只是“某些”保护,因为国际团结的义务不能期许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在没有对力量和可能性做出恰当的评估时就挥舞着社会主义标语而把世界拖入轻率的冒险之中,从而冒着世界战争和普遍毁灭的危险。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内部的和外部的反革命,还有革命的异化意义上的和平的反革命的力量和可能性。如果像各种极端分子所做的那样,只考虑“总的形势”,那就像把部分真理当作绝对真理一样是错误的。今天,“总的形势”毫无疑问正在发生有利于革命运动的胜利的变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那么如果强迫它进行革命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举动,对此历史将会做出清算。

历史主要是通过革命的异化做出这种清算的。当革命被那些对革命没有准备并且对革命反感,但由于某种原因(例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革命的支持和保卫)不能实施传统的武装的反革命的群众所“吞噬”时,革命的性质和内容都会发生变化。这个由群众和平地“吞噬”革命的过程,也就是使革命的特征与革命的前提相矛盾,但是又保留了其外部标识和意识形态用语,这正是我称之为革命的异化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由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还存在,它抑制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倒退)也可以把这种革命的异化界定为和平的反革命。

从历史体验中可以汲取对未来有益的教训。最好是通过消除其产生的原因而预见到危险,而不是同一种伪革命的意识形态随波逐流,伤害革命的同盟,给反动派提供积极的论据,最后在革命被挫败后再表达遗憾。最有用的教训可以从那些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历史中汲取。我们在这里不一一列举各种具体原因,而是把我们的推论和断言建立在众所周知的事情上。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与执政党及其新制度的关系问题。让我们假设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相对落后的社会里取得胜利,这个社会受到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这个社会的居民对新政权缺乏热情或者甚至带有敌意,这个社会不仅不能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使群众的生活条件恶化。这样的社会不符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革命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在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上会发生什么?必然会发生什么?

当出现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瓦解(例如,一次战争的失败、统治阶级的腐化和由于国家的动荡而引发社会普遍的不满等),而政权已经“唾手可得”时,或者当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进驻使人民群众无法反抗时,党可以变革经济形态。在这种条件下,对革命政党而言,重要的是,不仅要今天完成革命而承担责任,而且也要为明天继续维护和发展革命而负责。当然,人们也可以认为,胜利的革命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只能够将赢得新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并且将培育社会主义的新人;但是只有当新制度获得了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只有一些社会边缘阶层,即主要是原有的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所组成的少数人需要去争取和教育时,这一论点才有意义。但是,当压倒性的多数由于某种原因而对新的制度怀有敌意时,那么上述论点就根本不具有正确性。列宁曾说过,当涉及革命性转变的积极创造者时,不应当简单地使用计算多数的办法。但是,不能把这一论点机械地运用到对于革命事业的社会支持上。社会全体一致地投身到反对旧的和可憎的

制度的斗争中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这样的支持；对新政权的支持不会自动地从这一事实中产生，即使它的倡导者站在革命的前列并领导革命。他们不过是比较其他人更加积极，更有组织性，更善于灵活地运用社会的不满罢了。从对他们所致力于反对的消极纲领的支持不会自动地导致群众对他们为之奋斗的积极的纲领的支持。革命政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形势，并且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群众的成熟和实现他们的纲领的客观可能性。列宁在1905年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作为直接的斗争目标，而他在1917年却提出了这一目标，因为列宁和当时的大多数革命者确信，俄国革命将成为引发世界革命的火花，而那个俄国将仍然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不过是作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落后国家。

如果对新制度的社会支持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会发生什么，并且必然会发生什么？党作为新制度的保卫者和捍卫者，会是孤立的，会感受到威胁。除了投降和失败，唯一的选择是暴力强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是一种客观的规律。这就导致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不受法律控制的、彻底暴力的政权。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而有时无产阶级却激烈地反抗“它的”专政，甚至通过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的暴动而表现出来，这种情形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主张这样的政权制度的人们既不是退化堕落的人，也不是专制者；形势逼迫他们这样做，以保卫新制度。错误存在于起源之中。例如，在这种情形中，党不可能允许举行自由选举，因为那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无论是残酷的暴力，还是缺少自由选举（甚至在执政党内也缺少自由选举），都无法构成“更高的民主形式”。它们是对最简单形式的民主的否定，然而，这些并不是反民主倾向的结果，而是必然性使然；否则政权将无法巩固。

只有依据这样的背景，才可能理解安全机构作为对社会的暴力强制的手段的发展，它甚至对党都具有支配作用。如果说对于一个新制度而言，由于缺乏社会支持，暴力强制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特殊的强制

机构的建立也就是必需的；并且为了保证这一机构更加有效地运转，这一机构就不仅对社会整体，而且对创立了它的党也都具有支配性统治的特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客体异化意义上的异化的典型例子。实际的情形并不在于（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安全机构成为一种独立于党，并且与党争夺权力的机构，并且也是可以废除的东西，从而使党摆脱压力。安全机构的确变得异化，并且凌驾于党之上与之争夺权力。但是，安全机构是党的创造物，没有它党就无法行使权力。斯大林从异化的机构的二重性得出结论：要不时地清除那些变得过分强大的安全机构领导人，及与他们紧密相关的那些人的“机器”；但是对这个机构的权力要不断加强而从不削弱。

286

问题不仅仅是被特殊的“机构”所使用的暴力强制；我们还要考虑这一机构的运行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公民相互监视、告发、指责等制度。这些现象可以达到惊人的规模，并且通过对人们的人格的践踏而造成无法弥补的社会伤害。

关于这个主题本身，我在这里只是提及一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最恐怖的事情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们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必然产生的现象。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象绝不是“蜕变”或者“变质”的问题，而是一些可以合理地加以解释的、有规律的，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必然的现象。那种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魔鬼学研究”并不能说明问题，而只能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归咎于个人，尽管他本人的确赋予了斯大林主义以特殊的色彩，而是应当归因于被强制纳入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的制度的作用，在这种强制中，这一制度无法正常地发展。无论是弘扬道德还是谴责罪恶，都不足以改变这个问题；每一个发现自己处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境中的社会都会类似地活动和发展。必须要做的是防止这样的异化条件产生。

在这种违背自己的创造者的意图的意义上，不仅革命会异化，党本身也会异化。这是我们下一个要讨论的主题。

如果一个制度在上述所描述的条件下产生,那么由革命精英组成的党会发生什么,又必然发生什么?将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发生从社会学角度看十分令人鼓舞,而结果则是悲剧。

在这种制度中党由于自身的软弱而必然要占据垄断地位。即使在形式上出现其他团体,甚至它们也被冠以“政党”,都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只要占统治地位的党不想丧失自己的政权,不想被其他政党所取代,只要全部权力机构和强制机制服从于党,那么,这个所谓的“多党制”只是一个幌子。这种所谓的“更高的民主形式”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恰恰恩格斯在快到达自己生命的终点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是民主共和国(他把“民主的”理解为“议会制的”)。列宁是在极端的斗争压力下才选择了一党制,同时他清楚地强调,这是俄国革命在其特殊的条件下的独有的特征。

287

按照必然性,这样的**掌权的政党**必然是一个群众性政党。革命之前的政党是精英党,其成员是运动的精神精英、理想主义战士,他们随时准备在革命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在非法的政党中,所冒的风险是巨大的,所需要的成员数量是很小的,对成员资格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革命之后,党员的数量在短时间内“爆炸式地”剧增;从原本只有几万党员的党,很快发展为具有几百万党员的党。这样的党不可避免地失去作为军事的和精神的精英的特征,虽然它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精英,即它的成员获得了无数特权;应当付出更多的注意力去分析“精英”术语的歧义性。有时取得政权的诸政党大规模地猎取新党员;例如,出现两个具有不同传统和政治纲领的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政党。他们不得不追逐新的成员,因为他们的重要性和社会地位首先取决于它们的规模。这迅速导致党的性质的改变,尽管外在的标志和“礼拜式的”意识形态公式表面上还保持不变。大规模的党员必然不再是“信仰者”。当人民群众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对新政权不满,而新党员又恰恰从这些群众中纳新时,上述情形特别容易发生。这些新党员入党后把他们已经形成的社会特征带入党内——这些特征是由他们所

从属的阶级或者社会阶层的出身和心理结构而产生的。(例如,农民成员带着他们固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特征而大批涌入党内;或者新的工人阶级本身可能只是上一代才刚刚从农村中走出来。)这些新党员由于容易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观点和偏见而不仅改变了党的组成,而且还改变了党的“社会心理”,以及党的态度。这显然与党的意识形态和老一代党员所传承的去过的传统相冲突。这里也有解决办法——意识形态被转变成一种礼拜仪式(在这里教会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类比),而老一代党员被清洗了,部分是由于自然的原因,部分是通过被“清除”。斯大林对老党员的大屠杀,以及大多数人民民主制国家中所发生的,虽然形式上不那么剧烈,但是相似的进程,都不是偶然的;如果有这些老党员,就不可能实施新的政策,就不能如此明目张胆地背离原有的意识形态,而赋予“礼拜仪式”以全新的内容。党作为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群众党的一部分,被加入党的新成员所“吞噬”。最后,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这些新成员成为党的群众基础,并且占据了关键的位置,他们事实上热衷于同党已经正式认可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态度的意识形态。对老党员的清除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作为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而轻率地建立一种新制度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试图以意志力来替代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从墓中的报复。

288

由此可以推论,新的群众性政党背离了,而且必然背离了革命运动的原有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如果革命运动掌握了一种被传统——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那么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它不会正式地抛弃这种意识形态。抛弃意味着失去“神圣的东西”,并从而失去过去几代人的光荣传统使党拥有的情感的感召力,凭借这些前辈所做出的牺牲,他们的名字常常在一些节庆的场合被唤起。但是这

一意识形态不再符合党的新性质了；国际主义的口号和工人阶级的团结事实上让位于民族主义，让位于某种带有种族主义气味的东西。旧有意识形态成为只在节日里被人们所尊奉的偶像，而它的话语则转变为在实践中已经被否定的礼拜仪式。同时，对于日常的使用，存在着**新型政党的意识形态**，它完全不同于旧有的意识形态。这导致了混乱，甚至导致了社会的精神分裂症，其悲剧的—滑稽的表现就是唤起原有政党的传统，而同时又把这一传统视作——有时是相当公开的——种族上的异类而加以抛弃。例如，由于具有犹太出身而不被接受的犹太血统的同志们，在形成和引导传统方面可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意识形态的这种转变（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这种转变的特别具有挑战性的表现，但不是唯一的一种表现）是旨在不惜任何代价赢得社会支持和创造“民族团结”的绝望的策略。然而，在这种有意识的行动的表层之下，存在着某种对这种行动的更深刻的、心理学上期待的意向。放弃意识形态模仿的心理准备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旨在以放弃意识形态原则为代价而赢得社会支持和民族“和谐”的自觉的政治策略则是完全失败的。毕竟，存在着一些政治力量，无论他们是否能够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它们都拥有表达着同样观点和倾向的可靠性，而新的政党（哪怕它是从老党脱胎而来的，在某种意义上，
289 继承了老党的意识形态，哪怕是作为一种礼拜仪式）却不具有这种可靠性。结果，这些策略只是服务于“竞争”，这些竞争虽然暂时潜伏着，有时却十分激烈。

对官方意识形态事实上的背离，在实践中抛弃这一意识形态，而仍然把它宣布为最高的价值，即使只是在礼拜仪式中，这种社会精神分裂症也不应该被看作仿佛仅仅是党内的事务。它普遍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态度，并且构成影响他们的社会性格的综合现象的要素之一。这就引导出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即“党与社会成员的社会性格”的关系问题。

广义的“社会主义”一词不仅表示基础(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也表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等)。然而,由革命引发的基础中的变革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上层建筑中的相应的变革。上层建筑的变革是一个必须自觉地加以引导的革命过程。社会主义的新人,作为革命的最重要的产品,必须加以塑造。“社会主义的人”同时成为革命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基础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其未来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要害,舍此则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发展——即共产主义——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特定的社会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地或者统一地解决塑造自己的政治的、道德的等上层建筑的问题。这样,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就是完美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没有这样的“新人”,就不可能建设切实的社会主义,更不必说过渡到共产主义了。因此,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形成转变人的意识的合适的纲领。然而,谈论塑造新人是一回事儿,而实现这样的纲领则是另一回事儿。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不允许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发展时,这样的教育纲领也无法实现。相反,在现存的条件下,人的社会特性可以被贬损,这有效地破坏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让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即经济开始考察。当我断言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设想为经济高度发展的、富裕的国家时,有的人可能会吃惊。不是我,而是马克思在我们上述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贫困的平均化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也适用于人的社会性格。投机者、堕落的人、公共财富的盗窃者,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在我们所描述的否定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不难预见人的社会性格的被贬损;人只是一个人而不是天使,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也会盗窃财富,也会投机,也会堕落,只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很糟。经验表明,无论是宣传鼓动,还是严厉惩罚,都无法消除弊端。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能设想建设共产主义?如何实现“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转变”?实现这种生存状态,需要具有高度纪律性的人,

首先是道德高尚的人。没有这一点,即使在非常理想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这些也只是乌托邦的闲谈。

经济问题,无论人们认为它有多重要,还是相对简单的事情。人性则重要得多。关于这一主题可以写出大部头著作。

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成为一个**自治的社会**,并且这将最终导致国家的消亡。这样的“自治的”社会,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需要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人们去实现它,这些人应当是能够独立思考的、勇敢的(在公民的意义上)、在智力上全面发展的、与社会一体的人(反对各种形式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谈论“全面发展的人”;列宁以更通俗的方式说道,每一个厨师都能够管理国家。人们可以争论这一点的现实性问题。但是,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处于马克思主义巅峰的“伟人”,都没有产生过这样离奇的想法,认为靠经济犯罪类型的人或者那种只是“从上面”接受指令,即使这些指令与他们自己的信念相冲突也会服从的“驯服的”人,简而言之,即异化的人,也能建设处在通向共产主义途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的否定性模式的革命还能产生其他什么东西?

我所关心的只是指出问题,阐述清楚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在特定的蜕变的条件下革命遭受着威胁;革命的异化可以等同于和平的反革命。

这样的蜕变并不是自觉的经验和自觉的行动的结果。它是一个自发的进程,关于这一进程,它的创造者通常并没有意识到。相反,他们通常生活在一种神圣的信念中,相信他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这里,正存在着来自这一“和平的反革命”的危险。只要激发这一进程的条件存在,它都不可避免地向前发展,而不管参与这一进程的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典型的“虚假的意识”。让我们用一个生物学的类比;当把一个器官移植到一个有机体中,而这个器官从生理学上讲并不适合于接受者的机体时,那么,这个机体就会排斥这个移植

器官,而移植器官萎缩了,并且危及接受者的机体本身。在社会的实例中,这个类比不够完全;社会的“移植器官”可以通过暴力,通过强制而维持生存。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解决办法。革命的异化可以获得武装的反革命所无法得到的东西——革命将被毁掉。

当革命从它的创造者的控制中逃逸时,它开始以一种与他们的意图不一致的方式,甚至是与这些意图相对立的方式来行动。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成为一种与原来的意图不同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所言,这种情况也可能“在我们这里”发生。从所有这些分析中抽取的结论是简单的,但是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变革,包括革命的变革,不会服从于人的主观意愿,哪怕是高尚人的意愿,而是服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指出,“宁要少些,但要好些”。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现实主义的原则应当被整合到每一个革命的道德责任的戒律之中。

参 考 文 献

Aberbach, Joel, D. ,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9. No. 63, pp. 86-99.

Aberbach, Joel D. , Alienation and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1968 and beyond . Papers for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Adelmann, Frederick J. , Marx's Notion of Man, in J. Sommerville and H. Parsons (eds.) , *Dialogu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Westport, Conn. , 1974 , pp. 233-240.

Adorno, Theodor W. , *Negative Dialectics*, London, 1976.

Aiken, Michael and Hage, Gerald, Organizational Alien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1, No. 4, 1966, pp. 497-507.

Allardt, Erik,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Alienation: A Preliminary Ecological Analysis, in *Sociologiske Meddelelser*, 10 ser. , 1 og. , 2 haefte, 1965.

Almasi, Miklos, Alienation and Socialism, in Aptheker Herbert (ed.) , *Marxism and Alienation*.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London, 1969.

- Althusser, Louis,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London, 1976.
- Aptheker, Herbert (ed.), *Marxism and Alienation*, New York, 1965.
- Archibald, W. Peter, The Empirical Relevance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1959.
- Armer, Michael and Schneuberg, Allan, Individual Modernity, Alien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 replication of Costa 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 Avineiri, Shlom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Mass., 1968.
- Avrorkhanov, A., *Proiskhozhdenie partokratii* (The Origin of the Partyocracy), 2 vols., Frankfurt/M., 1973.
- Axelos, Kosta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Paris, 1961.
- Baczko, Bronisław, *Rousseau—Samotność i wspólnota* (Rousseau—Solitude and Community), Warsaw, 1964. French translation *Rousseau—Solitude et Communauté*, Paris, 1974.
- Baczko, Bronisław, Wokół problemów alienacji (On Problems of Alienation), in Bronisław Baczko, *Człowiek i światopogląd* (Man and World Outlook), Warsaw, 1965.
- Bagley, Christopher, On the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Distinction of Anomie and Alie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 Banshchikov, V. M. and Lomov, B. F. (eds.), *Sootnosheniie biologicheskogo i sotsialnogo v chelovieke* (The Relation of the Biological and Social in Man). Moscow, 1975.
- Baptista, Jose, Bureaucracy and Society, *Telos*, Washington, No. 22, 1974-1975, pp. 116-184.
- Barakat, Halim, Alienation: a Process of Encounter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9, 20, 1.

Barakat, Halim, Social Forces Determining Political Alienation Among University of Leban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Barnhart, J. E., "Anthropological Nature" in Feuerbach and Marx, *Philosophy Today*, XL (Winter), 1967, pp. 265-275.

Batishchev, T. S., Deiatelnaya sushchnost chelovieka kak filosofskii printsip (The Active Essence of Man as a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in *Cheloviek w sotsialisticheskome i burhuaznom obshchestve* (Man in Socialist and Bourgeois Society), A symposium of the Philosophy Dept.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Moscow, 1966, manuscript.

Becker, Ernest, Mill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Great Historical Convergence on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in J. L. Horowitz, *The New Sociology*.

Bedeschi, Giuseppe, *Alienazione e feticismo nel pensiero di Marx*, Bari, 1968.

Bell, Daniel, Sociodicy: A Guide to Modern Usage, *American Scholar*, 1966, No. 35, pp. 696-714.

Bell, Daniel, *The Debate on Alienation*, Leopold Labedz (ed.), London, 1962.

Bell, Daniel, The "Rediscovery" of Alienatio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LVI, No. 24, 1959, pp. 933-952.

Bell, Wendell, Anomie, Social Isolation and the Class Struggle, *Sociometry*, 1957.

Berger, Peter L. and Luckmann, Thoma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1966.

Berger, Peter, and Pullberg, Stanley, Reification and the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Consciousness, *History and Theory*, 1966, No. 4.

- Bigo, Pierre, *Marxisme et Humanisme*, Paris, 1954.
- Blauner, Robert, *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
- Bottigelli, Emile, Presentation de Karl Marx Manuscripts et 1844, in *Karl Marx, Manuscripts de 1844*, Paris, 1962.
- Bramson, Le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rinceton, 1961.
- Braybrook, David, Diagnosis and Remedy in Marx's Doctrine of Alienation, *Social Research*, Vol. 25, 1958, pp. 325-345.
- Breed, Warren, *The Self-guiding Society*, New York, 1971.
- Bronfenbrenner, Urie, The Origins of Alien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1974, pp. 53-61; December 1974, pp. 9-11.
- Browning, Charles J. et al.,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with a reply by Melvin Seem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1, pp. 780 ff.
- Buber, Martin, *I and Thou*, New York, 1974.
- Buber, Martin, *Le Problème de l'homme*, Paris, 1962.
- Buhr, M., 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Marx-Kritik,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No. 7, 1966.
- Bullough, Bonnie, Alien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 Calvez, Jean-Yves,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 Champarnaud, Francois, *Revolution et contre-revolution culturelle en URSS*, Paris, 1975.
- Chazel, Francois, De quelques composantes de l'aliénation politiqu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 Chiodi, P.,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Existentialism, in *Sartre and Marxism*, Hassocks, Sussex, 1976.
- Citrin, Jach, McClosky, Herbert, Shanks, J. Merrill and Snider-

man, Paul M. , Personal and Political Sources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Part 1, January 1975, pp. 1-31.

294 Clark, John P. , Measuring Alienation Within a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No. 6, 1959, pp. 849-852.

Clausen, John A. ,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Illness, in Merton, Robert K. et al. , (eds.) , *Sociology Today* (see Merton) , pp. 485-508.

Clinard, Marshall B. ,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in Merton, Robert K. et al. (eds.) , *Sociology Today*, pp. 509-536.

Cohen, Albert K. , The Study of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nd Deviant Behavior, in Merton, Robert K. et al. , *Sociology Today*, pp. 461-484.

Cohen, Albert K. , The Sociology of the Deviant Act: Anomie Theory and Beyon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0. No. 1, 1965, pp. 5-14.

Cohen, Albert K. et al. , *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the Gang*, New York, 1955.

Coleman, James S. ,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on Alie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9, 1964-1965.

Cottier, Georges M. M. , *L' Athéisme du jeune Marx. Ses origines hegeliennes*, Paris, 1959.

Cornu, Auguste,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Vol. 3, Paris, 1962.

Crozier, Michel,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London, 1964.

D' Abbiero, Marcella, "Alienazione" in Hegel. *Usi e significati di Entäusserung, Entfremdung, Veräusserung*, Rome, 1970.

Dahrendorf, Ral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1959.

Dahrendorf, Ralf, Sociology and Human Nature, in *Homo Sociologicus*, London, 1973.

Davids, Anthony, Generality and Consistency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Alienation Syndrom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1, 1955, pp. 61-67.

Davids, Anthony, Alienation, Social Apperception, and Ego Structure,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Vol. 19, No. 1, 1955, pp. 21-27.

Davydow, J. N., *Freiheit und Entfremdung*, Berlin, 1964.

Dean, Dwight G., Alienation: 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6, 1961, pp. 753-758.

de Grazia, Sebastian,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Chicago, 1948.

de Man, Hendrik, Der neu entdeckte Marx, in *Der Kampf*, 1932, No. 5.

Denise, Theodore C.,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Some Critical Notices, in Johnson F. (ed.), *Alienation* (see Johnson).

Desan, Wilfrid, *Marxism of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1965.

D'Hondt, Jacques, La crise de l'humanisme dans le marxisme contempora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No. 85-86, 1968, pp. 369-378.

Dobzhansky, Theodosius, *Mankind Evolving*, New Haven, 1962.

Dubos, René, Human Nature. Man and His Environment, in *Britannica Perspectives*, Vol. I, pp. 213-334, Encycl. Brit. 1968.

Dufrenne, Mikel, *Pour l'homme*, Paris, 1968.

Duhrssen, Alfred, Philosophic Alien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69, 1960, pp. 211-220.

Durkheim, Emile, *Suicide*, London, 1952.

Durkheim, Emil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1933.

Duvignaud, Jean, *L'Anomie. Hérésie et subversion*, Paris, 1973
(ed): *La Sociologie. Guide Alfabétique*, Paris, 1972.

Easton, Lloyd, D. , Alienation, Empiricism and Democracy in Early Marx, in Sommerville, J. and Parsons, H. (eds.), *Dialogu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Westport, Conn. 1974, pp. 312-324.

Easton, Lloyd D. , Alienation and History in the Early Marx,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22, 1961, pp. 193-205.

295 Eichhorn, W. , Das Problem des Menschen im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No. 7, 1966.

Ellul, Jacques,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1964.

Engels, Friedrich, *Engels and August Bebel*, MEW, Bd. 36, Berlin, 1967.

Engels, Friedrich, *Anti-Dühring*, Moscow, 1962.

Engels, Friedrich,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s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ESW, Vol. 2, Moscow, 1969.

Engels, Friedrich, 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entwurfs 1891, MEW, vol. 22, Berlin 1972.

Engels, Friedrich, *On Authority*, MESW, Vol. 2.

Engels, Friedrich, *The Housing Question*, MESW, Vol. 2.

Engels, Friedrich,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MECW, Vol. 6, London, 1976.

Engels, Friedrich,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MESW, Vol. 3, Moscow, 1970.

Engels, Friedri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MECW, Vol. 4, London, 1975.

Engels, Friedrich,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MESW, Vol. 3.

Erikson, Kai, *Wayward Puritan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1966.

Etzioni, Amitai, Basic Human Needs, Alienation and Inauthentic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33, 1968, pp. 870-885.

Festinger, Leon,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1957.

Fetscher, Iring, *Marx and Marxism*, New York, 1971.

Fetscher, Iring, Von Marx zur Sowjetideologie, in Markert, Wernet (ed.), *Der Mensch in Kommunistischen System*, Tübingen, 1957.

Fetscher, Iring, The Relationship of Marx to Hegel, in *Marx and Marxism*.

Feuer, Lewis, What is Alienation?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in Stein, A. and Vidich, A. (eds.), *Sociology on Trial*, New Jersey, 1963.

Finifter, Ada, 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946-1970; Exploration of a possible Indicator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Finkelstein, Sidney, *Existentialism and Alienati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1965.

Finkelstein, Sidney,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Alienation, in Aptheker, Herbert (ed.), *Marxism and Alienation*.

Finkelstein, Sydney, *Who Needs Shakespeare?* New York, 1973.

Fischer, Arthur, *Die Entfremd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heilen Gesellschaft: Materialien zur Adaptation und Denunziation eines Begriffs*, Munich, 1970.

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sation*, London, 1963.

Frankl, Victor E., *Der Mensch auf der Suche nach Sinn*, Feiburg, 1972.

Frankl, Victor E., *Homo Pativus*, Warsaw, 1971.

Frankl, Victor E., *Der Wille zum sinn*, Vienna, 1972.

Fritzhand, Marke, *Człowiek—humanizm—moralność* (Man—Humanism—Morality), Warsaw, 1961.

Fritzhand, Marke, *Myśl etyczna młodego Marksa* (The Ethical

Thought of the Young Marx), Warsaw, 1961.

Fromm, Erich,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1941.

Fromm, Erich,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Fromm, Erich,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Fromm, Erich, *Man for Himself*, New York, 1947.

Fromm, Erich, Marx's Con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Man, in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70.

296 Fromm, Erich,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ew York, 1973.

Fromm, Erich,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1962.

Fromm, Erich, Alienation under Capitalism, in Josephson, E. (ed.), *Man Alone*.

Fromm, Erich, Charakter und Aggression, *Wissenschaft und Weltbild*, Vienna, 1975, No. 1, pp. 9-31.

Fromm, Erich and Maccoby, Michael, *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 New Jersey, 1970.

Fromm, Erich and Xiran, Ramon (eds.), *The Nature of Man*, London, 1968.

Gabel, Joseph, Rousset, Bernard and Trinh Van Thao (eds.), *L'Aliénation aujourd'hui*, Paris, 1974.

Gabel, Joseph, *Idéologies*, Paris, 1974.

Gabel, Joseph, *Sociologie de l'alienation*, Paris, 1970.

Gabel, Joseph, *False Consciousness*, Oxford, 1975.

Gabel, Joseph, *Formen der entfremdung, Aufsätze zum falschen Bewusstsein*, Frankfurt/M, 1964.

Gallino, Luciano, Presupposti Delle ricerche sociologiche sulla alienazione, *Tempi moderni*, 1963, p. 12.

- Garaudy, Roger, *Karl Marx*, London, 1967.
- Garaudy, Roger, *Dieu est mort*, Paris, 1962.
- Garaudy, Roger, O poniatii "otchuzheniie" (On Understanding Alienation), *Voprosy filosofii*, No. 8, 1959, p. 68.
- Garaudy, Roger, *Perspectives de l'Homme*, Paris, 1959.
- Garaudy, Roger, *Humanisme Marxiste. Cinq Essais Polemiques*, Paris, 1957.
- Gehlen, Arnold, *Der Mensch*, Frankfurt/M, 1971.
- Gehlen, Arnold, Uber die Geburt der Freiheit aus der Entfremdung, in *Studi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 Berlin, 1971.
- De George, Richard T., *The New Marxism*, New York, 1968.
- Geras, Norman, Marx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lackburn, R.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1972.
- Gerson, Walter M., Alienation in Mass Society: Some Causes and Response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Vol. 49, No. 2, 1965, pp. 143-152.
- Geyer, Felix, Alienation and General Systems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 Goffman, Ervin, *Stigma*, Harmondsworth, 1968.
- Goldmann, Lucien, La réification, i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Paris, 1959.
- Goodman, Paul, *Aufwachsen im widerspruch. Uber die Entfremdung der Jugend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Darmstadt.
- Gould, Laurence, J., Conformity and Marginality: Two Faces of Alien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XXV, No. 2, 1969, pp. 39-63.
- Gouliane, C. I., *Le Marxisme devant l'homme*, Paris, 1968.
- Grassi, Ernesto, *Humanismus und Marxismus. Zur Kritik der Verselbstandigung von Wissenschaft*, Reinbek-Hamburg, 1973.

Gregor, A. James,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Karl Marx, in Somerville, J. and Parsons, H., *Dialogu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Westpoint, Conn., 1974, pp. 291-307.

Grigorian, B. T., *Filosofia o sushchnosti chelovieka* (philosophy on the Essence of Man), Moscow, 1973.

Grodzins, Morton, *The Loyal and the Disloyal*, Chicago, 1956.

297 Groothoff, H. H., A. S. Makarenko und das Problem der Selbstentfremdung in der europäischen und der sowjetischen Pädagogik in *Marxismusstudien*, Tübingen.

Hagedorn, Robert B., Alien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ssociations—a Repl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Hajda, Jan, Alie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tuden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6, No. 5, 1961, pp. 758-777.

Hays, David G., On “alienation”. An Essay in the Psycholinguistics of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cience.

Hegel, G. W.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1977.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London, 1962.

Heller, Agnes, Is Everyday Life Necessarilly Aliena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Herlihy, David, Alienation in Medieval Culture and Society, in Johnson, F. (ed.), *Alienation*.

Hinton, S. E., *The Outsiders*, New York, 1967.

Hirszowicz, Maria, *Kommunistyczny Lewiatan* (The Communist Leviathan), Paris, 1973.

Hodges, Donald Clark, Marx's Contribution to Humanism, in *Science and Society*, No. 2, Vol. XXIX, 1965.

Hodges, Donald Clark, *Socialist Humanism*, St. Louis, 1974.

Hoffer, Eric, *Reflections on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1973.

Hoffer, Eric, *The True Believer*, New York, 1951.

Hollitscher, Walter, *Der Mensch im Weltbild der Wissenschaft*, Vienna, 1969.

Hollitscher, Walter, Kommunikation, Hominisation und Humanisierung, in Borbé Tasso (ed.), *Der Mensch, Subjekt und Objekt, Festschrift für Adam Schaff*, Vienna, 1973.

Hong, Lawrence K., The Function of Group in the Relation of Anomi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Horney, Karen,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1968.

Horowitz, Irving Louis (ed.), *The New Sociology*, New York, 1964.

Horowitz, Irving Louis, On Alien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Somerville, J. and Parsons, H. (eds.), *Dialogu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Westport, Conn., 1974. pp. 325-336.

House, James S. and Mason, William M., Political Alienation in America, 1952-196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0, No. 2, April 1975, pp. 123-147.

Horton, John, The Dehumanization of Anomie and Alienation: A Problem in the Ideology of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XV, No. 4, 1964, pp. 283-300.

Hsü, Francis L, K.,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A sociocentric model of man. Santa Barba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Dialogue Discussion Paper, 17 Sept. 1973.

Hyppolite, Jean,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New York, 1969.

Israel, Joachim, *L'Aliénation de Marx à la sociologie contemporaine*, Paris, 1972.

Israel, Joachim, Alienation and reif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Jaco, E. Garthy, The Social Isolation Hypothesis and Schizophren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9, 1954, pp. 567-577.

Jaroszewski, Tadeusz M., *Alienacja?*, Warsaw, 1965.

Jaroszewski, Tadeusz M., *Rozważania o praktyce* (Reflections on Practice), Warsaw, 1974.

Jaroszewski, Tadeusz M., *Osobowość i wspólnota* (Personality and Community), Warsaw, 1974.

Jaroszewski, Tadeusz M., Kategoria alienacji w filozofii marksistowskiej (The Category of Alienation in Marxist Philosophy), *Studia Filozoficzne*, No. 9, 1974, pp. 113-120.

Jaspers, Karl,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Berlin, 1960.

Johnson, Frank, Alienation: Som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in Johnson, F. (ed.), *Alienation*.

298 Johnson, Frank, Psychological Alienation: Isolation and Self-Estrangement, in Johnson, F. (ed.), *Alienation*.

Johnson, Frank, Alienation: Concept, Term and Word, in Johnson, F. (ed.), *Alienation*.

Johnson, Frank (ed.), *Alienation*, New York-London, 1973.

Johnson, Frank A. Some problems of Reification in Existential Psychiatry: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Papers for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Josephson, Eric and Mary, Introduction to Josephson, E. and M. (eds.), *Man Alone*.

Josephson, E. and M. (eds.), *Man Alone.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1962.

Kägi, Paul, *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Vienna, 1965.

Kahler, Erich, *The Tower and the Abyss*, New York, 1957.

Kakabadze, S. M. *Cheloviek kak filosofskaya problema* (Man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Tiflis, 1970.

Kamenka, Eugene,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London, 1962.

Kangrga, Milan, Das Problem der Entfremdung in Marx' Werk, in *Praxis*, 1967, No. 1.

Kelman, Harold, Alienation: Its Historical and Therapeutic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p. 198-206.

Kemiston, Kenneth, Alien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Utopia, *American Scholar*, 1960, Vol. 29.

Kepiński, Antoni, *Schizofrenia*, Warsaw, 1972.

Keshelava, V. , *Mif o dwukh Marksakh* (The Myth of the Two Marxes), Moscow, 1963.

Koenig, Daniel J. , Martin, Gary M. , Goudy, H. G. and Martin M. , The Year that British Columbia went NDP: NDP voter support pre- and post-197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Koff, Stephen, The Political Use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Johnson, F. (ed.), *Alienation*.

Kofler, Leo, *Der proletarische Bürger*, Vienna, 1964.

Kofler, Leo, Entfremdung und Ideologie, in Kofler, Leo, *Der Proletarische Bürger*, Vienna, 1964.

Kon, Lgor S. ,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Social Research*, Vol. 34, No. 3, 1967.

Korsch, Karl,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0.

Korsch, Karl, *Karl Marx*, London, 1938, reprinted New-York, 1963.

Kosik, Karel, *Die Dialektik des Konkreten*, Frankfurt, 1967.

Krakowiak, Jozef, *Problematyka alienacyjno-dezalienacyjna u Engelsa*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and Disalienation in Engels), in *Studia Filozoficzne*, No. 2, 1975.

Krishna, Daya, Alienation positive et aliénation négative, *Diogene*, No. 72, 1970.

Kurella, Alfred, *Der Mensch als Schöpfer seiner selbst*, Berlin, 1958.

Kurtz, Paul (ed.), *Language and Human Nature. A French-American Philosopher's Dialogue*, St. Louis, 1971.

Lachs, John, Mediation and Psychic Distance. Papers for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Lacroix, Jean, L'humanisme de Marx selon Adam Schaff,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No. 85-86, 1968, pp. 379-386.

Lacroix, Jean, *Marxisme, Existentialisme, Personnalisme*, Paris, 1949.

Lacroix, Jean, La Nature Humaine, *Actes du XI Congrès des Sociétés de Philosophie de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1961.

Lander, Bernard,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 York, 1954.

Langman, Lauren, Block, Richard, Feigon, Jackie and Ross, David, Alienation and Value Transmiss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Langslet, Lars Loar, Young Marx and Alienation in Western Debate, *Inquiry*, Vol. 6, No. 1.

299 Lefcourt, Herbert M.,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Acceptance of One's Reinforcement Experienc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Lefebvre, Henri, *Sociology of Marx*, London, 1968.

Lefebvre, Henri,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68.

Lefebvre, Henri,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 Introduction*, Paris, 1958.

Lenin, V. I.,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CW, Vol. 38, Moscow, 1963.

Lenin, V. I., *Marxism on the State*, Moscow, 1972 (not included in Collected Works).

Lenin, V. I., *State and Revolution*, CW, Vol. 25, Moscow, 1964.

Lenin, V. I., *April Theses (On the Tasks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Present Revolution)*, CW, Vol. 24, Moscow, 1964.

Lenin, V. I.,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CW, Vol. 27, Moscow, 1965.

Lenin, V. I., *Tasks of the Trade Unions*, CW, Vol. 28, Moscow, 1965.

Lenin, V. I., *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the Moscow City Conference of the RCP (B)*, CW, Vol. 28.

Lenin, V. I., *Session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March 12, 1919-Replies to Written Questions*, CW, Vol. 29, Moscow, 1965.

Lenin, V. I., *Draft Programme of the RCP (B)*, CW, Vol. 29.

Lenin, V. I., *Eighth Congress of the RCP (B)—Report on the Party Programme*, CW, Vol. 29.

Lenin, V. I., *Extraordinary Plenary Meeting of the Moscow Soviet*, CW, Vol. 29.

Lenin, V. I., *Results of the Party Week in Moscow and Our Tasks*, CW, Vol. 30, Moscow, 1965.

Lenin, V. I., *Our Foreign and Domestic Posi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Party*, CW, Vol. 31, Moscow, 1966.

Lenin, V. I., *Speech Delivered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Communists*

of Zamoskvorechye District, CW, Vol. 31.

Lenin, V. I., *Tenth Congress of the RCP (B)*, CW, Vol. 32, Moscow, 1965.

Lenin, V. I., *The Tax in Kind*, CW, Vol. 32.

Lenin, V. I., *Instructions of the Council of Labour and Defence to Local Soviet Bodies*, CW, Vol. 32.

Lenin, V. I., *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the Trade Unions under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W, Vol. 33, Moscow, 1966.

Le Roy, Gayherd, C.,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An Attempt at a Definition*, in Aptheker, Herbert (ed.), *Marxism and Alienation*.

Levin, Murray, *Political Alienation*, in Josephson, E. and M. (eds.), *Man Alone*.

Lewis, John, *Marxism and the Open Mind*, London, 1957.

Lewis, John, *Alienation* in Lewis, John, *The Marxism of Marx*, London, 1972, pp. 111-126.

Lewis, John, *What is Man?*, in Lewis, John *op. cit.*, pp. 95-110.

Lichtheim, George, *Alien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 London, 1968.

Lipinski, Edward, *Alienacja*, in Lipinski, E. (ed.), *Teoria ekonomii i aktualne zagadnienia gospodarcze* (The Economic Theory and Actual Economic Problems), Warsaw, 1961.

Lowith, Karl, *Man's Self-alienation in the Early Writings of Marx*, *Social Research*, Vol. 21, 1954, pp. 204-230.

Lowry, Ritchie, P., *The Functions of Alienation in Leadership*,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Vol. 46, No. 4, 1962, pp. 426-435.

Ludz, Peter C., *Alienation as a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 Overvie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Lukacs, Gerog, *The Young Hegel*, London, 1975.

- Lukacs, Gero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300
- Lystad, Mary, Student Protesters and Chang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alu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 Macha, Kara,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Berlin, 1964.
- Machovec, Milan, *Vom Sinn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Freiburg, 1971.
- McClosky, Herbert and Schaar, John H. ,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A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0, No. 1, 1965. pp. 14-40.
- McIver, Robert M. , *The Ramparts We Guard*, New York, 1950.
- McMullen, Roy, Art, Affluence and Alienation. The Fine Arts Toda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London, 1968.
- Malini, V. A. , Marksova Kontseptsia chelovieka v "Kapitale" (The Marxian Concept of Man in "Capital"), in *Chelovick v sotsialisticheskom i burzhuznom obshchestviie*, Moscow, 1966.
- Mandel, Ernest,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Lutz, W. and Brent, H. (eds.), *O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 pp. 36-46.
- Mandel, Ernest,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 Manley, James C. , Report of the Fifth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 (Alienation of Man),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Honolulu, Vol XX, No. 4, 1970, pp. 383-417.
- Manley, James C. , Concepts of Alie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Congress of Sociology.
- Mannheim, Karl, *Mensch und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des Umbaus*, Leiden, 1935.
- Marcuse, Herbert, *One Dimensional Man*, London, 1964.
-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

cial Theory. New York, 1954.

Martin, Alexander Reid, Self-alienation and the Loss of Leis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p. 156-165.

Mark, Kar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Vol. 3, London, 1975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MEW: Ergänzungsband-Schriften/bis 1844, Erster Teil, Berlin, 1968).

Marx, Karl, *Letters from the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MECW, Vol. 3.

Marx, Karl,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MECW, Vol. 3.

Marx, Karl, *On the Jewish Question*, MECW, Vol. 3.

Marx, Karl,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MECW, Vol. 3.

Marx, Karl, *Capital*, Vol. I, London, 1970, Vol. II, Moscow, 1967, Vol. III, Moscow, 1974.

Marx, Karl,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MECW, Vol. 9, London, 1977.

Marx, Karl,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ESW, Vol. 2, Moscow, 1969.

Marx, Karl,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ESW, Vol. 1, Moscow, 1969.

Marx, Karl,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Harmondsworth, 1973.

Marx, Karl,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ECW, Vol. 6, London, 1976.

Marx, Karl,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MESW, Vol. 3, Moscow, 1970.

Marx, K. and Engels, F. , *The Holy Family*, MECW, Vol. 4, London, 1976.

Marx, K. and Engels, F. , *The German Ideology*, MECW, Vol. 5, London, 1976.

Marx, K. and Engels, F. , *Circular Against Kriege*, MECW, Vol. 6.

Matejko, Alexander, Overcoming Alienation in W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ead, Margaret,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New York, 1970. 301

Mecharabian, A. A. , K probleme otchuzdeniia lichnosti (On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of the Individua), in *Problemy lichnosti* (Problems of the Individual), Symposium of the Philosophical Institute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 Moscow, 1969.

Mende, Georg, Marx und der Begriff der "Entfremdung", in Mende, Georg, *Karl Marx' Entwicklung vom tevolutionären Demokraten zum Kommunisten*, Berlin, 1960.

Merton, Robert K. , Brook, L. and Cottrell, L. , Jr. (eds.), *Sociology Today*, New York, 1959.

Merton, Robert K.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l. , 1957.

Merton, Robert K. ,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1938, pp. 672-682.

Merton, Robert K. ,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in Josephson, E. and M. (eds.), *Man Alone*.

Mészáros, István, *Marx' 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Metha, Arlene, Existential Frust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nomie Within Select College Student Subcultu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etzke, Erwin, Mensch und Geschichte im ursprünglichen Ansatz des Marxschen Denkens, in Markert, Werner (ed.), *Der Mensch im Kommunistischen System*, Tübinge, 1957.

Michels, Robert,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62.

Middleton, Russell, Alienation, Race and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3, No. 28.

Miller, George A., Professionals in Bureaucracy: Alienation among Industrial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2, No. 5, 1967, pp. 755-768.

Miller, Curtis R. and Butler, Edgar W., Anomia and Eunomia: A Methodological Evaluation of Srole's Anomia Sca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1, 1966.

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1956.

Mills, C. Wright, *The Mass Society*, in Josephson E. and M. (eds.), *Man Alone*.

Mills, C. Wright, *White Collar*, New York, 1951.

Mizruchi, Ephraim Harold,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in a Small C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5, 1960.

Mizruchi, Ephraim Harol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otion of Alienation, in Johnson, F. (ed.), *Alienation*.

Mizruchi, Ephraim Harold, *Success and Opportunity. Class Values and Anomie in American life*, Glencoe, III., 1964.

Mizruchi, Ephraim Harold, Alienation and Anomi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in Horowitz, J. L. (ed.), *The New Sociology*.

Morin, Edgar, *Le Paradigme perdu: la nature humaine*, Paris, 1973.

Morin, Edgar and Piattelli-Palmerini, Massimo (eds.), *L'Unité de L'homme*, Paris, 1974.

Mouledous, Joseph C. and Elisabeth, C., Criticisms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70, 1964.

Müller-Herlitz, Ursula, *Karl Marx—Wesen und Existenz des Menschen*, Munich, 1972.

Mumford, Lewis, The Mechanical Routine, in Josephson, E. and M. (eds.), *Man Alone*.

Murchland, Bernard,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Narskii, I. S., Problema otchuzhdeniia v eksistentsializme i religii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in Existentialism and Religion), *Filosofskie nauki*, No. 1, 1966, pp. 62-72.

Narskii, I. S., Ob istorichno-filosofskom razvitii poniatia "otchuzhdeniie" (The Historico-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Filosofskie nauki*, No. 4, 1963, pp. 97-106.

Narskii, I. S., Kategorii otschuzhdeniia w "Kapitale" i drugikh trudakh K. Marksa (The Category of Alienation in "Capital" and Other Works by Marx), in "*Kapital*" Marksa filosofia i sovremennost, Moscow, 1968, pp. 644-98. 302

Natanson, Maurice, Alienation and Social Role, *Social Research*, Vol. 33, 1966.

Naville, Pierre, De l'idée d'alienation à l'analyse du monde moderne, *Etudes*, No. 1, Brussels, 1962.

Naville, Pierre, Aliénation et exploitation, *Cahiers d'études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et de l'Automation*, No. 6, 1964.

Naville, Pierre, *Bureaucratie et révolution*, Paris, 1962.

Naville, Pierre, *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 La genèse de la sociologie du travail chez Marx et Engels*, Paris, 1967.

Neal, Arthur G. and Groat, Theodore, Alienation Correlates of Fertility: a Progress Repo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Neal, Arthur G. and Rettig, Salomon, Dimensions of Alienation Among Manual and Nonmanual Work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8, No. 4, 1963, pp. 599-608.

Neal, Arthur G. and Rettig, Saloman, On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2, No. 1, 1967, pp. 54-64.

de Negri, E. , L'elaborazione hegeliana di termini agostinian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Vi, fasc. 1, No. 19, 1952, pp. 62-78.

Nettler, Gwynne, A Test for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0, 1945, pp. 393-399.

Nettler, Gwynne, A Measure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2, 1957, pp. 670-677.

Niel, Mathilde, The Phenomenon of Technology: Liberation or Alienation of Man?, in Fromm, Erich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1965.

Nisbet, Robert A. , *Community and Power*, New York, 1962.

Ochocki, Aleksander, O markosowskiej koncepcji alieancji estetycznej (On the Marxian Concept of Aesthetic Alienation), *Studia Estetyczne*, Vol. 2, 1965.

Ogurtsov, A. P. , Cheloviek w mire otchuzhdeniia (Man in the World of Alienation), in *Cheloviek w sotsialisticheskom i burzhuaznom obchestviie*, Moscow, 1966.

Oiserman, T. I. , Alienation and the Individual, in Aptheker, Herbert (ed.), *Marxism and Alienation*.

Oiserman, T. I. , *Formirovaniye filosofii marksizma* (The Shap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Moscow, 1962.

Oiserman, T. I. , *Chelowiek i jego otchuzdenie* (Man and His Alienation), Moscow, 1965.

Oiserman, T. I. , *Problema otchuzhdeniia i burzhuaznaia legenda o marsizmie*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and the Bourgeois Legend on Marxism), Moscow, 1965.

Oken, Donald, *Alienation and Identity: Some Comments on Adolescence, the Counter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Adaptations*, in Johnson, F. (ed.), *Alienation*.

Ollman, Bertell,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Mass. , 1971.

Olsen, Marvin E. , *Political Alienation as Reality*.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Olsen, Marvin E. ,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Opin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5.

Oppolzer, Alfred A. , *Entfremdung und Industriearbeit*, Cologne, 1974.

Panasiuk, Ryszard, *Filozofia i panstwo* (Philosophy and the State), Warsaw, 1967.

Panasiuk, Ryszard, *Problematyka antropologiczna w doktrynie Marksa*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in Marx's Doctrine), in *Archiwum historii filozofii i mysli spolecznej*, Wroclaw, 1973.

Pappenheim, Fritz, *The Alienation of Modern Man*, New York, 1959. 303

Pazhitnov, L. N. , *U istokov revolutsionnoyo perevorota w filozofii* (At the Sources of the Revolutionary Upheaval in Philosophy), Moscow, 1960.

Pearlin, Leonard, I. , *Alienation from Work: A Study of Nursing Personn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5.

Petrosian, M. I. , *Gumanism*, Moscow, 1964.

Petrovic, Gajo,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23, 1963, pp. 419-426.

Petrovic, Gajo, *Philosophie und Revolution*, Hamburg, 1971.

Petrovic, Gajo, Alienation, in Edwards, P. (ed.), *The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Vol. 1, New York, 1967, pp. 76-81.

Petrovic, Gajo, Man as Economic Animal and Man as Praxis, in *Inquiry*, Vol. 6, No. 1.

Petrovic, Gajo, Marx's Concept of Man, in Petrovic, Gajo, *Marx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67.

Pilskaln, Robert J., Alienation as a State of a Self-System.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Plamenatz, John,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 Oxford, 1975.

Plasek, J. W. and Moreno, Manuel I., Updating Marxist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liena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Pogosian, V. A., *Problema otchuzhdeniia w "Fenomenologii dukha" Gegela*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Erevan, 1973.

Popitz, Heinrich, *Der Entfremdete Mensch. Zeitkri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 Frankfurt, 1967.

Post, Wernet, *Kritik der Religion bei Karl Marx*, Munich, 1969.

Powell, Elwin, H., Occupation, Status, and Suicide: Toward a Redefinition of Anomie,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3, No. 2, 1958.

Preti, Giulio, Alienazione, in *Il filo rosso*, I, 1963.

Radiavi, Kazem, *La Dictature du proletariat et le dépérissement de l'Etat de Marx à Lenine*, Paris, 1975.

Ramm, Thilo, Die Künftige Gesellschaftsordnung nach der 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Marxismusstudien*, 2nd folge, pp. 87-119.

Read, Herbert, *Art and Alienation: The Role of the Artist in Society*, London, 1967.

Redfield, Robert, The Universally Human and the Culturally Variable, in *The Papers of Robert Redfield*, Vol. 1, Chicago, 1962.

Redfield, Robert,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Man, *op. cit.*

Redfield, Robert, Nature of Man, *op. cit.*

Reich, Wilhelm, *The Function of the Orgasm*, London, 1968.

Reich, Wilhelm, *Sex-Pol*, New York, 1972.

Reimanis, Gunars, Alienation and Educa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Rhodes, A. L. and Orcutt, J. D., Social Correlates of Two Forms of Student Aliena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Rieser, V., Il Concetto di "alienazione" in sociologia, *Quanderni di Sociologia*, XIV, 1965.

Riesman, David,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52.

Rokeach, Milton,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New York, 1960.

Rosdolsky, Roman,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1971.

Rose, Gordon, Anomie and Devia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Stud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6, No. 17.

Rosen, Zvi, The Influence of Bruno Bauer on Marx's Concept of Alienation, *Social Theory and Praxis*, 1970, No. 1(2), pp. 50-69.

Rosner, Menachem, Aliénation, Fétichisme, anomie,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11, 1969. 304

Rossi, Mario, *De Hegel a Marx III. La scuola hegeliana. Il giovane*

Marx, Milan, 1974.

Rossi-Landi, Ferruccio, *Dialektik und Entfremdung in der Sprache*, Frankfurt, 1973.

Rossi-Landi, Ferruccio, *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The Hague, 1975.

Rossi-Landi, Ferruccio, Ideen zum Studium sprachlicher Entfremdung, in Schaff, Adam (ed.), *Probleme der Soziolinguistik*, Vienna, 1976.

Rottenstreich, Nathan, *Concept of Alienation and Its Metamorphoses*.

Rottenstreich, Nathan, On the Ecstatic Sources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16, 1963, pp. 550-555.

Rubel, Maximilien, *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1957.

Rubins, Jack I., The Self-concept, Identity and Alienation from Self,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61-1963, pp. 132-141.

Samjatin, Jewgenij, *Wir*, Vienna.

Sartre, Jean-Paul,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ondon, 1976.

Schacht, Richard, Alienation, the "is-ought" Gap and Two Sorts of Discor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Schacht, Richard, *Alienation*, New York, 1971.

Schachtel, Ernest, G., On Alienated Concepts of Ident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p. 120-130.

Schaff, Adam,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1970.

Schaff, Adam, *Alienacja a działanie społeczne* (Alienation and Social Action).

Schaff, Adam, Alienation comme problème socio-philosophique,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1974.

Schaff, Adam, W sprawie tłumaczenia "Tez o Feuerbachu" na język polski (On the Translation into Polish of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in *Studia Socjologiczne*.

Schatz, Oskar and Winter, Ernst F., Alienation, Marxism and Humanism, in Fromm, Erich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1965.

Shevchenko, L. A., Cheloviek w sotsialisticheskom i burzhuazom obschchestvie (Man in Socialist and Bourgeois Society), *Filosofskie nauki*, No. 4, 1966.

Schlesinger, Rudolf, The Continuity of Marx's Thought,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XXIX, No. 2, 1965.

Schmidt, Alfred,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1971.

Schufenhauer, Werner and Buhr, Manfred, Entfremdung, in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Vol. I, Leipzig, 1969.

Scott, Marvin B., The Social Sources of Alienation, in *Inquiry*, 1963, pp. 57-69.

Seeman, Melvi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4, 1959, pp. 783-790.

Seeman, Melvin, On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Alienation in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2, No. 2, 1967, pp. 273-285.

Seeman, M., Vidal, D., Amiot, M. and Touraine, A., De l'utilité sociologique de la notion d'alienation. *Sociologie du travail*, No. 2, 1967.

Sevigny, Robert,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Social-Psychological Research.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Shepard, Jon, M.,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Alien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70, No. 23.

Shepard, Jon M. and Panko, Thomas R., Alienation and Social Re-

ferent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Simmons, J. L. , Liberalism, Alienation and Personal Disturbance,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Vol. 49, No. 4, 1965, pp. 456-464.

305 Sitnikov, E. M. *Problema "otchuzdeniia" w burzhuaznoi filosofii i falsyfikatory marksisma*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in Bourgeois Philosophy and the Falsifiers of Marxism), Moscow, 1962.

Sommerville, John and Parsons, Howard L. (eds.), *Dialogu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Westport, 1974.

Sportelli, Silvano, La teoria sartriana del pratico-inerte, in *Critica Marxista*, No. 5, 1974, pp. 77-97.

Srole, Leo,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ertain Corollaries: An Explanato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1, 1956, pp. 709-716.

Staford, Gene and Barbara (eds.), *Strangers to Themselves. Readings on Mental Illness*, Toronto, New York and London, 1973.

Steigerwald, Robert, *Herbert Marcuse*, Berlin, 1969.

Struening, Elmer L. and Richardson, Arthur H. , A factor Analytic Exploration of the Alienation, Anomia and Authoritarianism Dom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0, No. 5, 1965, pp. 768-776.

Suchodolski, Bogdan, *U podstaw materialistycznej teorii wychowania* (The Foundations of a Materialist Theory of Education), Warsaw, 1957.

Summer, Robert and Hall, Robert, Alienation and Mental Illn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3, 1958, pp. 418-420.

Swados, Harvey, The Myth of the Happy Worker, in Josephson, E. and M. (eds.), *Man Alone*.

Sykes, Gerald, *Alienation, The Cultural Climate of our Time*, Vols. I and II, New York, 1964.

Taranto, Domenico, Alienazione e feticismo: una o due teorie? , in *Critica Marxista*, No. 3-4, 1974, pp. 207-216.

Tatsis, Nicholas, Ch. , Marx, Durkheim and Alienation: Toward a Heuristic Typology.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I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Taviss, Irene,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Alienation. The 1900s vs. the 195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34, 1969, pp. 46-57.

Templeton, Frederic,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me Research Finding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No. 30, 1966-1967, pp. 249-261.

Templeton, Frederic, The Alienation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mancipation (Discussion), *Praxis*, Vol. 1, 1973, pp. 43-68.

Their, Erich, *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 Göttingen, 1957.

Tomberg, Friedrich, Der Begriff der Entfremdung in den "Grundrisse" von Karl Marx, in *Das Argument*, Vol. 52, Pt. 3, June 1969, pp. 187-223.

Tönnies, Ferdinand,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Leipzig, 1887.

Tucker, Robert,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Mass. , 1961.

de Unamuno, Miguel, *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London, 1962.

Venable, Vernon, *Human Nature: The Marxian View*, London, 1946.

Vollmerhausen, Joseph W. , Alienation in the light of Karen Horney's Theory of Neuro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1961, pp. 114-151.

Vranicki, Predrag, Soci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in Fromm, Erich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1965.

Vranicki, Predrag, La signification actuelle de l' humanisme du jeune Marx, in *Annali dell'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1964-1965.

Wacławek, Janusz, Teoria podziału pracy i "utopia" Marksa (The Theory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Marx's "Utopia"), in *Człowiek w warunkach cywilizacji współczesnej* (Man in Modern Civilisation), Warsaw, 1967.

306 Weber, Max, Wesen Voraussetzungen und Entfaltung der bürokratischen Herrschaft, in Winckelmann, Johannes (ed.),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ologne, 1964. English trans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3 vols., New York, 1968.

Weiss, Frederick A., Self-alienation: Dynamics and Therapy, in Josephson, E. and M. (ed.), *Man Alone*, pp. 463-479.

Wells, Harry, K., Alienation and Dialectical Logic, in Somerville, J. and Parsons, H. (eds.), *Dialogu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Westport, Conn., 1974, pp. 78-104.

Wenkart, Antonia, Regaining Identity Through Relat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XXI, No. 2, pp. 227-233.

White, William A., Alienist, in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I, New York, 1930.

Whyte, William H. Jr.,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1956.

Wiatr, Jerzy, Założenia budowania teorii społeczeństwa socjalistycznego (The Premis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y of Socialist Society), in *Studia Socjologiczne*, Vol. 2 (53), 1974, pp. 55-78.

Wiatr, Jerzy, Alienation, Disalien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in Borbe, T. (ed.), *Der Mensch, Subjekt und Objekt; Festschrift für Adam Schaff*, Vienna, 1973, pp. 399-409.

Wójcik, Przemysław, *Markowska koncepcja wyzwolenia pracy i jej antagoniści* (The Marxian Concept of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ur and its Antagonists), Warsaw, 1976.

Zelterbaum, Max, Zu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Neue*

Zeit, Vol. ii, Nos. 39, 42, 43, 1902.

Ziherl, Boris, Sur les conditions objectives et subjectives de désaliénation dans le socialisme, in *Questions du Socialisme*.

Zurcher, Louis A., Jr., Meadow, Arnold, and Zurcher, Susan Lee, Value Orientation, Role Conflict and Alienation from Work. A Cross-culture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0, 1965.

Zvorykin, A. A., Sotsialniie uslovia i problema otchuzhediia truda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Alienation of Labour), in *Che-loviek w sotjalisticheskom i burzhuaznom obshchestvie*, Moscow, 1966.

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本表中的页码为外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A

- Abolition of bureaucracy 废除官僚制 132
- Adaptation 适应,顺应 151,193
- Administration of people 人民的管理 110
-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of the state 国家的管理职能 234
- Alcoholism 酗酒,酒精中毒 180
- Alienated labour 异化劳动 100
- Alienated power 异化的权力 108
- Alienated products 异化的产品 226
- Alienation 异化
- and anomie 异化与失范 141
- bureaucracy 异化与官僚制 112
- crime 异化与犯罪 181
- cultural 文化异化 178
- definition 异化的定义 56
- economic 经济的异化 99

- ideological products 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 135
- individual 个体的、个人的异化 158,183,195,200
- labour 异化劳动 52
- Marxist's view on theory of 马克思主义者的异化观 2,3
- objective 客观的异化 210
- political 政治异化 171
- revolution 革命的异化 277
-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s 社会政治结构的异化 106
- state 国家的异化 106
- subjective 主观的异化 210
- under communism 共产主义的异化 236
- under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异化 10,19,218,225
- Alienation-phobia 异化恐惧 5
- Alienation theory, Marx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23
-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异化理论 32
- Capital* 《资本论》中的异化理论 36,37
- Grundrisse*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异化理论 37
- fate of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命运 82
- Manuscripts*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48
- renaissance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复兴 85
- the conceptual apparatus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 55
- The German Ideology*《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理论 45
- The Holy Family*《神圣家族》中的异化理论 45
- Alloiosis* (希腊语)陌生化,疏离 26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110
- Anomie 失范,混乱 141
- Anthropologism 人类主义,人本主义 51,54

- Anthropology 人类学,人本学 31
- April Theses* 《四月提纲》(即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245
- Army 军队 108
- Association of free producers 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 109
- Autism 孤独症,自我中心主义 190
- Automation 自动化 105,205
- Automobile industry 汽车工业 212
- Autonomy 自律,自主,自治 232
- B**
- Bauer's theory of alienation 鲍威尔的异化理论 30
- Behaviourism 行为主义 264
- Bukharin 布哈林 120
- Bureaucracy 官僚制,科层制 108,112,244
- C**
- Caligula 卡里古拉 12
- Capital* 《资本论》 28,36,37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4,207
- Capitalist economic relations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6
- Catholics 天主教徒 7
- Character 性格,特征 264
- Charismatic leaders 超凡魅力的领导 115
- Chile 智利 276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7,23,136
- Class struggle 阶级斗争 84,88
- Classes 阶级 106
- 308 'Closed mind' personality “封闭性心理”人格 8,13
- Cognitive dissonance 认知失调 6,13

- Collateral 抵押物,担保品 44
-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 88
- Commodities 商品 75
- Commodity economy 商品经济 186
- Commodity fetishism 商品拜物教 40,56,79
- Commodity, human 人作为商品 53,165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12,54,108,226,236
- Communist bureaucracy 共产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 251
-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239
- Compulsory labour 强制性的劳动 102
- Conceptual apparatus of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tion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 55
- Conformism 因循守旧,尊奉主义 151
- Consumer society 消费社会 261
- Contemplation 思辨,沉思 26
-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32
- Counter-revolution 反革命 174,272
- Creativity 创造性 201
- Crime 罪行 181
- Cult of the individual 个人崇拜 115,128,242
- Cultural alienation 文化的异化 178
- Cultural goal 文化目标 147
-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268
- Cultural structure 文化结构 147,173
- D**
- Davidov, J. N. J. N. 达维多夫 4
- Delinquent subculture 问题青年亚文化 182

- de Man 德·曼 70
- Democracy 民主 130,237,245
- Demographic explosion 人口激增,人口爆炸 255
- Demonology 魔鬼学,魔鬼研究 12
- Deviant behavior 越轨行为 155
-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 82,83
-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专政 130
- Disalienation 扬弃异化 47,66,104,222,259
- of human activities 扬弃人之行为的异化 203
- Dissatisfaction 不满 185
- Divine Spirit 圣灵 25,26
- Division of labour 分工 46,103,105,204
- Durkheim, E. E. 涂尔干 142,155
- E**
- Ecology 生态学 254
- Economic alienation 经济的异化 81,86,99
- Economic formation of society 社会的经济结构 3,278
- Economy 经济 289
- Ecstasy 狂喜迷幻药 26
- Ego 自我,本我 166,183,258
- Egoistic suicide 自负性自杀 144
- Eisler dictionary 艾斯勒辞典 2
- Elections 选举 174
- Engels, F. 恩格斯 100,106,110,235
- Entäusserung 外在化,外化异化 2,3,18,25,26,28,29,52,56,
58,78
- Entfremdung 异化 2,3,18,25,29,52,56,58
- Entrepreneur 企业家 116

Escape 逃避, 逃逸 173

Escape from freedom 《逃避自由》 164

Escape into oblivion 躲进遗忘 180

Essence of man 人之本质 10, 34

Estrangement 疏远, 疏离 50, 52

Ethical socialism 伦理社会主义 4, 70

Existential vacuum 存在的空虚, 生存空虚 195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73, 86

Externalization 外化 30

F

Fashion 时尚, 方式 186

Fetishism 拜物教 41, 79

Feuerbach's philosophy 费尔巴哈的哲学 24, 31

Forced labour 强制劳动 102

Frankl, V. V. 弗兰克尔 197

Free creativity 自由创造 206

Free time pollution 空闲的堕落, 无所事事的堕落 262

Freedom 自由 164

Fromm, E. E. 弗洛姆 91, 105, 159, 163, 194, 264

G

Gattungswesen 类存在物 33

Grundrisse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37

H

Hegel 黑格尔 25, 28, 68

History of ideas 观念史, 思想史 24

Honoratioren 显贵, 绅士 115

Human commodity 人作为商品 53, 165

Human condition 人的条件,人的境况 72,78,222

Human labour 人的劳动 100

Human nature 人性,人的本质 51,187

Humanism 人道主义 68

I

Identity with oneself 自我认同 166

Ideology 意识形态 135,288

309 Idolatry 偶像崇拜 168

Individual alienation 个体的异化 158,183,195,200

Inhuman life 非人道的生活,非人的生活 64

Innovation 创新,革新 151

Internalized goal 内在的目的,内化的目的 196

Isolation 孤独,隔离 159

J

Juvenile crime 青少年犯罪 182

K

Kantianism 康德主义,康德哲学 83

Kenosis 神性放弃 25,28

L

Labour 劳动 201

Labour's product 劳动产品,劳动者的产品 101

Language 语言 135

Leadership 领导,领导权 117,118,126,243

Lenin 列宁 107,132,231,240,245

Life activity 生命活动 100

Living labour 活劳动 42

Logotherapy 意义疗法,言语疗法 197

Loss of realisation 非现实化 52

Lukács 卢卡奇 76

M

Man for Himself 自为的人,为自己的人 166

Man-nature 人与自然 27,254

Managing of things 物的管理 234

Manuscripts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48,100

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185

Marketing orientation 市场取向,以市场为定向 167

Marx on alienation 马克思论异化 24

Marx theory of alienation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2,3,23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异化理论 32

Capital 《资本论》中的异化理论 36,37

the conceptual apparatus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 55

fate of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命运 82

Grundrisse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异化理论 37

Manuscripts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48

The German Ideology《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理论 45

The Holy Family《神圣家族》中的异化理论 45

Marxism, alienation under socialism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 218

Marxologist 马克思学家 16

Mastery of the masses 掌握群众 262

Meaning of life 生活的意义,生存的意义 196

Means of subsistence 生活资料 100

Medieval literature 中世纪文学 26

Merton, R. K. R. K. 默顿 146

Michel, R. R. 米歇尔 113,116

- Money 货币,金钱 44
- Motivation 动机,动力 202
- Multiparty system 多党制 129
- N**
- Narcotics 麻醉药,镇静剂 180
- National unity 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288
- Natural rights school 自然权利学派 27,29
- Nature and man 自然与人 254
- Nazism 纳粹主义 164
- Negation of productivity 生产力的否定 169
- Neuroses 神经机能症,神经官能症 190,194,198
- Nowacka, T. T. 诺瓦茨卡 7
- O**
- Objectification 对象化,客观化 56,61,75,82
- Objectified labour 对象化劳动 42
- Objective alienation 客体的异化 4,30,65,86,98,210,262
- Ogurtsov 奥古尔佐夫 4,70
- Oligarchy 寡头政体 118,119
- Organizers 组织者,发起人 120
- P**
- Parliamentary party 议会党 240
- Party bureaucracy 政党官僚制 116
- Party ideology 政党意识形态 288
- Patrons 赞助人 115
- Peaceful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273
- People's state 人民的国家 111
- Permanent revolution 不断革命 267
- Personalism 人格主义 86

- Personality, socially shaped 社会塑造的人格,社会地形成的人格
258
- Personality traits 个性特征 161
-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异化现象 224
- Philosophical language 哲学语言 32
- Physical compulsion 暴力强制,人身强制 285
- Planning 计划 220
- Polish working-class movement 波兰工人阶级运动 9
- Political alienation 政治异化 81,88,174,244
-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116,239
- Political revolution 政治革命 272
- Pollution 污染,堕落 254
- Power 权力 108,244
- Powerlessness 无力,软弱 175,212
- Practical movement 实践运动 84
- Praxis group 实践派 72
- Predicament of mankind 人类困境 254
- Private ownership 私有制 14,76,207,226
- Private property 私有财产 99
- Producers' self-government 生产者的自治制度 237
- Product commodities 产品商品 226
- Product of labour 劳动产品 50,102,208
- Production 生产 212
- Productive activity 生产活动 40,52
- Psychic illness 精神疾病 189
-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 组织心理学 118
- Public opinion 舆论,民意 129

R

- Rational argumentation 合理性论证 7
- Raw materials 原材料 256
- Rebellion 反叛,造反 152,173
- Reification 物化 44,56,74,82
- Relation of man to nature 人与自然的关系 27,254
- Religion 宗教 7,135
- Religious domination 宗教统治 85
- Retreatism 退却主义,逃避现实主义 151,173,180
- Revisionists 修正主义者 2,5,19
- Revolution 革命 151,271,277
- Ritualism 形式主义,程式主义 151
- Rotation of personnel 岗位轮换制 128
- Rousseau 卢梭 27
- Ruling class 统治阶级 106
- Ruling party 执政党 286
-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俄国社会民主 83
- S**
-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 190
-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经院主义 65,72
-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国际 83
- Seeman, M. M. 西曼 159
- Self-alienation 自我异化 30,43,47,48,53,56,62,73,86,
141,258
- Self-estrangement 自我疏离,自我异化 49,160
- Self-government 自治 122,237,251,290
- Self-identification 自我认同 184,189,194
- Sexual customs 性习俗 179
- Single-party system 一党制 129

- Smashing the state machinery 打碎国家机器 131
- Social action 社会行动 9
- Social activity 社会活动 47
- Social character 社会性格 264
- Social consciousness 社会意识 33
-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27,29
- Social control 社会控制 129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116,117
- Social development 社会发展 60
- Social engineering 社会工程 219
- Social foundation 社会基础 170
-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man 社会机构(制度)和人 230
- Social pathology 社会病理学 167
- Social planning 社会计划 220
- Social power 社会权力,社会力量 47
- Social relationships 社会关系 150
- Social revolution 社会革命 271
-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结构 149,173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207,226,277
- and alienation 社会主义与异化 10,19,218,225
- Socialist humanism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88
- Socialist man 社会主义的人 259,289
- Socialist revolution 社会主义革命 87,134
- Socially shaped personality 社会塑造的人格,社会地形成的人格
258
- Sociology of parties 政党社会学 116
- Socio-economic formation 社会经济结构 32
-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s 社会政治机构 106

- Soviet government 苏维埃政府 245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11,88
State 国家 106,230,231
State machinery 国家机器 131
Stigma 耻辱,污名 193
Struggle for power 夺取政权的斗争,权力斗争 241
Subcultures 亚文化 182
Subjective alienation 主体的异化 65,72,86,141,210
Suicide 自杀 142,155
Surprise 惊异,惊奇 2
Syndrome of alienation 异化综合征,异化的典型表现 161

T

-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 45
The Economic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of 184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48
The German Ideology 《德意志意识形态》 45
The Holy Family 《神圣家族》 45
Trade unions 工会 176,246
Troglydtes 类人猿 8
True believers 笃信者,忠实信徒 8,13

U

- Universal man 全面的人 262

V

- Veräußerung 外化 56,58

W

- 311 Wage labour 雇佣劳动 41,100
Wandering of ideas 观念的游荡,观念的徘徊 28
Weber, M. M. 韦伯 113

Work 工作 201

Work disalienation 工作的非异化 203

Worker's self-government in production 生产中工人的自治 213

Working class party 工人阶级政党 240

Y

Yugoslav government 南斯拉夫政府 238